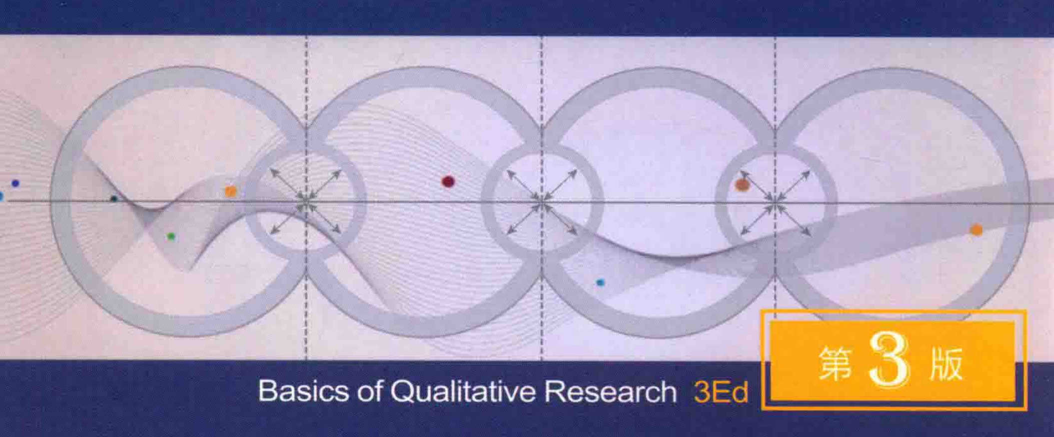


研究方法・基础应用

质性研究的基础：形成扎根理论的程序与方法



第3版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3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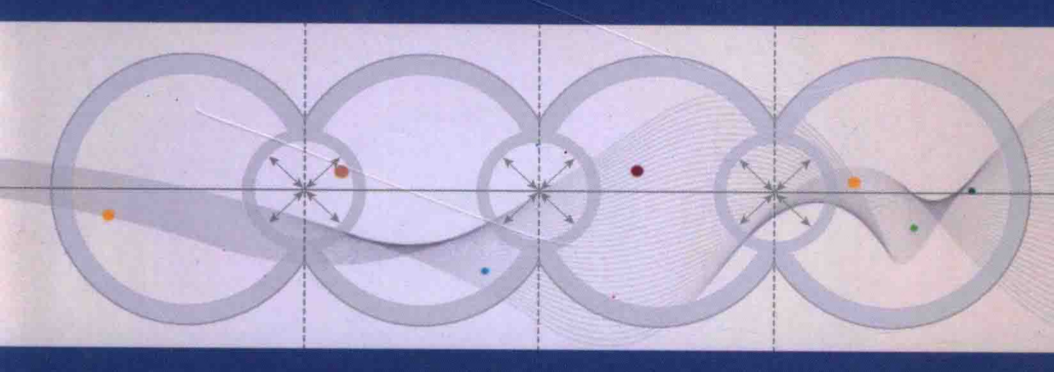
朱丽叶・M.科宾（Juliet M.Corbin）
安塞尔姆・L.施特劳斯（Anselm L.Strauss） 著
朱光明 译





ZHIXING YANJIU DE JICHU

从多种提出问题的形式，到编码和分析，再到报告研究结果——本书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为研究者提供了手把手的指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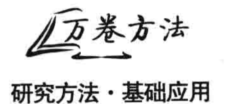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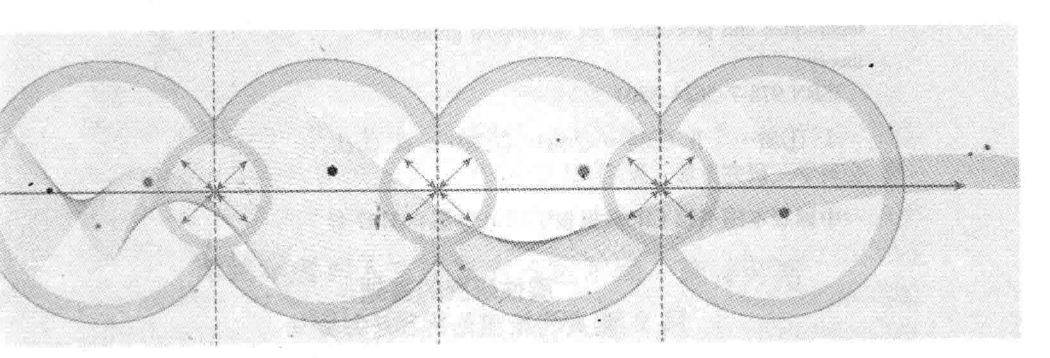
总策划：雷少波 林佳木 邹 荣

定价：49.00元



研究方法·基础应用

质性研究的基础：
形成扎根理论的程序与方法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3Ed

朱丽叶·M.科宾（Juliet M.Corbin）
安塞尔姆·L.施特劳斯（Anselm L.Strauss） 著
朱光明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质性研究的基础:形成扎根理论的程序与方法/(美)科宾(Corbin,J. M.),(美)施特劳斯(Strauss,A. L.)著;朱光明译. —3版.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2

(万卷方法)

书名原文: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for developing grounded theory

ISBN 978-7-5624-8801-9

Ⅰ.①质… Ⅱ.①科… ②施… ③朱… Ⅲ.①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Ⅳ.①C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003137号

质性研究的基础:

形成扎根理论的程序与方法

第3版

朱丽叶·M.科宾
安塞尔姆·L.施特劳斯 著
朱光明 译

策划编辑:雷少波 林佳木 邹 荣
责任编辑:邹 荣 版式设计:邹 荣
责任校对:邹 忌 责任印制:赵 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邓晓益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邮编:401331
电话:(023)88617190 88617185(中小学)
传真:(023)88617186 88617166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自贡兴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940×1360 1/32 印张:12.875 字数:345千
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 000
ISBN 978-7-5624-8801-9 定价:49.00元

献给学者和人文主义者安塞尔姆·施特劳斯
1916 年 12 月—1996 年 9 月

他触动了那些曾与他接触的人们的心灵，并影响了
他们的生活

代序/陈向明

通过研究实例展示扎根理论的发展

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是由两位美国学者巴尼·格拉泽(Barney Glaser)和安塞尔姆·施特劳斯(Anselm Strauss)在1967年出版的合著《扎根理论的发现》中首次提出的(Glaser & Strauss, 1967)。此后,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两位创始人以及他们的同事和学生对这种研究路径(approach)进行了一些修改,也出版了不少专著,包括专门讨论扎根理论方法论的书籍和实地研究的案例(Glaser, 1978, 1992; Glaser & Strauss, 1965, 1968; Strauss, 1987; Strauss & Corbin, 1990; Strauss et al. 1975, 1985;卡麦兹,2009)。本书即施特劳斯的学生朱丽叶·科宾(Juliet Corbin)在两人1990年合著的同名书基础上,修改后形成的第3版发表于2008年。施特劳斯于1996年去世,目前第3版的第一作者由他改成了科宾,他成了第二作者。该书的第2版发表于1998年,2014年出版了第4版。由于翻译滞后,我们目前看到的这个译本是该书的第3版。

扎根理论并不是一种实体理论,而是一种研究的路径(approach)(潘慧玲,2005),或者说是一种"方法论"(methodology)(Corbin & Strauss, 2014:6)。它可以被看作是质性研究领域众多路径中的一种,其他路径有:民族志、现象学研究、叙事探究、话语分析、传记研究等(陈向明,2000)。它与其他路径的最大不同在于:研究的目的是从经验资料(empirical data)中生成(generate)理论,而不只是描述和解释研究现象,或针对被研究者的叙事结构、话语特征或生活史进行分析。因此,研究者需要时刻保持生成理论的心态,采取"理论性抽样"的标准(而不是人口学变量的标准),根据生成理论的需要选择研究对象,系统地收集和分析资料,从资料中发现、发展和检验理论。在生成扎根理论的过程中,研究者也需要借鉴学术界已有的理论,在经验研究、个人知识和前人理论之间形成对话。扎根理论研究的结果是对现实的理论

呈现,因此需要研究者采用具有一定抽象程度和概括性的语言对结果进行表述。

扎根理论的提出,基于格拉泽和施特劳斯对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学界三种主要趋势的批评(Glaser & Strauss, 1967)。其一,大部分学者习惯于照搬已有学术大师的"宏大理论"(grand theory)(如韦伯的科层制理论、涂尔干的自杀论等),使用逻辑演绎的方法,通过自己的经验研究对其进行验证或局部修改。这么做的结果是导致"理论资本主义"(theoretical capitalism)的形成,极少数学术大师垄断了理论的生产,而大部分学者则沦为验证这些理论的"无产阶级"。其二,绝大部分人类学和民族志研究仅仅局限于对研究现象进行"印象式"的描述,没有形成明确的理论阐述。这类文本虽然生动有趣,但研究结论稀松、平常,难以与学术界其他理论对话,也难以被世人记住。其三,一些研究虽然提出了不错的理论,但没有介绍理论生成的方法、步骤和过程。而扎根理论研究者认为,衡量理论是否可信和好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理论生成过程的判断。如果不知道这些理论是如何生成的,则很难判断其可信性,更不知如何运用。因此,扎根理论研究希望在理论和资料的鸿沟之间架起桥梁,在经验资料、已有文献和研究者个人知识的基础上,通过系统的资料收集和资料分析生成理论。

扎根理论的理论基础是社会学中的符号互动论和哲学中的实用主义(Glaser & Strauss, 1967)。前者认为,社会、现实和自我都是由人们的行动和互动建构的,因此需要通过行动者的视角理解他们的世界。后者认为,事实和价值是相互关联的,有用的知识才是真知识;世界是一个整体,而且是丰富多变的,需要通过观察、实验等系统的方法从变动不居的经验事实中提炼理论。根据格拉泽的观点,扎根理论研究归根结底要做的就是:呈现行动者在处理某个问题时的行为变异(variation),找到各种可能的行为模式(pattern),并将这些模式用理论的形式表达出来(Glaser, 1978)。

在本书的第1版,施特劳斯和科宾对扎根理论的资料编码进行了详细的阐述(Strauss & Corbin, 1990)。他们不仅介绍了三级编码的步骤(开放编码、轴心编码、选择编码),而且提供了一些提高研究者理论敏感性的技术。在轴心编码阶段,他们还提出了一

个编码范式模式（paradigm model），将不同类属联结起来：（A）因果关系——（B）现象——（C）情境——（D）中介条件——（E）行动/互动策略——（F）结果。科宾在本书的第3版中，对这个模式进行了修改，在“行动/互动”部分增加了“情感”的内容。此外，她还引用了沙茨曼的“解释范式的矩阵”，使分析的层次更加丰富：

（从）视角

（属于）维度—属性

（在……中）情境（在……下）条件

（具有）结果的行动/过程

格拉泽与施特劳斯的编码思路有所不同，只有两级：开放编码和选择编码，分别对应两类代码：实质代码和理论代码（Glaser，1978）。开放编码对研究领域内的经验实质进行概念化，形成实质代码；而选择编码则将实质代码通过假设联结起来，整合为理论。为了帮助研究者实施选择编码，格拉泽根据社会学分析的一般通则，提供了18个理论代码家族。

也许是由于学界对扎根理论提出了过于技术化、程序化的批评，也许是后来受到建构主义和后现代思潮的影响（科宾在本书前言中有所提及），科宾在第3版对本书的内容进行了大幅度的修订。除了在章节开篇保留了三级编码的概念定义，正文中不再涉及具体编码的程序和技术，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灵活、多样的备忘录，呈现了作者为开设扎根理论课程而专门从事的一项研究的具体过程。作者在施特劳斯生前对一位曾经在越南作战的美国老兵的访谈资料的基础上，通过网络又联系了两位受访者，一位曾经在越南作战，一位曾经在其他地方作战。为了呈现当时美国政府发动越南战争的初衷以及各类参战人员的思考和感受，她还广泛收集了当时的政府文件以及市面上已经出版的回忆录和小说。通过对这些资料的连续性分析，她最终形成了一些非常有趣的概念类属及其属性。

通读全书后，我认为，本书最出彩的部分是第8章到第12章。这五章系统地介绍了作者对越南参战老兵进行研究的具体步骤、方法、过程和结果，内容分别是：形成概念，阐明分析过程，分析情境，将过程纳入分析，整合类属。作者主要通过撰写备忘录，对所收集到的资料进行“微分析”，将研究一步步往前推进。读者会看到，有时作者一天会连着写若干个备忘录，不断对资料进行概念

化、类属化,寻找类属的属性和维度,并在不同类属之间建立联系。更为有趣的是,作为一位女性研究者,科宾甚至提到,自己某天做饭时突然灵光乍现,赶紧坐下来记下这宝贵的灵感。

正是如此这般的内容,使本书与第1版相比,几乎可以说变得“面目全非”了。作者如此大刀阔斧地对原书进行修改,在我看来,至少说明了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扎根理论的资料来源可以是多样的、不拘一格的。研究者既可以自己亲自到实地收集资料,也可以通过网络收集资料;既可以借用其他研究者的资料,也可以使用政府文件和图书馆、档案馆的资料;既可以将新闻和文学作品作为素材,也可以借助研究者自己的个人轶事。其实,这一点在扎根理论的两位创始人那里一直是得到认可的,科宾在此只是身体力行而已。

第二,作者似乎在暗示:三级编码不一定是必需的。在我看来,虽然三级编码的技术确实能够帮助初学者较快地形成分析思路,但分析的方法可以是丰富多样的,既可以逐字逐句地进行编码,也可以写备忘录、画图表,还可以等待灵感的降临(当然,如帕斯卡尔所言,灵感不会光顾没有准备的大脑)。此外,编码其实不必局限于三级,分析的上限可以是无止境的,可能会有第四级、第五级。重要的是研究是否提出了新颖的理论,理论是否能够有效地解释研究现象,理论生成的各个环节是否具有逻辑连贯性,理论的内容是否密实并具有较好的整合度,是否有足够的资料作为支撑。

不过,虽然如此猜测并表态,我心里还是有点犯嘀咕:扎根理论(至少施特劳斯版本的扎根理论)的长处就在其系统的分析步骤和编码技术,而本次修改幅度却如此之大,几乎看不到任何具体的编码步骤和过程。然而,科宾却仍旧将施特劳斯作为作者之一(虽然从第一作者变成了第二作者)——这不禁令我怀疑:如果施特劳斯还健在,是否会同意科宾所做的修改?不过,通过比较本书的第1版和第3版,我发现它们各有长处。前者对三级编码技术和分析步骤介绍得非常详细,并列举了具体实例加以说明。而后者对通过写备忘录推进资料的分析、形成理论性抽样的标准等提供了一系列范例,有利于读者开拓思路。也许,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有选择地阅读,也可以结合阅读二者,获得相得益彰的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在2014年出版的本书第4版（Corbin & Strauss, 2014）中，科宾将第1版和第3版的内容进行了有机的整合。第4版的内容被分成三大部分，共19章。第一部分有11章，对扎根理论的概念和方法做了系统介绍。第1—2章讨论了质性研究的定义和功能，以及作为一种质性研究方法论的扎根理论及其理论基础等问题。第3—4章探讨了如何提出研究问题，如何收集资料，如何处理伦理问题。第5—10章介绍了三级编码（开放编码、轴心编码、选择编码）的过程，包括概念类属的形成，理论抽样的标准，写备忘录和画图表的方法，对情境和过程进行分析，整合理论的思路等。第11章介绍了如何使用计算机程序对资料进行分析。第二部分有5章（第12—16章），通过作者对美国赴越南参战老兵的研究实例展示了扎根理论研究的具体过程。这个部分的内容与第3版中第8—12章十分类似，但更加明确地呈现了形成类属、属性和维度的过程，而且增加了作者对研究方法的反思，在提供一系列备忘录的同时，专门提供了方法笔记和个人日记。第三部分（第17—19章）探讨了如何写作扎根理论的报告和论文，如何衡量扎根理论研究的质量，并回答了学生们经常问的一些问题。在每章后面，作者都提供了参考文献、可思考的问题和复习作业，有的章节后面还提供了作者的学生对本章内容的反思。我感觉，第4版大大丰富了扎根理论研究的内涵，很好地结合了第1版和第3版的精髓。由于目前我们还没有翻译第4版，因此有机会了解第3版的内容，对有兴趣的读者应该也会十分有用。

将本书引入我国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扎根理论在国际社会科学研究界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在质性研究的各种路径中，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扎根理论是除了民族志之外，最早且最具影响力的研究路径。其他路径都是晚近兴起的，而且（除了现象学研究）都可以将扎根理论作为一种分析资料的方法。此外，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界虽然对扎根理论有所了解，但对其作用存在一些误解（如将扎根理论仅仅当做一种分析资料的方法），而且对这种研究路径的操作技术也不够娴熟。虽然近年来质性研究在我国不断升温，但绝大多数初学者的研究仍停留在描述层次，理论提升的意识和能力有待提高。希望通过本类书籍的引介，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能够对扎根理论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在经验资料与理论

建构之间架起桥梁,超越“理论资本主义”和“猎奇式”描述,创造更多符合我国国情的、扎根于我国本土实践的理论。

参考文献

陈向明. 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

卡麦兹. 建构扎根理论[M]. 边国英,译.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

潘慧玲(主编). 教育研究的取径:概念与应用[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Corbin, J. & Strauss, A. (2014). *Basics of Grounded Theory: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for Developing Grounded Theory*. 4th ed. Thousand Oaks: Sage.

Glaser, B. (1978). *Theoretical Sensitivity*. Mill Valley: The Sociology Press.

Glaser, B. (1992). *Emergence vs Forcing: Basics of Grounded Theory Analysis*. Mill Valley: Sociology Press.

Glaser, B. & Strauss, A. (1965). *Awareness of Dying*.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Glaser, B. & Strauss, A. (1968). *Time for Dying*.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Glaser, B. & Strauss, A. (1967).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Strauss, A. (1987). *Qualitative Analysis for Social Scientis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trauss, A & Corbin, J. (1990).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Grounded Theory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 Newbury Park: Sage.

Strauss, A. et al. (1975). *Chronic Illness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St. Louis: The C. V. Mosby Company.

Strauss, A. et al. (1985). *Social Organization of Medical Work*.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作者简介

朱丽叶·科宾(Juliet Corbin)(护理学硕士,护理学博士,家庭护理师)是圣何塞州立大学(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大学的护理学院社区卫生护理专业的一名临床指导教师。她与安塞尔姆·施特劳斯合作撰写了《质性研究的基础》(1990)第1版和第2版、《无尽的工作与护理》(*Unending Work and Care*,1998)和《构造一个新的卫生保健系统》(*Shaping a New Health Care System*,1988),以及《实践中的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 in Practice*,1997)等作品。她的研究兴趣、教学、演说和著述都是在质性研究方法论、慢性病以及社会工作等专业领域内。

安塞尔姆·施特劳斯(Anselm Strauss)出生于1916年12月18日,于1996年9月5日去世。去世时,他还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弗朗西斯科)社会和行为科学系的荣誉教授。他的研究和教学活动都是在健康和疾病社会学(sociology of health and illness)等专业领域中。他做研究的取向是质性的,目的是要建构理论,他和巴尼·格拉泽(Barney Glaser)是扎根理论的重要奠基者。很多年,他一直是剑桥大学、巴黎大学、曼彻斯特大学、康斯坦斯大学、哈根大学及阿德雷德大学(Adelaide)的访问教授。他一生撰写了大量的论文和著作,其中很多被翻译成其他语言。他与其他作者合作完成的著作有《死亡的意识》(*Awareness of Dying*,1965),《镜子和面具》(*Mirrors and Masks*,1969),《专业、工作和职业》(*Professions, Work and Careers*,1971),《谈判》(*Negotiations*,1978),《医学工作社会组织》(*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Medical Work*,1985),《无尽的工作与护理》(*Unending Work and Care*,1988),以及《行为的连续排列》(*Continual Permutations of Action*,1993)。在他正式退休之后,他仍然积极地进行研究和写作,直到生命结束之际,其研究主题包括医院工作和社会学视角中的身体。

前言

> 在我的理性深处也许就是这样的感觉——社会现象世界是错综复杂的，无论你认为这一想法是多么天真。复杂性既让我着迷，又困惑了我大半生。如何阐明部分的复杂性，整理它，而不是对它感到沮丧或被它打败？如何不要因为过分简化了其存在而回避其复杂性或扭曲了对其的阐释？当然，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抽象化（理论）必然是简化的，然而为了深入理解，为了梳理，某种程度的抽象又是必需的。如何在扭曲和概念化之间保持一种平衡？（Strauss，1993，p.12）

每当作者被要求去修订一个文本时，总有这样一些人（包括我们自己），他们会说："还需要再修改吗？在过去的版本中，一切不都已经说过了吗？"我曾经就是这样想的，然而当我阅读本书第2版的时候，我意识到，自从本书出版以来，无论是质性研究领域还是我自己，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当我阅读现今有关质性研究的文献时，似乎我的理性是在恐龙时代学习成长起来的。带着我内在的价值、信念、态度，以及我的专业知识和时代，我相信我所听到的，并将其记录下来。但是有一天，我环顾四周，竟然发现自己已经被贴上了"后实证主义者（post-positivist）"的标签（Denzin，1994）。"哦，亲爱的，"我想，"我已经被归类并贴上了标签，就像我们在质性研究中所做的那样。"这看起来就像是在我平常去上班的时候，却发生了一场质性研究革命。作为这场变命的一部分，"解释（interpretation）"这个从前质性研究中的"代名词（by-word）"。变得"过时了（passé）"。新的质性研究术语集中在让参与者为他们自己说话。而且，现在人们能够接受"追求本土化（go native）"，而这在过去则会受到严厉的指责。事情变得更糟

糕。我了解我的研究世界,像蛋形人(Humpty Dumpty)*那样,当“客观性”这个概念因为不可能实现而消失了的时候,我的研究世界崩溃了。与成为“客观的研究者”相反,后现代运动恰恰将研究者置于研究的中心位置。然而,对我的研究认同最致命一击的是,有人认为,能在资料中把握“实在(reality)”的观念(notion)只是一种幻想。一切都是相对的,因为有“多重视角”。后现代时代已经来临,一切都已经“被解构”和“重构”。

毫无疑问,当我听到这些新的理念时,我只是有点儿愤怒,也有点儿担忧。我担心研究者会变得“过分关注他们自己的肚脐眼(navels)”以及“讲述动听的故事”,以至于忽视了研究的目的和责任(至少从我的观点来说),而这样的结果只会使他们成为一个生产经验化知识的专业躯体。最重要的是,我担心,无论质性研究在“科学世界”中已经积累了什么样的信度,它们都将变得松散。然而,随着我思考的深入,我意识到“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和“建构主义”学派思想提出的有些观点有其合理性。随着我最初研究的“泡沫破灭”,我想知道还留下了什么。我得加上这样的“坦白”,在过去的这几年中,我在世界各国做了大量有关如何做分析的教学活动,而和学生的互动也有助于形成我对质性研究的新理解。

直到有人请我写本书的第3版,我才开始考虑将我的这些想法集中在一起重新思考。在为本书拟定写作提纲的时候,我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有:方法是什么?它们仅仅是一系列的程序吗?或者它们只是一些几乎不包括任何程序的哲学取向?程序在研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它们是指南,或只是一套大致的思想?需要给学生什么样的组织结构以及给予多少?研究者的角色是什么?在讲述参与者的故事的时候,研究者如何才能够得到承认?诠释的范围应该有多大?

在写作新版本中,我面临的挑战之一是本书中我作为一名研

---

* 蛋形人(Humpty Dumpty)是英语童谣中的一个人物形象,也曾在《爱丽丝漫游仙境》中出现,在英语世界几乎是家喻户晓。——译者注

究者的定位。我接受的训练就是成为一名扎根理论学者。在我学习的时期,恐怕只有一种“扎根理论”取向,尽管这个观点有待商榷。过去这么多年,最初的扎根理论已经发展出很多不同的取向,它们都是扎根于资料以建立理论。每一种发展都是一种对原初方法现代化改革或扩展的尝试,从而使得扎根理论和当代思想更加一致。我还想坚持安塞尔姆·施特劳斯的方法论愿景,虽然他现在已经去世,但是直至去世,他一直相信理论的价值及其对任何专业知识发展的重要意义。然而,我不再相信理论建构是发展新知识的唯一途径。

深描、案例分析、改变困境以及讲故事,这些对于做研究都是合理的原因。每一种形式的研究在其自己的方式上都具有说服力。我开始意识到,为了真实对待施特劳斯的愿景,同时仍然坚持我自己的信念,本书中,除了理论建构,我必须要找到一种办法以容纳其他的研究目标。然而,正如本书前言对施特劳斯的引用所指出的,依然存在整体的复杂性问题。由于复杂性对施特劳斯来说太重要,所以本书中所呈现的方法无疑需要提供一种理解某种复杂性的途径。换句话说,我必须要寻找一种途径,将科学的艺术、解释和复杂故事的讲述——这些品质肯定是施特劳斯写作的特点——融合在一起。那些非常了解施特劳斯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位讲故事的大师,不过也没有人会否认他的著作在科学上的贡献。

不用说,考虑到这些,我担心自己是否敢于面对第3版写作所面临的挑战。当我开始坐下来写作的时候,我是相当害怕的。我犹疑不决、开始着手写作,然后又重写,就像一个人在思想实验时所做的一样。但是当我进入写作的“最佳状态”时,我发现自己在享受这个过程。我发现,我不是在描绘一整套新的方法,而是在将一直伴随着我成长的方法进行现代化的改造(modernizing the method),去掉一些教条,使一些程序更加灵活,甚至考虑如何通过计算机改进研究过程。

在《质性研究的基础》第3版写作过程中,我尽可能将安塞尔姆的愿景记在心中。我的目的并不是再造他的方法去分析,而是

要将老版本中有价值的东西和当代思想的某些方面结合起来。我并不希望被贴上一个“这个”或“那个”的标签,因为一旦使用了标签,往往就摆脱不掉。标签不会考虑时代在变化、知识在变化,尤其是,和这些变化一起的人也在变化。

本书建立在这样的信念基础之上,即尽管从一套资料中能够建构多种解释(我自己就是这么做的),但创造概念依然是一种有益的研究贡献。这里的有益是因为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它增进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他们日常行为、习惯、疑惑及议题,以及他们如何处理或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解;其次,概念提供了一种用来研讨和争论的语言,从而促进共同的理解和意义的形成。这些理解能够用来建立一种专业知识,并可以用来改进实践。

《质性研究的基础》第3版并不是一本做质性研究的食谱,而且我也反对别人这么看待它。它只是呈现了一套分析的技术(techniques),我们可以用这些技术使得一大堆资料变得有意义。我们鼓励研究者用自己的方式来运用这些程序(procedures)。然而,有一件事情我需要特别强调。研究者应在研究的一开始对研究要走向哪里非常清楚。如果研究目标是描述,那么,很好,就朝着描述的方向做。我只是希望研究者去做“高质量的”描述,使用这本书应该有助于他们的描述。然而,如果研究目标是形成理论(develop theory),就应该整合研究发现,从而形成一个良好解释力的一般理论模型。大多时候,人们做的是描述,却称之为理论,这让读者对什么是理论、什么不是理论感到非常困惑。

如何做质性分析并不是一件能够“被教(dictated)”的事情。做质性研究需要研究者自己去感受。书本只能提供一些理念和技术(techniques)。个人要自己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方式来运用这些程序。

读者会注意到,在本书的第1部分使用了人称代词“我们”,而在本书后半部分,人称代词变成了“我”。请不要感到疑惑,这是有原因的。本书的第1部分,包括所有的方法论步骤的章节,都是建立在安塞尔姆·施特劳斯和我一起工作的成果基础之上——很多在本书先前的版本中都出现过。本书后半部分主要是

使用越南战争的材料来展示如何作分析。这些都是新的章节,由我个人承担全部文责。虽然安塞尔姆·施特劳斯已经去世好几年了,但他依然对本书影响巨大。在过去的十五年中,我们一起合作,因此,很难将我的观点和他的观点区分开。时代已经发生变化,我也一样,但是本书中所有的语言都建立在他对我教导的基础上。我希望,在这一版中,我能忠实于他,也忠实于现在的我。对于安塞尔姆来说,本书中的方法和步骤不只是一种做研究的方式,也是他了解生活的方式。

在第3版中增加了一些新的特点。首先,该书在分析上更加开放,反映了我自己身上发生的变化。其次,第1章一开始就说明了本书呈现的研究理路的理论基础。虽然这一章是在安塞尔姆去世前几年写的,本来要作为第2版的组成部分,但在付梓前,这一章的理论部分却被编辑删除了。也许是编辑认为它对于一本入门书而言太过于理论化了,而且为了压缩出版成本,必须要删减文字。第三,本书读者不只限于那些想要建立理论的人。理论建构是一个很长的过程,需要很多的分析步骤。使用本书的人可以不必读到理论建构的最后一步也能做出高质量的研究,只要他们清楚自己并不是要去建构理论。本书中有一章专门讨论理论建构,但是很多分析的章节是专门针对那些对深描、概念分析或者只是对提炼主题感兴趣的研究者的。第四,在该版本中,不是仅仅谈论分析,我是真正地在做分析——带着读者从概念发现(concept identification)到理论形成(theoretical development)一步一步地分析。第五,和前面版本不同,这次在每一章的末尾都安排了一些练习来强化学习。第六,本书中还对如何利用计算机程序进行分析作了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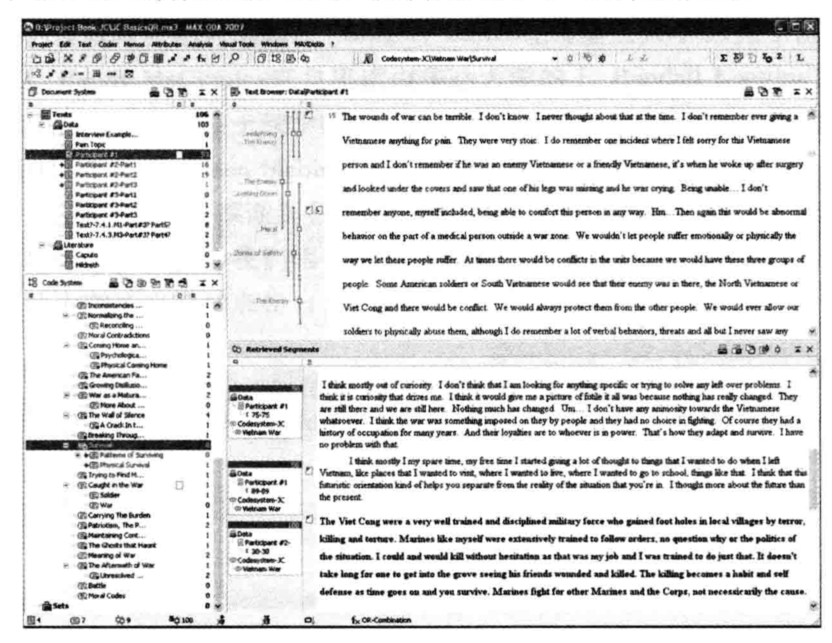
在我过去的岁月中,每一次教学的研讨班上,必然都会遇到关于在质性分析中使用计算机程序的议题。虽然计算机程序的使用在质性研究中是有争议的,而且有些研究者是坚决反对的,但却不能因此而忽视。这里保留了用来研究分析的计算机程序,而且在现有的很多程序中,随着每一次的改进,它们对研究过程的支持能力在逐渐增加。注意,我说的是“支持(support)”而不是

“代替(take over)”或“指导(direct)”研究过程。我认为,此次版本最有趣的方面之一就是书中虽然增加了计算机程序的运用这一部分,但分析过程仍然是一个研究者驱动(researcher-driven)的思考及体验的过程。这一点非常重要。计算机程序的使用者有时候僵化的运用了分析程序,这是不必要的。应该由演进中的分析来决定研究者如何使用计算机程序,而不是相反。没有理由将分析限制在计算机程序的能力范围之内。和本书中呈现的很多其他分析工具一样,计算机程序只是工具。它们能够提高研究者搜索、存储、分类以及检索材料的能力;它们有助于研究者跟踪自己的编码,为查看备忘录提供便利,以及辅助制作图表。而且,在分析过程中,研究者不需要过早地投入一个确定的分析框架中去,因为计算机程序允许研究者不断移动材料,以其他方式去思考它们。一切尽在研究者的掌控之中。不再需要翻箱倒柜地从纸盒或笔记本中查找重要的备忘录。最后,计算机程序让研究过程变得透明。研究者能够追溯整个分析过程,这在二十年前是不可能的。对于那些对“信度”感兴趣的研究者,计算机程序能够提供“审查跟踪(audit trail)”,能够追溯计算机程序分析过程,使得无论是在分析期间还是在分析结束评估研究过程都更加容易。不要忘记,研究者打算投入到分析中的劳动越多,研究的发现才越好。研究者必须要在过程中思考和感受自己的研究方式。计算机程序提供了一种选择、一种工具、一种辅助分析的手段,不要因它而转移了对分析过程的注意力。计算机程序并不是本方法的组成部分,也不是完成本书中的练习所必需的,只是放在其中作为一种选择。

本书中使用的计算机程序是 MAXQDA (Kuckartz, 1988/2007)。作者在此并不主张某种计算机程序优于另外一种,并且认为还有很多优秀的程序,其中包括 N-vivo、Atlas/ti 和 Ethnograph。但我碰巧使用了 MAXQDA,我之所以使用该程序,是因为它确实能够非常清楚明白且有条不紊地处理我希望计算机程序做的任务,而且它也相对比较容易学习和使用。再者,对于我这个非技术性的头脑,我能够理解它。在书中的某些地方,有关于

如何使用该软件的细节,以及它在分析的特定阶段和操作步骤中呈现出来的样子。并且,本书中呈现的资料和分析是作为 MAXQDA 的一个项目(project)准备的,读者可以免费从 Sage 网站(www. sagepub. com/corbinstudysite)或从 MAXQDA 网站(http://www. maxqda. com/Corbin-BasicsQR)下载。

这样,有了该软件,读者就有机会"当场"分析资料、补充编码、增加代码、撰写你自己的备忘录等。读者可以下载具有该项目的免费试用版 MAXQDA 软件,它的名字叫"JCBasicsQR. mx3"。它还有循序渐进的教学指导,轻松易懂地为你介绍该程序的基本功能。而且,你还会发现有关如何处理该项目的详细信息。



屏幕截图 0　该截图展示了"JC-BasicsQR. mx3"这个研究项目,它包括本书所有的备忘录和访谈资料。该项目可以通过下面的网页下载:www. maxqda. com,你还可以在该网页上找到使用该项目的所有必要信息。该屏幕截图展示了 MAXQDA 2007 的工作界面:四个窗口的主屏幕构成了质性研究资料分析的四个主要区域:资料库(The Data Set)(窗口:"文件系统");编码/类属(the codes/ categories)

(窗口:"编码系统");检索结果(窗口:"检索部分")和文本工作空间,在这里进行编码、撰写备忘录和粘贴(窗口:"文本浏览")。大部分管理工作选项都以上下文菜单的形式放在这四个窗口中,通过鼠标右键就可以点击进入。MAXQDA 的基本选择原理是激活,单击选择任何数字,然后连接编码与文本。在屏幕截图中,你可以看到,参与者#1 的一段文本和参与者#2 的三段文本被激活了,而且编码"生存(Survival)"和它的次级编码都一起被激活了。该选择意味着,被激活文本的所有的编码片段(这些被激活的编码已经赋予了它们)都显示在检索段(Retrieved Segment)的窗口中。当前打开的文本是参与者#1 的一个文本,显示在文本浏览窗口中。所有已经编码的文本及其确切位置则通过彩色的编码线条(颜色可以由研究者自由选择)显示在窗口的边缘。备忘录则在其旁边创建并显示,通过双击备忘录图标就能够将其打开。

致谢

我要感谢我的丈夫 Dick ,在我整个写作过程中,他在计算机应用方面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支持。当然,他还弥补了我在计算机使用方面的不足。

我还要感谢我的朋友 Anne Kuckartz 在写作中给予的支持和帮助。她对项目的兴趣和鼓励让我不断前进。

我要感谢下面这些评论者,感谢他们所有的帮助评论:来自小岩城阿肯色大学的 T. Gregory Barrent;马里兰大学帕克学院的 J. Randy McGinnis;来自里诺内华达大学的 J. Randall Koetting;康涅狄格大学和波士顿学院的 Anthony N. Mluccio;以及北达科他州立大学的 Kathleen Slobin。他们的参与促进了该书质量的提高。

最后,我要感谢那些通过访谈和书面回忆参与该研究的越战老兵。他们曾为我们因生活在一个民主化社会而能安享到的,且认为理所当然的那份自由而战斗。

如果艺术家在其创造过程中不对新的愿景进行完善，那么他只是在机械地行动，就像头脑中有一个蓝图，在重复某种固有的陈旧模式。

——约翰·杜威，《艺术即经验》，1934，p. 50

目　录

1

导 论

像怀疑、信仰、思想、观念等这样的词语，如果它们所特指的东西有任何客观意义，更不用说获得公开确认，那么它必须被放置在并描述为行为，有机体和环境在其中共同行动，或进行互动。(Dewey, 1938, p. 32)

框1.1 术语界定

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由格拉泽和施特劳斯提出的一种从资料中建立理论的特殊方法论(Glaser & Strauss, 1967)。本书中，扎根理论这个术语是在更加一般意义上使用的，表示源于质性资料分析的理论建构(theoretical constructs)。

方法论(Methodology)：一种思考及研究社会现象的方式(way)。

方法(Methods)：收集资料和分析资料的程序和技术(Techniques)。

哲学取向(Philosophical Orientation)：一种世界观，它是构成方法论与方法的基础，并指导方法论与方法。

质性分析(Qualitative Analysis)：一种审查资料和解释资料的过程，目的是从中发现意义、获得理解以及发展经验知识。

杜威和米德:实用主义的知识哲学

任何**方法论**都取决于知识(knowledge)以及认知(knowing)的本质,我们的方法论也不例外。在本书的一开始就安排一个对哲学知识的抽象讨论,我们并不是要吓唬新手研究者。放心,其余部分会具体得多。我们这里的目的是为随后要讨论的方法论奠定一个基础,并且提供一种洞见,关于从方法论上而言我们为什么做我们所做的事情。

本方法论的知识论(epistemology)经历了两步的演化(a two-step evolution),既涉及芝加哥互动论(Chicago Interactionism)传统,也涉及实用主义哲学,很大部分来源于约翰·杜威和乔治·米德的思想(Fisher & Strauss, 1978, 1979a, 1979b; Strauss, 1991)。后来的在这样特殊传统中受到训练的互动论者,写作或者触及有关知识论问题时,他们至少潜在地吸收了这些思想来源(Baszanger, 1998; Becker, 1982, 1986a; Blumer, 1969; Charmaz, 1983, 1991; Clarke, 1991, 2005; Davis, 1991; Denzin, 1989; Fagerhaugh & Strauss, 1977; Fisher, 1991; Fujimora, 1987, 1991; Gerson, 1991; Hughes, 1971; Lofland, 1991; Schatzman, 1991; Shibutani, 1991; Star, 1989; Suczek & Fagerhaugh, 1991; Wiener, 1991)。

对于那些可能不熟悉互动论或实用主义的读者,我们提供下面两段引言,虽然不是非常全面,但确实指出了这两种哲学非常重要的元素。根据布鲁默的说法,"符号互动(symbolic interaction)"指的是一种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特殊的互动形式(Blumer,1969)。他说:

> (互动主义)其独特之处在于这样的事实,即人类解释或"界定"彼此的行为(action),而不是仅仅对他人的行为作出反应。他们的"回应"不是直接针对彼此的行为,而是建立在他们赋予这些行为意义的基础之上。(p. 19)

米德告诉了我们一些有关实用主义及其起源的知识(Mead,

1936)。他说:

> 正是出于对行动(act)本身的兴趣以及对思维与行动关系的兴趣,当代哲学最近开始思考这些问题,也就是说,实用主义出现了。在心理学中,你可以称其为“行为主义的(behavioristic)”流派,对一种实用主义哲学的出现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当然,有好几种来源,但行为主义是其主要的来源之一。(p.404)

有影响力的实用主义学者的著述主要发表在20世纪的头三十年中(Dewey, 1917, 1922, 1929, 1938; Mead, 1917, 1932, 1934, 1936, 1938, 1956)。这些著述呈现了一种全新的知识哲学,作为我们自己方法论的理论框架,非常容易识别。例如,杜威和米德都认为,知识是通过行为和互动而建立起来的。杜威认为,“……观念(ideas)不是对是什么或已经是什么的陈述(statements),而是对将要实施的行为的陈述”(Dewey,1929,p.138)。或者更准确地说,知识是由具有自我反思性的人(self-reflective beings)行动(acting)和互动(interacting)(注意这些动词)中产生的。具体说,行动(activity)是由问题情境所引发,置身其中的人不能只是自动的或者习惯性的行动。根据杜威“一切反思性探究都是由一个问题情境开始,而问题情境不可能自行解决”(Dewey,1929,p.189)的观点,米德认为,“反思是在检验方法(means)中产生的,即在继续一个已经被检验过的行为时,为了对其进行某种假设而出现的”(Mead,1938,p.79)。行动者面临的问题是解决问题。它的答案是不确定的,而对它的判断只能根据由临时答案所指示的进一步的行动(后果)来决定。正如杜威所言,“对观念的检验,更一般地说对思维的检验,是通过由观念所引起的行动后果来发现的,也就是在刚刚成为现实的对事物的重新配置中实现的”(Dewey,1929,p.136)。

思维活动,即使是极快的无意识的瞬间,也有其时间向度。预想的行动目的影响了实际上采取怎样的行动,而且当行动者重新评估其效果时行动通常也会在中途改变。过去的记忆和回忆也直接或间接地进入这些行动。杜威说过,“……反思性的思考

(reflective thought),即包含着推理和判断的思维,并不是原初性的。它在先前的现实(antecedentreality)中有过验证,就像在某种非反思性的直接知识中所揭示的那样"(Dewey,1929,p. 109)。由于行动的时间性向度——在一个偶然性的世界中——所以实用主义者也关注过程。"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过程的世界里,未来,尽管是过去的延续,但并不是过去的简单重复"(Dewey,1929, p. 40)。

另外,实用主义者并不认同当时流行的个人和群体(或集体)二元论观点。因此,不要说团队或组织,即使是个人,当他(她)发现或建立了对现实的某种新的理解,那也是因为他(她)在那些被继承了的思维方式中被社会化了。"无论是探究还是最抽象形式的符号系统,都无法逃离它们生活、运动和存在于其中的文化母体"(Dewey, 1938, p. 20)。因此,实用主义者相信集体知识的沉淀。(虽然今天这一点对我们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但还是有知识哲学家毫不怀疑地赋予个人认知者以首要地位。)

总之,实用主义者密切关注自然科学(主要是生物学),将其作为一种模型。他们认为,在被同行经验性的验证之前,新知识都是暂时性的。在米德的《科学与个体思想者》中有一段总结是这样结尾的:

> "在这两种过程中——一种是通过实验(即受控研究)来验证新假设的合理性以认识经验的结构,另一种是通过构想出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假设,个体得以运用其完整的特殊性,同时跟造就了他的社会保持有机的关系。"(Mead,1917, p. 227)

无论是谁在做研究,其个人经验对该项研究及其潜在的思想过程都是至关重要的。杜威指出,"到目前为止,我们相信人类经验的可能性,在经验的所有阶段,观念和意义受到珍视,而且将持续不断地生产并使用。但它们也是经验过程本身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从超越现实的外部来源超越输入的"(Dewey, 1929, p. 138)。

所谓的"有效性(validity)",或者哲学家所谓的"真理

(truth)"是什么,这个问题一直存在。实用主义者一向热衷于这个观点纷争的问题。对它们的回答潜藏于所做的研究成果中。"对于要实施的操作(operations)的观念本质的界定,以及通过这些操作的后果来对观念的有效性进行检验,这就在具体的经验内部建立起了联系性"(Dewey, 1929,p. 114)。他们谨慎地强调,认知的行为体现了视角。因此,对"事实"的揭示不能与认知者的操作性视角(operative perspective)分开,它悄悄地潜入了他或她对某事的探究及其最终结论中。这种实用主义立场没有导致激进相对主义(这是当前后现代主义的一种形式)。激进相对主义(radical relativism)认为,既然没有哪种叙述或解释能够被证明,那么我们就不能假定任何给定知识的确定性。和他们不同,实用主义者,以及那些在他们那个时代或我们的时代实践的科学家,必须做出一些关键假设。其中一个假设就是,真理等义于"就目前而言是我们所知道的,但最终它可能被判定为部分的错误,甚至完全错误。"另外一个假设是,尽管真理具有这样的性质(qualification),但知识的积淀并不是幻象(mirage)。世界并不是平的,银河系也不是宇宙的中心;同样的,电子的发现和它所有的理论及实践意义也不应被漠视。确实,有些人也许不相信进化论或地球是圆形的,但是一般来说,这些都属于积淀起来的信念。也许关于社会和人类活动的知识不那么具有累积性(cumulative),但实用主义者和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家相信,某些社会知识肯定是累积的(cumulative),且为思想和社会的演化提供了基础。

实用主义者相对于(vis-à-vis)知识哲学的最后一个立场是,知识能够对实践或实践性事务有用。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假想在知识和日常行为之间有一个大豁口——另一种错误的二元论(dualism)。杜威说过,"我们的讨论很大一部分已经转向了一种对知识的分析。不过,这里的主题(theme)是知识和行动的关系;对于知识而言,结论的最终要旨在于它加诸于行动中的变化了的观念"(Dewey,1929,p. 245)。实际上,它们(知识和行动)两者相得益彰。知识产生有用的行动,行动提出了要思考、要解决的问题,这样又转变成新的知识。在一个持续变化的世界里,偶然事件一个接着一个

的发生,实践和探究的这种相互作用也是连续的。(这在哲学上相当于阐明了科学家在数据和理论之间的交互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实用主义者并没有在日常思考("常识")和更系统控制了的科学典范之间画上一条严格的界限。他们没有阐明——但肯定会赞同——关于组织行动的观点,例如,它们大多很少是随意的,而是经过精心设计和评估的。然而实用主义者并不仅仅对实践或实际的东西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还有美学和伦理学方面的东西,语言和意义方面的东西,以及其他类似的、抽象的东西。米德认为,"实用主义绝不反对美学经验。像人类所有其他活动一样,它要面对自身的问题,要被欣赏和肯定,并通过反思来解决问题,它是一种被普遍承认的活动"(Mead,1938,p. 98)。

以上这些关于知识和世界的假设,有一些是其他社会研究方法论所共有的,但也许不是所有的都这样。重要的是,要知道其他的方法论是由不同的假设所支撑的。因此,在"客观性"的名义下,方法论可能稳稳地将个人经验排除在研究之外。也因此,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自我反思的重要性,在其与"事实(reality)是什么"以及如何"认知"它的关系中可能被低估了。很明显,行动和互动对于实用主义者以及我们自己对世界和知识的观念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本体论:关于世界的假设

也许大多数使用我们的方法论的研究者(当然还包括那些只使用其程序的研究者)并没有反思过本书中介绍的方法背后的假设。也许他们认为,方法论的发展完全来自于实践。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这样,但方法论很大程度上也受到我们的世界观或我们对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的信念和态度的影响。

我们想要研究的这个世界的本质是什么?下面这段话表达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拥有巨大流动性的宇宙;它不会也不能保

持静止。在这个宇宙中,分裂、分解和消失是出现、显露及聚合的镜像。在这个宇宙中,没有事物是被严格决定的。其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自然主义的分析得以确定,包括男人[以及女人]参与构建那些塑造了他们生活的结构的现象。(Strauss, 1993, p.19)

什么样的理论能够适合上面一段话中认定的宇宙本质呢?一个复杂的,通常是充满歧义的世界,既是变化的,又有着阶段性的永恒;在这里,行动自身在今天是常规惯例,但明天也许就问题重重;在这里,答案变成了问题,而问题最终又产生答案。

我们将要提出一套假设,它们反过来支撑了本书中阐明的方法和研究策略。例如,我们对偶然事件的不可避免性的假设、过程重要性的假设,以及现象复杂性的假设,既指导着我们去审视问题,又指导我们应对日常的情境和事件。对我们而言重要的是,人的条件在遭遇到事件和问题时所采取的行动、互动以及情绪反应是各种各样的。人类反应的本质创造了影响、约束、限制行动/互动的条件,并增进了其多样性的重组,这些我们可以从社会生活中发现。反过来,人们也塑造了他们的制度体系;他们通过行动及互动创造和改变着周围的世界。

下面我们将介绍一些适用的公理,它们非常特殊地存在于我们的方法概念的背后。它们大部分建基于上面介绍的实用主义和互动论哲学。当读者对本书越来越熟悉之后,应该很容易理解这些假设对本方法论而言的重要意义。这里我们再重复一下其中的一些假设*。

---

* 这一章的导言最初写于该书第2版。当时,由于考虑这一章作为质性研究入门教科书的开头而言过于复杂,Sage出版社删除了这一部分。然而,作者认为,删除说明奠定方法之基础的哲学部分是一个错误,因为这一部分正是为那些不熟悉施特劳斯其他著作的人确定其方法的位置所用。鉴于所有的围绕方法的讨论和争议,特别是关于扎根理论的讨论和争议,科宾相信,有必要将哲学背景材料纳入第3版当中。这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实际上,它与施特劳斯在他的《行动的不断重组》(*Continual Permutations of Action*, 1993)一书中所写得非常相似,而且我建议读者查阅该书,看看更加完整的描述。但是,本章当然还有我的(科宾)思想印记在里面。

假设 1 外部世界是一种符号性表象(symbolic representation),一种"符号的世界(symbolic universe)"。外部世界和内在世界都是通过互动创造和再造出来的。事实上,外部世界和内在世界之间并不存在划分(Blumer, 1969)。

假设 2 意义(符号)是互动的各个方面(aspects),并与意义(符号)系统之内的其他方面联系在一起。互动产生新的意义,……也改变并维持原有的意义(Mead, 1934)。

假设 3 行动根植于互动之中——过去、现在以及想象中的未来。因此,行动也承载意义,而且可以在意义系统之内得到定位。行动可以产生进一步的意义,二者都与进一步的行动以及它们根植于其中的互动有关(Mead, 1934)。

假设 4 在行动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偶然事件。这些事件会改变行动的持续、节奏,甚至意图,而这又可能会改变互动的结构和进程(Dewey, 1929)。

假设 5 行动伴随着暂时性,因为它们形成了持续时间不同的行动的过程。不同的行动者对一个行动的暂时性状况的解释可能由于行动者各自的视角不同而各不相同,但这些解释也可能随着行动的进行而改变(Mead, 1932)。

假设 6 互动的过程产生于共享的观点,若没有共享的视角,而行动或互动要进行,则必须要对观点进行协商(Blumer, 1969)。

假设 7 在童年的早期以及后面整个人生中,人类形成了自我,自我无形中进入人们所有的行动中,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进入其中(Mead, 1932)。

假设 8 反身性互动(彼此间相互反馈)可能先于、伴随着以及(或者)紧跟着行动(或显或隐地)。这些行动可以是行动者自己的行动或者其他行动者的行动。尤其重要的是,在很多行动中,未来包括在这些行动之中(Dewey, 1929)。

假设 9 互动行为可能伴随着对行动的回顾,对行动者自己的行

动和其他人的行动,以及对未来行动的预测。在行动/互动过程中作出的回顾和评估可能会部分影响甚至完全重塑(recasting)行动(Dewey, 1929)。

假设 10 行动并不必然是理性的。很多是非理性的(nonrational),或者通俗地说,是"不理性的(irrational)"。理性的行动还会被其他的行动者误认为是非理性的(Dewey, 1929)。

假设 11 行动有情感方面的特征(emotional aspects):将情感与行动区别开,将其看做是伴随行动的实体(entities),就是将行动的情感方面实物化了。我们不做这样的二元区分。你不可能将情感从行动中分离出来;它们是同一个事件流的一部分,一方引起另一方(Dewey, 1929)。

假设 12 手段—目的分析框架通常不适合理解行动和互动。这些常识和未经检验的社会科学框架对于解释人类行为来说过于简单(Strauss, 1993)。

假设 13 行动对于互动的嵌入(embeddedness)表明了一种行动的交织(intersection)。交织需要各个行动者视角之间存在着可能的,甚至可能性很大的差异(Strauss, 1993)。

假设 14 在一个互动过程中,几名或多名参与者需要对各自的行动进行"校准(alignment)"(或澄清)(Blumer, 1969)。

假设 15 行动者视角以及相应的互动的一系列主要条件是他们在社会世界(social worlds)及亚世界(subworlds)中的成员身份(memberships)。在当代社会中,这些成员身份通常错综复杂、相互交叠、对比鲜明、冲突不断,而且对参与互动的对方并不总是透明的(Strauss, 1993)。

假设 16 在互动的各个种类之间,一个非常有用的基本区分是日常(routine)互动和"有问题(problematic)"的互动。"有问题"的互动涉及"思考",或者先超过一个互动参与者时,还会涉及"讨论"。"有问题"互动的一个重要表现还可以是"争论"——对议题或解决途径意见不一。也就是说,一个争议区形成了,它将会

影响未来的行动进程(Dewey, 1929; Strauss, 1993)。

方法论的启发意义

上述假设对方法论的启发意义可总结如下。世界是非常复杂的。事物并没有简单的解释。相反,事件是多种因素一起作用并以复杂且常常是预料之外的方式互动而产生的结果。因此,任何方法论,如果想要理解经验与说明情境,就必须是复杂的。我们认为,重要的是应该尽可能多地在我们研究中捕捉这种复杂性,同时又要认识到,完全的捕捉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要努力从多种视角去看待事件,并在我们的分析框架中充分考虑差异性。我们意识到,为了理解经验,我们必须用一种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种族的、关于性别的、信息的及技术的框架将其放置在更大的事件当中,而不能将其从这些事件中分离开,因此,这些都是我们分析的基本方面。

过程是我们研究的组成部分,因为我们知道经验,以及随后的任何行动/互动很可能是由一种对后果和偶然事件反应形成和转化而来的。我们并不是必然想要将对行动/互动/情感的理解简化为一种解释或理论框架,然而我们确实相信,不同层次抽象的概念构成了分析的基础。概念为专业人员之间的讨论及达成共同理解提供了路径。如果你没有一种语言,你就不能说话,而如果你无法说话,你就不会做事,而很多专门职业的基础仍然是做事(Blumer, 1969)。

最近的思潮对本方法论的影响

[上面所述反映的是施特劳斯和科宾的思想,而现在要写的,更多的则是反映科宾的思想。因此,在下面这部分,将使用第一人称]。

尽管上面所述的哲学和知识论假设为这里的方法论奠定了基础,但无疑,当代思想对我的方法论思想产生了一些影响。最

近几年的很多著作给予我无法估量的洞见,让我看到了过去一些做法的错误,并且偶尔令我反思——我怎么竟然被这样地“误导”了。但这就是知识的本质。知识随着时间而进步和变化,方法论也是这样。有些研究者简单地抛弃了传统的做质性研究的路子,而另一些研究者,像我一样,努力坚持过去研究的长处,同时与时俱进地向当下的方法看齐。和大多数人一样,基于“我是谁以及我是什么样的人”,我从这些思想大杂烩中既选择了过去的一部分,也选择了当下的一部分,同时拒绝了其他一些思想。

无疑,我,科宾,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当代女性主义、建构主义及后现代主义著作的影响。我尤其敬佩克拉克(Clarke,2005)和卡麦兹(Charmaz,2006)两人的作品,以及他们如何将后现代主义和后建构主义范式应用到扎根理论方法论中,并接受邓金(Denzin,1994,p. 512)的挑战,将解释性方法更加深入地搬到了后现代主义的敏感领域。在这一节里,我想说明,我的分析取向是怎样受到质性研究最新方向的影响的,同时仍然最大限度地保持施特劳斯做质性研究分析的基本取向。

本书的读者应该记住,这是一部关于做分析的基础读物。我们的目的是要阐述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让初学质性研究的人能够理解。本书作者非常清楚,在做质性研究时,当超过了研究者的阐述或解释能力时会发生什么事情。当他说“解释是一种无法形式化的艺术”(p. 338)时,表明她同意邓金(Denzin,1998)的这种观点。然而,没有方法的某种形式化,人们如何通过教科书来教学呢?我不认为,像人们更加自觉而系统地对资料进行思考那样,这一新版本也更加朝向方法的形式化;这也是为什么我将关于分析的演示章节放在书中的原因。我承认我并不完全了解质性研究方法论,而且本书的分析路径无法解决所有方法论的问题,或是回应所有当代哲学的争论。我相信,方法会演化以解决我们作为研究者在田野中遇到的问题。使用本书的读者将会在我使用的语言中、在讲述如何使用这些程序时,尤其是在我演示分析的那些章节中,注意到一些变化。

我无法用简单的语言从方法论上对现在的我进行归类,也无

法用一个简洁的术语介绍呈现在这里的方法。我和施特劳斯以及这本书都是很多事情的一个混合体。当谈论今天的研究和质性研究者时，邓金说得很好，“简单地归类显然行不通。任何心灵手巧的质性研究者，往往既属于这一类又属于其他类，能被同时归于性格脆弱类和意志坚强类（Denzin，1998，p. 338）。我想说的是，这句话就是描述的我——脆弱而意志坚强。更具体地说，本版中我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我意识到，并没有一个“实在”在那儿等着被发现（Geertz，1973）。然而，我确实相信，有外在的事件存在，例如满月、战争，以及飞机撞到大楼。正如施万特所说，“你可以合理地认为概念和观念是被发明的（而不是被发现的），同时主张这些发明符合真实世界中的事物”（Schawndt，1998，p. 237）。然而，事件本身并不是我们研究中的议题，因为每个人都是按照他/她自己的经历或经验，根据性别、时间和地点、文化、政治、宗教以及专业背景来经历事件并赋予其意义。要理解这句话的正确性，你只要打开电视，倾听一群人讨论一件事情，例如总统的一次演说。虽然存在着大量的话语，但有时候所说的却完全互相冲突，尤其是，涉及政治时，对于事件的意义几乎没有一个完全一致的意见。在没有明确共识的情况下，对同样一个话题观察者的所见所闻其视角是千差万别的。令情况更复杂的是，从电视上听到和看到的意见经过了观察者对事件的解释过滤，这些解释建立在他或她个人历史和经历的基础之上，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非常复杂的情况，一个研究者不可能完全理解或重新建构的情况。

我同意建构主义者的观点，概念和理论都是由研究者从故事当中建构的，这些故事则由研究参与者所建构，他们努力向研究者和他们自己说明和解释他们的经历和/或生活。从这些多重的建构中，分析者建构了他们称之为知识的东西。施万特说：

> 在相当不易察觉的意义上，如果我们相信心灵在知识建构中是积极主动的，那么我们就都是建构主义者。我们多数人都会同意，认知不是被动的——一种将感觉资料往心灵的简单印刻——

> 而是主动的;心灵对这些感觉印象做出了某些活动,至少做了某种程度上的概念抽象。在这个意义上,建构主义意思是,与其说人类是找到或发现了知识的存在,不如说是建构或制造了知识。我们创造了概念、模型和图式来理解经验,进一步地,我们根据新的经验不断地检验和修正这些构念(constructions)。(Schawndt,1998,p. 237)

虽然我意识到知识总是根据新的经验而持续发展,也许正是我心中的护士在说话,但我相信,分析工作需要某种程度的概念语言来谈论“研究发现”。没有一种概念语言,就没有讨论、碰撞、协商及发展一种基于实践的知识的基础。无法想象实践者走来走去做事情,却没有一套学科化的知识体系和经验,作为其行动的基础。知识也许并不是世界的镜像,但它确实有助于我们理解世界。如果你是重症监护室的一名病人,你会希望在大街上随便找一个人来照顾你吗?或者,你还是愿意要一个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并且理解任何理论都不应该教条地应用,而应该对理论进行重新评估和调整以适合当下的情境的护士?

我很实际,关于我想要通过我的研究所达成的目的。我有过护理背景,因此我想提出能够指导实践的知识。在总结我的实用主义和互动主义(Hughes, 1971; Park, 1967; Thomas, 1966)理论取向以及保持女性主义研究的社会公正目标中,我想改变社会,让人们生活得更好。但你不太可能看到我在街角带着标语或领导抗议活动。我最近参加了一场会议,在会议上,我提到并展示了我做过的一个小的研究项目,该项目是本书的一部分。一名观众回应说:“但我听不出你有多愤怒。”是的,我确实愤怒,实际上在做关于越战老兵这个小型研究的时候我很焦躁不安。但我不能让这种愤怒占据我的生活。从个人经历上来说,我是这种类型的人:宁愿用语言说教而不愿到大街上表达愤怒。我将反战的“游行”留给了比我年轻的人。我的希望是,在讲述这些越战老兵故事的时候,人们要理解年轻士兵面对的身体、情感和道德上的问题。也许他们的故事会引发社会公愤。如果有了足够的社会

公愤，也许就不会再将年轻的男女送去打仗。或者，如果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那么社会应该将越战老兵作为英雄来欢迎他们回家，为他们提供照料以及支持系统，因为他们需要去“适应”，以回归平民生活。

我同意女性主义者的观点，我们无法将我们是谁与我们的研究和分析分开。因此，我们必须对我们如何影响研究过程以及研究过程反过来如何影响我们进行自我反思。汉贝格和约翰逊说明了他们如何做自我反思，我也努力在这么做。他们说：

> 对于这种反思性分析，我们就重新阅读经过编码的访谈来审查充满了张力与矛盾的片段，或是有冲突的编码——那些在我们想要努力发现合理、有效的解释的时候通常已经被讨论过的段落。我们还阅读备忘录来回忆我们在访谈当中及之后我们的反应，以及在比较我们的编码时的讨论。(Hamberg & Johansson, 1999, p. 458)

我想，在做本书后面章节中的有关越战的小型研究项目时，我在写作备忘录对该研究如何影响了我做跟踪记录。确实，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要写下我的体验和感情，因为我常常感到如此不安。我真实地认同我听到和读到的这些故事。我已经被卷入。但我也关注我作为研究者的角色以及讲述我研究中的参与者的故事的必要性。我当然不愿意剥夺我的研究参与者的权利，而是要给他们阅读和对涉及他们的相关章节提出建议的机会。我告诉他们，访谈资料将用到一本方法论的书籍中，而他们也同意这样。我还要考虑伦理问题，要确保他们愿意将他们的话刊印出来，因为他们的有些话非常形象——他们的语言讲述的故事比我讲得好——我只是一个从来没有参加过战争的女人。参与者和我自己无法办到的是要将这些研究发现结合在一起，尽管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共同的建构，因为故事确实将他们的语言和我的语言放在一起呈现。

虽然读者建构他们自己对研究发现的解释，这些是建构和重新建构，但这一事实并没有否定研究发现的重要意义，也没有否定可

以从它们之中获得的洞见。我相信,我们分享共同的文化,可以通过对话在这些共同文化的基础上达成共同构念(constructions)。概念给了我们对话并达成共同理解的基础。因此,我会继续相信概念的力量并提倡概念的运用。

同时,我想强调,方法和程序只是工具,而不是指令。研究者不应该执着于遵循一套编码程序,这样质性分析就失去了流动和动态的本质。和任何思考过程一样,分析过程应该是放松的、有弹性的,而且应该由与资料的不断互动中所获得的洞见所驱动,而不应该过分结构化,以及仅仅建立在程序的基础上。对这些有了反思之后,我准备开始讨论本书的目的:教学生如何做研究。

为什么做质性研究

为什么做质性研究?最常见的回答,可能也是最准确的回答是,研究问题应该决定用来实施研究的方法论取向。还有其他理由包括:质性研究让研究者能够获得参与者的内心体验,能够确定意义是如何通过文化并在文化之中形成的,以及能够发现而不是验证变量。但是为什么有些人将做质性研究作为一种职业,我认为还有其他原因。致力于质性研究的人往往这样设计他们的问题,以至于唯一能够回答他们问题的方式就是通过质性研究。

致力于质性研究的人之所以倾向于质性研究是因为,与那些更加严格和形式上结构化了的量化研究方法相比,质性取向研究的流动的(fluid)、演进中的(evolving)及动态的本质更加吸引他们。质性研究者喜欢意外收获和探索发现的过程。统计可能是有趣的,但是能让质性研究者产生共鸣的是更多地了解人那种无穷无尽的可能性。质性研究者想要的并不是与他们的研究参与者之间的距离,而是在人性的层次上与他们建立联系的机会。质性研究者有着一种天然的好奇心,引导着他们研究那些让他们感兴趣的世界,否则他们可能没有机会接近。另外,质性研究者喜欢琢磨文字(玩文字游戏),在看似无序之中寻找有序,根据复杂关系来进行思考。对于他们,做质性研究是一种挑战,它将全部

的自我带到这个过程中。这不是诋毁量化研究者,也并不是说他们不具备这样的品质,这里仅仅是指出,致力于质性研究的人往往具有某种特定的风格。

虽然并非质性研究者所特有,但那些做出“好的”质性研究的人往往都有下面这些特征:

- 人文主义的爱好
- 好奇
- 创造性和想象力
- 一种逻辑感
- 在承认规律性的同时也能够承认多样性
- 冒险的意愿
- 容纳歧义感和模糊性的能力
- 在田野中完成研究工作的能力
- 愿意将自己作为研究工具
- 信任自己及能够理解自己研究的价值

那些经过我们训练的研究者,往往真的很喜欢与资料打交道。他们喜欢分析资料这种精神挑战。在分析材料时,他们不怕依靠和运用自己的经验,因为他们抛开了传统“客观性”的观念,也不担心使用个人经验的危险。我们以前的学生都将他们的观念看做是暂时性的。即使公开出版之后,他们仍然将他们的研究看做是可修改的而且对批评和反驳持开放态度,因为新知识在不断累积。就他们的研究本身来说,我们所训练的研究者往往比较灵活,这是在我们研讨班和偶有的团队研究不断得到强化的一个特点,他们在这里向各种批评敞开,能够在小组讨论的贡献与吸纳中享受思想的玩味。例如,看看下面这段表述:

> 我是一个写作小组的成员,我们一个月会见一次,已经好几年了。我们传阅正在进行中的研究,并进行批判,有时候我们帮助渡过分析难关。最近,我们小组的一名老成员回来了,她向我们描述了她想在另外一个地方发起成立一个类似的小组的失败经历。她这个小组里的参与者都模仿我们这个小组的程序,在组

织形式上模仿,但是他们都非常苛刻地看待彼此的研究,而且更多地关注竞争式的发言,而不是真正的合作。我们的小组试图分析我们为什么是成功的,意识到和我们中有四个人参加过扎根理论(研讨班)很有关系。然而,并非只是因为这一点我们才有了共同的分析焦点,因为实际上我们之间的差异非常大。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已经学会了以一种合作和支持的方式在一起做研究。(Leigh Star as cited in Strauss, 1987, pp. 303-304)

灵活性和开放性与学会保持一定的模糊性(ambiguity)联系在一起。急切要求避免不确定性以及迅速完成研究,这种想法需要调和,要意识到现象是复杂的,且它们的意义也不容易把握,更不是想当然的。研究本身是一个过程,一个我们以前的学生都喜欢的自我反思的过程。在做研究的过程中,他们享受思想的流动,而不仅仅是实体性的东西(substantive ones),因为他们知道,理论思想有其自己的宝贵价值。不过,他们对理论持有怀疑,无论理论看起来多么迷人,除非它们最终扎根建立在与资料的积极互动之上。

还有另外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是,多数研究者可能希望研究对非学术的读者也有意义。这是因为,质性研究者非常严肃地收集他们所研究的人们的语言和行动。或者说得更深刻一些,"我知道,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不要脱离人们的生活,他们应该和人们生活的世界以及他们对其的思考建立直接的联系。"(B. Fisher,引自:Maines, 1991, p. 8)。我们的第二个问题是,受过质性分析训练的研究者,几乎都完全"沉浸在研究中",这虽然并不总是"位于(我们生活的)前景中,但却从来没有消失过"(A. Clarke, 私人交流, 1990. 3. 21)。

这种对研究过程的专注、投入,以及因此带来的一种强化了的整体感,在另外一个学生的书面描述中反映出来。我们大量引用她的这段文字,因为她的话生动地突出了我们有关质性研究者及其研究工作特征的很多看法。在公共卫生领域接受训练之前,她已经在一家苏族印第安人(Sioux Indian)的住处工作了三四年,这让她全神贯注于这样的问题:既然这些观念与我们的有很大差

异,那么他们的基本健康观念是什么?在田野中从事研究数月之后,她回到研讨班,很快她在一篇给导师的备忘录中这样评说:

> 这些担忧和恐惧(全班可能会误解她的非西方的、跨文化的资料)在两个小时的课程上被系统而慎重地消除了。我非常仔细地观察并专注地倾听人们所说的,以及他们如何将观念和想法渗透到资料中去,当需要更多的信息时谨慎地向我提问,而不是在得到重要的补充之前就直接得出结论。学生们似乎是在资料中仔细寻找丰富性,找到关键的问题,反复对比、玩味,寻求更多的意义,指出不同情境的多种可能解释。我非常高兴,在这些分析者试图寻找的和我在研究中听到的及看到的之间有如此多的一致性。这些课程的完整性和精确性方面都在这种教学的形式之下得以保留和持续,也即(因为它无法脱离)互动主义知识论和质性研究的概念和分析框架的结合(K. Jurich,引自:Strauss, 1987, p.304)。

小　结

> 像柯立芝(Coleridge)和《忽必烈汗》(*Kublai Khan*)一样,我从梦中醒来,但由于这不是一个完整的梦,只是思想的萌芽,它们就在这儿……(Anselm Strauss)

人们选择做研究是因为他们都有个梦想,即在某种程度上,通过他们的洞见和理解对这个世界产生影响。但有梦想还不够。梦必须要取得成果。本书的目的就是为质性研究者提供一种实现他们做研究之梦想的工具。这不是一个完美的方法,而且我们也承认这一点。然而,通过我们自己作为研究者和分析者多年的经验,我们确实能为读者提供一些智慧语言。我们呈现了一些分析程序和技巧——我们发现这些非常有用,而且这些程序和技巧后面的思想为学生提供了某些东西,当学生面对大量资料不知所措的时候,他们可以转过来求助于这些东西。我们通过研究项目的演示,带着学生看我们自己是如何分析资料的,希望以此给学生以启发。作者知道,对于那些已经收集到大量的质性研究资

料,但却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些资料的人,这有多难。

虽然我们希望我们能够穿越世界,训练每一个对学习质性研究感兴趣的人,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带着这样的希望来写作本书:我们能够成为“不在场的教师/导师”。像所有的好教师一样,我们的目的不是提供一本食谱一样的书。相反,我们的目的是为资料分析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一个使学生能够追求他们的职业生涯并达到他们梦想所达到的研究高度的基础。虽然学生开始做质性分析的时候,通常需要指导,而且渴望结构,但是做研究的正确方式并不只有唯一一种。

质性研究分析包括很多东西,然而它并不是一个能够严格规定的过程。毕竟,它所需要的是一种对资料中所发生的事情的直觉;相信自己和研究过程;以及同时保持创造性、灵活性和诚实面对资料的能力。质性研究分析是研究者必须自己感知自己找路的东西,某种只能通过做才能学会的东西。有些使用本书的人会对发展“扎根理论”感兴趣,而其他研究者的目的可能是深入而丰富的描述,或者也许只是界定基本主题。无论什么样的研究目的,我们认为本书将都非常有用。

这里的介绍结束之后,我们想带着我们的读者开始一个获取知识的旅程——一段我们希望在未来数年都能够给予读者以启蒙、赋权和鼓舞的旅程。

要点总结

选择做质性研究有很多理由,但最重要的也许是渴望超越已知和进入参与者的世界,从参与者的视角看这个世界,从而做出新的发现,继续发展经验知识。质性研究者应该具有好奇心、创造性,而且敢于相信自己的直觉。尽管做质性研究有很多种不同的类型和研究取向,在本书中我们呈现了一种方法论取向以及研究程序,我们认为对分析质性资料非常有用。我们的方法源于芝加哥学派的互动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结合。这些传统指引着我们

完成资料收集和分析。在资料收集和分析过程中,我们要寻找很多东西,并提出大量的问题,但是我们分析所依赖的基础却是概念。

虽然我们的兴趣在于人们如何经历事件,以及他们如何赋予这些经历以意义,同时我们还考虑到,任何对经验的解释,如果不能做到下面这些都是不完整的:(a)将经验定位在其所根植于其中的更大的条件框架或情境之内;(b)描述行动/互动/情感过程或它们进行中的和变化中的形式,人们用它们来回应那些引起了行动/互动的抑制的事件和问题。我们还寻找后果,因为它们回过头又成为后面一系列行动的一部分。本书的读者不必采取我们的理论立场也会发现本书的用处。很多程序,例如比较、提出生成性的问题(generative questions)以及理论抽样,并不是基于理论而是来自于施特劳斯早期与格拉泽的著作(Glaser & Strauss, 1967),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它们,无论他们的研究目的是理论建构、深描或案例分析。

思考、写作及小组讨论活动

1. 花一些时间思考你自己个人及专业的哲学取向和对世界的信念。写一两段话描述你认为这些哲学取向和世界观会怎样影响你做研究的取向。与班级同学或同事分享你的思想并进行讨论。
2. 是什么吸引你去做质性研究?你认为自己的个人特质将如何提高你做好质性研究的能力?
3. 在小组中,讨论你认为好的质性研究者的品质有哪些?这些品质可能怎样通过恰当的导师指导和教/学环境来培养。

2

实际考虑

……你迫切地要交流、教导或取悦，要维持优雅、愉快或超然状态，让真实或想象的事物出现。但是你不能指望这就会发生。这是一个持之以恒和坚信不疑的事情，也是一个艰苦努力的事情。因此你最好是继续前进，而且从现在开始。(Lamott, 1994, p.7)

框2.1 术语界定

非技术性文献：传记、日记、文档、回忆录、手稿、录音、报告、手册，以及其他可以用作原始资料的材料或补充访谈和田野观察记录的材料。

难题(Problem)*：研究的一般问题或焦点。

问题(Question)：需要通过研究来解决的具体问题。问题确定项目的研究范围，指出了资料收集和分析中要使用的方法。

敏感性：在资料中发现细微差别和线索用来推断或指出意义的能力。

技术性文献：研究报告及具有专业和学科写作特点的理论论文或哲学论文。

* 作者在本书中将Problem和Question区别开，这里暂时将前者译为“难题”，后者译为“问题”。但在汉语的实际应用中，它们都可以作为“问题”，具体意义要根据具体的语境来判断或者在前面添加相应的修饰词。一般来说，这里的Problem相当于导致研究选题的问题，或者是研究问题本身；而Question相当于针对选题而提出来需要研究的具体内容，是对这些具体内容的提问方式。本书后面的翻译中，除非在将这二者进行比较，否则都根据语境译为“问题”或添加相应的修饰语。——译者注

导　论

对没有经验的质性研究者，做质性分析是一个令人畏惧的过程。之所以令人害怕是因为有一些压倒性的担忧："我的做法正确吗？""我诚实地对待资料没有？"很自然，研究者都希望尽他们所能做出最好的研究，即使有经验的研究者也会问这些问题。然而，我们希望读者放心，这种担心没有必要。质性分析建立在自然的思维方式基础之上。引用沙茨曼的话，即"本文的基本观点认为，分析是自然的、一般的思维过程，它是在早期社会生活中和我们的语言一起习得的，而且几乎总是在经验中习得"（Schatzman，1986，p. 1）。

我们在本书中将要讨论的很多内容听起来都很耳熟。例如，在分析中，我们建议分析者根据概念来思考，因为概念形成了共同理解的基础。想到"椅子"这个词，立刻，某种可以坐的东西就浮现于脑海。在分析中，我们还建议分析者要对资料进行提问。当你遇到你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时，考虑你最初的想法。你可能会问，"这是什么？"或"这里发生了什么？"另外，我们鼓励分析者在不同资料片段之间进行比较，从而确定它们之间的相同点和差异之处。当你要出去购买新轮胎时，你会对品牌进行比较并问："哪一种轮胎最物有所值？"大多数时候，概念化、提问以及进行比较都是无意识发生的。它们是个人认识和理解他们居于其中的世界而使用的工具。日常生活和做研究分析之间的差异是，在研究分析中，研究者采取一种更具自我意识和系统性的取向进行认知。

当我们一起坐下来开始分析资料时，分析建立在日常思维方式基础之上的概念对学生来说就显而易见了。我们的研究生总是说："一起做分析和在书中读它有着很大的差异。"确实如此！在我们的分析研讨会上，当我们结束了活动并提醒他们，"看，你们正在用概念进行提问、比较、讨论"，学生这才意识到他们正在做研究分析。经验告诉我们，在课堂上教授分析比在书本中要容

易得多。

关于分析的讨论还为时尚早。在研究者能够做分析之前,他或她必须有一个研究项目和一些资料。因此,让我们将有关分析的讨论暂时放一放。本章的目的是要为正准备开始做研究项目的人提供一些实际的建议(practical suggestions)。本章首先讨论选择研究问题(research problem)以及提出具体研究问题(research question)。然后用一小节来介绍资料收集。本章的后面,将讨论有关技术文献和非技术文献的使用问题。最后,用一小部分讨论关于理论框架的内容。

选择一个研究问题

做研究一个最困难的方面是选择一个研究题目(topic)。题目是研究者必须要与之共同生活一段时间的东西,所以它必须是某种有趣的东西。与选择题目有关的两个主要问题是:(a)我如何寻找一个我想要研究的问题?(b)然后是,我该如何充分地缩小我的研究问题,使它变成一个切实可行的研究项目?

对于新手研究者,选择一个题目,并界定其范围看起来尤其困难,因为在质性研究中研究问题并不像在量化研究中那么容易结构化。质性研究一般由一个宽泛的问题开始,通常并没有预先确定的概念。概念是在资料中寻找并建构起来的。正是对发现的充分敞开使得做质性研究如此有趣,但却让新手研究者产生某种胆怯。

问题的来源

质性研究中的问题来源和其他形式研究的问题来源并没有多大的差异。有四个主要领域:

- 导师建议或指定的问题
- 来自技术文献和非技术文献的问题
- 来自个人和专业经验的问题

- 研究本身出现的问题

下面我们将分别讨论每种问题。

首先是导师建议或指定的问题。一种获得研究问题的方式是向正在一个感兴趣领域做研究的教授寻求建议。他或她常常有正在研究的项目，而且欢迎有研究生来做项目中的一小部分。这种寻找问题的方式往往增加了参与到一个可行且有意义的研究问题中去的可能性。因为在一个特定的具体研究领域，更有经验的研究者早已知道需要做什么。另一方面，以这种方式达成的选择也许并不是学生最感兴趣的。记住无论选择什么研究问题，研究者必须要能够持之以恒，因此最终选择的应该是能够引起他或她好奇心的问题。

指定或建议的问题来源的另一种变化形式是，密切关注专业或同行对某个“如此这般”的研究的评论，他们可能认为这样的研究不但有用而且有趣。这常常是一种更加令人愉悦的问题来源，如果研究者对该领域有某种偏好那是最好。例如，一个女运动员可能会被下面的话激发出兴趣：“我注意到，进行锻炼的妇女往往会感觉身体更加舒适。”这样宽泛而且开放的陈述能够引出各种类型的问题。妇女对身体和锻炼的观念是如何形成的？学校体育运动、健康信念、媒体以及文化倾向对妇女锻炼的意愿产生了哪些影响？经常锻炼的妇女通过什么样的过程开始了解他们的身体及其力量和限度？妇女最可能参加的体育活动是在什么样的范围中？为什么是这些活动而不是其他活动？参加体育锻炼的妇女和不参加体育锻炼的妇女在身体体验上有区别吗？体育锻炼的身体体验如何转化进入到妇女生活的其他方面？

关于指定的研究问题，还有一个变数是关于某些题目的研究是否能够获得资助。实际上，导师会从方向上引导学生进入可以获得资助的研究方向。这是一种相当合理的建议，因为这些通常是特别需要的问题领域。

研究问题的第二个来源是技术文献和非技术文献。文献可以在很多方面激发研究。有时候，它指出一个相对没有涉足的领

域,或暗示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题目。还有些时候,在已有的众多研究和著述中存在着矛盾或模糊。这些差异表明需要一个能够帮助解决这些不确定性的研究。另外,研究者对某一个主题的阅读可能发现需要一种新的方法来解决老的问题,即使该问题过去已经有过较为充分的研究。有关该问题领域的东西及其相关现象仍然模糊,这些未知的,如果被发现,可以用来重构我们的理解。而且,在阅读文献的过程中,研究者也许会遇到和自己经验相冲突的研究结论,这可能会产生解决该冲突的研究。最后,阅读也许只是激发对一个主题的好奇心。当一位潜在的研究者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怎么样”,而且发现该问题还没有答案,这时候他或她就有了一个问题领域。

研究问题的第三个来源是个人和专业经验。一个人也许经历了离婚,而且想知道其他妇女或男人是如何经历他们的离婚事件的。或者某人可能在他或她的专业领域中或工作场所遇到一个问题,而且没有现成的答案。专业经验常常导致这样的判断,即某种专业特征或实践缺乏效益、效率、人性或公平。因此,人们相信,一个好的研究也许有助于纠正这样的状况。有些专业人士返回学校去攻读更高的学位,因为他们被改革的热情所激发。他们研究问题的选择就建立在这样的动机基础之上。通过专业或个人经验的途径(route)选择一个研究问题似乎比通过建议或文献途径选择的要更冒风险。但事实并非必然如此。潜在研究者的经验这个试金石(touchstone)比其他更加抽象的来源也许是一个更具价值的关于一个潜在的成功研究工作的指标。

第四个来源是研究自身。研究者进入田野的时候可能对想要研究什么有一个一般性的概念,但没有具体的研究问题领域。做一些初步的访谈和观察是一个很好的开始研究的方式。如果研究者仔细倾听或观察被研究者的讲话和行动,分析会引导研究者发现被研究者生活中重要的或有问题的(problematic)主题。注意被研究者关注的问题,这种辅助检测是一个研究项目应该聚焦的关键之处。不可否认,虽然没有唯一的有意义的焦点,但是通过谨慎审视被研究者考虑的问题而发现的具体焦点降低了研究

问题不重要或完全无关紧要的风险。思考下面的例子。

一个从博茨瓦纳来的学生，正在修一门田野研究的课程，她在一位老住户的家里（a senior resident home）研究“老年美国人”时，感到非常绝望。首先，她在进入田野时的观念似乎并不符合她的所见、所闻。但是，如果是这样，那么“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她最初带入研究现场的可能是来自三个不同来源的假设。她还年轻，所以对老年人有着某些不正确，甚至有些根深蒂固的成见。而且，她是一位外国人，她是根据她自己的文化来思考。其次，她是一位新手研究者，还没有学会如何从被研究者自身关心的问题中寻找线索，而且她还不熟悉如何让这样的信息来指导她选择研究问题。在该学生的例子中，她还面临另外一个困难。她自愿为一家社会工作机构服务，机构有着自己的规程，其中包括对与这些老人相关工作的评估。因此，该机构一直督促她要获取一些特定的信息，但她认为这些信息与这些老人的生活或利益没有任何关系。然而，她要对该机构负责。最终，通过密切倾听这些老人，她提出了一个意义重大的研究问题。

当然，任何人，只要他对自己周围的世界感到好奇或关心——以及任何愿意去冒险的人——在经过审慎的思考之后，找到一个研究的问题领域不应该有太大的麻烦。下一步就是提出适当的具体研究问题（question）。

具体的研究问题（Question）

任何研究都需要一个某种类型的问题（question）来指导探究。然而，质性研究问题往往不同于量化研究问题。

界定议题（Issues）

研究者提出研究的方式很重要，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用来做研究的方法。这里有个两难问题。研究者之所以选择质性研究，是因为问题领域以及源于问题领域的问题（question）暗示这种形式的研究将最富有成效？或者，投身于质性研究的研究

者设计问题(frame the question)以适应方法？如皮尔斯所指出的，决定研究取向的过程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呢？(Pierce，1995)这个问题(issue)很难回答，因为答案不清楚。虽然基本前提是，研究问题(question)主导着研究方法，但是我们认为，个人往往要么倾向于做质性研究，要么倾向于做量化研究。例如，由于我们(本书作者)的背景受到实用主义和互动主义的吸引，我们似乎很自然地偏向于质性研究方法。因此，即使一个问题领域可以使用质性研究，也可以使用量化研究，我们仍倾向于以能够让我们使用质性研究方法开展研究的方式提出问题。我们没有理由在这一点上喋喋不休；我们只是想强调，对于有些问题，很明显一种形式的研究比另外一种形式的研究要好，因此研究者不但要诚实地面对研究问题，而且还要诚实地面对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研究偏好。

而且，即使研究者选择使用质性研究取向，仍然存在如何在众多质性研究方法中选择哪种方法的问题。现在有很多不同的质性研究取向，因此，想要对每一种方法都做一个介绍则超出了本书的范围。想要阅读各种方法，我们建议读者可以参阅这些作者的著述：Berg，2006；Creswell，1998；Denzin and Lincoln，2005；Flick，2002；Gilgun，Daly，& Handel，1992；Marshall & Rossman，2006；Morgan，1996；Morse，1994；Morse & Field 1995；Silverman，2004；Somekh and Lewin，2005。有三本新近出版的著作，它们采取不同于本书中介绍的做扎根理论研究取向：卡麦兹(Charmaz，2006)采取了她称之为"建构主义"的取向，克拉克将她的方法称为"情境分析(situational analysis)"(Clarke，2005)，而古尔丁将自己的书定位于管理、商业和市场研究人员(Goulding，2002)。

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是，研究问题(research question)有助于建立研究的边界。任何研究者都不可能涉及难题(problem)的所有方面。因此，即使在质性研究中，恰当地设计问题(question)，也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一个研究难题(problem)需要使用质性研究取向和量化研究取向的混合方法。这又引出了另外一整套方法论议题，它们超出了本书的范围。(对混合方法感兴趣的读者，

我们建议阅读:Creswell 2003; Greene, Kreider, & Mayer 2005。)

设计研究问题(Research Question)

质性研究中的问题是什么样子的?它们与量化研究中的问题有何不同?为什么?质性研究常常是探索性的,它更多的是提出假设而不是验证假设。因此,必须要以这样的方式设计研究问题:为研究者对主题进行一定深度的探究提供充分的自由和弹性。运用质性研究方法的背后还包含这样的假设,即某个给定现象所有有关的概念还没有被识别(identified),或没有得到充分发展(developed),或理解不充分,因此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以增进理解。虽然质性研究中的研究问题(questions)往往比较宽泛,但它们并没有宽泛到会产生无限可能。问题的目的是引导研究者走进资料,只有在资料中,才可以探究对研究中的个人、组织、群体和共同体来说重要的议题(issues)和难题(problems)。

质性研究中的研究问题是一个陈述(statement),它指明了要研究的主题领域,并告诉读者研究者感兴趣的特殊主题(topic)是什么。人们会怎样写一个质性研究问题?这里有一个例子。"患有慢性并发症的孕妇如何管理她们的怀孕和生活,从而确保安全生产?"虽然人们可能认为这个问题对于一项量化研究而言太一般化而且不具体,但对于质性研究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Corbin, 1993)。这个问题告诉读者,该研究将研究孕期的妇女,且患有慢性并发症。此外,该研究将要从妇女的角度研究如何管理怀孕和日常生活;这意味着,不是从一名医生或任何其他人的角度。而且,最重要的是,研究中的妇女希望她们的怀孕有好的结果——也就是说,她们希望保住这个孩子。

当然,在质性研究中,对于一个研究问题获得尽可能多的视角是非常重要的,在上面的研究中,研究者可能也想要获得有关医生、护士、配偶以及其他重要人物对于慢性病、妊娠以及所有的相关问题所做的事情和所说的话的资料,因为这些互动会影响妇女如何看待和管理妊娠。然而,正如问题所指出的,焦点仍然是妇女。保持焦点可以防止研究者被不相关的和没有结果的问题

分散注意力，并不是要试图获得全部可能性的资料。例如，这里不是要研究高危妇产科的整个世界，只有那些检查和治疗——因为是参与者（即孕妇）要接受的实际或潜在的妇科治疗而进入研究视野，才成为研究的一部分——需要追踪。这对慢性病情况是同样的。仅从逻辑上，在计划的研究中，并非要研究所有慢性病及其治疗范围。只有慢性病或其治疗的那些进入并影响了参与者的妊娠的方面，才会成为研究的内容。

其他相关要点

在质性研究中还有其他一些我们想要强调的要点。质性研究不必限定于个人。研究可以关注家庭、组织、行业以及其他丰富多彩的研究领域。这里有一个例子，来自于文献的有关互动和组织研究的问题。在对制度结构边界、结构动态以及渗透性的本质的研究中，舒瓦尔和米兹拉希提出了下面这些问题："组织的和认知的边界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为什么生物医学实践者允许竞争对手的侵入？其他实践者如何'适应'诊所和医院结构的社会空间和地理空间？在实践环境中，可以看到关于接受或机制或惯例（rituals）？"（Shuval & Mizrahi，2004，p. 680）

在他们对三代人的家庭的传记研究中，罗森塔尔和沃尔特提出了下面的问题："有着经历过的粹时期的家庭和集体的过去，三代家庭在今天是怎样生活的？第一代人的过去，以及他们自己处理过去的方式对他们后代的生活以及他们后代接受家族历史的方式产生了哪些影响？"（Rosenthal & Völter，1998，p. 297）

请注意上面的问题是多么的宽泛，以及他们如何在表达感兴趣的问题的同时限制了研究范围。质性研究有趣的一面是，虽然研究者带着一个一般性的问题开始研究，但是在研究过程中问题却不断地出现，这些问题更加具体，而且引导进一步的资料收集及分析。当读者在本书的后面阅读到有关分析的章节时，这一点会更加清晰。

资料收集

质性研究的优点之一是它有很多种资料来源。研究者可以使用访谈、观察、录像、档案、图画、日记、回忆录、新闻报纸、传记、历史档案、自传以及其他这里没有列出的资源。在任何研究中，研究者都可以单独使用或组合使用这里所列的一种或几种资料来源，这取决于要研究的问题。其他的考量包括，希望就同样的问题进行三角检验或获取各种不同类型的资料，例如将观察和访谈结合起来，然后可能还要增加文献资料来验证或增加其他来源的资料。由于有很多优秀的书籍对资料收集技巧有过深入的讨论，例如，如何做访谈或观察，所以我们将不再详细介绍过程本身。相反，我们将主要讨论与资料分析有关的更加一般性的资料收集问题。（关于访谈的优秀著作见 Gubrium & Holstein, 2001; Weiss, 1994;关于讨论田野工作或观察的著作见 Lofland, Snow, Anderson, & Lofland, 2006; Patton, 2002; Schatzman & Strauss, 1973——一本古老的经典。）

尽管有很多因素会影响分析的质量，但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研究者正在分析的材料的质量。人们有时候认为，不经过训练或不需要准备他们就能够走进田野进行访谈或观察。这些人常常会失望，因为他们的参与者未能提供很好的信息，得到的资料即便作最乐观的估计都很稀少。访谈和观察是要经过训练并要通过实践才能够获得的技巧。

我们的经验已经说明，最能得到丰富资料的访谈是那些非结构性访谈，也就是说，它们不是通过任何事先确定好的一套问题引导出来的(Corbin & Morse, 2003)。它需要练习，带着一个开放的心灵和一个开放的计划坐下来，不要让紧张妨碍了信息的自由流淌。例如，可以这样问：“能告诉我你的癌症经历吗？我想听你自己讲出来的故事。在你讲完你的故事之后，如果我还有其他问题或事情不清楚，我会问你的。但现在请随便说。”

运用非结构性访谈并不意味着研究者对访谈过程没有影响。

米什勒将访谈看做是研究者和被访谈对象之间的一种对话。他说:"提问与回答都是说话的方式,它们都扎根于并依赖于文化上共享的而且常常是默会的假设之上,后者假定了如何表达和理解信念、经历、感情和意图"(Mishler,1986,p.7)。他还解释了访谈是如何在结构和意义上被发生在各参与方之间的提问、停顿、脸部表情以及言语的和非言语的交流而形塑的。

对于研究新手,访谈的一个最大困难是访谈中面对的沉默时间。两位德国传记研究者,黎曼(Riemann,2003)和许策(Schütze,1992a & 1992b)已经形成了一种访谈和分析的风格,它将沉默考虑在内(需要其他做传记访谈和分析的例子,请参阅 Rosenthal,1993)。

对于质性研究者,遇到一个人,同意接受访谈,但一旦访谈开始却没有什么可说的,让研究者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这是很常见的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最好是有些备用的问题。通常的问题是,这个人只是不知道说什么,或者是对访谈的情境不舒服。问几个问题常常会让研究参与者感到放松,而且激发起他或她的记忆,这样他或她就会变得更加健谈、更加主动(spontaneous)。有时候,一个人暂时还没有思考该问题。或者,可能是一个话题引起了很多的情感,参与者不得不沉默一会儿以恢复镇定。

一个敏感的访谈者知道什么时候退居一边,让被访者引导着什么时候重新开始访谈。研究者发现,最有趣的事情是,只要录音机(笔)一关上,被访者常常会提供某些最有趣的资料。我想,被访者有很多理由等到录音机(笔)被关上之后才会讲述最后的"花絮(tidbits)"。在访谈结束"泄露真相"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访谈过程为被访者提供一个深入谈论有关话题的机会,在赋予他们自己的行为其他洞见之前他们还没有过多地谈论这些议题。最后这些话是他们想要分享的总结(afterthoughts)。另外一个原因,且也许更有可能的解释是,当录音机(笔)开着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揭示他们认为是"敏感信息"的东西会不舒服。他们并不介意研究者使用这些材料,否则他们就不会说出来,但是,尽管有了保证,在记录之后录音将被销毁,但一想到通过录音可能识别

出来,这令他们感到不舒服。除了录音机(笔),我总是随身带着铅笔和纸,所以我提出请求允许记下这些额外的信息。被访者总是同意,不过他们的同意可能是由于访谈者和被访者之间的权力差异以及由于礼貌的原因。

研究者可能永远不知道为什么人们同意做研究参与者;如果有问题的话,研究者所能做的就是请求允许,而且不但要对被研究者的语言回应敏感,而且要对他们的非语言回应也要敏感。也许正是这一点,我们要对田野研究伦理作一些评论。

大多数研究机构伦理委员会成员的职责就是确保要有保护措施来保证研究参与者的匿名权和保密权,以及保护他们的健康和福利,以免在生理上或潜在的社会/心理上影响研究。另外,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有责任像对待家庭成员一样对待参与者。一个可靠的原则是,如果你认为你不喜欢这样,那么参与者可能也不喜欢。还有另外一点,人们有权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有时候研究者对访谈材料或某些被观察的东西觉得不舒服或尴尬。然而,参与者却不这样想。实际上,他们想他们的故事就在那儿。当读者阅读第 8 到第 12 章的时候,这一点就会更加明白。

另外,研究者不能对其他人的话进行评判,除非这些话可能会对其他人产生意外的伤害。作者承认,在研究中,伦理是一个密切相关的话题。鉴于长篇大论地讨论伦理不是本书的范围,我们为读者推荐朗和约翰逊(Long & Johnson,2007)以及派珀和西蒙斯(Piper & Simons,2005)的著作。

做观察或田野研究对新手研究者通常更加困难。也许,这也是为什么在很多质性研究者的资料收集过程中,访谈比观察使用得更多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有些研究者认为田野研究只属于人类学家。另外,做观察是一个更加费时间的事情,而且会对别人造成侵犯,因此研究者自己都不愿意使用这种收集资料的形式。但观察能够为质性研究者提供大量的信息,因此在选择资料收集模式时,应该考虑将其作为一种模式。观察法如此重要的原因在于,人们常常说他们在做一件事情时而实际上却在做另外一件事情。想要知道这些,唯一的方法就是通过观察。另

外，人们可能意识不到，或者无法说出他们与他人之间在互动中发生的微妙之处。观察将研究者置于行动发生之处，在这里他们能够看到发生的事情。巴顿认为，“创造性的田野研究意味着调动研究者自己的所有感官去体验和理解所发生的一切。创造性的洞察来自于直接投身于研究的情景中”（Patton，2002，p. 302）。

观察有其自身潜在的不足。研究者可能会基于观察赋予行动/互动以意义，却不检验其对参与者的意义。将观察和访谈结合在一起，或者留下开放的可能性，与参与者一起验证解释，这总是有益的。巴顿指出，“非语言行为很容易被误解，尤其是在跨文化交流中。因此，只要可能及合适，已经观察了那些看起来非常重要的非语言行为，就应该努力跟踪它们，希望直接从中发现非语言行为的真正意义”（Patton，2002，p. 291）。

在做观察的时候，研究者要寻找的是什么？研究者首先要坐下来或站出来，让场景自然展开。最终，某些有趣的东西将会抓住研究者的眼睛。然后观察就聚焦于其上。如果该事件证明意义重大，研究者就记下发生的事情、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情，以及谁说的。但是，想要抓住情境中事件的每一点是不可能的。从这些作者的观点来说，在做访谈和/或观察的时候要记住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概念驱动（drive）着资料收集和研究分析。但这些概念来自哪儿呢？让我们从我们对护士长们的研究中为大家举一个例子（未出版）。科宾第一次田野研究，要见一位护士长，她为这一天做了准备，跟着她一整天，记下了护士做的或说的所有的事情，而且还记下了情境，最后还在观察记录后面写下了需要护士长进一步解释的事件的问题。（在医院繁忙单位里对每一件发生的事情都作记录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将我的观察记录限于护士长以及和她相关的行动和互动。）然后去科宾和施特劳斯一起分析该笔记。来自分析的概念成了后面观察的基础，虽然不完全是。后面每一次的观察为跟踪前面发现的概念提供了机会，而且还发现了新的概念。如果后面的观察不能为概念提供资料，观察结束的当天，研究者要就概念进行询问。

在访谈或观察以及随后的写作中，保密都是一个重要的议

题。洛弗兰德等人认为,“田野研究者对于他们研究的那些人主要的义务之一是通过‘保密协议’给予匿名担保——承诺研究报告中不会使用真实姓名、地点等或者将由假名替代”(Lofland et al.,2006,p.51)。

资料收集和分析期间的反身性(Reflexivity)是质性研究中另外一个重要的考虑。过去,我们都知道,在收集资料和分析资料的时候,研究者会经历伤心、愤怒、幸福,以及对是否许可的回应,然而我们从来没有很好地思考研究者自己的感情或反应。毫无疑问,这些情感被传递到参与者身上,这样,反过来,在访谈或观察活动中,参与者会通过不断地调整他们的立场来与研究者的反应进行互动。这些很多是在无意识层面发生。你甚至可以说,由于这种相互影响,研究者和参与者(至少在资料收集上)一起共同建构了该研究(Finlay, 2002)。因此,审视研究者对研究过程的影响非常重要,正如切斯尼所说的:

> 我赞成对自我的传记研究,不是作为独立于女性民族志或与其竞争的研究,而是作为一个培育床来存放研究发现,以及作为透视研究过程的一部分。诚实而开放地反思有助于我保持某种诚实、形成洞察力和自我意识,而且还给了我一定程度的自信。(Chesney,2001,p.131)

虽然现在这些考虑对研究过程是必要的,但是研究者赋予反身性及其实施程度的意义会随着研究者哲学取向以及和研究过程联系程度而变化。每一个研究者必须要对其程度、时间及方式进行思考。虽然人们都同意反身性的必要,然而对其可行性仍然有些争议。既然大量泄漏出来的信息在意识的更深层次发生,在询问我们研究中如何能够完全说明我们自己时,卡特克利夫(Cutcliffe,2003)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然而,反身性仍然像芬莱所说的,“是一个有用的工具,可以用来:

- 审视研究者立场、视角和在场的影响;
- 通过审视个人回应和人际间的互动来提升洞察力;
- 通过开启一个更加底层的意识来给他人注入力量;

- 评估研究过程、方法和结果;以及
- 通过提供研究决策的方法论日志,让公众能够审查研究的诚实性”(Findlay,2002,p. 532)。

在做呈现在本书后面有关分析章节中的对越战老兵的小型研究时,我(科宾)发现,自我反思是一个非常自然而且也是非常必要的过程。自我反思具有很强的情感倾向(cathartic),能够帮助我看到自己是如何偏向(slanting)资料的。我注意到,正像我在评论和思考备忘录里所写的,某些内容是我对资料的情绪反应的反思,而不是对我的研究对象对我讲述内容的概念化。我重写了这些备忘录,但是我当然能够在分析中看到我自己。

敏感性

传统研究中,资料收集和分析要求“客观性”。但如今,我们都知道,在质性研究中客观性是一个神话,研究者将他们自己的范式,包括视角、训练、知识以及偏见都带到了研究情境中;因此,自我的这些方面特征被编织到研究过程的各个方面(Guba & Lincoln, 1998)。我们面临的问题包括:情况有这么糟糕吗?我们如何能够利用我们作为研究者带入研究过程中的东西,从而增加我们对被访者所告诉我们的内容的敏感性?也许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关注敏感性(Glaser and Strauss, 1967; Glaser, 1978; and Strauss, 1987)。

敏感性的本质

敏感性和客观性相对应。敏感性要求研究者将自己投入研究中去。敏感性意味着富有洞见,协同一致,能够抓住资料中相关的议题、事件以及意外情况。敏感性意味着能够呈现参与者的观点,通过沉浸在资料中承担起他人的角色。敏感性是一种特点,它更容易出现在研究者而不是其他人身上。更多情况下,它是一种品质,是在时间中,通过密切关注及研究资料和人们而形

成的。通过资料收集和分析过程的交替，资料的意义和主旨，通常一开始令人困惑，然后变得越来越清晰，研究者开始从参与者的视角看待议题和问题。

但是对资料的洞见不会随意发生，它们只为有准备的头脑而生，在与资料不断的互动玩味中出现。理论，我们大脑中承载的专业知识，会以多种方式注入我们的研究中，即使是相当无意识地注入（Sandelowski，1993）。援引戴伊的话，“总之，一个开放的心灵和一个空荡的脑袋之间有很大的差异。为了分析资料，研究者调动了积累的所有知识。这是不可避免的。问题不是是否要利用现有的知识，而是如何利用”（Dey，1993，p. 63）。当研究者在分析中逐步推进时，是他们的知识和经验（专业、性别、文化等）使得他们能够对资料中的东西作出反应。当我们谈论我们给研究过程带来了什么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在谈论将我们的观念强加给资料。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的背景和过去的经历提供了精神上的能力，从而能够回应和接受资料中含有的信息——同时要记住，我们的发现是资料的产物加上研究者带入到分析中的东西。

敏感性是研究者和资料间的一种神奇的相互作用，其中理解资料中被描述的东西是慢慢演进的过程，直到最后研究者可以说，“啊哈，这就是他们要告诉我的”（至少从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当研究者在解释过程中忽视自我的相关性，而且资料在通过研究者的“眼睛”说话时，研究者还认为只是资料在说话，这时候，很有可能是研究者将自己的观念强加给资料（Glaser，1992）。我们越是能够意识到资料分析中的主观性，我们越有可能明白我们是如何影响解释的。

专业经验能够提高敏感性。尽管经验可能会妨碍分析者正确地阅读资料，但经验也能够使得研究者更快地理解某些东西的意义。这是因为研究者不必花费时间熟悉环境或事件。虽然“新鲜的面孔”常常很重要，但是有时候一个新手研究者只是熟悉环境就要花费一两周的时间，而且这期间，时间——以及资料——可能就丢失了。有三件重要的事情需要记住。第一，始终要将知识和经验进行对比，绝不要忽视资料本身。第二，总是根据概念

的属性与维度来思考,因为这样能够让研究者专注于事件的相同和不同之处,防止出现过多的描述性资料。第三,重要的不是研究者对事件的看法,参与者所说的或做的才是重要的。例如,科宾或许知道,医院中有一种设备是用来做 X 透视的。但是在做一项病人对医院设备的反应或体验的研究中,相关的并不是研究者对该设备的理解。相关的是参与者赋予该设备的意义以及这些意义是如何形成和转化的。参与者会将该设备描述为一种落后的机器、一种身体威胁、某种有益的或挽救生命的因此能够忍受的东西吗?对该机器的体验是痛苦的、令人恐惧的,还是使人不舒服?让研究者专注于资料的是有一个比较的基础,通过它来研究。研究者或许会对自己说,"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诊断的设备",一个"没有生命的物体","一件有用的工具"——该设备的所有属性。但是我却是从一个护士的角度来看它。病人是以同样的方式来描述他们的体验吗?或者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来看待它吗?他们赋予该设备什么样的意义?和该设备接触在他们那里产生了哪些情感反应?当他们将参与者的描述和其他参与者或研究者的描述进行对比时,一名参与者的描述往往显得较为突出。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例子。虽然研究者可能从来不会体验到不希望的离婚,但是经历了爱人的死亡确实有助于其理解丧失和悲伤的意义。经历为其提出离婚中有关丧失和悲伤的问题提供了比较的基础。一旦研究者形成了丧失和悲伤的一系列属性,那么提出来的这些属性就能够用来作为比较的基础来审查资料。最终,只有资料本身才是重要的,但在一开始的时候,研究者的经验能够提供一些洞察力。我们不需要每天都重新发明生活,否则我们将不知所措。相反,通过将我们不知道的和我们已知的进行比较,我们建立起我们的知识基础。研究也是同样的。

在研究者开始分析资料时,令人不解的是如何建立敏感性。有时候,研究者遇到一段资料就陷入困境,不能辨别其意义。本书的作者发现,在日常各种各样的活动中,研究者头脑中常常带着他们的分析问题。这样,或许当他们在阅读报纸、和同事打电话或发电子邮件,或从梦中醒来的时候,一种洞见就出现了,于是

研究者能够理解那些目前还意义很少或没有意义的资料。从技术上说,这些洞见属于资料,即使该洞见由其他经验所激发。

背景、知识以及经验不仅让我们对资料中的概念更加敏感,而且让我们能够看到概念之间的联系。正如生物学家谢耶曾经写道,“首先不是看见某物,而是在先前已知的和迄今未知的事物之间建立联系,这些未知的东西构成了具体发现的本质”(Selye,1956,p.6)。换句话说,为了知道我们在资料中“看到的”是重要的,以及能够分辨出概念之间的重要联系,我们必须有一些背景,这些背景要么是通过沉浸于资料,要么是个人经验。

关于敏感性这一部分内容适合于培养跨文化研究。虽然这些作者不是该领域的“专家”,但我们确实知道,在分析其他文化或其他性别的时候,敏感性特别重要。伊娃·霍夫曼有一本标题为《在翻译中丢失的意义》(*Lost in Translation*)(Hoffman,1989)的精彩著作。霍夫曼出生于波兰,七岁时移居加拿大。当她来到加拿大的时候,她面临的一个问题是缺乏表达自己在这个新鲜而又陌生的国家中经历的语言。当她试着用英语表达自己的思想的时候,其复杂性丢失了。研究者应该记住这一点,尤其是在做跨文化研究时。某种复杂性可能会丢失。作为教师,这些作者都曾面对过这样的难题:外国学生在他们自己国家做研究常常遇到没有具体对应的英语概念。例如,我们一个学生,纪子山本(Noriko Yamamoto),她在资料中发现两个用来表达护理质量和水平的日语概念,这是在她父母老年痴呆加重时,由日本家庭看护者说出来的。一个概念是“amaeru”,用来描述较年轻的护理人员(caregiver),希望从还能够作出回应的受护理者那里寻求宠爱;还有一个是“amayakasu”,用来描述那些当作为成年人的受照顾者不再能够作出回应时,由护理人员给他们提供的宠爱(Yamamoto & Wallhagen, 1998)。

研究者有很多方法能够用来增加跨文化研究中的敏感性。例如,切斯尼利用巴基斯坦导师们帮助她理解参与者对她讲述的内容。她说,有时候她希望自己是巴基斯坦人,这样就能够跨越文化和语言的障碍(Chesney,2001)。想要阅读关于如何处理研究

中差异性的精彩讨论,可以参阅 Green, Creswell, Shope, & Plano Clark (2007)。

文 献

研究者将大量的专业和学科文献背景带入了研究。这些背景可能是在准备考试的过程中获得的,或者只是在"跟上"该研究领域过程中学习得来的。在研究过程中,分析者通常发现传记、备忘录、手稿、报告似乎与他们的研究领域有关。它们就像从文献中获取的知识一样,问题是如何用它来提高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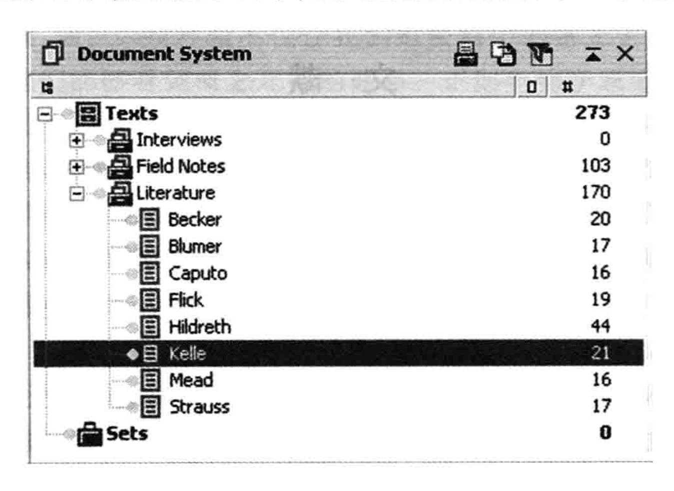
当然,学科、学派以及研究者的视角将极大地影响文献量的获取及其被使用的方式。首先,能够向读者保证的是,没有必要回顾该领域先前的所有文献。研究之前,知道要从这一堆资料中提出哪些突出的问题或相关的概念非常重要。总有某种新的东西可以发现。如果一个话题的所有问题都已经知道了,就没有必要做质性研究了。而且,研究者并不想浸泡在文献中,这样他或她就会受到文献的限制,甚至被文献所窒息。在研究之前或研究过程中,如果学生过分沉溺于已有的研究或理论,以至于他们几乎都失去了研究的勇气,这种情况很常见。贝克尔说得很好,他指出,"要利用文献,但不要让它利用你"(Becker,1986b,p. 149)。

利用技术文献

尽管下面列举的没有穷尽所有的作用,但它却描述了可以如何使用技术文献:

- 它可以用作比较的来源
- 它可以提高敏感性
- 它可以储备一些几乎没有解释的描述性资料
- 它可以提供开始观察和访谈的问题
- 它可以在分析中用来激发提问
- 它可以为理论抽样的范围提供建议(见第 7 章)

- 它可以用来证明研究发现，或相反，研究发现可以用来证明文献在哪里有错误、过于简单，或只是部分地解释了一个现象



屏幕截图 1 该截图显示的是 MAXQDA 的四个主窗口之一：文件系统窗口（Document System Window），你的资料全部在此存储和处理。可以通过文本群（text groups）来组织资料，让你能够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给资料分组。文件系统处理的方式类似于 Windows 浏览器。在该例中，“访谈”和“田野笔记”分别都有它们自己的文本群。而且，建立文本群“文献”的目的是将重要的文章、摘要等整合到项目中去。这样就可以直接找到相关的文章等，而且你可以将要援引的文献直接拷贝和粘贴到备忘录中。

下面我们将逐条进行讨论。

来自文献的概念可以作为资料比较的来源，只要是对属性与维度进行比较，而不是将其作为资料本身来使用。如果资料中出现一个概念，它让人想起来与文献中的相似或者相对，那么研究者既可以从相似性也可以从差异性来审查。例如，设想一个研究者正在研究如何“处理”在工作事故中丧失配偶的问题。当然，处理此境况下的丧偶问题和其他类型的方式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例如，处理与离婚有关的丧偶问题，但是它们也有很多差异。有时候比较两个概念相似但情境不同的概念［这里的概念是“丧失（loss）”］要分别描述

他们的重要属性。如果你根据丧失的时间、以前有关丧失的体验、对配偶的感情等这样的属性与维度在进行思考,情况就尤其如此。

对文献的熟悉能够提高对资料细微的敏感性。虽然研究者并不想带着一大串概念进入田野,但是有些概念可能一遍又一遍地在文献中出现,而且也在资料中出现,这就表明它们的重要性。当出现这样的情况时,研究者要询问的重要问题是:"这些概念真的来自资料吗? 或是因为我对这些概念太熟悉而将它们强加给资料?"例如,像护理和心理学领域中的学生给所有事情都贴上了"处理"的标签,这很常见,因为这个概念和他们的专业有关。然而,"处理"也许不是描述该研究中所发生的事情的最好概念。分析者必须学会"盒子外"思考*,并摆脱滥用专业概念,例如处理。然而,如果一个概念确实相关,要提出的问题就是这个概念和文献中的概念有什么异同。

已有的描述性材料对研究者还有一种特别的意义。书面材料常常为某些概念或研究发现提供说明,包括一个几乎没有解释的相关话题的描述性资料。阅读这样的文献几乎就像阅读其他研究者为相同或其他目的而收集的田野笔记一样。如此大量未经解释的研究发现能够激发思考,而且会让分析者对自己资料中的东西更加敏感。它还可以启发研究者对资料进行提问。而且,研究的主题或概念可能和研究者的研究相关。但是,要强调我们前面所说的,研究者必须要非常仔细地在自己的资料中寻找事例并识别概念在自己研究中的呈现形式。

在开始研究之前,研究者借助于文献提出最初观察和访谈的问题。在最初的访谈或观察之后,研究者将转向来自资料分析的概念和问题。通过提供一系列要研究的概念领域,最初来自文献的问题也可以用来满足人类研究对象委员会们(Human Subjects

---

* 所谓盒子外思考,也可以说是非限制性思考。它的反面是盒子内思考(Think Inside the Box)。盒子内思考是一种自然且习惯的思维,所以大多数人大多数时候都是进行盒子内思考。从这个角度上说,盒子外思考也可以翻译为非习惯性思维或非传统性思维。本文采取直译的方式。——译者注

Committees)的要求。虽然新的领域将会出现，最初的问题至少说明了研究的总体意图。

技术文献也可以在分析过程中用来激发问题。例如，当研究者的资料和文献中报告的研究结果存在分歧的时候，这样的差异应该促使提出这样的问题："怎么啦？我忽视了什么重要的东西了吗？这个研究中的情况有什么不同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它将对我要看的东西有什么影响？"

文献可以对理论抽样范围提供建议（第 7 章），特别是在研究的开始阶段。文献能够提供洞察力，让研究者知道到哪儿（什么地方、时间、论文）去探究相关概念。换句话说，它可以引导研究者到那些他或她可能没有想到的情况中去。当研究者完成了他或她的资料收集和分析工作，并进入写作阶段，文献可以用来确认研究发现，或者正好相反，研究发现可以用来证明文献是错误的、简单化的，或者只是能够部分地解释现象。将文献带入到写作中，不仅表明学术性，而且可以延伸、验证和提炼该领域里的知识。研究者对自己的研究题目已经做了充分的研究，他或她应该避免研究发现的不可靠，即使它们与已有的文献不一致。这些差异能够为新的发现指明道路。

利用非技术文献

非技术文献包括书信、传记、日记、报告、录像、回忆录、报纸、手册、备忘录（科学的）以及各种各样的其他材料。非技术性文献可以用作上面列举的所有目的。另外，非技术性文献还有下面的用处：

- 它可以用作原始资料
- 它可以用来补充访谈和观察

非技术性文献可以用作原始资料，尤其是在历史或传记研究中。因为对有些历史文件、信件、回忆录和传记的真实性的证实和确定一般比较困难，因此，交叉检验资料（cross-check data）就非常重要，通过审查各种各样的文献，如果可能，还要对访谈和观察

进行补充。从第8章开始,在这些分析的章节中,你将会看到科宾如何利用回忆录和历史文档作为原始资料的。

非技术性文献可以用来补充访谈和观察。例如,通过研究有关报告、通信和内部的备忘录,我们就可以了解一个组织机构的大量信息,它的结构以及它如何运作(这在观察或访谈中也许不能直接看到)。

理论框架

在结束这一章之前,谈一谈理论框架的运用似乎挺合适。在量化研究中,理论框架很常见。它们为选择要研究的概念,提出研究问题以及形成研究结果提供了一个概念指导。例如,帕特里夏·范霍克,一名来自东田纳西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正在使用科宾和施特劳斯的“慢性疾病发展轨迹(Chronic Illness Trajectory)”和“恢复(Comeback)”的概念(Corbin & Strauss, 1991a & 1991b)指导自己对妇女中风(strokes)的研究(Vanhook, 2007)。概念不仅为她的研究提供了结构,甚至还有测量工具的选择。每一种工具都被选择用来测量恢复的一个要素方面(component):身体的恢复和复原、对丧偶的心理调节,以及重新调整生活步调。在质性研究中,理论框架的使用并不很清楚。对于是否应该使用框架以及如何使用似乎存在分歧。我们知道,很多质性研究者确实是用理论框架。其实对这个话题,我(科宾)和同事简·吉尔甘(Jane Gilgun)有过大量的讨论。

尽管本书作者的偏好是,不喜欢以一个预先界定的理论框架或一套概念开始我们的研究,但是我们承认,在有些情况下,理论框架还是有用的。例如:

- 研究了一个问题之后,研究者发现一个原先提出的框架和研究者当前研究中所揭示的情况非常一致,因此,研究者可以用它来补充、拓展以及证明该研究发现。
- 来自文献的框架还可以用来提供另外一种解释,因为我们都知

道，事情总有不止一种解释——不过这里我们必须小心，因为来自文献的框架可以解释研究发现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这样研究者会试图扭曲研究结果来与理论保持一致。

- 如果研究者正在建立一个研究程序或想要形成中层理论（middle-range theory），那么一个先前找到的理论框架可以为其提供洞察力、方向以及一系列有用的初始概念。然而，研究者应该对新观念和概念保持开放，并且当他或她发现某种“引进的”概念不符合资料，要能够放弃。“保持开放”是至关重要的，即使对那些有经验的、根据自己的研究程序进行研究的研究者而言。
- 理论框架能帮助研究者决定要使用的方法论。

熟读期刊文章就会发现，研究者常常运用理论框架来证明其使用特定的方法论或采取某种取向的合理性，尤其是在护理专业中。例如，霍尔罗伊德在中国做的有关护理的研究中使用了来自认知人类学范式的一个框架，该框架聚焦于“共享的、被认可的和传承的内在文化呈现形式，其观点是文化的指导方针存在于特定社会的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中”（Holroyd，2003，p. 306）。通过使用该框架，霍尔罗伊德希望能够发现，责任和义务应该与中国社会的性别和生育指导方针相一致。在另外一个例子中，研究者在对“临终关怀（palliative care）”的本质研究中，作为方法论的选择，他们用符号互动主义来解释扎根理论（Cannaerts，Dierckx de Casterlé，& Grypdonck，2004）。

当研究者用马克思主义或女性主义或互动主义哲学取向做研究的时候，使用理论框架就会出现一些差异。在这种情况下，哲学倾向可能会影响研究者做研究的整体取向。里德在着手她的标题为《被排斥的伤口》（*The Wounds of Exclusion*）的专著研究时，将自己定位于一名女性主义者在实施女性主义的行动研究。在解释其意义时，她说：“在下面的补叙中，我试图对自己作为研究对象的角色和自我作出说明性的解释，以便作出批判性的分析及负责任地使用权力”（Reid，2004，p. 6）。

我们继续另外一个相关的话题,如果质性研究者想要扩展一个实质理论(a substantive theory),或将一个从实际存在的事物中获得的理论(substantively derived theory)提升为中层理论,他或她可以从一个概念开始。例如,"意识(awareness)"这个概念,它来自格拉泽,施特劳斯和贝诺利尔对死亡的研究并出现在格拉泽和施特劳斯的《死亡意识》(Glaser & Strauss,1965)一书中。这个概念被用来解释各种互动者/行动者(inter/ actants)(健康专业人员、家庭,以及正在死去的人)如何管理有关病人死亡过程的信息。一名研究者,如果对发展"信息管理"的中间理论感兴趣,他或她可以从格拉泽和施特劳斯描述的"意识(awareness)"这个概念开始,并将其作为研究的一个基础,研究在婚姻背叛、间谍活动以及"亲密的"伙伴之间是如何透露信息或对其进行保密的。很可能会发现新的类属,也会有对前面发现的类属的扩展。最后,"意识"将被提升到一个更加抽象的层面,因为它现在正被跨情境使用。想要阅读讨论关于形成、检验及连接一般理论的文章,请参阅施特劳斯题为《关于一般理论的本质和发展的说明》(Notes on the Nature and Development of General Theories)的文章(Strauss,1995)。

要点总结

本章包括四个主要领域:(a)选择研究题目并陈述问题,(b)形成对资料的敏感性,(c)文献的使用以及(d)理论框架的运用。在开始研究之前,必须要对每一个领域进行思考。

研究题目和问题。最初的研究问题和表述问题的方式引导着研究者从特定的视角来审视资料,以及使用某些资料收集技巧和资料分析模式。研究问题为研究项目定调,而且帮助研究者集中注意,即使是大堆大堆的资料。质性研究中最初的问题常常是开放式的而且比较宽泛。随着研究的进展,研究领域中问题和议题的发现,研究问题往往会变得更加精炼和具体。最初的研究问题可以是由教授或同事建议提供,或者来自文献或研究者的经

验。无论问题的来源是什么,重要的是研究者对课题(subject)要有激情,因为他或她将必须和该课题生活一段时间。

敏感性。如果你在质性研究中不能做到客观性,但你也许可以保持敏感性。敏感性,或对资料的洞见性来自于研究者带入到研究中的东西,以及在资料收集和分析过程中的投入。敏感性让研究者能够抓住意义,从知识上(和情感上)对资料言说的内容作出反应,从而能够发现扎根于资料的概念。然后,在着手撰写研究报告的时候,同样的敏感性让研究者能够将参与者的集抽象概念、细节描述以及感情于一体的故事呈现出来。

使用文献。技术文献和非技术文献往往以某种不同的方式以及特定的方式发挥作用。除了使用一般的技术文献之外,聪明的研究者有时候会使用各种其他类型的公开及非公开材料来补充他们的访谈和田野观察。虽然通常进入大脑的是报告和传记,但还是有很多有用的非技术文献。

技术文献能够提供最初的问题、最初的概念以及理论抽样的观念。非技术文献既可以用作原始资料和补充资料,用来作比较,也可以作为形成一般理论的基础。研究者要记住的重要方面是,如果将技术文献放在研究者和资料之间,它会妨碍创造性。但是,如果将技术文献用作比较,它能够帮助寻找相关概念的属性与维度。

理论框架是一种技术文献。在质性研究中常常用到,然而它们的运用不同于量化研究。也就是说,它们不是界定要研究的变量,它们也不像在量化研究中那样构成研究。它们往往更多的是用来证明使用一种特定方法论的合法性,或者作为研究的指导取向。另一方面,在质性研究中,研究者的理论倾向(theoretical orientation)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虽然理论倾向不能决定要研究的概念,但它确实能够决定做研究的取向。而且,对从实质理论(substantive theory)形成中层理论(middle-range theory)感兴趣的研究者可以将实质理论用作理论基础,跨越不同群组来探究核心概念,这样就能够增加理论深度、广度以及抽象的层次。

思考、写作及小组讨论活动

1. 写一段话，描述你的研究问题的来源。或者，如果你还没有研究题目，说明你可以怎样在本书提供的信息基础上找到一个题目。
2. 就你的研究题目，写下两个问题，一个质性研究的问题，一个量化研究的问题。然后，写出这些问题将怎样引出不同的资料收集和分析的方法。
3. 小组讨论敏感性的概念。敏感性对小组各个参与者意味着什么？如何促进敏感性的形成？小组成员如何看待其与他们自己研究的关系？
4. 讨论技术文献如何能够促进或阻碍质性研究过程。
5. 详细查阅你的研究领域里的期刊，标出质性研究如何利用理论框架或概念框架。拿出几个样例供小组讨论。

3

分析的准备

在阅读科学发现时，人们有时会被简单而又看上去容易的观察所震撼，正是这些观察产生了伟大而深远的发现，从而使得科学家声名鹊起。但在回顾中我们看到了已经确立重大意义的科学发现。最初，发现通常没有固有的意义；发现通过将其与其他的知识联系在一起而被赋予意义，比如通过用它来进一步推演知识。（Beveridge，1963，p. 141）

框3.1 术语界定

分析：分析获得事物及其成分，以确定它们的属性和功能，然后运用获得的知识对整体进行推断。

分析工具：分析工具指能帮助编码的恰当的思维工具或思考程序（procedures）。

概念：代表一群或一类对象、事件和行动的词语，它们拥有某些主要的共同属性，虽然这（些）属性在维度上会有变化。

维度（Dimensions）：属性在一个范围的不同变化形式。

“感觉对了”（Feeling right）：指在资料中沉浸一段时间后，研究者认为通过反思性分析获得的研究发现表达出了参与者试图通过语言行动和情感所传递的东西，就像从分析者的“眼睛”（自己的视角）看到的一样。

微分析：围绕概念所进行的详细编码。一种用来拆解资料并寻找词语或短语各种意义的开放编码形式。

属性：一个对象、事件或行动的特征或成分。特征赋予对象、事件和/或行动以特殊性（specificity）并对其进行定义。

导　论

研究者不可能一直连续不断地收集资料。迟早要对资料做些“什么”，从而赋予其意义。这就是**分析**。

什么是分析？分析就是为了揭示事物是什么以及它是如何发挥作用而对其进行研究的过程。为了进行分析，研究者可以将一个事物分解为各种成分，然后研究这些成分，以发现它们的**属性与维度**。最后，研究者利用所获得的关于这些成分的知识和它们的属性，对作为整体的实物对象进行推测。在推测过程中，分析者依靠经验和训练来辨别(recognize)和赋予意义的，就像贝费里奇在上面的引言中所讲的一样。没有一定的背景，即没有沉浸到资料中，或没有专业/经验知识，就没有辨别的能力，也没有赋予意义的能力(Beveridge，1963)。

另外一种分析取向是从整体开始，观察事物在做什么以及它看起来如何发挥作用，然后将其分开确定它的各个成分，研究成分的构成及其功能以及它们和整体的关系。拿血液为例，研究者能够对其一般特征进行审视，例如，颜色、黏稠度、显在功能以及在身体内的分布。这虽然有益，但该取向并不能告诉我们血液的整体情况。研究者必须要更加深入地挖掘，更加密切地审视血液，从而对其成分进行判断，例如，血红细胞、白细胞以及血浆；并探究它们的属性及功能。最后一步是对各个不同成分彼此之间以及它们与整体的关系进行判断。而另外一种方法是拿出某种像血液一样的东西，假设它具有各种功能，对每一个假设进行检验，从而判断某一假设或更多假设是正确的，最后排除那些错误的假设。研究常常既是一个归纳的过程，又是一个演绎的过程。

分析是一个非常动态化过程。分析者必须要进行头脑风暴，尝试不同的观念，排除一些并拓展另外一些，然后才达成结论。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看看下面的例子。施特劳斯博士的一位雕刻家朋友曾经邀请我们到他的工作坊去看他是如何工作的，我们在那里开始讨论创造性。他的工作坊到处都是各种类型、各种

形状和构造的金属。他告诉我们他是如何工作的。首先,他研究了不同的金属,看看它们有哪些可能性,展开自由想象。然后,赋予想象的雕塑以形体,看看真正的形体是否符合他的视觉。如果从美学上看结果不“好(work)”,就要抛弃,这个过程会不断重复,直到该雕塑“看起来及感觉起来不错”。

这对于分析是一样的。从资料中能够建构很多不同的故事。研究者如何将**概念**结合在一起常常需要很多次的尝试,这样故事或研究发现才让他或她“感觉对了”。“**感觉对了**”是一种直觉。它意味着在沉浸于资料之后,研究者相信研究发现反映了参与者要传达的东西的“本质”,或代表了对资料的一种逻辑解释,就像通过分析者本人的眼睛所看到的。

在本章中,我们将剖析分析本身,审视分析的各种成分,展示一种关于分析的微分析。本章的目的就是要为新手研究者提供关于本书后面内容的强有力的基础。

质性研究的一些属性

质性研究有很多不同的属性。在本章的余下部分,我们将逐一进行深入探讨。

- 分析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科学
- 分析是一种解释活动
- 资料中能够建立不止一种故事
- 概念构成了分析的基础
- 概念具有不同的抽象层次
- 存在着不同层次的分析
- 分析可以有不同的目的
- 描述情境(context)是分析的一个重要方面
- 分析是一个过程
- 分析从第一份资料的收集开始
- 研究者可以根据分析情况的需要进行**微分析**(Microanalysis)或

者更一般的分析

分析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科学

分析既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科学(Patton, 1990)。"艺术"方面指的是创造性地使用方法去解决分析问题,以及能够从资料中建构一个连贯的解释性故事,故事要让研究者"感觉对了"。要将艺术的方面带入分析,研究者在方法的使用过程中必须要保持灵活性。他或她必须要学会"在盒子外面"思考,愿意冒险,而且能够将"稻草"编织成"金子",也就是要将原始资料变成某种增进理解以及增加专业知识的东西。研究的艺术性超越了研究的所有形式,没有它就能够完成任何一点重要的研究是令人怀疑的。贝费里奇这样解释研究中的艺术:

> 新知识常常来自于某种相当意外的观察或者在研究过程中出现的偶然事件……解释这些线索并理解其重要意义要求不带有僵化观念的知识、想象力、科学的品味,并有对所有未经解释的观察进行沉思的习惯。(Beveridge,1963,p. 147)

虽然质性研究有其艺术方面,但它也承担着某些责任。研究必须也要有科学的部分。桑德罗斯基说:

> 称赞质性研究中的艺术并不是赞成无组织或无知无畏。质性研究者不是无中生有,他们会想象,但不会捏造。他们不能因为贴着质性研究标签就任意忽视各种研究策略的逻辑和美学。(Sandelowski,1994,p. 58)

质性研究的科学方面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科学"。这里的科学是指它将概念的生成"扎根于"资料。这样,以它们的属性与维度的形式系统性地形成概念,同时通过将其与新搜集的资料进行对比来验证对其的解释(Blumer, 1969, pp. 25-26; Glaser & Strauss,1967)。当我们使用"验证(validate)"这个术语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是在量化研究意义上来检验假设。这里进行验证更多的是指,随着研究的进展,向参与者求证并利用反对性资料对解

释进行检查。在质性研究中,科学和艺术间必然要有某种平衡。虽然研究发现和资料都是建构的,而且可能被认为是“故事”(Denzin, 1989),但它们并不是传统意义上虚构出来的用来娱乐的趣闻轶事那样的“小说”(yarns or tales)。这里不能有不切实际的幻想(flights of fancy)。质性研究也不是受控制的实验科学。研究分析在艺术和科学的维度之间走得多远,这取决于研究者的哲学背景、其所在学科和所使用的质性研究方法。

分析涉及解释

分析涉及解释(Blumer, 1969)。解释暗示着研究者要像身处其中的人那样理解事件。正如邓金所说:

> 解释是一个生产性的过程,它指出了一个事件、事物、经验或实验的多重意义。解释是一种转化。它阐明、照亮了经验。就像提炼黄油时一样,解释产生并提炼了意义,这些意义可以来自文本、事物或者来自一段经历(Denzin,1998,p.322)。

但是邓金并没有止于此。他继续道,“这样看来,意义就不在文本中,解释也不会超越经验或其表象(representation)。意义、解释与表象彼此之间深深地纠缠在一起”(Denzin,1998,p.322)。虽然解释并不是资料的精确复制,而是分析者对资料的想法,但这并不意味着研究者就应该放弃作研究。解释并不是精确科学。它从来都不是,也不该是。虽然质性研究有其不足,但是做好这个仍然是一项重要的贡献。作为一名护士,质性研究在我(科宾)的实践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它让我走出了“健康护理权威”的角色,从而成为一个与病人进行共同创造或协商的护理角色(Corbin & Cherry, 1997)。通过质性研究,我知道了,病人对他们疾病的了解比我们预想的要更多,他们的身体对疾病作出了反应,而且他们设计用来控制病情的方法也更多,因为他们每天都要和这些疾病生活在一起。

研究者是他人语言和行动的翻译者(translators),研究者是参与者和他们期望的听众(读者)之间的中间人(the go-betweens),

这是他们想要达到的。因为每一个语言的翻译者都知道,意义传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以及从一种情境到另一种情境,语言可能会有不同的意义。在国外教书的时候我(科宾)和很多翻译者在一起工作过。我说的有些东西总是引起学生发笑,因为一个直译词传递的并不是我想要表达的意思。或者,学生会告诉我,他们并不确定他们对我的发言理解了多少,因为翻译很糟糕。很明显,有些东西在翻译中丢失了。当听到学生说书本或发言的翻译“不是很好”的时候,虽然我感到有些泄气,但是这确实给了我们这些想要通过研究恢复参与者的语言的人一个教训。解释通常并不精确,而且有时候研究者是一个“半截子(bit off)”,另外,有些解释者(interpreters)比其他解释者更善于翻译。然而,变成“半截子”的可能性有时不应该打消了研究者努力尝试的积极性。质性研究者必须推进分析。只有这样,我们的收获才会比我们失去的要多。

在继续我们的介绍之前,关于解释还有一点是,分析从来都不会结束,无论研究者想要在一项研究上工作多久。既然研究者总是在思考他们的资料,那么当新的洞见出现以及情境变化的时候,他们总是要延伸、修订以及重新解释他们的解释。这些修改是质性研究过程的组成部分。正如邓金和林肯在《资料收集和解释》(*Collecting and Interpreting Qualitative Data*)一书第2部分的导言中所介绍的,“第2部分探究解释和评价的艺术和策略,认为分析、评价和解释的过程既不是终结的,也不会机械的。它们总是在进行之中、意料之外、无法预测而且是未完成的”(Denzin & Lincoln,1998,pp. 275-276)。

从资料可以形成不止一种故事

质性研究资料实际上本来就非常丰富,而且充满各种可能性。不可能说从资料中只能建构一种故事。虽然参与者通过资料说话,但是资料本身不会挥舞旗帜指出什么重要及什么不重要。不同的分析者专注于资料的不同方面,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事物,寻找不同的意义。而且,即使资料相同,不同的分析者会得出

不同的结论。这完全取决于分析者带入资料的角度或视角。例如,对那些患有慢性病人的访谈可以从疾病护理(illness management)的角度分析(Corbin & Strauss, 1988),也可以从身份和自我的角度分析(Charmaz, 1983),还可以从他们遭受的痛苦这一角度研究(Morse, 2001; Morse 2005; Riemann & Schütze, 1991)。如果一个人分别阅读由这些研究者实施的访谈,特别是非结构性访谈,那么这个人就会发现,这些访谈在实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是研究者看资料的透镜。护理、身份以及痛苦都能够在有关慢性病的资料中发现,而且都是合理的解释。每一种解释都呈现了慢性病是什么的更加圆满的图像。但是不同研究者往往关注不同的方面。换句话说,资料以不同的方式在对他们说话。每一项研究的区别是他们赋予了每一个不同现象以不同层次的意义以及它们在研究中结合在一起的方式。

分析的层次

分析的范围包括从浅层的描述到理论的解释。浅层的描述往往是停留于资料的表面,而且看起来更像新闻而不是研究。它没有挑战思想、呈现新的理解或告诉我们也许以前不知道的东西。更深入的分析往往在资料表面之下进行更深入的挖掘(但现在很多记者也在进行解释)。它所呈现的描述体现了建构完好的主题/类属、情境的发展以及在时间中过程或变化的解释说明。深入分析更有可能产生新的知识并加深理解,因为这样的分析往往超越个人已知范围。虽然这些研究者对花费时间作更加深入的分析有偏见,但是他们也承认,研究者在实施研究项目及分析的动机、训练、方向和资源等方面有着不同的层次水平。很多想要做质性研究的人没有老师指导他们。这些研究者常常不能确定如何进行研究、缺乏自信,或者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好的"分析。他们可能是从方法书本到方法书本,试图弄明白怎么去做,而最后任凭自己去做最善于做的,却常常很少是他们本想要做的或者只有有所指导就能够做的事情。

还有,有些研究项目并不要求详细的分析。可能只是量化研究中遇到一些问题,需要增加某种程度的质性分析。在这些项目中,对重要主题进行总结也许就足够了。从另外一个极端来说,分析可能会过分细致,使得报告过于描述和琐碎,因此读起来乏味。琐碎不是我们的目标。分析的艺术在于知道追求什么观念,观念延伸多远,什么时候停止,以及如何在概念化和描述之间保持一种平衡。

概念构成分析的基础

概念/主题是本书中所描述的分析方法的基础。布鲁默强调概念对研究的重要性时说:

> 在整个科学探究活动中,概念扮演着中心角色。在学者对经验世界的先验图式中,概念是重要的因素;学者提出研究问题时,概念可能就是那些术语;概念是资料寻求的类属,资料通过它们进行分组;它们通常是用来建立资料之间联系的主要工具;它们是解释研究发现的"锚定点(anchor points)"。(Blumer,1919,p.26)

概念来自于资料。它们代表了研究者对经历、语言、行为、互动、问题以及参与者表达的议题中所表达出来的东西的印象主义理解。概念的使用为资料分组/组织提供了一种方法,它是研究者现在使用的方法。如果你想到一只鸟、一架飞机或一个风筝,要问它们有什么共同点,你可以说是"飞(flight)"。"飞"这个概念能够让研究者将这些多种多样的事物组织在一起,然后,就"飞"的概念更加深入细致地分别对这些事物的相似性及差异性进行探究。通过这样的研究,研究者在一般意义上揭示了"飞"这个概念某些有趣的知识,以及"飞"在每一类事物中的特殊性。

概念在抽象层次上不同

概念在抽象层次上有差异。有基础层次上的概念和更高层次上的概念,我们称其为类属(categories)。低层次的概念指向、

关涉更高层次的概念,并为其提供详细的内容。例如,在上面提供的例子中,飞就是一个比鸟、风筝或飞机更高层次的概念。飞说明了这些事物所做的事情。鸟不会飞很可能就不叫鸟(虽然世界的某些地方可能会有不会飞的鸟)。风筝,之所以叫做风筝,应该会飞,否则它就是一个废物(dud)。而如果飞机不能飞,它可能就叫做别的什么东西,例如有翅膀的汽车。因此,飞是这些事物个体的内在组成部分。但是如果我们想要理解并描述飞(flight),我们必须审视当飞应用于这些事物个体时飞(flight)的个别属性与维度,这样就形成了对各种情况下飞(flight)的理解。在我们解释任何高层次概念中,通过保留低层次的概念,我们就不会远离资料,而且还提供了所有的细节,从而为我们研究的现象增加趣味和变化。研究者越是向上移动概念的层级,概念就变得越宽广,解释也越多,然而当它们变得越来越抽象时,虽然在解释力度上有所帮助,但是它们开始丧失某些具体性。不过,如果概念的金字塔被小心地建立起来之后,更高层次的概念将依赖于低层次概念作为其坚实的基础,后者反过来要直接回到那些带有细节和描述力量的资料。

一开始,分析是自由开放的,更像头脑风暴。研究者寻找概念,但在分析的早期,可能无法确定一个概念是低层次的概念还是高层次的概念,或必须赋予事件什么样的解释性意义来对其进行分组,以及如何相应地将其提升到更高的抽象层次。在鸟、飞机和风筝的例子中,很容易看到这三种事物的共同之处。但是在分析资料的时候,什么事件、行动、互动情感是共同的,通常并不十分明显。多花时间浸泡在资料中,研究者就能获得观察力和敏感性。正是洞察力使得研究者能够在一个更加抽象水平上对事件进行组织分类。开放地设想资料中所有可能的意义以及概念之间的潜在关系,这在早期分析中是非常重要的。这会防止过早结束或匆忙得出结论,它们随着分析的进展后来可能证明是错误的。

早期分析保持开放对于有些人很难,尤其是对那些埋头于严格量化研究的人。质性研究新手常常担心,即使他们进行头脑风暴,

而且列出某事件或行动中表现出来的所有可能的意义,却在某种程度上是在资料中"放入某些东西"。新手研究者没有意识到的是,对资料的意义草草得出结论是多么容易的事情。花时间去考虑一切可能的意义有助于研究者对他们自己的假设以及他们对资料的解释产生更加清醒的认识。

研究目的

质性研究有很多不同的目的。研究目的可能从描述,到概念整理,到理论化,各不相同。由于训练、技巧、质性研究方法的类型和目的上的差异,不同的研究者会有不同的目的。因为刚开始做研究的人常常很难对描述和理论作出区分。因此我们在此将就这些问题多作一些介绍。而且,我们还将介绍另外一种处理资料的模式,这在质性研究中经常用到,这种模式我们称其为概念整理(conceptual ordering)(想要了解对这些同样的问题上相似但在某种程度上又不同的视角,见 Wolcott,1994)。

人们通常在他们日常对话中描述事物、人物、情景、时间、行动、情感、情绪及愿望。不仅普通人这样描述,作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新闻记者、小说家、技师、旅行及其他现实主义作家也是这样描述。描述利用普通词汇来传达关于事情、人物和地点的观念。例如你可能会听到:"清晨,大街寂静无人,我希望坐着自己崭新的敞篷车,驰骋在这空旷的大路上。"当日常语言无法描述或需要更精彩语言图画时,也可以使用明喻和隐喻来描述(Lakeoff & Johnson, 1981)。思考下面由马奎斯(Márquez,1992)描述的情景,"这是八月初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阳光普照,典型的战后夏天周末光景。巨轮缓缓地行驶着,带着一声疲惫的呼吸,穿过静静的湖面"(p. 117)。比喻丰富、生动,而且很容易让读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没有描述的能力,人们就几乎无法交流。人们需要描述来传达所发生的事情、周围的情况、人们在其中所做的事情等。描述语言的使用能够使得普通事件显得异乎寻常。伟大的作家,像马奎斯

(Márquez)和福楼拜(Flaubert),都懂得这一点,而且努力让他们的细节显得如此生动,以至于读者真正能够看到、尝到、闻到及听到情境中所发生的一切。然而,即使只是普通人,我们这些没有多少写作技巧的人,在遇到新的情况,有时是日常琐事的时候,也会用描述将我们的经历、思想和感情讲述给他人听。

描述看起来可能是客观的,但它们并非如此。即使基本的描述也涉及目的(否则为什么要描述啊)和听者(audiences)(谁会看或者听你的描述)及观者的选择性视角(Wolcott, 1994)。例如,政策报告主要集中在犯罪或研究性议题以及其他利益党派(interested parties)。然而,一位新闻记者对同样事件的描述很可能会写得更加丰富多彩。后者往往也反映个人、政治或机构的立场,其目的是为了告知并感动读者。

总之,讲故事者所用的描述性细节通常都是有意或无意地选择出来的,都是建立在他或她所见所闻的基础之上,或者是他们认为重要的。虽然描述常常意味着传递信任以及描绘图像,但它也是用来劝说、说服、表达或引发激情。描述性语言可以承载或隐或显的道德判断。不仅仅语句可以这样,而且整本书都可以这样——例如在针对改革的报告或丛书中。即使看起来客观的报告,像那些政策报告或新闻报道可能反映了很深的偏见和道德判断,并没有意识到个人的态度和感情。美学判断也是透过描述来传递的,"这位年轻的女高音的嗓音优美、空旷,虽然高音处她偶尔有点儿颤抖,但通常表达了个性精神;她在表演方面有着广阔的前景"。有时候还掺杂着美学和道德方面的内容。例如批评家和观众对早期印象主义油画的负面反应。后来,同样是这些油画成了世界各地博物馆参观者和艺术收藏者最喜爱的作品,当这些作品被涨价拍卖的时候,它们为持有者带来了成千上万美元的进账。

重要的是要理解,描述是资料更加抽象解释的基础,也是理论发展的基础,虽然它未必会通向理论,即使这不是研究者的目标。描述已经体现概念,至少隐含着概念。即使最抽象的科学,没先前的或相应的描述也不可能有科学的假设和理论活动或实

验活动。虽然描述很明显不是理论,但描述是理论化的基础。

描述也是我们所谓概念整理的基础。后者指根据资料的特点和维度将其组织安排到各种类别中(有时候分等级),然后用描述阐明这些类别。大多数社会科学分析包括很多概念整理,而且有很多类型的概念整理。研究者要根据分类计划进行组织安排,例如类型或阶段,从而发现资料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各个条目(items)都是在资料中寻找,并根据它们各自的一般属性与维度进行界定。例如像《米其林指南》(*the Michelin Guide*)对饭店进行评级(ratings)一样。他们常常根据诸如质量、品味、外观、环境、价值及复杂的酒单等特点将饭店从三星到五星进行评级。每个饭店在每个特点维度上的变化为一般评级提供了基础。由于评价者的喜好,常常对饭店评级有所偏见,这未必反应了大众的品味。然而在《米其林指南》中要被赋予三星、两星或甚至一星都是非常具有声望,而且保证是饭店的成功者。当介绍评级时,研究者几乎必然要用各种描述性的材料来解释他们的评级。讨论概念整理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这种分析类型是理论化的先导,理论正是通过这些特点和维度而形成。

形成理论是一种复杂性的活动。理论意味着什么?对于我们,理论表示的是一套形成完备的类属(主题、概念),它们通过关系的阐明,系统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解释某种现象的理论框架(Hage,1972,p. 34)。理论的聚合力(cohesiveness)是通过使用上位的解释性概念而产生的,这个概念位于其他概念之上。而且,除了将其他概念聚集在一起外,它还解释事物的本质、方式、时间、地点及原因。

并非所有的人都想形成理论。其实,如今形成理论似乎已经落伍了,它被"生活体验"的描述及"叙述性故事"所代替。虽然我们承认理论有其限度,但是将形成理论和增进知识联系在一起在安塞尔姆·施特劳斯(Strauss,1995)的一生中始终没变。作者认为,并非所有的事情都能够或应该纳入到一个巧妙的理论解释图式(cheme)中,虽然图式可能会对我们有所帮助。然而,作为一项研究贡献,形成理论仍然是重要的,而且应该如此。研究者考虑形成理论不应该被最近的反理论潮流所吓倒。潮流有一种反反

复复的形式。任何特定的理论可能都会过时，如果有新知识出现，即使这些理论没有呈现“真实”，即使这些理论是归纳性的，但它们很长时间被证明是有用的。人们肯定会诧异，如果只有“故事”而没有“理论”，这个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我们也许绝不会能够将人送上月球、发明计算机，或用玻璃建造房子。研究者必须作出选择，而且应该选择最适合研究问题和最有可能做出专业贡献的研究取向，并朝着研究目标去努力。

理论化是解释性的，而且它不仅要将原初资料提炼成概念，而且还要将概念安排到一个逻辑的、系统性的解释性图式中。如果研究者要建构理论，那么他或她就应该做好这件事情，而不应该满足于理论的拙劣建构、简单模仿。理论建构所需要的是一个充分被探究的并从很多不同角度或视角进行思考的观念。另外非常重要的是，要在理论的启发下探究到底。构想和启发引起“研究活动”，研究活动需要根据大量各种各样的问题作出决策和行动，而这些问题则使得研究者能够充分地探究一个话题。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一直会有决策及相应的行动。理论化的核心是归纳（从材料中获得概念、属性及维度）和演绎（假设概念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也是来自材料，但是材料已经经过了分析者的压缩，以形成概念）之间的交替活动。

理论可以是实质的、中层的或正式的（Glaser & Strauss，1967，pp. 32-34）。一项关于同性恋如何向医生透露或保守他们性认同的秘密（disclosure/nondisclosure）的研究就是一个来自实质领域理论的例子。“信息管理”的概念也能够用来研究 HIV 情况的同性恋者对其爱慕对象的暴露或保密问题。研究变化情况下同性恋者的“信息管理”能够形成一个更为中层的“信息管理”理论，这适用于对男同性恋生活非常重要的情境。

更多的正式理论很少针对一个群体和/或一个地方，而适用于一个更广泛的学科和问题。为了形成正式的“信息管理”理论，研究者可以从一个实质理论或中层理论开始，这些理论来自于先前研究，然后运用这些理论框架作为基础研究范围更加广泛的相关话题。例如，在一项研究性活跃的成年人揭示的关于性病传播

的研究中,研究者希望从中形成有关“信息管理”的一般理论,他可以采用原初的框架,然后再延伸,通过用该框架研究父母阻止他们的孩子上网,从而对其进行抽象提升;然后是政府之间的秘密;最后是政治运动中的“信息管理”。因为正式的理论通常来自于对各种相关话题和情况下的概念的研究,它们变得更加抽象,而且比实质理论或中层理论具有更大的适用性。

描述情境是研究分析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做分析的时候,描述事情发生的情境或情况,人们在这些情境或情况下所说、所做和/或所感的,这和提出“正确的”概念同样重要。情境不仅为概念奠定基础,而且最大的减少了歪曲意义和/或误传意图的可能性。电影制作人和小说家可以采用创造性的措施,将情境中的事件用语言或图片插入到其他情境中表达政治或社会观点。电影制作者或小说家如果决定编造故事,他们可以根据他们的创造性视野、拼接、改编、添加、压缩或修饰人物和事件。但是研究者不是在用同样的创造性方式做研究,这正是研究者和小说家之间不同的地方。两者都需要一个好的眼光,都必须能够传达出本质、情绪和感觉,但是研究者却不能为了表达观点就修改参与者的语言或行动。研究者必须要将表达的情绪、感情、体验和行动放置到它们发生的情境中,这样意义才会清晰而准确。研究者在解释期间必须紧扣资料,并公正地呈现研究发现,即使资料可能与研究者的假设及预期相矛盾(Sandelwoski,1994)。

分析是一个过程

分析是一个产生、发展概念和检验概念的过程——一个在时间中以及资料获取中建构的过程。你可以从第一份资料中提取一些概念。将这些相同的概念与后面的资料比较,比较其相似性和差异性——或者通过增加新的属性和维度来拓展概念,或者,如果资料中有新的观念,就往概念清单中增添新的概念。或者,

还有第三种选择,即如果在看到新的资料之后,觉得其他术语会更加适合的话,则修改前面的概念。记住,如果研究者提前知道资料中的所有相关变量和关系,那就没有做质性研究的必要了。

收集到第一份资料就开始分析

新手研究者常常会问,"我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分析?"理想的情况是,研究者在完成了第一个访谈或观察之后就开始分析(Glaser & Strauss, 1967; Strauss, 1987)。这种有序的资料收集和分析方法允许研究者找出相关概念、跟上随后的问题,而且能够以更加敏锐的方式倾听和观察。建立在概念基础上的资料收集被称作理论抽样(theoretical sampling),我们将在后面第 7 章对此进行更多的阐明。虽然一边收集资料一边分析比较理想,但是有时候在收集资料时,又不能马上开始分析。这里的危险是,有可能无法将相关的思想贯彻到最终的结果中,因为可能有些主题或概念可能会比其他的发展得更好。但是研究者要做他或她必须要做的,而且要学会处理他或她所拥有的。有时候,一次有好几个访谈。或者,研究者去另外一个国家或城市收集资料,所以访谈和观察之间很少或没有时间。我们说这一切的目的是告诉读者,如果有可能,在第一份资料收集之后,分析就应该开始。

除了允许研究者跟踪、验证以及发展概念,一边收集资料一边分析有助于防止研究者被过多的资料压倒。面对一大堆访谈或观察资料而不知道做什么,这是令人沮丧的事情。在资料收集期间就沉浸在资料分析中,这提供了一种方向感,加深了对资料的敏感性,而且让研究者能够重新定位,并在研究过程中修改访谈或观察问题。

分析工具在分析中的运用

分析工具是研究者在编码时所使用的心智策略(mental strategies)。编码作为概念,表示参与者的语言或来自观察或来自录像的事件。无论是否意识到,每一个研究者在分析过程中都会运用一些心智策略。本书中,我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有

些是我们自己的，有些则是从其他研究者公开出版物中借鉴的。实际上，我们用了整整一个章节探究这些方法(见第4章)。工具的选择取决于研究者的训练、经验和技巧。随着研究者分析资料变得越来越顺利，他或她很可能会从多年发展起来的经验库中拓宽工具的使用。有些我们认为与分析最相关的分析工具则受到质疑并需要权衡比较。最后，在选择用分析工具分析手头的分析任务时，分析者应该使用自己觉得最顺手的研究策略。

微分析(microanalysis)和更一般的分析

在本书1998年版中，我们讨论了一种我们称之为"微分析(microanalysis)"的分析形式，一种开放的编码形式。学生常常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微分析和其他类型的编码有什么不同?"微分析并不是另外一种编码形式。它只是一种更加详细的开放编码类型。它是将资料拆分开，以思考各种可能的意义。你可以说，编码具体说来有很大的差异，从微观编码(意义非常详细)，到不关注细节的更加宏观(或一般)的编码，再到关注一般本质的更宏观的编码。微分析最可能是在项目的一开始使用，在分析者试图拆分资料，去理解材料意义的时候。微分析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工具。它就像使用高倍显微镜去更加近距离地审查每一份资料。我们，即作者，常常用微分析开始我们的研究项目。

我们为什么如此重视微分析？我们重视它是因为它能够让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思考事情。想想爱因斯坦和达尔文。他们之所以能够得出与当时传统观点不一样的结论，是因为他们能够细心观察、密切关注细节，而且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布鲁默的观点有点儿不同，但却非常好：

> 人们是怎样走进社会经验世界并深入挖掘它的？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不是仅仅走进一个给予的领域然后去看看而已。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需要一种很高的秩序：慎重而诚实的探究，创造性又有纪律性的想象，研究中充满智慧

又富有灵活性，对自己的研究发现进行沉思，以及时刻准备着要验证并重塑（recast）自己对该领域的观点和意向。（Blumer，1969，p.40）

虽然多数人同意，微分析是一种有价值的分析工具，特别是当他们看到它发挥作用的时候，然而还有人错误地认为我们在整个项目中都提倡使用微分析，或者认为我们编造子虚乌有的材料。实际情况是，微分析是有选择性地使用的，而且通常是在项目的一开始使用。其目的是提出观念，让研究者深入到资料中，将注意力集中到那些看起来相关但其意义仍然模糊（elusive）的资料上来。它还有助于防止过早地下结论（foreclosure），因为它促使研究者在自己的参考框架之外思考。这是费时间的事情，需要一定的训练，但其回报也是相当可观的。

这让科宾想起她丈夫常常给她讲述的一个故事。当他作为一名工程部经理工作的时候，问题常常在生产线上产生，然后他就会派他的工程师去查找问题。通常是，这些工程师还没有仔细研究问题所在，就推测问题是由"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引起的。基于推测而不是观察或检验，他们想要对流程作一些改变，如果他们的假设是错误的话，这些改变的代价可能非常昂贵。只要工程师们以这样的方式行事，我丈夫就会问："但你怎么知道这就是问题所在？你研究了这个问题并收集了所有能够支持或否定你的假设的数据了吗？"回答常常是"没有"。我丈夫就会让这些工程师回到"现场"，并告诉他们，除非他们仔细地研究了该问题并且掌握了所有必要的细节，否则不要回来。仔细地研究资料在一开始很花费时间，但后来会节约时间，因为研究者有了向前推进的坚实基础。在微分析中，我们提供了可能性，同时针对资料检验这些可能性，抛弃不相关的，并在需要的时候修改我们的解释。

微分析补充并增加了一种更一般的分析。然而微分析看的是细节，而一般分析要回过头以一种更加宽广的视野看资料，"所有的资料正在对我们讲述什么？"这做起来更加容易，尤其是对刚开始分析的人，他们可能对自己还不很确信。虽然在我们的方法

中微分析和一般分析被同时用来分析，但有些研究者喜欢更一般的分析，特别是，如果他们的兴趣是粗略地寻找问题和议题，而不是关于概念形成的细节。然而，即使做更一般的分析，研究者仍然必须要对解释进行怀疑。在微分析中，研究者不可能只满足于任何一种解释。相反，在得出任何结论之前，都要针对已有的资料检验每一种可能的解释。对于更一般的分析，研究者能够很容易就得出结论，因为其他可能性很少。另外还涉及平衡，不要做过多或过少的微分析或一般分析，但要知道什么时候以及如何使用每一种方法。

下面是一堂分析课的例子，可能发生在 1990 年代早期，全班正在施特劳斯博士的指导下进行微分析。(See also Strauss, 1987, pp. 82-108 for a longer example of open-coding.)

课　堂

在进入下一章之前，我们想为读者提供我们课堂上的一个微分析的简短例子。这节课有趣的地方是，从仅仅一小段资料产生了多少种的可能性以及语言常常因为它们的使用和解释而呈现怎样不同的意义。同时指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如何引导对资料更加深入的研究以及引起比较分析。

田野笔记引用：

当我听到这个诊断的时候，确实提心吊胆。我有些惊慌失措。怀孕之初，一切都很好，我也感觉良好，没有早晨的恶心，而且精力充沛。后来，我突然被告知患上了糖尿病。这令我非常震惊，因为这是我怀的第一个孩子。我主要考虑的是孩子。我担心这个孩子。我非常想要这个孩子。我真的非常害怕，因为我等了这么长时间才有了这个孩子，我不想出任何意外。

课堂讨论和评价

T = 教师

S = 任何学生

T:让我们看看第一个词“当……的时候(when)”,这个词可能是什么意思?

S:它对我来说代表着时间,一个时间点。某个时间,虽然不很确定,但是过去的某个时间。

T:嗯,它可以代表未来的某个时间,如“当电话铃响了的时候我就去接,因为我猜他会打电话给我。”

S:“当……的时候(when)”还表示一种条件,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一个问题要你去面对。

T:设想这个词不是“当……的时候(when)”,而是“任何时候(whenever)”。那么会是什么意思?

S:那么我理解它的意思是一种反复的时间。一种事情发生的模式。

T:因此,它表示的是另外一种条件,由于某事或某些事情而随后发生了某事。

T:但设想说话的人不是用“当……的时候”而是说“那时(at the time)?”

S:哦,那么它可能意味着讲述一个故事,用“当……的时候(when)”在时间上往回追溯,也许。

T:好的,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集中讨论这一个词,以及它的一些变化形式。那么,“当……的时候”还有哪些可能的特性?

S:它可能是突然的。或者并不突然……或者是意料之外的(或意料之中)……或者是同时出现的事情,可能只有你注意到了而别人没有看到;或者也被其他人注意到……或者这些可能不重要——或者是非常重要。

T:我们可以虚构出“when”这个词的很多特征及相应的事件。有无数这样的事件,但可能只有一些与你的研究相关且出现在你的资料中,但必须要找出来。然而,注意我的问题如何促使你注意到的那些属性与维度。现在,让我们思考“我听到这个诊断(I heard the diagnosis)”这句话。第一个词“我(I)”是什么意思?

S:可能是我们——或他们,如父母——听到了或被告知了这个诊断。这肯定是有区别的。

T: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他们会将这件事情告诉病人的亲戚、父母或者病人?这样做的结果会有什么不同?现在怎么看动词"听到(heard)"?

S:哦,诊断也许是写下来。或者(也是)出示给病人看,例如,如果她被诊断为肺结核或者是髋骨破碎(a shattered hip),医生会给她看X光片。

T:假如有不同的情况存在,其中每一种情况都会出现,而且它们也许会产生不同的后果。肺结核很有趣,因为诊断常常会被听者怀疑,因此医生就会出示X光片。当然,病人不大可能会解释光片,因此他或她只能相信该诊断——或者拒绝该诊断,如果不信任的话——于是,我们就要讨论诊断的合法性议题。这让我们从方法上开始讨论诊断可能存在的其他相关属性。这些属性会是什么?

S:学生们列举出一部分属性:"难以判断;模棱两可或众所周知;像癌症一样的征兆;或征兆不明显;(对自己、他人、医生、所有人都)非常重要;意料之中或之外的;当预见到最糟糕的情况或在整天忧虑等待中被可怕地或真正地确诊;很容易就相信的。"

T:那么,关于诊断的宣布有一些有趣的理论问题,以及在回答每一个问题后面的结构性议题。谁宣布(以及为什么)?(你有名的家庭医生、一位陌生的专家、住院医师,或者你的妈妈,如果你是一个孩子的话?)如何宣布(以及为什么是这种方式)?(在急救室里,由一位在场的住院医师告诉一位母亲:"你的孩子死了。"想想突然宣布和唐突宣布之间的区别。将其与验尸人员慢慢地在敲开一对夫妇的门后宣布死亡孩子的消息比较。另外一个问题可能是什么时间宣布?马上,在慎重地思考之后,等等。或者是当孩子父亲已经到了的时候,这样可以将孩子死亡的

消息告诉两个人？在医院，如果某人晚上死了，护士常常并不在电话中告知死亡的消息，他们很可能发出情况变得更加糟糕的信号，等待父母或亲戚的到来，以便让医生宣布。“当……的时候（when）”在这里也包括父母或配偶向其他亲戚宣布死亡的消息——晚些时候，有时候是几个小时之后，以及他们如何宣布的问题，是当面宣布还是在电话里宣布，等等。这些问题也能够激发在访谈中要询问的问题吗？是的，它们当然能够激发描述性的问题。

T：现在，我们看看这句话中的下一个短语“一切都很好（everything was going well）”。而这可能会成为一个鲜活概念（an in-vivo concept），一个被孕妇反复使用的短语，因此代表了对她们可能重要的事情——而且它对我们研究者应该也是如此。于是，我们记下了它，防止它会与我们的研究相关……这样，从分析的角度，这个短语会是什么意思呢？

S：哦，我觉得它是用来表示时间性，某事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是可以预期的，有一个正常的过程（以及那些偏离的过程）……这意味着他们在评价这是正常还是不正常……

T：是的，但这意味着必须要有标准（属性），其实她在后面的句子中指出来了……但是也要注意正是她自己将自己从维度上定位在这个过程上。从分析的角度，我们可以提问：为什么不是医生或护士而是她（用常识标准）在定位？我们这里谈论的是定位过程和定位者（the locating agents）。如果你进行比较，你很快就会明白，在其他情况下，由于不同结构的原因，会有不同的定位者。例如，经济学家会告诉你，你正在进入衰退期——你可能绝不会承认你是这样……现在这里有一个相关的短语是她“早在这次怀孕时（early in this pregnancy）”。抛开“这次（this）”——因为这里她肯定是将其与另外一次或多次进行比较——考虑“早在（early in）”。她是怎么知道这一点的！

S:每一位母亲都知道,怀孕过程有九个月,所以她能够给自己定位。这是文化的、常识的知识。

T:再来比较——并通过一个让你有点儿惊讶的极端的但从分析上又促进比较的例子——想一想,当希特勒获得要职时,德国发生了什么。人们对此的解释差异很大,虽说这是事后诸葛亮,但我们知道,德国从此深深地卷入到纳粹革命中去了。谁是这些定位者?他们是怎么知道在这个过程中德国在什么位置?他们如何实现其他人的合法性——或者相反?自己(比如你是一名犹太人)正确或错误地理解这个革命过程的后果是什么?通过这样的案例比较提出的这些问题(而且在研究的早期极端案例也非常有用),能够激发你思考妇女的特点,例如那些正在考虑怀孕并对怀孕作出反应的被访者,他们正将关于"定位"的同样问题用于自身,(而不是关于纳粹主义的观念)……注意,这些类型的比较,即使不像希特勒的事情那么极端,也能够激发你对你自己的假设以及对怀孕资料的解释进行提问。这些问题动摇了你的标准、对怀孕及其本质的那些想当然的观念,而且迫使你思考你的假设在做分析中的意义。

S:对我来说,两个时间过程似乎有一个交叉(crisscrossing)。一个是母亲希望成功怀孕的过程,还有一个是婴儿的生长过程。生物学上来说当然取决于母亲的生理机能,但这牵涉到其他一系列问题。(当然这段援引内容的其余部分会指明这一点。)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它们也涉及不同的行为,例如为孩子来到这个家庭做准备,在怀孕期间为了婴儿未来的福祉"正确地"行动。

T:你指出了不同的现象,所以你可以创造两个不同的概念来表示它们,还有一个概念表示你说的"交叉(crisscrossing)"。我将称其为"交织(intersecting)"或关联(linking),就像在轴向编码中一样。你还指出了行动和事件的序列和阶段,这是早先指出的时间性的另一个方面属性。贯穿行动阶段的还有过程或活动。

要点总结

分析是赋予资料意义的行为。我们对分析的介绍涉及拆分资料、对其概念化,以及根据其属性与维度形成概念,从而确定这些部分对我们讲述了哪些有关整体的东西。在研究的一开始,分析常常更加详细或“微观(microscopic)”,因为在进行任何解释之前,研究者想要探究各种可能性。然后,分析往往会更“一般(general)”,以便于充分形成并验证解释。在我们做质性分析的方法中,概念构成了分析的基础,而且是研究的基础,无论研究的目的是理论建构、描述或案例分析。

总之,描述就是描写(depicting)、讲故事——有时候是一个非常生动而细腻的故事——而没有大量的解释或试图解释某事为什么发生,也不是其他情况。概念整理(conceptual ordering)是按照各种公开阐明的维度对事物进行分类,而不必在这些类别之间建立联系或形成一个上位的解释架构(scheme)。理论化是从资料建构一个解释架构(explanatory scheme)的行动,它通过关系的阐述系统地整合概念及其属性与维度。虽然研究发现是建构的结果,资料的解释也是通过研究者的眼睛看到的,但是做质性研究仍然是一个有价值的尝试。它取决于我们作为研究者去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必要时要将我们的分析放到一边,然后重新分析,而且要保持一种无休止的精神,而不是仅仅“感觉对了”。

思考、写作及小组讨论活动

1. 比较和对比质性分析方法和量化分析方法。
2. 仔细思考并写一段话描述你认为一个做质性分析的研究者要努力达到什么样的目标?这与量化分析的目的有什么不同?
3. 从你的专业研究期刊中,选出三篇研究文章:一篇代表描述,一篇代表概念整理,一篇代表理论发展。不必考虑文章的表述方式。有时候人们把他们的研究结果称作理论,而实际上它们不是。将文章带到小组中,说明为什么你将这些文章作为描述、分类或理论发展的样例。

4

质性资料分析策略

探索性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更加清楚地理解研究者的问题是如何提出来的，知道哪些是合适的资料，形成什么是重要叙述线索的观念，以及根据研究者对生活的知识发展自己的概念工具。(Blumer,1969,p.40)

框4.1 术语界定

分析工具:分析者用来辅助编码过程的思维方法。

提问:一种用来开启研究线索和指导理论抽样的分析工具(device)(见第7章)。

编码:从资料中获取和发展概念。

持继比较:比较不同资料的相似点和差异性的分析过程。

鲜活编码(In Vivo Codes):使用研究参与者的真实语言而不是由分析者命名的概念。

理论比较:一种用来激发对分类维度和属性进行思考的分析工具。

理论抽样:建立在资料的概念基础之上的抽样。

导 论

分析涉及我们通常所谓的编码、提取原始资料以及将其提升到概念层次。编码(coding)是动词,而代码(codes)则是名词,它们被赋予那些来自编码(coding)的概念。在讨论之前我想要强调,编码不仅仅是一种释意(paraphrasing)。它也不只是在田野笔记的页边对概念进行注释或在计算机程序中做一系列的代码。它需要运用方法与资料进行互动,例如对资料进行提问、在资料之间进行比较,等等。在这个过程中,发掘代表资料的概念,然后再根据它们的属性和维度形成这些概念。研究者可以将编码看作是"挖掘(mining)"资料,在其外表之下挖掘以发现包含在资料之中的隐藏财富。下面是迈尔斯和休伯曼所指出的编码及其与分析的关系:

> 对一组田野笔记进行回顾,无论是转录的或综述的笔记,并且对其意义进行仔细的剖析,同时保持各个部分之间关系的完整,这就是分析的内容。分析的这部分涉及你如何区分和结合你收集到的资料,以及你对这些信息所作的反思。(Miles & Hubermanp,1994,p.56)

在与资料的互动中,分析者会利用思维策略。每一个分析者都有自己的策略库(repertoire of strategies)——用来理解资料的实用技巧。霍华德·贝克尔将其使用的策略叫做"行业诀窍(Tricks of the Trade)"(Becker, 1998)。根据布鲁默所述,自然主义者达尔文也有他的资料分析和推理策略。布鲁默综述达尔文的观点认为:

> 达尔文,这个有史以来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自然主义观察家之一,指出悠闲的观察被形象所限制。他建议用两种方法来帮助打破这样的限制。一个是对自己正在研究的问题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是荒谬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有助于提升观

察者的敏感性,从而以不同的和新的视角观察。另外一个建议是,记下所有的观察,除了任何奇怪的和有趣的观察,还包括那些挑战自己正在使用的概念的观察,即使其相关性暂时还不是很清楚……(Blumer,1969,pp.41-42)

本章的目的是要为读者提供大量的分析策略,作者发现这些策略对于理解资料非常有用。我们将这些思维策略称作分析工具,因为无论在策略上还是目的上,我们都将其作为工具使用。如果使用正确,这些工具不仅可以促进分析过程,当然也有助于新手分析者领悟可能堆积如山的资料。正如任何工具一样,这里的分析工具也要慎重地使用,而且要和编码过程中出现的分析问题相匹配。

分析工具的目的总结

分析工具对分析者的帮助表现在:

- 将分析者自己与技术性文献和个人经验分开,否则可能会阻碍研究者看到资料中新的可能
- 避免对现象思考的标准方式
- 促进归纳过程
- 不要想当然
- 能够澄清或揭示研究者以及参与者的假设
- 倾听人们正在说的和正在做的
- 在审查资料的时候,避免忽视"未经雕磨的钻石"
- 促进提问,提出能够打破传统思维的问题
- 能够给概念贴上丰富的概念标签并发现临时的类属
- 寻找分类的属性和维度

分析工具的类型

正如已经阐述的,每一个分析者都有自己用来分析资料的策略库,而且还有相当的差异。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所做

的质性研究的类型，例如，研究者是在做内容分析，还是案例分析，等等。有些研究者，例如迈尔斯和休伯曼，他们首先从文献中列出一系列编码，然后将这些编码和真实的资料进行比较，根据需要修改这些编码（Miles & Huberman, 1994）。格拉泽提出了十八个编码族群（coding families），其目的是提高研究者对资料中可能性的敏感度，从而将分析提升到理论层次（Glaser，1978）。沙茨曼提出了一种分析程序，他称其为"维度分析（dimensional analysis）"。他认为，研究结果要讲述一个故事，研究者需要一个视角为故事从资料中选择内容，将它们凸显出来，并安排好它们的顺序。沙茨曼根据故事的解释逻辑提供了下面的"矩阵（Matrix）"（类似于施特劳斯[Strauss，1987]的轴向编码概念），作为一种架构故事的手段（Schatzman，1991）。他的矩阵看起来像这样：

解释范式的矩阵

（从）视角

（属于）维度-属性

（在……中）情境（在……下）条件

（具有）结果的行动/过程

标记（Designations）

由于沙茨曼的研究与施特劳斯非常接近，他对维度的强调及对分析的看重与我们自己的分析取向非常一致。其他研究者使用不同类型的分析框架（schemes）来组织资料或达成对资料的理解。例如，洛弗兰德等人（Lofland et al.，2006，p. 119）建议分析之前先要"聚焦"。聚焦的目的是让研究者聚集到研究过程上。聚焦包括的策略，如为要集中研究的可能的题目而审查资料，通过提问达成对这些题目的理解，以及以引发兴趣的方式看待这些题目。当要做真正的分析时，洛弗兰德等人提供了以下一组理解策略。这些策略包括组织架构社会科学、淡化和应对焦虑、进行编码、撰写备忘录、绘

制图表以及弹性思考。(想要进一步深入讨论这些策略,参阅 Lofland, Snow, Anderson, & Lofland,2006,pp. 119-219.)另外一位质性研究者,戴伊(Dey,1993)提出了下面这些策略:"使用清单""转换"(如果有问题的话)"自由联想"以及为了理解资料的本质而"变换顺序思考"。

我们形成了我们自己的探究资料的策略。这些都是"试过的而且真实的"策略,施特劳斯已经使用了多年,而且已经证明了它们对分析资料的有用性。施特劳斯用过的很多策略和威克提出的探索工具(heuristic devices)非常相似,威克用这些工具来激发对熟悉的研究问题的新洞察。威克提出的探索工具包括:(a)用隐喻玩赏资料,想象极端情况,绘制图表以及查看过程;(b)将问题放到更大的领域并在问题领域之外进行比较,通过这些来考虑情境;(c)探究假设并提出相反的假设;(d)审查主要概念(Wicker,1985,p. 1094)。

虽然有很多分析策略,但有两个比较突出。它们是提问和比较。这两项策略是分析的主体(mainstay),而且其他质性研究者和我们都会使用。我们在本章讨论的其他策略也很重要,但是不常使用,其目的是用来解决分析问题的。在本书的先前版本中,有一个章节专门阐述"基本操作",其中包括提问和比较。在第3版中,基本操作这一章与分析工具这一章合并,形成一个综合章节。这些分析工具是我们在本章中将要讨论的,它们包括:

- 使用提问
- 进行比较
- 思考一个词的各种意义
- 使用翻转的技术(the flip-flop technique)
- 总结个人经验
- 挥舞红旗(Waving the red flag)
- 研究语言
- 研究表达出来的情感及引发情感的情境
- 寻找表示时间的语言
- 通过隐喻和比喻思考

- 寻找反面事例
- “这又怎么样?”和“如果这样又如何?”
- 研究叙事结构以及它是如何根据时间或其他什么变量来组织的

使用提问

我们要讨论的第一个分析工具是使用提问。正如布鲁默(Blumer,1969)所强调以及达尔文告诉我们的,这是分析的基础。每一个研究者都想提出好的问题,能够帮助发现新知识的问题。提问让研究者能够:

- 深入探究
- 形成临时答案(provisional answers)
- 跳出固有思维进行思考(Think outside the box)
- 熟悉自己面前的资料

提问是一种工具,从一开始到最终的写作,它在分析的每一个阶段都非常有用。当研究者遇阻以及难以继续他们的分析时,提问能够帮助他们。在安妮·拉莫特的一本题为《如何写作及面对写作生活》(*Bird by Bird: Some instructions on writing and life*)(Lamott,1994)的书中,问题的使用被建议作为一种方法,从而让写作计划启动(off the ground)。拉莫特相信,提问有助于研究者突破一开始的障碍,知道从哪里开始。虽然拉莫特是在谈论写作,不是资料分析,但是这两者有很多共同点。两者都有可能产生“被阻碍”的情境,而且都有可能难以“启动(getting off the ground)”。

在分析的开始对资料所提出的问题不必惊世骇俗或绝顶聪明。它们只是让分析者开始对资料进行思考。设想我们正在研究配偶护理人员(spousal caregivers),我们的第一份田野笔记的第一段记录下这样一些的事情:

> 要将我的丈夫放在护理房,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但无论从身体上还是情感上我都不能再照顾他了。我85岁了,这事

变得太沉重了(too much)。但是在我将他放在那儿仅仅六个月之后他就死了。现在我希望那时是将他放在家里。

当我们阅读一份资料时,像这样的资料,我们要做头脑风暴活动,这样我们就能够提出很有探索性的问题。“变得太沉重了(getting to be too much)”是什么意思?这位妇人想要告诉我们什么?有关她自己?她的老伴?他们的关系?以及在那种关系的背景下护理地方的“安置(placement)”?如果她将他放在家里会怎么样?然后呢?结果会不一样吗?护理者的年龄是怎样影响安置的?如果妻子比较年轻,她就能够继续照顾她的丈夫吗?她照顾他有多长时间了?她获得过帮助吗?所有这些问题都是要我们来思考,这种情况对于一个85岁的老妇人,在长期的婚姻生活中,不得不将丈夫放到护理房里,这意味着什么。

提问并思考答案可能的范围有助于我们站到他人的立场上,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地从参与者的角度理解问题。对这些问题的任何回答都只是暂时的,但是它们却让我们开始从参与者以及未来可能参与研究的人的角度去思考,我们需要在资料中寻找什么。

让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对资料提问的例子,我们来看一个与青少年吸毒(drug use)有关的概念。当我们访谈一位年轻妇女有关青少年吸毒情况时,她的评论是,“青少年获得毒品很容易。因为有一个方便的供应网络(obliging supply network)”。我们选择分析的概念是“方便的供应网络”。为了让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以及让我们知道下一步到哪儿去探究,我们可以对资料提出下面这些问题:谁在提供毒品?“方便的”这个词指的是什么?方便的供应网络最有可能在哪儿运营——在晚会上,在校园里的休息时间,当学生离开校园去吃午饭的时候,放学之后在校园周围,在当地青少年的住所?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思考“场所(site)”,也为我们提供了场所,从而可以进行理论抽样以及收集更多有关“供应(supplying)”概念的信息。他们提供了什么毒品,提供给谁?现在,我们在“毒品类型”前插入“供应者”。

我们现在转向“如何”。一个人是如何进入供应网络,或者一个人是如何让其他人知道自己在做“供应”的生意?孩子们有用来表示购买或销售毒品愿望的口头或非口头信号吗?有一个检验程序,以确定个人是否是合法使用者或销售者而不是一个警察?看到的交易形式是什么,用毒品换钱——如何使交易在隐蔽中完成?如果孩子们没有钱购买毒品或者如果销售或吸毒时被抓,他们会怎样?假如毒品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买到,为什么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或并非所有的人都吸毒?还有一个问题是“多少量(how much)”。一次供应的量有多少,是什么样的毒品?供应是否是无限制的?也就是说,你可以买到任何毒品,在任何时间?聚会上有足够的毒品让每个人都一醉方休?或者其目的就是为了建立群体凝聚力,因此只要每个人一两口就足够了?

我们并不是说,研究者必须对每一页上的任何一段资料提出所有这些类型的问题。用这样的方式对每一份资料进行分析并不实际。这样看一遍田野笔记就会花费很长时间。成为一名研究者意味着要运用常识并就什么时候对资料进行提问以及提出什么问题作出判断。研究者必须对资料中什么东西重要有一种直觉,并从中提取出来。资料分析没有正确或错误之分。也没有一套必须要遵循的规则或程序。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直觉,而且要相信自己作出了正确的判断。

对资料提问无须花费很多时间。你可以一边驾车,一边做这样的事情。其价值在于,当你开始对资料进行提问时,更多的问题就会涌现出来,让你能够对资料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究。为了避免空洞和乏味的研究发现,更加深入的分析是必须的。当我们对资料进行提问的时候,很明显的问题是,对一个概念,如“方便的供应网络”,我们有多少是不知道的,以及我们还需要发现多少。当我们探究并提出一个概念时,它就不仅仅是某些资料的一个“标签”,而是一个现象的一整套新的观念。

在做分析的过程中,除了什么人、什么事情、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方式以及什么结果之外,还有其他类型的对思考有用的问题。例如,询问时间性的问题,像频次、持续时间、速度(rate)

以及时机(timing)。另外一种问题是空间问题:多大空间、哪儿、受到限制或不受限制、开放或封闭。这样的问题会给予我们更多的洞见,例如孩子们在哪儿进行交易、谁出售以及那些买毒品的人是谁,或者在校园里他们将毒品隐藏起来吗?他们在哪儿卖给他们?交易的频率如何?一次交易的时间有多久?其他人是否能够看到?你可以提出一些技术性的问题,例如是否需要特殊的设备来销售或使用毒品。如果需要,这些设备从哪里来?或者你可以就信息来源问题进行提问,例如谁知道谁在使用、销售、哪儿购买,等等。而且,你也可以就规则、文化价值或道德,以及标准问题(毒品的纯度)进行提问。所有这些问题都能激发对青少年及毒品的思考,而且让我们对在该资料及未来的资料中寻找什么更加敏感。

为了强调,我们对下面这些能够对资料进行提问的问题进行了归类,但是提问并不限于这些问题。

- 首先,敏化问题(sensitizing questions)。这些问题引导研究者进入资料可能指向的东西。这种问题可能这样来看待某些事情:这里出现了什么,例如问题、困难、关注点?行动涉及哪些人?他们如何界定该情境?或者该情境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各个行动者在做什么?他们的界定和意义相同或不同吗?他们行动的时间、方式及结果如何?对各个行动者以及各种情境相同或不同的界定及意义是什么样的?
- 其次,理论问题。这些问题有助于研究者看清过程、变化等,而且在概念之间建立联系。这些问题可能像下面这样:一个概念与另外一个概念的关系是什么?也就是说,它们如何在属性上以及维度上进行比较或建立联系?(见下面理论比较部分)如果……会发生什么?事情和行动如何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这里更上位的结构议题是什么?以及这些事情如何进入或影响我的所见所闻?
- 再次,更具实践性质的问题。这些问题为理论抽样提供方向,而且有助于形成理论结构(即使形成理论不是你的目标)。在

很多其他议题中,这些问题还包括如下这些:哪些概念很好地被提了出来?哪些还没有?要发展我的理论,我下一步要去哪儿、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去收集资料?这样花多长时间?我提出的理论有逻辑性吗?如果没有,逻辑上断层在什么地方?我到达饱和点了吗?

- 最后,引导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引导我们访谈、观察、收集文献,以及对它们的分析。

我们在整个研究项目过程中提出的这些问题会随着时间而变化。问题都是为了推进分析,而且是针对特定的研究提出来的。通常在研究的开始,问题是开放的,然后随着研究的进展,问题将更加聚焦和精炼。在系列访谈的开始,问题可能是像这样的:

你曾经吸食过毒品吗?如果吸过,你的体验是什么样子的?在后面的访谈中,这些相同的一般性问题仍然是相关的,但是研究者还想要提出一些对特定概念、它们的属性及维度提供更多信息的问题。后面的问题可能类似于下面这样,将两个概念"容易获得"和"吸毒"放到一起。毒品"容易获得"这样的事实如何影响你参与"吸毒"的频率、数量以及类型?

进行比较

做比较分析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另外一个主要特征,它对于我们也是如此。通常,要将其放在项目设计中,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例如,社会学家对性行为进行性别比较;犯罪学者对族群之间杀人犯罪率进行比较;或者人类学家对仪式或其他文化行为之间的差异进行评论,正如在他或她做研究的社会中以及那些报告的关于其他社会所表明的,他或她是在进行比较。有人是在做持继比较(Constant Comparisons),还有人在做理论比较(Theoretical Comparisons)。下面我们分别解释。

持继比较。对事件与事件进行比较(如 Glaser & Strauss,1967),从而对资料进行分类,这理解起来并不难。在资料分析过程中,为

了寻找相似点和不同点，研究者会将资料中的每个事件与其他事件进行比较。那些概念上相似的事件被放到一个群组里，放在一个更高层面的描述性概念下面，例如“飞(flight)”。这样的比较是所有分析都必须的，因为它能够让研究者将一种类属/主题从另外一种类属/主题中区别开，以及发现该类属/主题特有的属性与维度。让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回到我们对配偶护理者的研究。在下面这个段落，我们85岁女性看护者继续说道：

> 自从我丈夫去世之后，我的生活似乎很空虚。你知道，我们结婚65年了。那是很长时间与人在一起生活。即使他生病，在护理室，至少我知道他在那儿。现在我孤身一人。我知道他是要走了，但是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够战胜后面的孤独。

在将这一段话与这位老妇人更早的一段话进行比较时，我们可以看到她访谈的每一个部分都在表达一种不同的现象。在第一次引用她的话中，这位妇人是在应对“安置(placement)”的问题以及她对此的感受。在第二次引用中，她不仅在为她丈夫的去世悲伤，而且还要面对“丧偶(loss)”，不得不在65年的夫妻生活后独自生活。“安置(placement)”和“丧偶(loss)”，虽然在案例中是相关的概念，但它们却是不同的概念。研究者在比较这两段话的时候，揭示了这些差异并将它们放在不同的编码下面。在随后的访谈中，那些编码为“安置”的事件将会与其他标有“安置”的事件进行比较，从而在同一编码中寻找相似点与不同点。在编码内比较的目的是要揭示编码的不同属性和维度。每个事件都有可能引出同一现象的不同方面。

理论比较。在编码过程中，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研究者遇到一个事件，但他们却不知道如何鉴别其意义。换句话说，研究者不能确定如何对其进行归类，或者无法根据其属性和维度对事件进行界定。这时候，我们转向我们所谓的理论比较。做理论比较需要进一步解释。人们在说话的时候，总是以比较的方式思考，而且使用隐喻和明喻(这是一种通过让一种事物代替另外一种事物所作的一种比较)。我们运用这些方法来澄清并增加理解。例如，我们可以说，

“昨天，工作就像动物园，因为我们完成项目的最后期限取决于我们自己。每个人都想立刻从我这里拿点儿东西，然而人们都朝四面八方跑。”“工作就像动物园”，当我们以这样的方式说话的时候，我们想要传达的并不是动物园的特性，而是一种情绪或一种情调。是这种情境的属性承载着这些特性，而且这些属性超越了这种特定的情境。像“吃力的（demanding）”“忙乱的（hectic）”以及“紧张的（tense）”这些词语都是该情境的属性，而且承载着关于这一天情调和经验的某些东西。我们并不是在说我们在一个动物园里，而是说某些我们认为可能属于动物园日常生活的属性也适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

我们再举一个更加具体的例子。当我们外出到杂货店购物的时候，我们看到两箱橘子，分别标着不同的价格。为了理解为什么它们的标价不同，我们可能会对这两种橘子进行比较，从这一箱到另一箱，分别就某些属性进行比较，如颜色、大小、形状，或许还有味道、硬度、浓度、甜度（如果提供样品），等等。我们希望，根据这些维度或具体属性对这两种橘子进行比较，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价格不同，然后选择更有价值的橘子，这可能未必单由价格决定。如果更加便宜的橘子水分少、又小，而且没有什么味道，它们可能不会成为要购买的对象。然而，常识性的比较并不总是像研究中所用的那么系统，它们也不会阐明理论问题，例如这两箱橘子相互之间是如何联系的，或者他们在大小、形状以及甜度上有怎样的不同。这让我们转向对诸如栽培、土壤和温度等问题的关注，然后又转向谈判、价格控制的问题等。前述第一种为归类法，此第二种方法则要求根据其维度的属性对概念进行审查，它将我们引向深度描述、概念分析和理论发展。

简单地作个小结，在属性和维度层面进行的比较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认知或理解他们周围世界的方法。人们不会每天都创造一个新世界。相反，他们利用他们所知道的去尝试并理解他们不知道的。而且，通过这种方式，他们揭示每一个事物的相似点和不同之处，并据此对它们进行界定。例如，床和沙发，我们知道床可以用作沙发，反过来也一样，但是与此同时，每一个事物都有

其自身的功能和特点,从而使得它们成为独特的事物,而且当我们研究概念的时候,我们想知道这种独特性是什么。

我们在分析中使用理论比较的目的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是一样的。当我们对我们资料中的事件或事情的意义感到困惑或迷茫的时候,或者当我们想要以不同的方式看一个事件或事物时(在可能的意义范围内),我们就会转向理论比较。运用比较能够发现事物的属性,这反过来又能够用来审视资料中的事件或事物。当我们进行理论比较的时候,我们使用的特定事件、事物和行动可以来自于文献也可以来自个人经验。注意我们并不是将个人经验或文献用作资料,而是使用通过这些事件比较所获得的属性和维度对我们面前的资料进行审查。就像我们不会每天都重新改造我们周围的世界一样,在资料分析中,我们利用我们所知道的来帮助我们理解我们所不知道的。理论比较只是工具,它们是用来帮助研究者从属性和维度层面审查资料,从而对某现象进行界定或达成理解。我们是通过属性与维度来认识事物的。如果属性在资料中非常明显,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做理论比较就可以将它们提炼出来。不过,由于细节对于"裸"眼并不总是那么明显,而且由于人类在他们的理解中是会犯错误的,所以人们有时候认不出他们眼前的东西。

做理论比较的机制(mechanics)非常简单。我们从日常生活或者文献中拿出一段与我们正在研究的现象相似的经历,然后就属性与维度方面进行思考。我们之所以可以这样做,并不是因为经历的具体特性之间存在相关,而是这些特性的概念与理解有关。例如,假如研究者访谈一位护士,听到下面的话,"当我晚上一个人工作的时候,我更喜欢和一位有经验的护士一起工作。当我和一个没有经验的护士一起工作的时候,最终都是我承担大部分的工作。"要理解她所说的"经验"的意思,我们可以用我们生活中或文献里那些的事情或与"经验"和"没有经验"有关的事情来做一个理论比较。

既然"经验"和"没有经验的"这些概念是这里的兴趣点,我们可以从能够显示有经验和没有经验区别的任何领域或情境进行我

们的比较,例如驾车或房屋装修。在进行理论比较时,我们依然在将事件与事件进行比较,但是这里我们是从我们自己的经验运用这些事件。我们寻找有经验和没有经验的属性与维度,目的是确定那些适用于驾驶员和装修工的属性或维度是否能够为我们提供某些洞见,以理解护士跟我们所讲的。这些来自“外面”情境的属性与维度不会用到资料中,而是给予我们观念,让我们知道在资料中寻找什么,让我们对以前我们可能忽视的东西敏感起来。一个没有经验的房屋装修工或驾驶员的特点可能是小心谨慎、犹豫不决,常常寻求指导,害怕脱离了常规,容易犯错误,对自己不确信,害怕危险的行为等。现在,有了某种观念,知道了“没有经验”的属性可能是什么,我们就能够到资料中去看看资料中是否有这些属性,这样,我们就更加具体地理解当护士作出评论时她的意思是什么。

这种工具的意义是,它促使研究者在这种属性与维度上思考,而不只是在具体特性上或原始材料上思考。如果我们继续我们对新手护士的研究,我们可以进行提问或者做观察,这会给予我们更加具体而且准确的关于有经验和没有经验概念的信息。我们可能想通过增加观察,对我们的研究进行三角检验。这里我们可以对有经验的和没有经验的护士如何在各种情况下工作和处理问题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进行观察,例如日常工作期间、危机时刻或者当过分劳累时——由此而进行理论抽样。关于理论抽样更为详细的情况见第 7 章。

有时候当我们进行理论比较时,我们用相类似的情况作为比较的基础。有时候我们使用我们所谓的“远距离比较(far out comparisons)”。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学习社会学家 E. C. 休斯(Hughes,1971)的例子,他喜欢做这种惊人的,有时令人震惊的比较,如对精神病学家的工作与妓女的工作进行比较。两者都属于职业(professions)、有顾客、收取报酬,而且还有如他所说的“小心不要在个人上变得与顾客过分投入,顾客可能会给他们带来私密性的问题”(Hughes,1971,p. 316)。

进行理论比较的一个作用是尽快地让研究者脱离描述案例具体特性的阶段,如这个花园非常漂亮,而是要更加抽象地去思

考各种花园共有的属性以及他们之间的差异。困扰质性研究初学者的一个难题是他们变得专注于寻找“精确的”事实,或者“精确地”循着程序。在这么做的时候,他们花费了大量的无用功,这些时间他们应该在理论上对资料进行思考。

再举一个例子,当我们出去买一匹马的时候,问题并不是这匹马有多少颗牙齿。重要的是,牙齿——它们的属性(号码、尺寸、体型,是否有溃疡,牙床是否粉红,等等)所告诉我们的关于这匹马的健康状况以及它的健康状况与其他将要和它在下一场赛跑比赛的马比较起来怎么样。当然,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打赌要赢,我们对这匹马就有更多想要知道的,例如它跑得多快,还有和同组其他马比较时怎么样。

在整个分析过程中,只要出现这样的需要,持继比较和理论比较两者都可以使用。随着分析的进展,需要比较的基础往往变得越来越复杂而且越来越抽象。

比较方法使用总结

- 能帮助研究者把握那些从其他方式看起来可能晦涩的事件的意义
- 能让研究者对存在于资料中但由于研究者缺乏敏感性而仍然保持晦涩的可能属性和维度敏感起来
- 在推进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进一步访谈或观察提供建议
- 帮助研究者更快地从描述层次推进到抽象层次
- 通过直接将分析带到更加抽象的层次来抵制专注于单个案例的趋势
- 促使研究者审视他们自己以及参与者的基本假设、偏见、视角
- 促使研究者审视研究发现,有时要限定或改变最初的解释
- 使得研究者更有可能发现变量以及普遍的模式
- 确保对资料分析持有一种更加流动和创造性的立场
- 有助于连接和压缩类属

一个词语的多种意义

第三个分析策略是考虑一个词语的多种意义。在访谈过程中，我们常常认为，在他们说某事时我们知道他们的回答指的是什么。这样，当我们回去再仔细地看看访谈，我们发现，也许我们并没有真正理解他们所说的。而且，甚至我们的参与者都没有意识到一个陈述中包含的所有意思。一个词语或陈述中能够包含多种意义以及多层次的意义，特别是如果说话者的意义模糊时。接受某人对自己所说的话的解释还存在其他问题，即在没有仔细地对所有可能意义进行探究的情况下就设定其意义。

当我们讨论探究一个词语或短语的意义时，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说研究者应该对一个文档中的每一个词语都运用这样的策略。研究者必须有选择性地来挑选要在哪些词语上多花费时间，只探究那些要进一步分析的词语。有时候，词语的意义在情境中很明显。有时候又不是很明显。或者，人们会担心，我们想当然的解释并不是唯一能够赋予该词或短语的意义，而且有更深层的东西在那儿是我们的手还无法触及的。当出现这样的情况时，就应该坐下来，考虑词语或短语中可能涵盖的所有可能的意义。总之，这里需要我们对意义进行头脑风暴，甚至包括最牵强的可能性，然后抛开那些与不可能的以及与资料不相关的意义。

从技术上来说，对词语、短语或句子做分析包括快速浏览文件，至少好几页，然后回过头来，集中到一个词语或短语，因为它重要而且在分析上看有趣，触动了分析者。然后，研究者开始列出这个进入头脑的词语的所有可能的意义。有了这个清单在脑海中，研究者就可以转向文献，寻找指向意义的事件或词语。例如，举一个青少年在讨论吸毒时提到的短语，即青少年把吸毒叫做“挑战成人的立场”。“挑战”这个词语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意义。因为我们的受访者并没有具体说明她意指什么，我们必须推测她的意指。“挑战可能意味着不同意父母的理解，要求父母重新思考或重新考虑他们的立场，作出自己来判断的独立思考的声明，它是一种反叛的形式，一种学习有关自我或关于吸毒的东西，一

种逃避父母权威的方式,一种确定自己是谁的方式。所有这些都是可能的解释。这需要研究者来决定,通过在资料中寻找线索看看哪种解释是最准确的,例如,将资料从头看到尾,寻找线索,看看哪些可能的意义在访谈的其余框架中展现出来。我们可能会发现,当我们根据资料进行检查时,我们在头脑风暴中遇到的可能意义,没有哪个会逃过审查。但,我们至少有一些思想需要排除出去。

使用翻转的(Flip-Flop)技术

翻转的技术包括"从里向外(inside out)"或"从上而下(upside down)"来变换概念,从而获得一个不同的视角来审查一个短语或词语。换句话说,我们研究一个概念相反的或极端的情况,从而发现其重要属性。为了使用另外一个适合青少年和吸毒的概念,让我们看看"接近(access)"这个词,我们的受访者将其描述为"容易(easy)"。为了更好地理解"容易"接近指的是什么,我们可以提出相反的问题:如果接近是"困难的",青少年吸毒会出现什么情况,即如果一个人必须走很远才能够获得毒品,问很多人,或者在得到毒品之前必须通过某种测试,那情况会怎么样?"很难接近"对青少年吸毒的数量或类型有什么影响吗?当我们想清楚了"很难接近"的意思,那么我们可以带着更多的问题回到我们的访谈,就吸毒的数量、类型以及频率询问"很容易"接近的意思。继续使用这个例子,如果你对"很难接近"进行思考,你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可能很少有地方能够买到毒品,他们在聚会上可能很少有机会获得毒品,或者毒品可能更贵。回到"容易接近(easy access)",你可能会寻找这样一些属性:他们在什么程度上可以接近,他们要花费多少钱,以及购买地点在什么地方。

这提出了其他重要的问题:如果"容易接近"让青少年吸毒变得更加容易,为什么不是所有的青少年都吸毒?是什么使得某些青少年利用了这种方便,而其他人却不用?是有些青少年更大胆、更反叛、更好奇或对同龄人的压力显得更脆弱?因此在资料收集期间这些问题使得研究者顺着概念线索进一步进行抽样。

另外一种方法是将青少年吸毒反过来，看青少年“不吸毒(nondrug use)”，看看这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洞见。研究者因此可以访谈那些没有吸过毒品的青少年，将他们的访谈内容与那些吸毒，当然是一直吸毒的青少年访谈内容进行比较，考虑的不是特定的访谈本身，而是就事件的概念、属性和维度进行比较。

利用个人经验

当我们与我们的研究参与者享有共同的文化时，以及有时候即使我们的文化不同，作为研究者，我们通常有与我们的参与者类似的生活经历。那么利用这些经历就非常有意义，从而使我们能洞察参与者的描述。并不是我们的经验与我们的参与者相同，而是我们经验的某些要素可能与他们的相似。例如，如果我们在研究年老人群，想知道他们如何改变物理空间以实现他们的功能需要，当思考这个问题时，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有年老的父母或长辈进入我们的意识。既然我们的意识不可能完全避免我们对父母或亲戚的经验，为什么不好好地利用这一知识呢？我们可以利用我们对母亲或朱莉娅婶婶的经验，并非作为资料本身，而是作为比较的案例，激发我们对概念的各种属性和维度的思考。

作为本书的作者，我们能听到我们的批评者所说的一些偏见——对使用个人资料建议的偏见。我们并不是要建议研究者将自己的经验强加给资料。相反，我们想利用我们的经验去发现其他意义的可能性。我们的经验甚至可以提供负面的案例，或者某些新的东西，从而让我们思考我们对特定资料的假设。而且，如果在比较的时候，我们还是停留在概念层面，用它们的属性和维度审视它们，这可能会让我们开始更加仔细地思考资料的属性可能是什么。

挥舞红旗*

和参与者一样，分析者也将偏见、信念和假设带到研究中。

---

* 引起警惕。——译者注

这并非必然就是负面的事情，毕竟，人都是他们的文化、他们生活的时代、他们的性别、经历和教育的产物。重要的是，无论是我们自己的还是参与者的偏见、假设或信念进入分析中时，我们都要识别它们。承认这种侵入常常很难，因为我们常常将意义当作理所当然的。有时候，研究者非常专注于他们的研究，以至于他们甚至都意识不到他们已经接受了参与者的假设或信念。研究者在进入参与者的内心世界时必须要划定一个界限，同时要保持足够的距离，从而能够清晰地分析性地思考他们所说的或所做的——这就是为什么要研究者对他或她的反应和感情做记录的原因。

研究者无论什么时候听到“总是”或“从来不”这样的词语，在他们的意识中就应该引起警惕(wave a red flag in their minds)。还有这样一些词语，“这不可能会是那样子的”或“每个人都知道事情就是这样的。”记住，作为研究者，我们在思考维度的范围，以及像“总是”“从来不”“每个人”以及“不可能(no way)”这些词语，它们只是代表连续体中的一个点(one point along a continuum)。我们还想知道“有时候”及其可能导向的那些维度变化条件。例如，我们的一个研讨班里有一位学生在研究诊所请翻译人员为亚洲妇女服务的情况。学生说，当没有女性在的时候，就叫男性为女顾客翻译。在这些案例中用男性翻译是不妥的，因为有些问题，像那些涉及性或妇科的问题太敏感，无法在异性面前讨论。

从分析的角度看，“禁忌(taboo)”和“从来不(never)”两个概念比较突出，立即在我们的意识中引起了警惕。对于熟悉亚洲文化的人，很容易接受这一立场，而且不会就此而引起任何其他问题。然而，“禁忌(taboo)”这个概念引出了一些很有趣的问题。当一位妇女的生命处于危险状态时，在生命受到威胁情境中会发生什么？这位妇女和/或研究者会因为没有人愿意讨论正在发生的事情而让她去死吗？或者，有通过推断、提供详细的线索或使用非口语的沟通等细致的方法了解禁忌的吗？一位敏感的临床医生，对这一群人非常熟悉，会知道那些没有说出来的话以及随后会说的话吗？这位妇女会找借口在其他时间回来吗？要是仅仅接受别人告诉我们的，而

且从不提问或更加充分地对问题进行探究，这就妨碍了形成更加丰富和多样解释的机会。

研究的原则是不要对情境或人们的话想当然。重要的是，要对任何事情进行提问，尤其是对于这样一些情景，即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或我们的受访者“入乡随俗(going native)”或接受了一般的观点或视角。而且，当我们听到了像“有时候”这样的词语，我们想要探究出现“有时候”的条件，并确定是否有其他还会出现“绝不”或“总是”的情况。我们想要寻找矛盾的或相反的案例，这样我们可能会发现当条件改变时概念如何变化的例子。而且，即使是“绝不”的情况下，我们想要知道为什么是这样，以及哪些条件使得它是这样。我们应该记住，人的智慧是无穷的。多年来，他们似乎发现了很多处理或应对各种不同情况的策略。找到这些变化形式增加了研究的深度，而且赋予了概念更大的解释力量。

某些词语，例如“绝不”和“总是”，是要更进一步审查资料的信号。我们必须要问，这里的真实情况是什么？“绝不”和“总是”是什么意思？说是“绝不”，但是在什么条件下呢？“绝不”这样一种状态是如何维持的？或者，人们通过什么样的策略才能够避免这样的事情呢？如果“绝不”的情况没有维持住，会发生什么？也就是说，如果某个不知道的人打破了社会规则或禁忌会怎么样？最后，我们需要问，在什么情况下这些规则有可能被打破和保持，那样的话会发生什么？

研究语言(Looking at Language)

人们常常以很有趣的方式使用语言。研究受访者如何使用语言能够告诉我们很多有关一个情境的信息。用我们早先援引的关于一位老年妇女将丈夫放在护理室的那段话为例。这位老妇人说，“当我将丈夫放到护理室的时候，那是一个艰难的选择。”注意她在使用第一人称的“我”而不是“我们”，这告诉我们她将把他放在护理室看作是她的决定。这是否意味着她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从情感上与他的丈夫“拉开距离(distance)”，以便能够把

他放在护理室？他丈夫参与者了这样的决定吗？她有孩子吗？他们是否参与了她的决定？如果没有，为什么？她独自一人作出这样的决定有可能增加她的负罪感吗？

人们常常用概念为我们表述事件，从这一点来说语言还是很有趣的。他们用来表达事情的术语在表述上常常是概念化的，所以我们能够用它们作编码。当有人说，“我想，我不得不承认我的无能，”他们给我们的概念是“承认(coming to terms)”。当我们对其进行思考的时候，这是一个对所发生事情描述性的概念，研究者很难找到更好的概念。当我们用受访者的语言作为编码的时候，我们将其称作“**鲜活编码**(in-vivo code)”，指来自资料的术语(term)。有趣的是，作为研究者，我们直接对这些术语作出回应，而且很有可能我们的读者也会这样作出回应。语言常常是丰富的，而且具有描述性，因此值得关注，因为它能够为我们提供洞察力，洞察我们在研究的这些人，知道他们来自什么地方。

研究表达了什么样的情感

那些重要的，足以在访谈中被提到的情况或事件，能够在参与者和研究者心中激起一定程度的情感。在做分析的时候，不要忽视表现出来的情感，因为它们是情境的组成部分，而且常常伴随着并/或联系着行动或内在行动。情感为研究者理解事件对个人的意义提供了线索。我们从田野笔记中摘录一些文字，是关于一位丈夫对发现妻子乳房里有肿块的反应：

> 当我们第一次发现她乳房里面的肿块时，我们的反应可能和大多数人的反应一样。首先我想，这可能没有什么，但应该要检查。我私下里认为，我们两个都非常烦躁而且害怕。她确实去检查了，然后很明显，怀疑可能确实有，这样她可能不得不做手术。因此，我们都感到非常恐惧(frightened)，因为我们两个接受的教育是，癌症是真正威胁到生命的事情。于是，你不得不迅速采取行动，我们就是这样做的。(田野笔记摘录)

当我们看到上面的田野笔记摘录时，癌症对这对夫妇的意义

是很明显的。当肿瘤"第一次被发现"时,他们烦躁而且害怕,因为乳房肿瘤常常和癌症联系在一起(虽然并非总是)。然后,当这对夫妇发现她不得不做手术时,他们感到"非常恐惧",因为手术就意味着是癌症,而癌症对他们等同于一种"生命威胁"。这种恐惧所导致的结果是,这对夫妇很快为妻子作出决定,对受到影响的乳房进行手术。激起如此强烈情绪的并不是手术,而是"癌症"这个词以及对死亡的恐惧。

寻找指示时间的词语

与时间有关的词语的使用常常表示在观念、思想、事件或对事件的解释上的一个变化或一次转变。时间词语是像这样的一些词语:当……的时候、在……之后、自从、在……之前、万一以及如果。时间词语有助于我们组织事件、指明情况,它们在我们要寻找情境和过程的时候非常重要。重新检查上面从田野笔记中引用的材料,丈夫在里面描述了关于他妻子为乳房癌做手术的事件。我们注意"当……的时候"这个词。它组织了随后以及标志进入癌症体验的那些事件。后面跟着好几行文字的那个"然后(then)"表明体验中的一个转变,从它"可能是癌症"以及我们暗暗地害怕,到它可能是癌症,我们需要手术,而且我们都"非常恐惧",因为癌症威胁到生命。

用隐喻和明喻进行思考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使用隐喻来向别人及我们自己解释事情。当我们称某人为"一只狐狸",我们想表达的是他或她很狡猾而且奸诈,或许是聪明而且意志坚定。如果我们说某人"像一只乌龟",我们的意思是他们很慢,但却保持前进。我们的研究参与者常常使用隐喻和明喻来描述事件和表达情绪。(见 Lakoff & Johnson [1981],他们介绍了人们如何使用隐喻来讨论事情。)研究者可以使用隐喻来帮助他们理解或解释事件。例如,一个人可能将经受癌症治疗的过程描述为"走过了地狱"或"打了一场战役"。像这样,甚至使用几个词就能够表达出他们的很多意

义，并描绘出一幅生动的图画。很快地，思想抓住了情节并且理解了，也许并不完全，但是很大程度上，事情肯定就像这样。

寻找反面案例

反面案例是指不符合这种模式的案例。对于其他人研究的行动、互动、情绪反应，它是一个例外。虽然研究者可能找不到一个反面案例，但是寻找这样的案例很重要，因为这能够让研究者提供另外一种解释。寻找反面案例为理解一个概念的维度提供了更加全面的探究。它丰富了解释，并且指出了生活并不是确定的，而且对于某些观点总有例外的情况存在。

其他分析工具

另外一种分析工具是询问“如果是这样又会怎么样?”以便于理解其意义。研究者可以问上面这对夫妇，“什么使得该发现非常重要?”如果有肿瘤又会怎么样？它对这对夫妇当下以及未来意味着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能够更好地帮助研究者理解为什么这对夫妇感到他们需要立刻采取行动。还有一种方法是查看叙述结构，即看看它在时间上是如何组织的，或叙述是在生活故事的什么点上开始的，它是如何发展的，结局如何。故事中有断裂吗？叙述中加入了情境吗？看看参与者如何组织该故事，让研究者知道参与者在他们的生活中如何定位和突出这些事件。

然后，研究者还可以与资料玩“如果……会怎么样?”这样的游戏。如果上面介绍的这对夫妇忽视了这个肿瘤会怎么样，情景会有什么不同？或者，如果肿瘤是在乳房 X 光照片中或日常体检中被发现的而不是这对夫妇自己发现的会怎么样？或者，如果肿瘤是在这对夫妇度假时而不是在家里发现的，情况又会怎么样？让我们展开想象并思考其他情节，这有助于研究者带着一双“裸眼”回到资料。这能帮助他们放弃自己的假设并对参与者的假设进行质疑。例如，在上面援引的关于乳房癌的故事中，参与者暗示，在这个世界上对于一个妇女来说，当她发现了乳房癌的时候，最自然的事情就是跑去看医生。但是情况是这样吗？有些妇女却忽视这样的事情，她们

并不将肿瘤看作是严重的事情,还有些妇女怕得没法生活。有人也许会问,是什么样的背景、教育和经历使得这对夫妇对此怀疑并去看医生?提出这样一些问题能够让研究者获得情境要素。当其他人可能不怀疑的时候,为什么这对夫妇却开始怀疑?

研究者要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的参与者的假设、文化信念和知识层次是什么样的?还有,研究者应该还要问,资料告诉了我们哪些更广泛的关于癌症和美国健康护理体系的社会信念。通过提出这些类型的问题,研究者就能对情境因素和任何被注意到的行动/互动/情感反应之间的可能关系进行探究。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使得研究者能够对他们的各种分歧进行分类。

要点总结

这一章中,我们介绍了一系列分析工具。我们期待着研究者能够像好的手艺人一样,灵活地使用这些工具,并且以此来拓展他们的能力。作为研究者,我们想形成具有实质内容而且对我们的专业领域内知识发展具有贡献的研究报告。要想形成新知识需要对资料的多层意义保持敏感性。分析工具会起到启发性作用,它们促进了研究者与资料之间的互动,而且帮助研究者理解可能的意义。人们可以利用分析工具来探究资料、激发抽象思考、增加敏感性、尝试对资料进行其他解释,以及形成自由流动的观念。

另外,分析工具的准确使用可以培养一种分辨的意识,知道偏见和假设如何影响分析的方向。虽然有些研究者声称在分析资料的时候能够"悬置(bracket)"他们的信念和视角,但是我们发现这是不可能的。偏见和假设通常是如此根深蒂固而且是文化的本性,以至于研究者在分析过程中通常意识不到它们的影响。我们发现,承认我们的偏见和经历并自觉地利用这些经验来改进分析过程会更加有益。除了利用这里介绍的分析工具,我们建议研究者在资料收集和分析过程中要写个人日记。记日记为研究期间出现的思想、行动以及感情提供了一个记录。做分析的一个

重要部分是反思我们是谁以及我们的研究如何构成并改变了我们。我们不仅是研究的塑造者，也必然被我们的研究所塑造。

思考、写作及小组讨论活动

1. 在班上或者一个人，使用上面介绍的一些技术，对本书附录 A 的田野笔记中的段落进行分析。这些田野笔记摘自一个传记研究，它研究的是对于个人生命威胁事件的意义以及这些人如何将这些事件融入他们的生活中。这些田野笔记中的事件指的是胸痛。如果你愿意，你可以使用你自己的一些田野笔记或小组成员的田野笔记。重要的是，你要花时间练习这些活动，让它们成为你自己思考过程的一部分。没有实践，这些工具的使用就变得勉强而不是熟练。与小组一起分享你的分析结果，并说明你认为它们的使用如何改进了研究——你认为如果你没有使用这些方法，情况可能又如何？
2. 想想作为一名研究者你可能添加到分析方法清单中的其他分析方法。和你的小组对这些方法进行讨论。

5

介绍情境、过程及理论整合

……一个事件与其前提条件的关系很快构成了历史，而事件的独特性使得历史与该事件联系在一起……过去的一切都在当下作为历史的条件，未来的一切都起因于当下，作为独特事件发生。(Mead, 1959, p. 32)

框5.1 术语界定

条件/结果矩阵(Conditional/Consequential Matrix)：一种有用的分析策略，帮助研究者思考能够进入情境的可能条件和结果。

情境(Context)：形成情景、环境或问题本质的结构条件，个人通过行动/互动/情绪对其作出反应。情境条件范围很广，从最宏观到最微观。

整合：围绕一个中心或核心类属将各个分类连接起来并提炼出最终的理论形式。

范式：一种将结构与过程整合起来的分析策略。

过程：在对事件、情景或问题作出反应中出现的行动/互动/情感流程。结构条件的变化可以要求行动、互动以及情感反应方面作出调整。行动/互动/情感可以是策略上的、日常的、随机的、新颖的、自动的，以及/或者深思熟虑的。

导 论

在前面一章中,我们介绍了一系列分析工具或分析策略,我们发现它们对分析资料非常有用。本章中,我们将继续前面一章,介绍为情境、过程和理论整合而实施的资料分析策略。我们将首先讨论情境,然后介绍过程,最后以理论整合来结束本章。这一章相对冗长,因此我们的导论尽可能简洁。不过,我们想补充的是,如果阅读本章的读者已经阅读了阐述分析的章节——即从第 8 章到第 12 章——他们也许想要回到这一章,并更加深入地研究这一章。

情 境

情境并不决定经历或既定的行动(course action),但它确实提供了各种条件(conditions),问题与/或情景(situations)都在其中出现,而个体则通过某种形式的行动/互动和情感对其作出反应,在个体这样做的时候,它带来的后果反过来可能又会影响条件。读者可能会发现,在上面的陈述中,我们对事件性质和人们对其作出反应的哲学信念源于符号互动主义和实用主义,我们在第 1 章中讨论过。也就是说,个体在塑造他们的生活中扮演着能动的角色,他们积极地处理或者无法处理他们遇到的事件或问题,并作出他们的行动/互动/情感反应,当然这是建立在他们对这些事件认识的基础之上。

为情境而进行的资料分析与为概念或类属而进行的资料分析没有什么不同。研究者要不断地提问并作比较。其实,当研究者早在分析的开始作最初的编码时,很有可能就会发现资料中某些概念最终将与情境有关。然而,当研究者发现一个概念与情境有关,而且想展开或详细说明情境概念,其他策略可能是必要的。虽然很多有经验的研究者可能通过直觉就能够发现进入情境和界定问题的广泛条件,但是对于如何以及到哪儿寻找情境,新手

研究者可能需要更多的指导。这正是范式(Paradigm)和条件/后果矩阵(Conditional-Consequential Matrix)作为分析工具发挥作用的地方。

范 式

质性研究者要分析的资料是复杂的。它们由大量存在于复杂关系中的概念组成,通常很难从资料中梳理出来。用一种方法来思考这些关系可能会对研究者有所助益。帮助研究者寻找情境要素并将它们与过程连接在一起的一种工具就是所谓的范式。范式是一种视角,是一系列应用于资料以帮助研究者提炼情境要素并寻找情境与过程之间关系的问题。

范式中使用的专业术语是从标准科学术语中借鉴而来的,为方便科学家之间的讨论提供了一种熟悉的语言。另外,范式中使用的基本术语遵循人们在他们日常的事物描述中表达的逻辑。范式的基本要素如下:

1. 条件(conditions)。这些条件提供一种对为什么、哪里、如何以及发生了什么这些问题的回答进行概念化分类的方法。例如,如果你听到这样的事情,“当我第一次听到她说我在某段关系上撒谎时,我非常生气,以至于走出了房间。”这里“当……时”这个词是一个分析线索。它将研究者的注意力集中到后面发生的事情上。这个人是在揭示导致他或她作出特定反应的环境或条件。

2. 互动/行动和情感。这是由个人或群体对情景、问题、偶发事件,以及大事件(happenings, and events)作出的反应。在上面的例子中,“听到她说我撒谎”就是作为回应者变得生气并走出房间的条件或原因。

3. 后果(consequences)。这些是互动/行动或者对事件的情感反应的结果。后果回答的是这样一些问题:作为那些互动/行动或者情感反应的结果而发生了什么。看看下面的描述,“在我

走出房间之后,我意识到我是多么愚蠢,然后回去道歉。”

标志着条件或原因的问题,比如为什么、何时、哪里以及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在田野笔记中可能是暗含的,也可能是外显的。也就是说,有时候人们使用的词语提醒研究者他们要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解释或者说明理由,例如,在事件或行动后面跟着说“自从(since)”“由于(due to)”“当……时(when)”及“因为(because)”。在阅读越南战争的一段回忆录时,研究者可能会看到这样的话“当敌人开始沿着我们穿越丛林常走的小径布置地雷的时候,我们的伤亡事故在上升”(条件上的一个变化)。“为了最大化地减少伤亡,对从哪儿走以及如何沿着小径走,我们不得不非常小心,总是在寻找像细金属线这样的线索”(用来处理问题情景的行动/互动/情感策略)。“如果我们弄错一个线索,我们的腿就会被炸飞”(后果)。这样描述性的例子告诉我们,在这些条件中事情发生了变化。因此,美国士兵在执行侦察任务时不得不更加小心。如果他们错过了线索,他们很可能就要承担相应的后果。

当研究者给资料编码的时候,类属的概念性名称并不必然指出是否类属代表着一种条件、互动/行动、情感反应,或者结果。但分析者必须对它们作出区分。重要的是要记住,范式仅仅是一种工具,而不是一套指令。分析者并不是在为条件或结果本身进行编码,而是利用这种工具来获得对事件周围环境的理解,并因此丰富自己的分析。新手分析者一个常见的误解是,他们固执于范式的规范,而不是思考范式使用背后的逻辑以及使用范式的目的。过分专注于在资料中寻找“条件”或“策略”或“后果”使得分析过程变得僵化。最后的结果从技术上也许是正确的,但有些东西却失去了,这就是赋予了质性研究以灵魂的创造性和情感。

条件/后果矩阵

范式为如何识别以及如何建立结构与过程之间的联系提供

了线索。它建议寻找那些标志着一系列的行动或对某事的一种解释说明的关键词,然后在整个资料中遵循这样的思路。虽然范式对思考情境有帮助,但是就其本身来说是不完整的。范式所不能做的有:(a)处理各种可能的理论抽样(见第7章)选择,这是分析者在研究过程中必须要作的决定,或者到什么地方寻找情境因素;(b)说明条件、互动/行动以及结果能够共存并相互影响的多种多样的、动态的和复杂的途径方法;(c)说明不同行动者的观念、解释,以及立场;(d)将所有不同的片段放到一起展现所发生的事情的整体画面;(e)最重要的是,它强调宏观条件和微观条件两者对分析都很重要。在下一节中,我们将介绍条件/后果矩阵,以下简称矩阵。矩阵通过帮助分析者整理事件所处的并对其作出反应的条件/后果范围,从而丰富分析。我们并不认为每一种可能的条件都必须纳入研究中。重要的是,研究结果不要过分简化了现象,而是要抓住生活的复杂性。这取决于研究者选择他或她想要的最终结果是多么复杂。对于想将复杂性带入他们研究结果的研究者,我们建议用矩阵来思考。(关于矩阵的一个精彩讨论以及它如何在研究中使用,见 Hildebrand, 2007)

矩阵中包含的思想

包含在矩阵中的思想有以下内容:

(1)条件/后果不是存在于真空中。它们总是通过行动/互动/情感反应联系在一起。由于一个事件常常导致另一个事件,又引起另外一个事件,就像一个链条一样连在一起,事件之间的关系常常很复杂,且很难整理。而且,条件和随后的互动/行动和后果之间的关系很少循着一条线性的路径。条件和随后的行动更像台球一样相互撞击所产生的后果,你不可能总是事先预见。这一点在下面一段话中表达得非常清楚,这段话来自麦克马斯特1997年撰写的有关越南战争的一本书:

> 在1963年到1965年间的美国化的越南战争是个性和环境的一个不平常的互动产物。美国军事干涉的升级源于一系列复

杂的事件和错综复杂的决定，它们慢慢地将越南的冲突转变成一场美国战争。（McMaster，1997，p. 323）

（2）微观和宏观之间的区别是人为的。多数情况是微观条件（那些更接近个体的条件）和宏观条件（那些与个体距离较远的条件，例如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条件等）的一种结合。在合适的时候，分析者应该就问题、情境和事件的微观和宏观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作为分析者，我们的兴趣在于微观和宏观之间的相互作用、它们对彼此的影响及随后的反应或相互作用的性质，以及它们所引发的全部后果，还有这些后果如何反过来成为条件，即它们成了情境和随后行动/互动或情感反应的一部分。例如，有些在越南战争期间服役的美国士兵，注意到越来越多的美国军队进入越南，而且伤亡人数在增加，因此他们在这二者之间建立起联系。士兵也许没有意识到是政府的政策带来了这样的变化，然而他们只是在前线感受到这些结果。通过挑选个别事件，例如“关注到伤亡人数的增加”以及回溯矩阵的不同层面来确定它为什么会发生，分析者能够增加研究的复杂性。

思考下面的一段话，因为它表明了微观条件和宏观条件是如何融合到一起来建立某些事件或情境。这里，麦克马斯特解释了他对美国如何卷入越南战争的想法。你可以看到他如何将微观（林登·贝恩斯·约翰逊[Lyndon Baines Johnson]的个人议题和日程安排）和宏观（更广泛的社会议题）放到一个段落中：

在1963年11月到1965年7月间，L. B. J. 作出了让美国进入战争的重要决定，而他却几乎没有意识到。这些决定，以及他作出决定的方式，深深地影响了美国在越南的战争方式。虽然是非主观的因素，例如包围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需要、官僚主义的行政体系以及制度上的特征，影响了总统的越南战争决定，但是这些决定主要还是取决于他的性格、他的动机，以及他与他主要建议者的关系。（McMaster，1997，p. 324）

（3）个体研究参与者并不总是能够看到微观/宏观条件之间

所有可能的内在关系。每一种关系都是从他或她的立场或视角出现在情境中，而且很少有对整体情境的把握。要想获得对整体的理解，就需要研究多种声音。

（4）条件和结果通常以集群的形式存在，它们彼此以及与相关的互动/行为都能够以很多不同的方式联系在一起或共同发生变化。而且，随着时间、意外事件的出现，条件和结果集群能够或是改变自身或是重新安排自身，这样，在它们与互动/行为之间存在的关系或联系性质也会发生变化。

（5）行为/互动和对事件的情感反应不限于个体。它们可以由代表民族、机构以及社会世界的行动来实施。而且，互动/行为和情感反应能够指向个体或民族、机构、社会世界等群体代表。这在阿尔瓦雷斯中尉（Lt. Alvarez）报告的一个事件中被证实，他是一名海军飞行员，曾在越南战争中被击落，并被北越人抓住成为俘虏（prisoner）。一天，一群俘虏，包括阿尔瓦雷斯，从监狱里被带出来，在河内街道上游行。当这些俘虏走在街上，穿过这些街道，站在街道两旁的越南人开始从言语和身体上攻击这些俘虏。虽然这些人现在是俘虏，而且不再扔炸弹了，但是他们依然代表着美国和战争，因此被看作是北越人发泄愤怒的合法目标（Alvarez & Pitch，1989，pp. 144-149）。

多样的连接模式

上面讨论中介绍的分析图景是多种多样的连接模式之一，这些模式随着时间与互动/行为的明显的转换模式建立连接。虽然有经验的研究者常常用他们自己的方法来研究这些复杂的关系，但是对于质性分析比较模式的研究者可能会感到很沮丧。记住并非研究者遵循的每一条路径都会发现分析的金矿。而且也不可能分辨出条件、行为/互动以及后果之间的所有可能联系。每一位分析者必须认识到，由于获取资料的方式、分析经验的程度以及个人储备的原因，我们能够揭示的东西是有限的。我们承认，做这种复杂的分析工作并不容易，而且阅读本书的研究者要选择去什么地方做他们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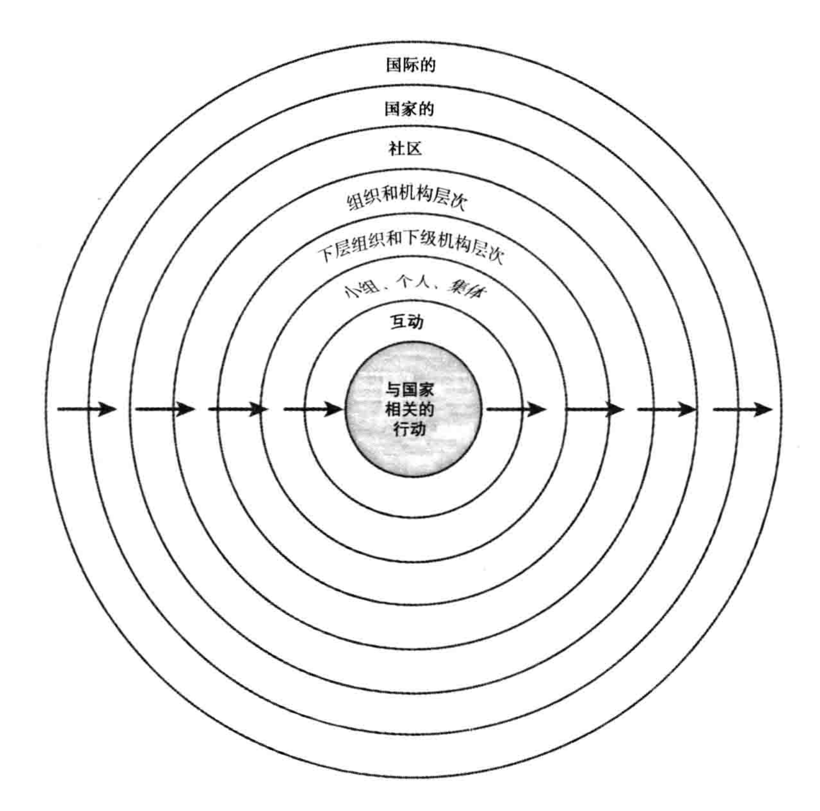


图 5.1 条件/后果矩阵

矩阵的描述

我们一直将矩阵作为一套观念来谈论。问题在于要将抽象的观念转变成一种容易理解的图表。

我们发明的图表并没有抓住我们上面所介绍的这套观念的复杂性。

矩阵是由带有双向指向和单向指向箭头线的一系列同心圆和相互连接的圆所组成。这些箭头呈现了条件/后果的交叠和事件所导致的关系链。条件指向并且围绕着互动/行为,以确立条件背景。其他箭头从互动/行为指向其他方向,常常以多样的和意料之外的方式改变或增加条件。图表的一个局限是其流向似乎是线性的。一个更好的比喻是台球,每次以不同的角度撞击另外一个球就会引发连锁反应,最终将目标撞击到网袋中。

矩阵只是一个概念向导,不是最后的程序。研究者可以修改矩阵以适合各自的研究和资料。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矩阵作为分析工具,每一个区域都是以其最抽象的形式呈现。包括在每一个区域中的条目(条件/后果的来源)都来自于研究,因此依赖于被研究现象的类型和范围。使用了矩阵的研究者常常会改变分类框架,以适合他们自己的目的,或者在批判的基础上,提出其他方法。(见 Clarke,2005;Dey, 1999;& Guessing,1995)

从圆圈的外面开始,我们安放的是最宏观区域,由"国际的"或"全球的"区域这个术语代表。该区域包括但不限于这些条目:国际政治、政府管理、政府、文化、价值观、哲学、经济、历史以及国际问题和议题之间的一致或分歧,如"全球环境变暖"。下一个区域我们设计用作"全国的"或"地区的"区域。该区域中的是潜在的条件。例如,国家/地区政治、政府规章、制度、历史、价值观及国家对待性别关系和行为的态度。例如,在伊斯兰国家,社会治理妇女角色的规则,如与美国相比,有很大的差别。然而,即使在美国,你也能够发现性别角色的差异,例如在获得权力上,在组织机构中管理层的地位,"性骚扰",以及进入某种工作等。接下来的条件是设计用来作为"社区"的区域。包括在该区域里的是上面所有的条目,但由于它们属于特定的社区,所以在所有其他社区中赋予其以单数形式。接下来的圆圈代表"组织"和"机构"区域。每个组织或机构都有其自身的目的、结构、规则、问题、历史、关系、空间属性等,它们提供了条件的出处。(有些机构,例如宗教机构,在范围上可能是国际性的,但是规则如何被揭示以及如何被实践,这对社区甚至对个人来说都是因人而异的。)另外一个圆圈代表的是"下层组织的"和"下级机构的"区域。最重要的,在中央位置上,是行为/互动/情感反应*。

---

* 我想感谢阿黛尔·克拉克(Adele Clarke),他指出了本书第 2 版中的一个错误。第 2 版中的矩阵图表借用了格森(Guessing)的图表。选择那个图表的原因是它展示了条件和结果之间一个更加流动的关系。然而,这绝不意味着要从中间去掉行动/互动。行动/互动是,而且仍然是矩阵的中心。

研究者可以研究在矩阵的任何区域内的任何实质性的话题。例如，他或她可能在国家的层面上研究卫生保健，聚焦于最近的立法、政策以及新出现的组织机构和趋势。或者研究者可以调低矩阵的几个层次，然后通过家庭（by families）研究慢性病的管理。无论聚焦的区域是什么，重要的是记住，外围层次的条件，如一个国家的卫生保健政策（例如全国卫生保健的缺乏）将会影响个人和家庭的疾病管理，反过来，个人或家庭疾病管理中提出的问题会对未来的立法产生影响，这会影响卫生保健政策。其他可能要研究的实质性区域包括但不限于这些：身份、决策、社会运动、竞技场、冲突与一致，意识、社会变革、工作、信息流，以及道德两难。它们可以分别在任何区域内研究。时间、历史、传记、空间、经济、性别、权力、政策等，都是潜在的条件，它们可能与矩阵中列出的任何区域中的被研究的实质区域相关。重要的是，没有哪个条目（无论是性别、年龄、权力等）能够声称与展开的故事相关，除非有资料支持它。

过　程

过程是一个难以捉摸的术语。就像在资料中难以把握它一样，我们很难对其进行说明。也许开始我们讨论的最好方式是介绍两个与研究不相关但却有助于学生理解的情节。

当你听一段音乐（无论什么音乐）的时候，你会不由自主地被各种音调的变化所震憾。我们知道，音乐，无论爵士乐、流行音乐或古典音乐，都是由一系列音符组成的，有些演奏得很快，有些则很慢，有些声音高，还有些则柔和，有时候是一个键，有时候在另外一个键，常常是在不同的键之间来来回回移动。甚至停顿也有其目的，是声音的组成部分。正是这些音符随着所有的变化以及协调序列中的演奏，使得音乐产生了一种运动、节奏、流动和连续感。

对于我们，过程就像一段音乐。它表现为节奏、变化和重复的形式、停顿、中断，以及变化的运动，它们是互动/行为序列的组

成部分，并且引发对事件的情感反应。下面一个情景对我们理解过程也许是一个更为形象的说明。最近，有一位作者在一个小飞机场的候机室里坐着。除了等候之外无事可做，于是她开始对附近咖啡馆正在发生的事情发生了兴趣。

这是一个不大的商店，是一种在美国任何小镇都能够看到的商店。有二十到二十五个人坐在店内的桌子上及柜台边。有一位女服务员和一名厨师。服务员从一个桌子走到另一个桌子，接受客人的订单，将订单送给厨师，厨师备好了食物之后就交给服务员分发给等候着的顾客。服务员还从顾客那里收钱，并记入收银机。不时地，服务员停下来和顾客说话，添加咖啡，清理桌子，然后继续做事，她的眼睛总是关注着顾客的需求信号。虽然每一种情况有一点儿不同，而且在她被观察的时间里，她的互动/行为在形式上和内容上是不同的，但是它们都是与整个过程有关的一系列行动的组成部分，它们可以被称作“饮食服务工作”。当服务员在做她的工作的时候，顾客们都在吃喝、谈话以及看着小型私人飞机起飞和降落。

这个情景并不是非常引人注目。实际上，这是非常普通的，而且全国的咖啡店肯定以基本同样的方式日复一日地重复着这样的情景。虽然普通，但却有着连续不断的行动，一个行动序列进入另外一个行动序列。工作流程有被打断的时候，而且还有要解决的小问题，但是这些往往是作为正在发生的需要解决的行动流程。观察该情景使得观察者意识到，“啊哈，这就是过程！”

过程是什么？

过程是用来对情景或问题作出回应的进行中的行为/互动/情感，通常有实现一个目标或处理问题的目的。行为/互动/情感随着时间出现，涉及不同活动和互动的序列以及情感反应（虽然并不总是很明显），而且有一种目的感和连续感。结构（情境）和过程是相关的，因为个人通过行动来回应某事，事情包括议题、问题、情景、目标以及他们生活中发生的事件。结果和过程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从而使得行为/互动/情感反应的强度、类型和时间上有着无限的变

化。当然，对目标成就、情景、事件或特定环境的任何行为/互动/情感反应都取决于个体或群体如何对它的界定或认识，还有他们赋予这些情景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你在类似情景的行为/互动/情感中看到这么多变化；个人很可能对情景有着不同的界定或者赋予它们不同的意义。

这意味着，如果一个人或更多人一起行动以达到一个目标或处理一个问题，他们的行为/情绪必须要一致，否则流程和连续性将会被打断。拿上面描述的餐馆来作例子。服务员和厨师必须协调一致，以便在一段合理的时间内为顾客服务。厨师准备食物，服务员端送这些食物，顾客的行为也必须要与厨师和服务员一致，也就是他们必须要么耐心地要么不耐烦地等到食物送过来。现在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改变这些条件，该行为或"工作流程"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如果几大群人同时进来，而且仍然只有一个厨师和服务员为他们服务，情况会怎么样？想象这将会如何改变工作的节奏——厨师接受订单、准备饭菜的能力，或服务员与顾客谈话、倒额外咖啡以及趁热端送饭菜的能力。顾客也许不得不等待很长时间，他们的反应可能是发火。如果厨师突然生病了，而服务员不得不下厨而且还要端送饭菜，这会怎么样？或者如果厨师要所有的人都走，到其他地方去吃，会怎么样？如果有5名服务员但只有20位顾客，会怎么样？各个服务员都要做些什么来消磨这些时间？设想有一位服务员既没有经验反应又迟钝，顾客等饭菜等得不耐烦了。顾客和服务员之间发生的愉快友好的互动/行动会变成一种急躁的、沮丧的，甚至令人恼火的互动/行动吗？每一种不同情境都有可能改变或转变互动/行动/情感反应的性质。既然随着时间的变化，结构往往会改变（由于在进入和离开餐馆的顾客数量和类型上的变化），所以为了保持同顾客流动及环境的一致，必然会有互动/行动及情绪上的调整。

过程的变化性质

你可以说，从最好的方面而言，过程就像协调一致的芭蕾或交响乐，每一个动作都优美、整齐、传神，有时候意蕴深刻，有时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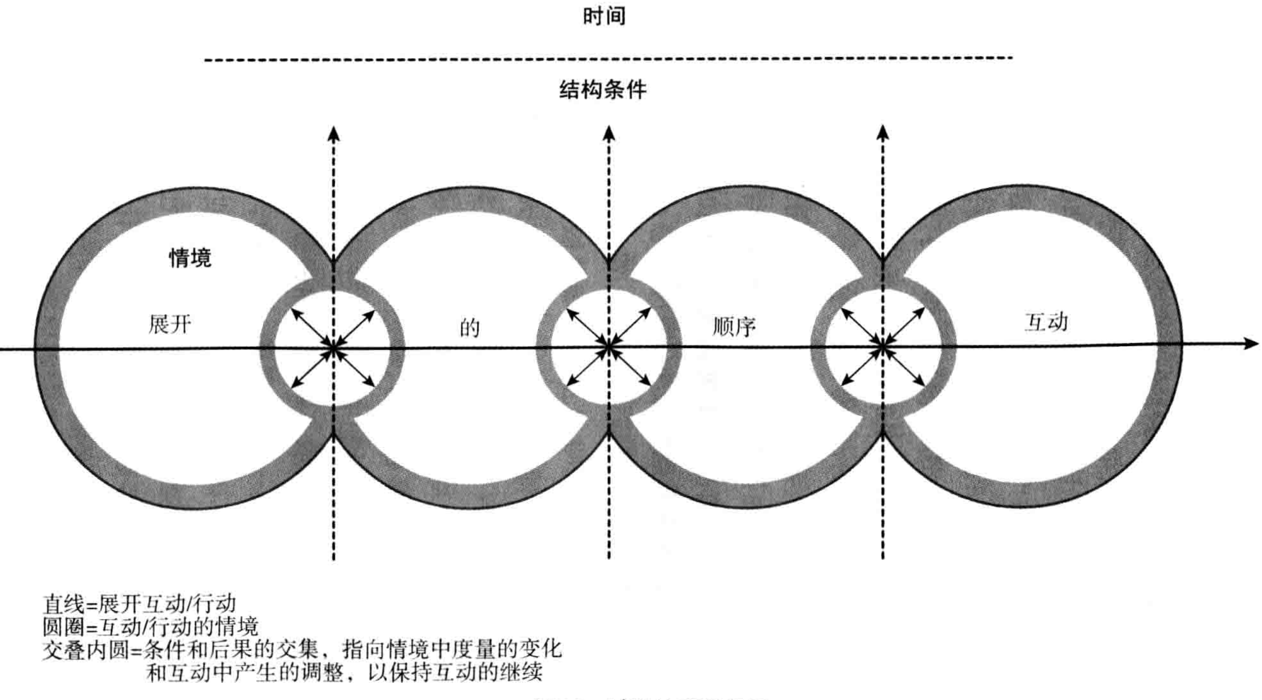

时间
结构条件
情境
展开
的
顺序
互动
直线=展开互动/行动
圆圈=互动/行动的情境
交叠内圆=条件和后果的交集，指向情境中度量的变化和互动中产生的调整，以保持互动的继续

图5.2 过程的直观呈现

又平淡无奇,一个行动流淌到另外一个行动。从最糟糕的方面,过程就像一场足球骚乱,行动参差、混乱、随意、失控、无方向,有时候还造成伤害。多数人互动/行动和情感反应,可能位于它们之间的某个地方。互动/行动/情绪顺序并不像在芭蕾中一样优美地进行,也不像在骚乱中那样混乱。实际上,作为分析者我们所看到的和听到的很大一部分都是枯燥而平淡的。过程展示了个体、组织和群体赋予问题以意义以及作出反应的能力,以及/或者通过互动/行动顺序形成他们发现自己处于其中的情景,将他们对情景的理解和对情景的反应考虑在内。另外,过程展示了群体能够如何与他们的互动/行动/情感反应一致或不一致,以及为什么这样做来维持社会秩序、演戏、聚会、工作、制造混乱或发起战争。作为研究者,当我们为过程而进行资料分析的时候,我们是在尝试着理解互动/行动和情绪的动态性质。

对过程的概念化

资料中的过程是通过互动/行动/情感反应的次序来呈现的,随着环境、事件或情景而变化。人们如何对过程进行概念化或描述取决于资料的内容以及研究者的解释。

过程常常是用像阶段或时期这样发展性的术语来描述,表明它线性的或进步的性质。然而,并非所有的过程都是发展性的或进步性的。过程可能是无序的。它可能前进一会儿,然后转头向下,或者是螺旋式进展。思考上面提到的餐馆的例子。对于服务员、厨师或顾客的互动/行动/情感反应,并没有什么发展性的或进步性的过程。然而,要说服务员"接受订单""传达订单""拿起订单"以及"根据订单送菜",这就是一个相当单调的描述,而且要求人们延伸想象来将互动/行动看作是发展性的。这样的描述并没有把握繁忙场景的动态性质。在饭馆这个例子中,互动/行动更加具有循环性,以顾客开始也以顾客结束。

另外一种描述过程的方式,就像人们试图执行任务、解决某些问题或处理他们生活中的事情一样,将其作为顺序(连续不断的事情)或一系列互动/行动和情感反应,用来对情景或问题作出

回应，或用来达到一个目标的目的。过程可以是社会心理的。它们还可以有教育的、法律的、管理的、政治的、军事的意义等。

为过程分析资料

为过程分析资料有某些好处。除了给研究发现一种“生命”感或动态感之外，为过程分析资料鼓励将变化吸收到研究发现中。除了变化，当人们以个人界定情景和应对情景的方式寻找相似性时，过程能够帮助发现模式。而且，如果一个人的最终目标是理论建构，那么为过程分析资料就是遵循这种方法的基本步骤。最后，在连接过程和结构的时候，人们实际上是在将类属联系起来。

互动/行动是日常行为，但并不意味着它不重要。研究日常行为对发展知识有广泛的启示。它使得研究者能够发现互动/行动和情感反应的模式，从而在面对偶然性的时候有可能“建立”和“维持”社会和个人稳定性，因此拓宽我们对日常生活的理解。例如，当科宾和施特劳斯在医院做研究（未出版的研究）的时候，他们发现医院的每一个部门都以传统、政策、程序和规则的形式建立了日常规范，这些常规使得各个部门能够在现行的基础上运转并照顾病人。甚至还建立了处理意外事件的政策，例如当病人心脏骤停时。

人们在为过程而分析资料时可能会对资料提出包括下面这些问题：这里发生了什么？参与者界定的问题或情境是什么？引起那些情景的结构条件是什么？人们是如何通过互动/行动和情感反应对它们作出响应的？它们是如何随着时间而变化的？互动/行动和情绪是一致的还是不一致的？什么条件/活动将一个事件序列连接到另外一个序列的？当条件变化时，互动/行动和情感反应的形式、流程、连续性和节奏会发生什么？也就是说，由于偶然性（条件中计划之外的或意料之外的变化）它们就变得不一致，或它们被打断了，或中断了吗？用来对问题或偶然性作出响应的互动/行动和情绪与日常的互动/行动有什么相似或不同？一组互动/行动和情绪结果是如何进入下一系列互动/行动中发

挥作用的？

后一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它让研究者明白互动/行动和情绪有怎样的结果，以及这些结果通常会成为条件背景的一部分，后面一系列的互动/行动和情感反应就在其中发生。反馈到原来背景或情境中的结果可能改变互动/行动，从而维持现状或打破现状。例如，在激战中被恐惧压倒也许会让一名战士在敌人的炮火面前畏缩不前，其结果可能非死即伤。反之，控制了恐惧并将其转变为建设性的行动也许会有助于这个战士活下来。

在继续之前，对于过程还有另外一个主要观点要提出来。有时候人们会问，现象和过程之间的区别是什么？这常常相当令人困惑。对于我们，现象代表整个资料中包含的话题、事件、事情、目标或主要观念（类别或主题）。过程代表获取这些的手段。例如，"生存"是一种现象。到越南的战士都想要在战争中生存下来。过程呈现了策略或手段，通过这些策略和手段，战士们以他们生存下来的方式处理当前的问题。

次级过程（Sub-Processes）

过程可以被分解为次级过程。次级过程也是概念，它们更加详细地说明了更大的过程是如何表达的。例如，在对有慢性病的怀孕妇女的研究中，科宾将主要的过程定义为"保护性治理（protective governing）"。保护性治理代表了手段（过程），通过它，孕妇、她的伴侣以及健康小组一起努力，尽可能降低与其怀孕有关的危险，并尽可能为母婴扩大积极结果的机会。保护性治理被分成"评估""平衡"和"控制"危险这几个次级过程。反过来每一个次级过程都是由某些危险管理策略或方法构成，它们往往根据整个怀孕过程中对危险层次的变化的定义而变化。然而，"保护性的治理"及其"评估""平衡"和"控制"的次级过程在整个怀孕过程中仍然保持一致。这是行动/互动/情绪（管理策略）的具体特征，它们根据怀孕和疾病状况的变化而变化，而且反过来又降低了它们的危险。

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的过程分析

过程可以在上面介绍的条件/后果矩阵的任何层面上进行研究。例如,你可以从国家层面上分析资料,从而了解美国是如何参与到越南战争的,看看导致他们去那儿的历史和政治过程。或者你可以看看,社会活动,从乡村地区开始,然后发展到全国层面上(甚至国际层面,如果你将北越的作用包括在内),是如何形塑了战争的结果。或者甚至更进一步,你可以将和平运动看作是集体运动,带着这样的研究观念:这些运动是如何开始、如何继续,以及最终如何彻底失败。你还可以研究传记(矩阵的一个更加内在层面)与战争的相互关系,通过研究约翰逊总统的个性特征、恐惧、政策、梦想和失败等,看看这些如何形塑了战争及其结果。反过来,你可以研究战争的结果是如何影响约翰逊总统的传记的。另外,你还可以研究越南的某一个村庄或社区是如何运转的,尽管村庄或社区及周围的战争在继续。我们想要指出的是,你可以在矩阵的任何层面上研究过程,而任何对过程的研究常常又跨越矩阵的各个层面。在本书的后面,科宾研究了前线士兵的体验,因为她看到了一个对越南老兵的访谈,并被该话题所吸引。但是一个同样有趣的研究可以是研究越南历史,以及在形成战争和维持战争的历史、文化和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

在正式理论层面为过程分析资料

当研究的焦点是要建立"形式的",而不是提出"实质的"理论,会发生什么?分析有很大的不同吗?当建立一般理论时,与其说是问题不同,还不如说是收集资料的方法不同。一般理论的建立是概念驱使。你从概念开始,例如"意识"或"污名"以及理论抽样,但在这种情况下,要对跨情境的资料进行对比和比较。选择用来研究的概念通常来自于并建立在研究者先前研究的基础上,但这并不是必须的。这里的要点是将研究的概念提升到一个更加抽象的层面,使其适用范围更加广泛,但同时仍然要使其建立在资料的基础上。例如,施特劳斯(Strauss,1978)想要提出一种

正式的"协商(negotiations)"理论。他从协商的概念开始,并在各种背景中研究"协商"。他在全国代表、法院法官、政治及其派宗教和民族团体以及保险公司及其客户之间寻求协商。通过比较和对比这些群体的相似点和不同点,他就能够找出协商过程的要素,这些构成要素超越了所有的群体,提供了对协商的一个更加抽象和广泛的理解。同时,他还能够发现协商的这些方面:那些显示出群体之间广泛变化特征的群体。另一方面,研究者如果在实质的协商层面上对概念发展感兴趣,他或她会将资料收集限定在一个主要群体,例如,房屋交易中买卖双方之间的协商。

理论整合的方法

正如本书所述,并非所有的质性研究的研究者都对建构理论感兴趣。但对于那些想要进行理论**整合**(integeration)的研究者,我们给予以下的建议。

雨伞有很多辐条。这些辐条提供了一个结构并让雨伞有了形式或形状。但只有辐条被覆盖上某种材料,它才变成雨伞,才能够为人们遮雨。换句话说,单有辐条并不构成雨伞。理论也是同样的,单有概念并不构成理论。要想从资料中建构理论,必须要将概念联系起来并充实细节。不可否认,整合对于新手研究者并不容易。正如保罗·阿特金森(Paul Atkinson),一位优秀的有关田野研究教材的合作者(Hammersley & Atkinson,1983),在私人交流中所说:

> 这方面——将其都集合到一起——是最难的一件事情,不是吗?先不考虑真正实现这一目标,单单注入下面这些恰当因素就很难:(a)相信它能够而且将会实现;(b)承认必须要努力达到,而不是建立在浪漫幻想的基础上;(c)这不像解谜或数学难题,而是必须要创造;(d)你不能总是将所有东西变成一种版本,而且任何一个项目都可以有很多不同组合到一起的方法。

这一节介绍了几种分析方法,用来帮助研究者实现理论整

合,这是为那些对理论建构感兴趣的研究者的最后的分析步骤。当分析者感到迷茫的时候,方法就尤其重要,这让他们感到资料开始“粘合(gel)”,但他们却不知道如何将这些直觉写下来。这部分还将讨论提炼理论的步骤,只要分析者致力于理论框架的建构。

在阅读这一部分时,有几个重要的观念需要记住:

1. 正如本书早先所述,达到类属形态的概念是抽象概念。他们代表了很多人或群体的故事,这些故事是由很多高度概念化的术语所描述和简化而来。在这些概念基础上提出的任何理论构想都应普遍地适用于研究中的所有案例。正是包含在每一种类属和/或次级类属(subcategory)之下的这些细节,通过对其属性和维度的说明,呈现出每一个案例的差别和变化。

2. 如果理论建构是真正的研究目标,那么研究发现就应该作为一套内部相关的概念来介绍,而不只是列出一些主题。正是整体的说明方式使得研究发现变成理论。那些具有各种属性和维度的次级概念提供了说明的细节。概念是通过对表明关系性质的陈述而联系起来的。像概念一样,这些陈述都来自于资料分析。就像概念一样,关系的陈述表达了分析者对资料中发生的事情的解释。概念或关系的陈述很少是受访者或案例的真正语言(虽然它们可以被看作是“鲜活[in vivo]”编码)。通常,上位概念与它们的描述及联系那些概念的关系陈述都来自于研究的参与者,而且也适用于所有的参与者。

3. 有多种表达关系陈述的方式。在我们的书中,它们往往并不是作为明确的假设或命题来介绍。在我们写作的时候,我们往往是将关系编织到叙事当中。你如何表达关系,这是一个风格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研究者写作的学科和训练的结果。理论的基本要素是,类属与一个更大的理论框架相互联系在一起。

中心或核心类属

整合的第一步就是确定中心类属。中心类属,或者有时候人

们称其为“核心类属”,代表研究的最重要的主题。这是所有其他概念都要与其建立联系的概念。要想找到中心类属,研究者必须要在研究过程中提出的类属概念之中进行选择,选出的类属必须是最相关的解释而且最有可能将其他的类属联系到一起。

中心类属具有分析的力量。赋予其力量的是类属能够从“理论上”解释或传达研究都与什么相关。例如,在呈现越战老兵的研究中,这将在第8章开始,其中最后有一个问题,促使人们在描述了背景和过程之后,提出要继续研究资料。问题是,是什么特殊的东西将所有不同的类属连接在一起,创造了一个有关越战战士生存下来的前后一贯的故事?在备忘录和资料中所要研究的是一个一贯的包罗万象的故事,是大于单个部分综合的东西(见第12章)。中心类属可能从一系列现有的类属中推演出来。或者研究者可以研究这些类属并作出这样的判断:虽然每一个类属讲述了故事的一部分,但是没有完全把握它。因此,就需要另外一个更加抽象的术语或短语,一个抽象的观念,所有其他的类属都可以放到它的下面。施特劳斯(Strauss,1987,p.36)提供了一系列标准,它们可以用于一个类属,以确定其是否合乎标准。

框5.2 选择中心类属的标准

1. 它必须是抽象的,也就是说,所有的主要类属能够联系到一起且可以归于其下。
2. 它必须频繁地在资料中出现。这意味着在所有的,或者几乎所有的情况下,都有指向这个概念的指标。
3. 它必须有逻辑而且与资料一致。不应该强加于资料。
4. 它应该足够抽象,这样它就可以在其他具体领域的研究中使用,从而发展出更加一般的理论。
5. 它应该在深度和解释力度上能够延伸,因为每一个其他类属都是通过关系的陈述与其建立联系。

在两个或更多可能性中选择

有时候分析者会面对两个或更多的核心类属。我们建议,尤

其对于初学者,要选择一个概念作为中心类属。理论发展的概念意味着所有的观念都被整合到一个理论框架。有两个中心类属意味着发展两种不同的理论。如果研究者有时间和专业知识,那么他或她可以随意选择。但通常情况下,如果研究者觉得资料很难,他或她可以提出一个统整的概念。

确定中心类属的困难

有时候研究者要超越研究的描述层面会遇到困难。他们想要形成理论,而且要达到分析的层面,但是似乎无法实现最终分析上的跳跃。还有学生很难发现中心统整的概念。对于这些学生,资料中的每一个观念都一样重要。

研究者在形成理论过程中遇到困难的原因之一是,他们没有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坚持将深入思考记在备忘录中。如果研究结束时,研究者所拥有的只是一系列概念或编码,以及从原始资料中摘录的与编码有关的一些内容,却没有真正的备忘录,研究者就不要期待着理解资料背后的分析故事。理论建构是一个过程,从原始资料开始,思考这些原始资料,描绘代表原始资料的概念,然后对这些概念的关系进行说明,将它们联系在一起,放置到一个理论整体中,沿着每一步将分析记录到备忘录中。

有些研究者在最终的整合过程中遇到困难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它们很不理解理论和描述之间的区别。在理论建构中,语言的解释产生区别。描述只是描述某些事情。例如,“这是一个红色的球。它有弹性,适合握入手掌,而且甚至在重复不断地弹跳时还保持自己的形状。”但描述并没有解释球为什么弹跳或者它是怎么来的,或者为什么它能保持自己的形状,或者如果你改变其大小、形状或制作它的材料会发生什么?另一方面,理论给予你这些解释。例如,“球能够弹跳因为它是圆的,是橡胶做成的。如果有人把球做成其他形状或者用其他材料制作球,那么它可能弹跳得没有这么好或者也许更好。它会有不同的性能、形式及功能,像足球或排球。”

在寻找中心类属过程中,研究者为什么会有困难的第三个原因是

对自己的分析能力缺乏信心。学生常常担心有可能读出某些资料中没有东西的。研究者必须要相信,研究到了这个时候,整个故事都在自己的心中了。现在只是需要提取就可以了。有些可能需要局外人的帮助,去鼓励他们进行概念上的跳跃。“局外人(outside person)”可以询问一系列引导性的问题,促使分析者抽象地回答而不是描述性地复述这个故事。只要能够给他人讲述分析故事,常常能帮助分析者获得看待故事的视角并获得信心。

帮助整合的方法

有好几种方法可以用来帮助寻找中心类属和概念整合。这些方法有写作故事提纲、使用图表以及回顾和整理备忘录,这既可以通过手工的方式,也可以通过计算机程序(如果有这样的程序可用的话)。

写作故事提纲

当研究者开始考虑整合的时候,他或她已经沉浸在资料中有一段时间了,所以常常对研究的东西有一种“本能”的感觉,即使他或她可能无法说出这些“东西”是什么。突破这种僵局的一种方法是坐下来,用非描述性的语言,将“这里似乎发生了什么”写下来。这可能要两次、三次,甚至很多次才能够准确地将资料的思想表述出来。直到最终形成一个故事。通常,回到原始资料重新阅读几个访谈或观察记录会有助于激发思考。然而这种方法要起作用,前提是研究者不是为了寻找细节而是为了寻找一般的感觉来阅读访谈或观察记录,站出来并提出这样一些问题,“这些人努力克服的议题或问题是什么?当我阅读这些访谈或观察记录或观看录像时,什么东西一次又一次地在打动我?虽然可能没有直接说出来,但整个资料告诉了我们什么?”(关于描述性故事的例子见第 12 章)

从描述性故事转向理论解释

一旦分析者对研究是什么写了几句描述性的话,他或她就准

备好了开始理论整合的工作，将重要的类属或主题整合到一个统一的理论解释中去。整合意味着选择一个核心类属，然后围绕核心类属讲述这个故事，且使用来自研究的其他类属和概念。在第12章中整合性的备忘录2是理论性备忘录的一个例子，它使用了源于越战老兵研究中的概念来说明士兵如何能够在战争中"生存"的经验。读者可以跳到第12章，将其作为理论性备忘录的一个例子来阅读。并非越战老兵在越南的经历分析中演绎出来的每一个概念（只有主要的）都包括在这个备忘录中，因为本书的目的是在方法论。它并不是一个关于越战老兵的研究报告，当然应该有一本专门关于他们自己的书。注意概念之间建立起来的联系并不是以因果关系模式作为假设来写作的。不过，希望撰写这样陈述的研究者，如果已经作出了选择，是可以这么做的。

整合图表的运用

有时候，由于偏好或者因为分析者更多的是具有视觉直观偏向的个体（a visual person），所以对于整理类属之间的关系，图表比讲故事更有用。对于理论整合，图表能够成为很有价值的工具，因为整合图表是抽象，但又是资料的视觉直观呈现。构建图表是有用的，因为它让分析者与资料之间有了距离，促使它们在类属的层面上理解概念，而不囿于众多备忘录的细节中。

绘制图表也要求分析者仔细考虑关系之间的逻辑，因为如果关系不清楚，那么图表就会混乱且令人困惑。如果分析者在整个研究过程都使用图表（而且有些分析者是视觉直观型的思考者，并且非常善于绘制图表），那么在整合故事中就应该继续使用图表。然而，如果图表很少，或者如果在回顾了先前的图表之后，研究者对概念之间的关系仍然不清楚，那么和老师、咨询人员或同事坐在一起，用图表向他们解释"研究的是什么"会有助于整合的过程。听者可以提出有针对性的问题或要求研究者用图表的方式呈现一些代表性的案例。这可以激发分析者思考相互之间的关系。通常，将概念以图表的形式放在一起，要尝试多次，概念化才会觉得合适。

图表不需要包含研究过程中出现的所有概念,而是应该主要关注那些确定为主要类属的概念。图表应该流畅、逻辑清晰,不需要过多的解释。而且,整合图表不应该过分复杂。图表如果有太多的语言、连线或箭头,就会使得读者很难理解要点是什么。细节应该留到文本的写作中。

通过备忘录进行回顾和整理

备忘录是分析思考的实时记录。备忘录是在资料互动过程中产生的思想观念的储藏室(见第 6 章),一般来说,备忘录开始很简单(主要针对一个概念)而且是描述性的,而作为研究过程,备忘录一般会变得更像小结,不仅抽象而且综合(探究两个或更多概念之间的关系)。这意味着后面的备忘录常常包含整合的线索,尤其是总结性的备忘录。有时候,正如读者将会在第 12 章所看到的,主要概念在研究的早期就出现了;只是研究者很晚才认识到它的重要意义。

备忘录通常是根据类属来整理。然而,随着备忘录开始连接两个或更多的概念时,整理就变得越来越困难。这正是计算机程序检索功能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计算机程序允许研究者整理和筛选,直到建构起逻辑理论结构。这是我们的经验,学生能够区分模式和过程,但即使所有的备忘录都在他们的面前,他们作出最终的分析跳跃(analytic leap)仍然有困难。面对众多不同的概念和类属,他们变得更加迷惑而且不确定。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重新阅读总结性的备忘录会非常有帮助,特别是,如果研究者听到自己的话,寻找重复出现的主题。迟早会出现“原来如此(aha)!”的体验。

有时候整个概念的观念不知道来自何处,或者它出现在“原来如此(aha)!”的体验中。有时候,只要想到描述这种情境的隐喻就是一种激发。或者有些研究者求助于文献来寻找统整性的概念。虽然这不是我们的常规做法,但有时候文献确实会使得分析的成果源源不断。我们都赞同使用一切有助于激发思考的手段。而且,研究文献还能够帮助研究者去思考,如何在写作的时候将自己的研究发现放到更大的专业文献整体之中。

提升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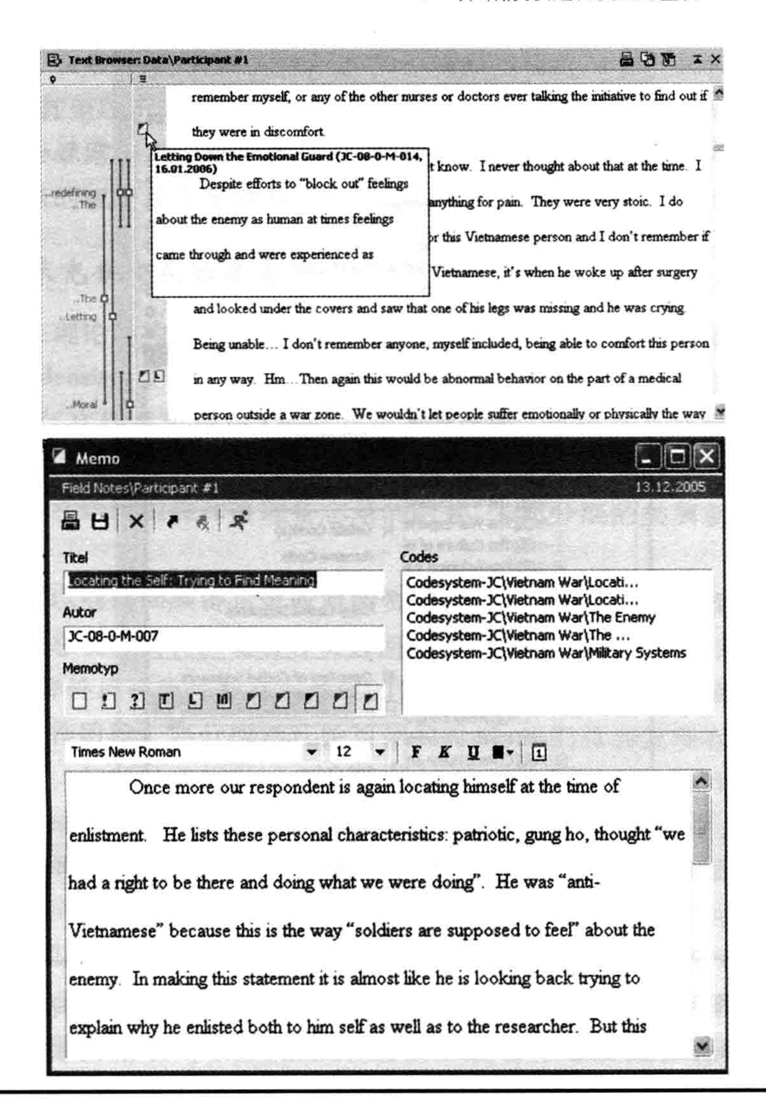
一旦研究者勾画出整体的理论框架,就可以提升理论了。提升理论包括:(a)从内部一致性和逻辑关系上重新审视框架,(b)补充发展不够充分的类属概念,删除整理多余的类属,以及(c)验证理论框架。

从内部一致性和逻辑关系上重新审视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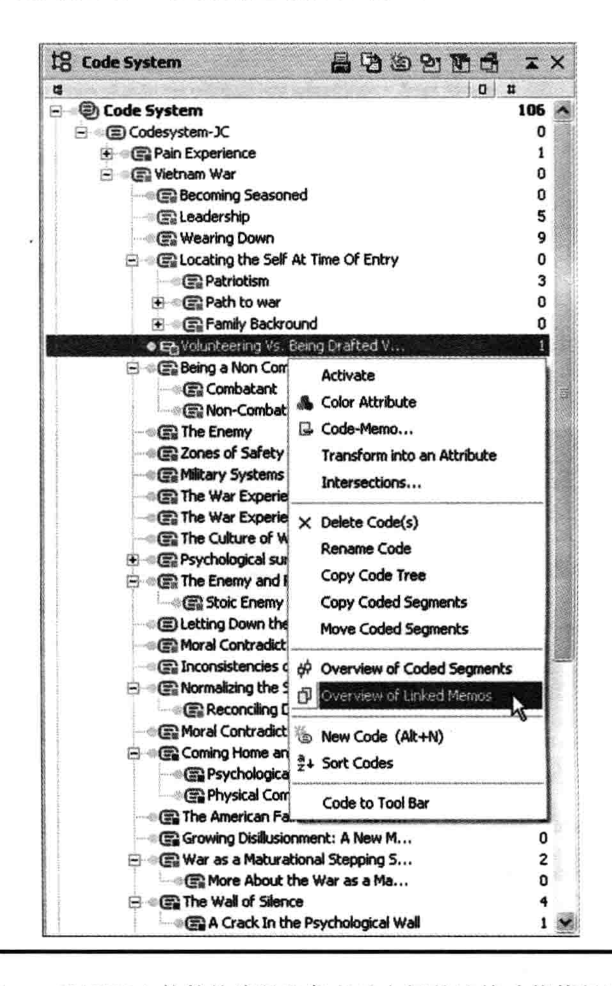
理论框架逻辑上应该流畅,不应该有不一致的地方。如果备忘录中的故事线索和图表都清晰,那么,一致性和逻辑性也因如此。然而,有时候在最后的写作期间,研究者会觉得“有些事情”不是非常合适。一两个概念或最终的思想仍然需要完善。当出现这样的情况时,研究者应该回去,重新阅读备忘录,而且还要利用图表。但是除非分析者知道他或她在寻找什么,或者什么东西丢失了,否则绘制图表并不会有什么帮助。

起始之地是中心类属本身。中心类属,像任何类属一样,必须根据其属性和维度来界定。定义应该来自于资料。即使在早先的备忘录中没有对中心类属进行命名,当分析者回顾这些备忘录时,他或她应该在资料中为该思想找到参考资料,以及它的属性和维度。

为了检查内部一致性和逻辑发展,分析者应该站出来,问自己(因为到现在为止分析者还是沉浸在资料中)它们的属性到底是什么,然后回去看看有多少已经被建构到框架中。如果仍然不清楚,或者有些地方似乎缺失了,那么分析者应该回到备忘录,整理出线索。有时候,分析者几乎快要找到了,但没有意识到他们看待资料的立场错了。这就是说,从分析者的视角,而不是适应受访者的视角看待资料,是很容易的,即使你认为你没有偏见。例如,正如更早的时候,科宾在写她的博士论文时所说的,一项研究计划,它通过患有慢性病的孕妇来看待管理,似乎有点儿违背逻辑,因为有些妇女的保护性治理策略与危险水平不匹配。最终,



屏幕截图 2a & 2b　该截图为我们展示了一张 MAXQDA 的备忘录表单。备忘录可以附着在文本浏览窗口中文本的任何位置(见屏幕截图 2b)。单击文本旁边的边缘区(in the margin)就可以打开备忘录(见屏幕截图 2a)。研究者可以任意界定 11 种不同类型的备忘录。备忘录文本区域可以写到 26 页。备忘录可以和任何编码建立连接(见"编码"部分)。因此你总是能够连接进入有关特定类属的所有备忘录,甚至直接从编码连接进入(见屏幕截图 3)。所有的备忘录都在备忘录处理器(memo manager)中处理(见屏幕截图 6)。



屏幕截图 3　　MAXQDA 软件的编码和备忘录之间的连接功能使得跟踪任何编码的备忘录都很方便：只要单击编码就可以打开上下文菜单，为编码系统提供很多处理选项。单击一下，立刻就会为你显示与特定编码建立连接的所有编码。

科宾意识到，虽然她认为她是不偏不倚的，但是实际上她是在自己看待危险是什么的视角基础上，将各种层次的危险加诸于妇女。妇女看待这些危险与健康专业人士有很大差异，而且他们更多的是根据他们的定义而不是根据健康专业人士的定义来行动——这就是为什么妇女的行为有时候与危险似乎不一致。重要的并不是科宾指出的危险或医生所说的危险。相反，是妇女自己

觉得什么是危险。换句话说，人们很容易被研究者自己的视角所蒙蔽，甚至还不知道。通常，除非分析框架似乎很有问题，专业偏见才会暴露出来。意识到这一点，研究者就可以回到资料，以更加清晰的视角看待受访者所说的。

补充未充分发展的类属

在理论建构过程中，分析者的目标除了抽象性外，还要有稠密性(density)。对于稠密性，我们的意思是类属的所有显著属性和维度(在理性范围内)都被找出来了，而且也建立了其变化形式。稠密性和变化形式是赋予类属准确性并增加其解释力度的东西。在绘制图表和整理备忘录的时候，未充分展的类属就非常明显。

可以通过回顾备忘录或原始资料来做补充的工作，寻找那些可能被忽视的资料。或者分析者回到田野，通过理论抽样(见第7章)选择性地收集另外有关类属的资料。补充常常一直持续到最后的写作阶段。当分析者开始写作的时候，他们总会发现有断裂的地方。问题是确定什么时候结束研究。并非所有的细节都能够很好地形成或清楚地说出来。在越战老兵研究的例子中，即下面从第 8 章到整个 12 章，“回家(Homecoming)”的概念并没有说清楚。虽然我(科宾)意识到，这并不是一个重要的概念，由于时间的限制，我无法收集到那些必要的用来说明这个概念的资料。

决定是否结束资料收集过程的最终标准仍然是“理论饱和”。在扎根理论和其他质性研究中，这个术语也许是被误解最多，而且也是被错误使用的概念。它常常是在 5 到 10 分钟访谈之后就合法地停止收集资料的借口。但理论饱和并非那么简单。理论饱和意味着获得每一种类属并详细地说出了它的属性和维度，包括变化形式。它需要大量的备忘录写作和非常有意识地填补资料中的断裂。

修整理论

有时候，问题并不是资料不够，而是资料太多。也就是，有些

观念似乎不适合该理论。这些通常是没有关系的概念、很好的思想,但却从来没有得到发展,最有可能是因为它们在资料中出现得不多,或者是少得我们找不到它们。我们的建议是在此研究中放弃它们,特别是,如果研究者想要在预定的时间毕业。如果这些概念有趣,分析者可以以后再去研究它们,但是没有必要用毫无方向的概念或对理解理论没有意义的概念去填塞一个理论。

检验理论框架

当我们说到检验,我们并不是说量化研究意义上的验证(更多有关该话题将在第 14 章阐述)。我们意思如下:理论是从资料中建构起来的,没错,但是到理论整合时,它只是表现为原始资料的抽象复制。因此,重要的是,确定如何使抽象概念很好地适合原始资料,而且还要确定是否有任何明显的东西从理论框架中被遗漏了。有好几种检验框架的方法。一种方法是回到框架并将其与原始资料进行比较,做一种更高层面的比较分析。该理论框架应该能够说明大多数案例。另外一种检验的方法是真正给受访者讲述这个故事或者请他们阅读,然后要求作评论,看这个故事是否符合他们的情况。自然,故事不会适合每个情况的每个方面,因为理论是材料的一种还原,而且也是在具体案例编辑基础上建立的,但是在更多意义上,参与者应该能够在讲述的故事中识别出他们自己。

如果一个案例不适合怎么办?

发现无关的案例是很正常的,既有那些在概念维度上是极端的案例,又有与所发生的事情似乎很矛盾的案例。大部分情况是,这些极脱离者(outliers)代表了理论的变化形式,或呈现出另外的解释。

在变化中建构理论

有些理论框架的问题之一是,它们无法说明变化形式。它们以发展的形式呈现过程,但并没有说明发展过程中的变化形式。这是有问

题的,因为它让理论显得非常造作,像每个人或组织被划归到简单的类型或过程的各个步骤当中一样。我们知道,生活并不是可以简单归类的。每一过程总会有变化形式,有些人行动迟缓,有些则非常敏捷,有些则落伍,还有些人则循着不同的道路走。这意味着,即使在模式和类属之中,不同的个人、组织和群体也会有变化性,它们会沿着某些属性而落入不同的维度上。

要点总结

为情境和过程分析资料是任何分析的基本方面。想要偷懒就是歪曲或扭曲被研究的情景,并且对所发生的事情及其原因只呈现一部分解释。换句话说,个人或集体都不是生活在真空里或在真空里活动,而是在一个更大的结构条件框架内存在和行动。结构条件并不决定行动/互动/情感反应。相反,它们产生某些事件的环境、情境以及/或者问题,个人和集体通过某种形式的策略行动、互动或情感反应(过程)对其作出响应。因此,情境和过程必须要结合起来,应该成为对任何现象解释的一部分。

对于那些对理论建构感兴趣的研究者,本章呈现了一些帮助理论整合的策略。我们的解释是,整合是围绕着一个中心解释概念而出现。整合的出现需要时间,从最初的分析开始,通常直到写作完成它才结束。当形成了中心思想观念,主要类属就通过关系的解释性说明与其建立联系。有好几种方法可以用来帮助整合的过程。这些方法包括讲故事或写故事提纲、运用图表,以及整理和回顾备忘录。

当形成了理论框架,分析者就要准备提升理论,修整多余的内容以及补充不充分的类属。不充分的类属通过进一步的理论抽样达到饱和(见第7章)。最后,通过将其与原始材料进行比较对理论进行检验,或者将其呈现给受访者寻求他们的反馈来检验理论。扎根于资料的理论应该得到参与者的认同,而且更大的概念应该适用于每一个案例,即使属于这些案例的一些细节丢失了或显得有些不合适。

思考、写作及小组讨论活动

1. 从你的生活中拿出一个情景，一个你愿意与小组分享的情景。从构成情景的最宏观方面到最微观方面，思考其环境或条件。
2. 思考你用来处理该情景的策略以及当情景变化时你如何反应，将过程带入分析当中。
3. 对于上面的情况，写一个详细的备忘录，然后将这个备忘录带到班级和小组一起讨论。
4. 在小组当中，讨论在个人备忘录中涉及的那些其他情境因素和策略，它们可能是个人所忽视的。
5. 理论对你意味着什么？你可能会如何将理论带入你的研究？
6. 讨论研究过程中那些你认为对理论建构非常重要的特征。

6

备忘录和图表

要实践最大化地掌控他的经验，研究者需要一种有效的方法将其记录下来。新手可能考虑将做笔记和录音作为主要的工具，来帮助记忆和存储及恢复信息。他们是对的，但只是在一个相对机械水平上的正确……我们的研究者需要的是记录的方法，这些方法将为他在作为发现者和作为社会分析者两种角色之间提供一个进行中的、发展性的对话。(Schatzman & Strauss, 1973, p.9)

框6.1　术语界定

图表：描述分析概念之间关系的直观工具。

备忘录：分析的书面记录。

理论抽样：在形成的概念基础上的资料收集。其思想是寻找能够表达出一个概念各种属性和维度的情况(situations)。

导　论

本章的目的是为读者介绍备忘录和图表。备忘录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书面记录——那些装着我们分析结果的记录。图表也来自于分析,它们是描述概念之间可能关系的直观工具。但是备忘录和图表不只是思想的仓库。它们是工作着的和活的文档。当分析者真正坐下来写备忘录或制作图表时,某种程度上的分析就开始了。正是写备忘录和制作图表促使分析者对资料进行思考。而且正是在思考中分析工作开始了。施特劳斯认为,"……即使当研究者独自一个人在做一个项目时,他或她都一直在进行持续不断的内部对话——因为,毕竟,思考本来就是这样的"(Strauss,1987,p. 110)。

在本书的第2版中,我们将备忘录分为好几种类型——编码笔记、理论笔记和操作笔记。在第3版中,我们想摆脱以结构化的方式来思考备忘录。原因是新手研究者常常会过分关注"做对(getting it right)",以至于他们失去了写备忘录的生成流动性特征。重要的不是备忘录的形式,重要的是真正去写备忘录。然而,早先一位评论者对这部分文字提出了一个组织框架,作为备忘录的例子,本章的后面将用到,在研究者可能会写作的各种类型的备忘录中,该框架非常详细而且很有帮助。下面我们将介绍这个框架。备忘录的目的有:

- 开启资料探究
- 寻找/发展概念/类属的属性和维度
- 作比较并进行提问
- 详细说明范式:条件、行动/互动和后果之间的关系
- 形成故事线索

——感谢这位不知姓名的评论者

对于读者,重要的事情是,他或她并不是根据各种类型来撰写备忘录。重要的是要养成撰写备忘录的习惯。

撰写备忘录应该首先从第一个分析阶段就开始，并贯穿整个分析过程。绘制图表更多是阶段性的，但却非常重要。撰写备忘录和绘制图表不要畏难，也不要看作是痛苦的事情，还不能将它们与已经完成的准备刊发的论文混为一谈。备忘录和图表开始只是呈现最初的思想，然后在复杂性、丰富性、清晰性和准确性上逐步发展，成为研究过程的组成部分。我们经常听到学生的抱怨之一是，撰写备忘录太费时间了。他们说，他们宁愿在田野日志的边上做一些笔记。我们对这些观点感到困惑。撰写备忘录和绘制图表是分析的组成部分，也是做质性研究的组成部分。它们将分析向前推进，正因为如此，它对研究过程的重要性就像资料收集本身一样。

质性分析非常复杂而且需要累积思考，不撰写备忘录就很难跟踪。而且，多数研究项目至少进行好几个月，有些持续数年。研究者如何能够记得他们几个月之前思考的东西呢？除非这些思想被记在某些地方。而且还有，很多研究是由两个或更多的人合作实施的，研究者需要一种方法来存储和分享他们各自的思考以及共同的分析研讨。没有备忘录和图表，就很难将交流的文字在研究者之间公开，或者说很难追溯研究的过程，而研究者正是通过这些达到最终的研究发现的。

备忘录和图表的一般特征

备忘录和图表有一些一般特征是研究者需要熟悉的。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些特征。

- **备忘录和图表在内容、概念化程度和长度上都不一样，这取决于研究的阶段、意图以及你正在编码的材料。**在分析的开始阶段，备忘录和图表似乎简单而且又没什么用处。这没有关系。记住，除了分析者，没有人（但委员会成员有可能）能够看到备忘录和图表。
- **虽然分析者可以在真正的访谈记录或田野笔记上写，但这不实**

际，除非在开放编码的最早期阶段才有可能这样。我们之所以这样说有几个方面的理由：(a)很难在田野笔记上写下多长的备忘录或绘制图表，因为那里通常没有足够的空间来发展思想；(b)随着分析的进展，有些最初的概念可能被修改，而当分析者回到文档去重新编码，就会面对写在笔记边上老的编码，这些可能会让人困惑并产生误导；(c)如果田野笔记或访谈记录的边缘是信息存储的唯一场所，那么检索信息就非常困难，换句话说，很难合并或整理备忘录；(d)有很多计算机程序可以用来帮助撰写备忘录和制作图表，因此没有必要在文档的边缘做这些工作。下面这些图书和论文非常有用，它们为分析者介绍了用计算机做资料分析的正、反两方的观点：Bong (2002); Fielding & Lee (1991& 1998); Kelle (1995& 1997); Lonkila (1995); Pfaffenberger (1988); Roberts & Wilson (2002); and Weitzman & Miles (1995)。

- **每一位分析者都会形成他或她自己的撰写备忘录和绘制图表的风格。**有些分析者使用计算机程序，另外一些人则使用分色编码卡(color coded cards)，还有人则更喜欢将写好的备忘录放到活页夹、档案夹或笔记本里。研究者用来记录和处理备忘录的方法并没有做这些事情本身那么重要。然而，我们可以补充的是，计算机程序现在极大地方便了这个过程。
- **虽然备忘录和图表的内容对保留分析记录至关重要，但是它们除了存储信息之外还有很多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是它们促使分析者分析概念而不是原始材料。而且它们让分析者能够运用创造性和想象力，这常常能够激发出新的洞见。
- **备忘录和图表的另外一个作用是它们是分析思想的反映。**当分析者必须要将观念落实到纸上的时候，缺乏逻辑和一致性的思想很快就暴露出来。
- **备忘录和图表提供了一个储藏室，使得分析概念能够根据演化的分析框架分类、排序和重新整理以及检索。**当进入主题写作的阶段，或者当分析者想要进行参照分类或评估他们的分析进展时，备忘录和图表的这些功能就非常有用。研究图表和回顾备忘录还能够揭示出哪些概念需要进一步发展和提炼。
- **分析者在每一段时间的分析之后都应该编码。**实际上，备忘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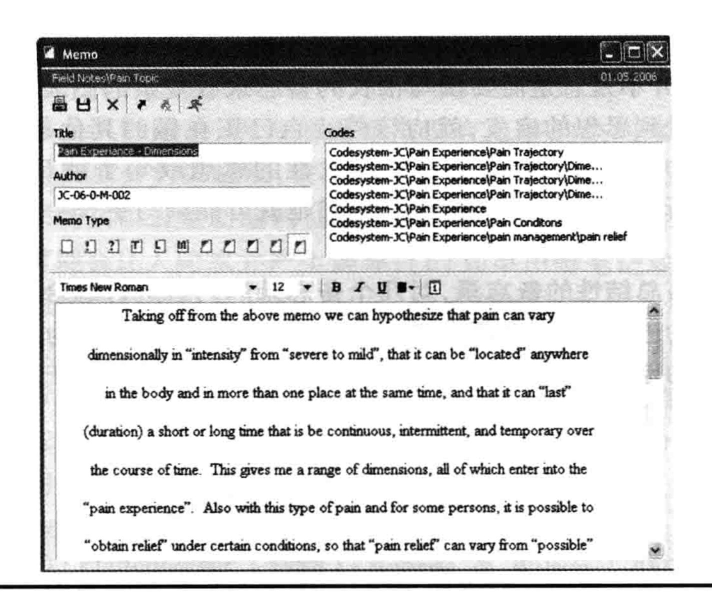
的写作常常就是一种分析,尤其对于独立进行研究的分析者。然而,并不是总是需要撰写很长的备忘录或复杂的图表。当分析者受到思想的启发,就应该停止自己正在做的其他事情,将自己的思想留在纸上。一些启发性的思想或句子就足够了。当分析者有更多时间的时候,他或她就可能撰写更长一点的备忘录。

- **可以写总结性的备忘录,对几个备忘录的内容进行综合**。随着分析的进展,分析者需要花时间坐下来,对他或她认为是分析重要的地方进行总结,这非常重要。这样做确实有助于后面的整合。整合性的图表可以用来直观地展示这些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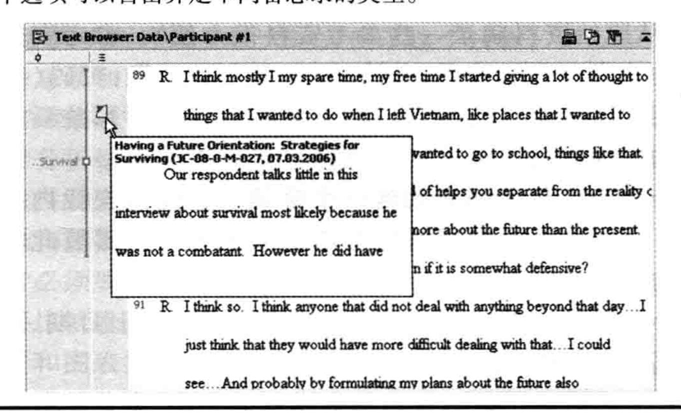
备忘录和图表的具体特征

除了备忘录的一般特征,我们为撰写备忘录和绘制图表提供了一些更加有用的建议。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沮丧的了:当你试图检索你记得曾经写下来的备忘录时,但却因为缺少识别信息而找不到。还有一些让撰写备忘录和绘制图表更有用的思想包括:

- **给备忘录和图表标注日期**。从备忘录所源自的文档和原始资料中摘录一些参考资料放进去也非常有用(由于计算机程序的使用,从原始资料摘录一些参考资料很方便)。参考资料可以包括访谈或观察的编码;文档;资料收集的日期;页码(以及那些使用计算机程序的行号);以及在检索资料时那些后来可能有用的其他查找方法。
- **为每一个备忘录和图表创建一个标题**。这使得查找内容更加容易。你可以交叉参阅那些将两个或更多的类属彼此联系在一起的备忘录或图表。
- **将一小段原始资料或描述放到备忘录中**。(加上日期、页码和所有其他方便检索的信息。)



屏幕截图 4　一份自动"贴上"作者名字的备忘录。在这个例子中，我还使用田野笔记在相应的 MAXQDA 项目中寻找本书中的各个备忘录。这样，你可以很轻松地同时使用本书中及项目的资料。而且，可以给每一个备忘录一个标题并将其连接到任何一个编码（见第 5 章）。备忘录可以输出或打印。一个非常有用的特点是这个选项可以自由界定不同备忘录的类型。



屏幕截图 5　该截图显示备忘录是如何在它所粘附的地方展现：在文本本身和可视化的编码之间。这是一个探索性的备忘录。鼠标移上去，备忘录就显示一个屏幕信息，标明该备忘录的标题、作者、创建日期以及预览文本。只要你将鼠标移开，这个信息就消失。

这些是资料的简易提示，让人想起特定的概念或观念（这随着计算机程序自动出现）。后面，在写作时，可以用真正的资料来说明这个概念。

- **经常更新备忘录和图表**。随着分析的进展，新资料引起更多的洞见，因此要添加到备忘录中，使之更加深刻与复杂。
- **列出一个概念和次级概念的清单，随时可供参考**（这依然是随着计算机程序自动出现）。这有助于防止重复和疏忽。
- **注意看看不同编码的几个备忘录是否看起来一样**。分析者可以重新比较概念的相似点和差异处，可以将它们合并到一起或对它们的差异之处进行标记。
- **对备忘录要多留几份备份或者对自己的研究做计算机备份**。由于计算机出错丧失重要资料的研究者知道，没有对研究进行备份会是多么令人沮丧的事。
- **备忘录指出什么时候分类出现饱和——意味着就其属性和维度而言什么时候形成很好的类属**。这样就可以让资料收集指向其他仍然需要发展的类属。
- **作为分析者，如果你同时提出两个或更多令人振奋的观点，你应该立即就每一个观点赶紧写一些东西**。通过这种方法，所有的观点都不会丢失，后面可以就每一点撰写一个备忘录。
- **在撰写备忘录和绘制图表时要灵活而且放松**。对是否正确的担心可能会扼杀创造性和冻结思想。
- **在撰写备忘录的时候要概念化而不是描述**。备忘录不只是关于具体的事情或事件，而是源于这些事情或事件的概念化思想。它是概念以及概念之间关系的表达形式，正是这些概念及其之间的关系将研究从原始材料变成研究发现。
- **形成你自己撰写备忘录和绘制图表的风格和方法**。
- **使用笔记本或流水日志（running log），与备忘录分开，记录访谈或观察期间参与者的印象和研究者的反应**。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日记能够作为一种很好的手段，记录下对自我反思的描述。

备忘录和田野笔记

本书的一位评论者指出，田野笔记“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形式的备忘录”。巴顿说，“记录和追踪资料收集过程中出现的分析洞见是田野工作的一部分，是质性分析的开始”（Patton，2002，p. 436）。无论什么时候对事件进行观察，这些观察都是经过研究者的眼睛筛选过，研究者会情不自禁地思考并对信息进行分类。这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事情，因为个人往往自觉地思考，或者说并不是根据概念来思考。因此，在田野时，只能是草草地记下分析的思想，因为正如巴顿所说：“……压抑分析的洞见可能意味着永远失去，因为没有人能够保证它们还会回来……”（Patton，2002，p. 406）。

这里要强调的是，如果研究者离开了收集资料的田野，理论思想将由资料激发，研究者要乘着还没有忘记，最好是将那些理论思想赶紧记录下来。实际上，当在田野中记录事情的时候，几乎不可能纯粹是描述性的，因为我们自然地对我们的所见命名并对其进行分类（Wolcott，2001）。然而，我（科宾）想在田野笔记和备忘录之间进行区分，让新手研究者不要混淆了它们各自的性质或重要性。田野笔记是资料，可能有一些概念化的和分析性的语言。另一方面，备忘录是有关事件的更长的和更加深入的思考，通常在离开了田野之后以概念的形式写下来的文本。那些对撰写备忘录和田野笔记的方法感兴趣的人，他们会在现场或现场之外进行区分，沙茨曼和施特劳斯提供了下面的框架。他们指出，撰写观察笔记（ONs）是描述真实的事件，撰写理论笔记（TNs）则是研究者对那些事件的思考。最后，他们建议撰写方法论笔记（MNs）或者记录研究过程的某些方面的提示信息（Schatzman & Strauss，1973，pp. 99-101）。外出在现场期间撰写复杂的笔记可能就比较困难，因为研究者可能非常投入，所以他或她可能看不到正在发生的事情。

洛夫兰德等人（Lofland，et al.，2006）通过将观察笔记作为对“现场”观察到的事件或互动做报告来帮助澄清“观察笔记”。这

样的笔记可能还包括背景描述以及或许某些非正式访谈的描述。

当外出在田野做观察笔记时，科宾循着类似的程序，而撰写备忘录则是在回家分析时做。例如，在研究护士长护理病人的研究中，科宾和施特劳斯二人在科宾观察的基础上写了很多备忘录。在每一次现场研究讨论期间，科宾都跟着一位护士长，就像影子一样，尽可能记录下每一位护士长所做的和所说的每一件事情，还有对背景的描述（当活动发生时在笔记本上写下这些东西从来没有任何问题，除非在心理治疗期间）。在观察的最后，科宾对护士长每天的记录进行了回顾，在重温了这些事件的同时也获悉了护士长对其行动/互动的解释，并将其作为一种非正式的访谈记录和检验过程。

大约在第二天，科宾就会和施特劳斯见面，他们会针对每一个事件进行分析，在他们讨论完毕之后撰写备忘录，使用他们在访谈中运用的方法进行分析。这些事件的解释和印象正是在分析期间产生的。我们对田野研究者的建议是，应该撰写观察笔记，记录下每一个事件，包括尽可能的描述，然后根据观察笔记来撰写备忘录——一个事件一个事件地写——以类似于访谈资料的方式写，但时刻要记住，在资料收集时，也许会出现某种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分析。

图表

每个人对图表都非常熟悉。图表是资料的概念化直观形式，而且因为它们是概念化的，所以图表有助于提升研究者事实层面的思想。图表能够让研究者组织他们的资料，整合他们的观念。图表有助于研究者以系统的和有组织的方式向同事和他人说明他们的研究发现。最重要的是，绘制图表促使研究者以“瘦身的方式（lean ways）”，即一种将资料还原到其本质的方式来考虑资料。你可以不必绘制图表来做质性分析，但是这样做如常言所说“一张图可以代替千言万语”。迈尔斯和休伯曼就是这样两位研究者，他们广泛地使用图表来组织资料和说明概念之间的关系。他们对图表是这样理解的：

> 概念框架最好是用图表的形式绘制，而不是用文本的形式。必须要在一张纸上绘制出整个框架，以迫使你详细列出不同现象的具体要素，绘制出可能的关系，区分概念上或功能上不同的变量，并同时考虑所有的信息。(Miles & Huberman,1994,p.22)

早期的图表并不复杂。像早期的备忘录一样，它们很简单，仅仅指明关系，而不是描述关系。这里有一些前面研究中的图表。注意它们很简单，但却能够帮助研究者思考可能的关系。

显示多种关系的复杂图表通常更多属于理论建构而不是描述，虽然也可能有描述性的图表。

表 6.1 同质病人/异质病人：轻松的工作/艰苦的工作

	同质病人	异质病人
轻松的工作		
艰苦的工作		

表 6.2 病历："机器-时间"维度

生病阶段	机器的数量		频次			持续时间	
	很少	很多	很少	中等	常常	短时间	永远
早							
中							
晚							

表 6.3 平衡矩阵

疼痛	结果						
	疾病轨迹	生与死	承载	互动	病房工作	情感经历	个人身份
诊断							
预防							

续表

疼痛	结果						
	疾病轨迹	生与死	承载	互动	病房工作	情感经历	个人身份
最小化							
实施							
减轻							
忍受							
表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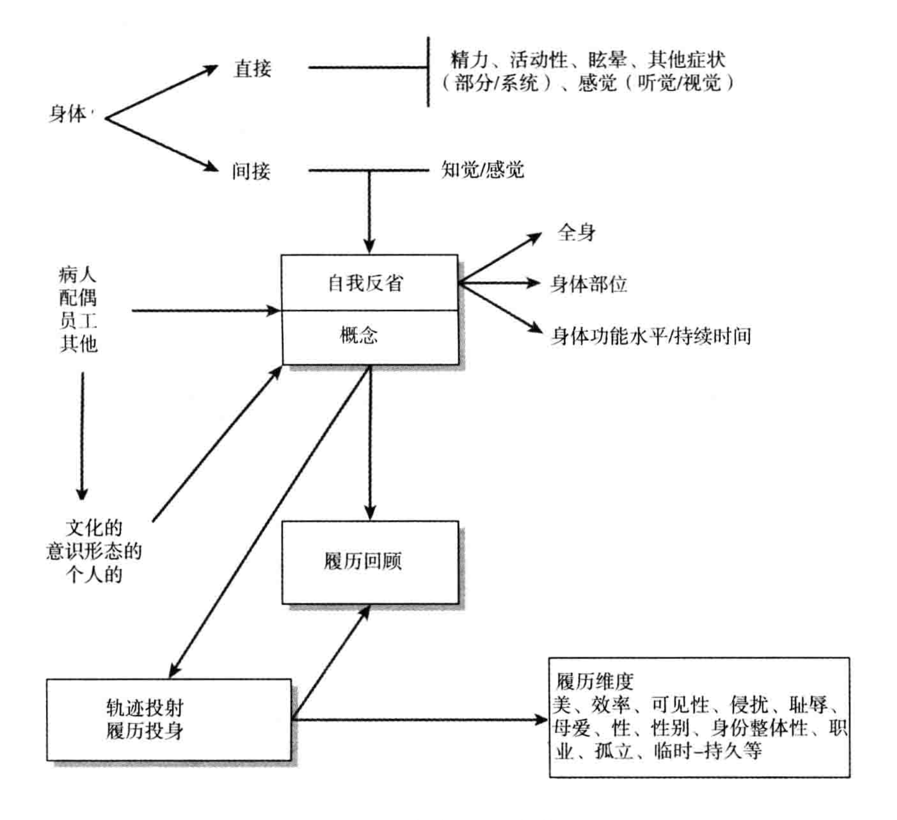


图 6.1 身体、履历与轨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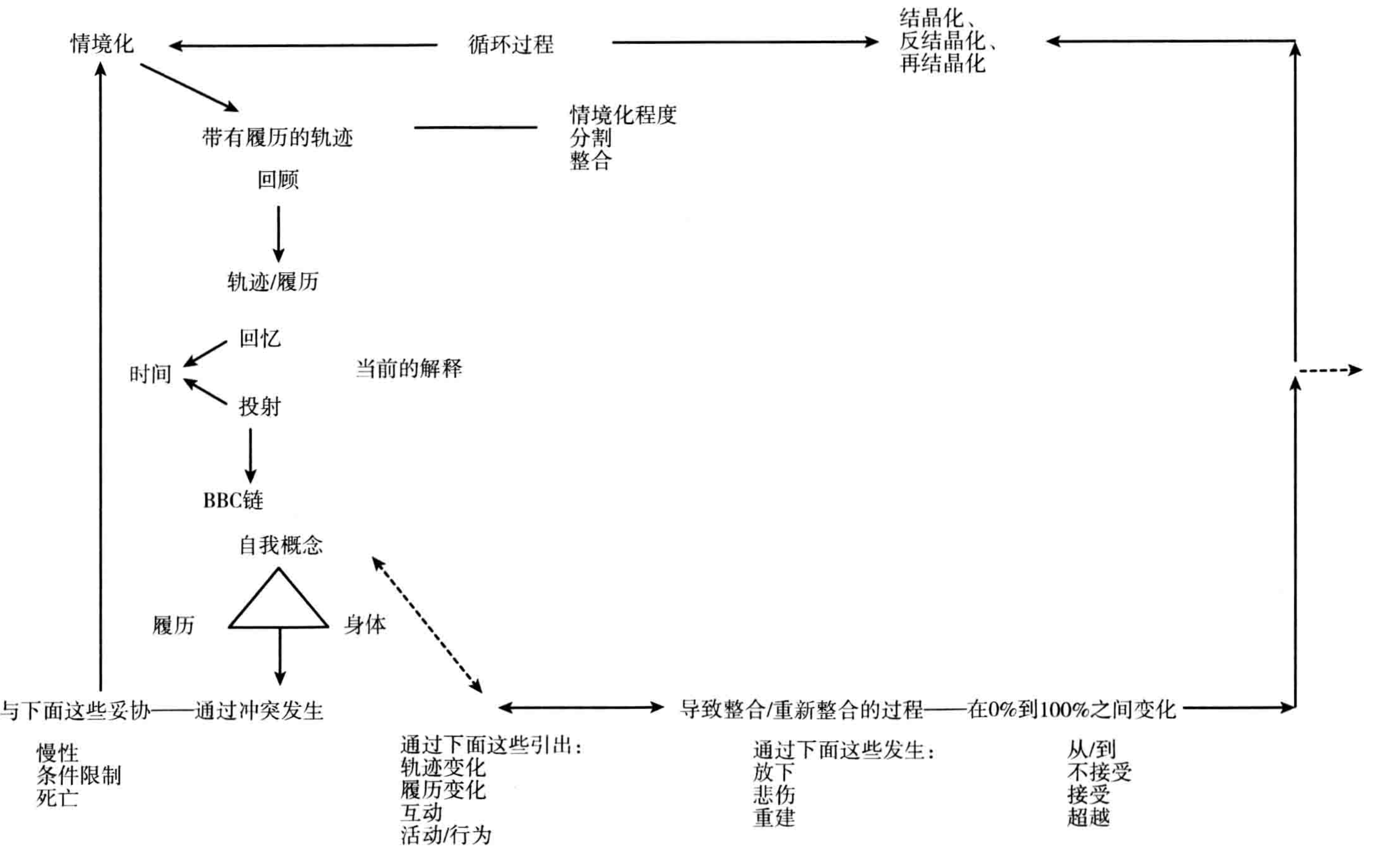

情境化
循环过程
结晶化、
反结晶化、
再结晶化
带有履历的轨迹
情境化程度
分割
整合
回顾
轨迹/履历
回忆
时间
投射
当前的解释
BBC链
自我概念
履历
身体
与下面这些妥协——通过冲突发生
慢性
条件限制
死亡
导致整合/重新整合的过程——在0%到100%之间变化
通过下面这些引出：
轨迹变化
履历变化
互动
活动/行为
通过下面这些发生：
放下
悲伤
重建
从/到
不接受
接受
超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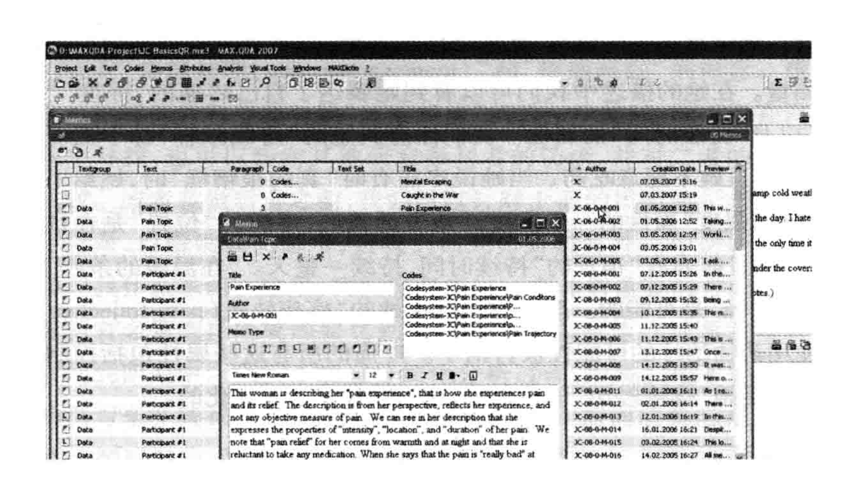
图6.2 时间反思过程

在建构理论的时候，虽然能以不同的方式将概念放到一起，但研究者提出的关系还是建立在资料的基础之上，因此可以说，这种关系是扎根于资料的。通过不断地将概念和真实的资料进行比较，提出的关系变得更加具体，因为它们逐渐清楚，而且提供了一个解释。随着时间的推移，图表变得更加全面而复杂。注意下面从前面研究中援引的图表。虽然仍然相对简单，但这是作者经过很多次修改才到达的最终版本。

要想了解综合图表在整个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情况，请阅读施特劳斯（Strauss，1987，pp. 174-178）。

撰写备忘录和绘制图表

既然我们已经对备忘录和图表以及它们对分析过程的重要性进行了相当冗长的讨论，我们想为读者提供一些例子。我们的说明应该让读者知道，撰写备忘录或绘制图表没有什么神奇的，呈现出来的备忘录和图表是对“痛苦经历”的分析。读者将会注意到，想要让分析过程继续，研究者需要的只是一点点资料。



屏幕截图6 该截图显示的是MAXQDA备忘录管理器，可以从主屏的上级菜单进入（见“备忘录”）。它让你项目中的所有备忘录一目了然。双击一行就可以

打开该行的备忘录，而且——同时——它连接的文本就会在MAXQDA文本浏览器中被打开。“作者”栏显示出是谁创建的备忘录。在该项目中，作者栏是用来识别备忘录的。本书中的每一个备忘录在括弧中都有自己的ID，因此让读者很容易使用本书的资料，与“JC-BasicsQR. mx3”项目中准备的资料类同。你可以在下面网址中下载该项目：http://www. maxqda. com/Corbin-BasicsQR 或者 www. sagepub. com/corbinstudysite。备忘录管理器的每一个栏目都可以通过单击栏目的页眉（column header）而成为表格筛选的标准。因此，你可以，例如根据备忘录的类型、标题等筛选备忘录。

备忘录1* 一份展示开始资料探究的备忘录样例 1997.4.4

疼痛经历的属性与维度（田野笔记摘录）

> 在湿冷的天气时我手上关节炎的疼痛真是很糟糕。早晨我痛醒了，而且持续了一整天。我讨厌吃药，担心可能的副作用，因此只有晚上当我躺在温暖的床上、盖着被子的时候感觉似乎好一些。（援引田野笔记第1页，与受访者#1的访谈记录）

在我的备忘录中我这样写道：

这位妇女在描述她的“疼痛经历”，即她如何体验疼痛以及疼痛的减轻。描述是从她的视角，反映了她的经历，而不是对疼痛的任何目标性测量。在她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她表达了自己疼痛的“强度”“位置”以及“持续时间”的属性。我们注意到她的“疼痛减轻”源于温暖和夜晚，而且她不愿意吃药。当她说疼痛有时“真的很糟糕”时，她给了我们“疼痛强度”属性的一个维度。她告诉我们，疼痛的“位置”是在她的手上，而且疼痛有“很长的”持续时间，持续一整天。“在温暖的条件下”“疼痛减轻”是可能的。至少这一点在她的“疼痛轨迹（pain trajectory）”中使用药物治疗的可能性被打消了。疼痛的所有这些属性包括控制和减轻都是她“疼痛经历”的一部分，这当然是非常个人化的。

---

* 每一个备忘录后面括号中找到的编码都允许使用者很容易地在备好的MAXQDA项目中找到该备忘录，你可以在下面的网址找到该项目：http://www. maxqda. com/Corbin-BasicsQR 或者 www. sagepub. com/corbinstudysite。你还可以在屏幕截图6中看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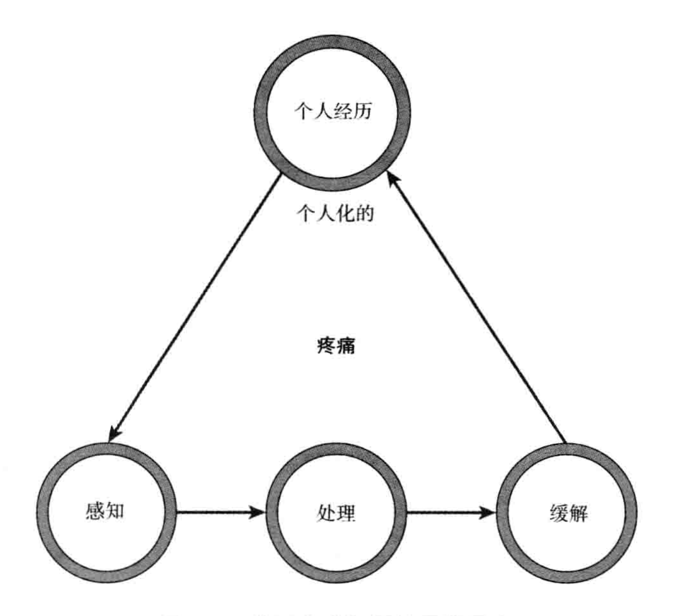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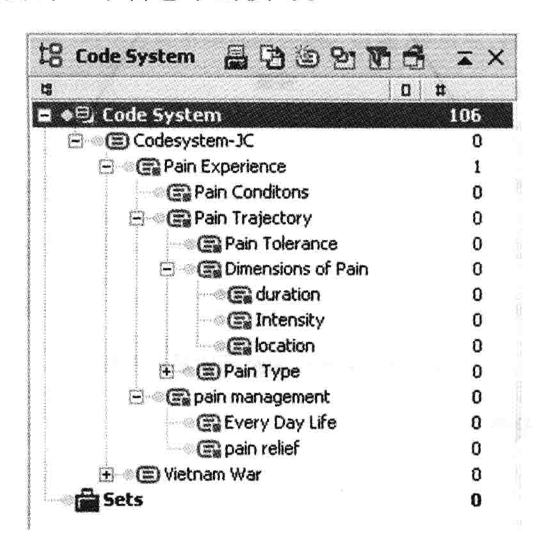
图 6.3　关于疼痛经历的早期图表

对备忘录和图表的评论

上面的备忘录和图表并不复杂或广泛。但它们确实让我们开始了我们的分析。我们有一个概念,"疼痛经历",而且我们已经找出了这位妇女"疼痛经历"的某些属性和维度(强度、持续时间、位置)。我们还有"疼痛处理(pain management)"和"疼痛减轻"的概念。现在我们可以回到资料寻找对她"疼痛经历"的进一步描述,既可以在同一访谈中寻找,也可以转向其他研究参与者的访谈,并对二者的描述进行比较。或者在做后者之前,我们可以针对上面的田野笔记撰写额外的备忘录,以帮助我们思考,当我们回到田野做另外一个访谈时我们想要寻找什么东西。这里,我们想要指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每一位分析者必须选择他或她要达到的分析深度以及他或她愿意投入多少时间到研究中。我们不想过分简化分析过程,但我们也不想用备忘录的撰写来吓唬我们的读者。我们,即作者,在前面的备忘录完成之后继续撰写备忘录,直到我们没有思想可写时为止,因为这就是我们的研究方式。但是每一位分析者都有他或她自己的取向、风格及工作节奏。本书中,我们提供的信息除了对新手研究者有用外,希望对有经验的研究者也有用。如果我们没有提供一定范围的既复杂又不复杂

的备忘录，我们就会有损我们的读者。我们将其留给读者去决定他们分析要达到的复杂程度，以及他们愿意在备忘录撰写方面投入多少时间。

在撰写上面的备忘录之后，我们继续我们的分析，从第一个备忘录转向另外一个备忘录的撰写。



屏幕截图 7　　编码系统的层级可以用来扩展类属的维度。而且，你可以在 MAXQDA 的绘图工具，MAXMaps 中绘制你的编码。你的 MAXMap 中的资料和图表呈现是形象生动的；这意味着你可以在 MAXMap 中打开编码，查看和输入编过码的材料以及备忘录等。而且，你还可以使用绘图工具而无须考虑你的资料，并且可以研究任何对象来展示你的思想和概念，就像图 6.3 中展示的 MAXMap 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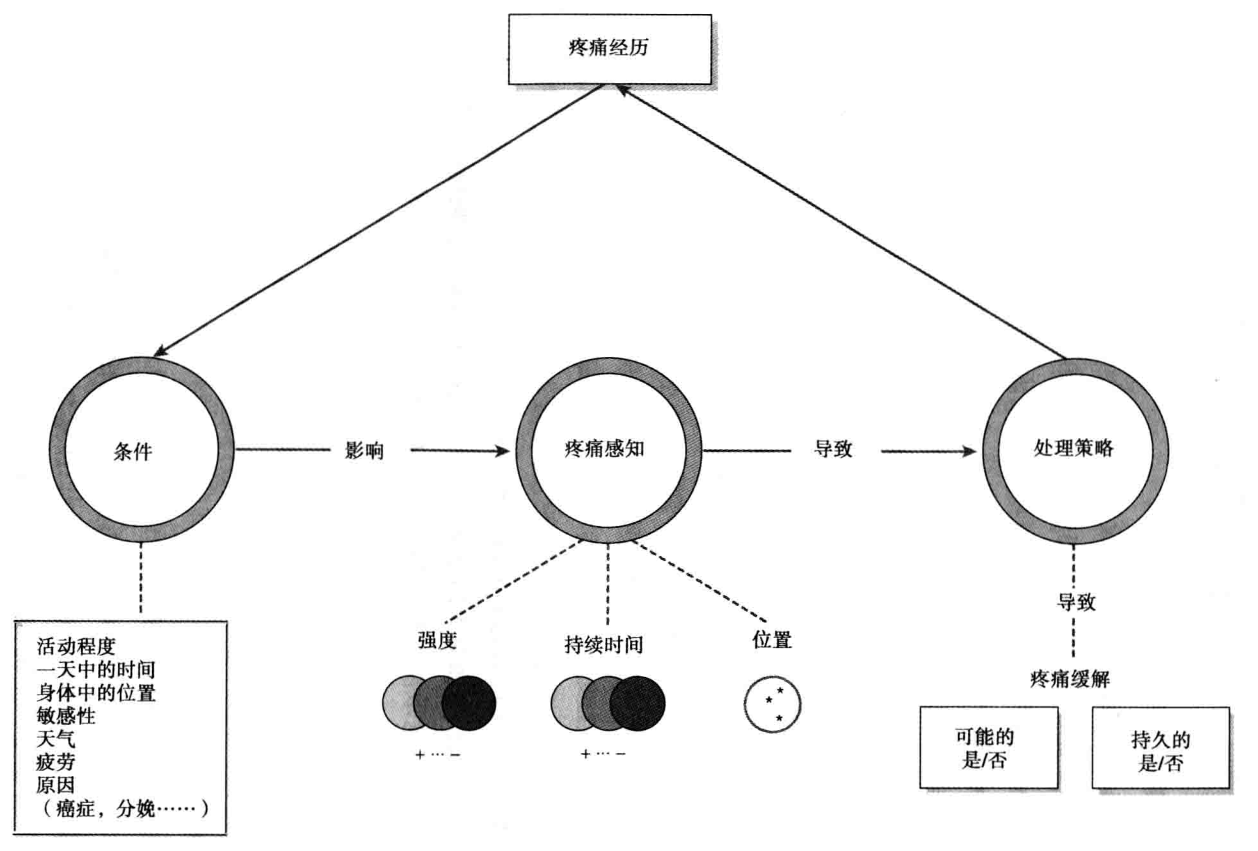


图 6.4 疼痛经历的未来发展

备忘录2 一个寻找/形成概念/类属属性和维度的备忘录样例 1997.4.4

疼痛经历

从上面的备忘录出发,我们可以假设,疼痛在"强度"上可以有维度上的变化,"从严重的到温和的",它们可以在身体的任何地方以及不止一处"发现",而且疼痛可以"持续"一小段或很长时间(持续性),在整个过程中它可能是持续不断的、间歇性的或暂时性的。这给了我一个维度范围,所有这些维度都进入到"疼痛经验"中。而且有这样的疼痛以及对于某些人,有可能在某种情况下"得到缓解",这样"疼痛缓解"会发生变化,从"可能"到"不可能",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这些都取决于这个人、疼痛的类型或原因,以及个人对它的反应。要使它变得更加复杂,疼痛的"感知"或"疼痛经验"似乎会根据很多因素或条件而变化,如疼痛在身体中的"位置"——有些地方比其他地方更加敏感,"活动的程度""时间(time of day)"以及甚至像天气这样"奇怪的事情"。最后,还有疼痛的"持续时间"属性。持续时间可以在维度上发生变化,如"继续不断的""间歇的"或"暂时的"。在上面的案例中,你可能会说,疼痛是"间歇的"。但是疼痛的所有这些维度或属性的变化形式是如何进入到"疼痛经验"中的呢?而且,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疼痛对人的意义是什么?嗯。疼痛的"主观性体验"融入很多因素,这取决于我如何将它们从资料中梳理出来。其他影响疼痛体验但不是从该田野笔记中提炼的因素是"疼痛历史"和"疼痛缓解"的当前体验及以前体验,以及你相信缓解在未来是否有可能。哦,上帝!疼痛缓解和治疗是我还没有探究但却是在该研究结束之前必须要探究的领域。随着我继续收集资料和分析访谈,我将在资料中寻找这些领域。

对备忘录和图表的评论

在这个备忘录和图表中,我们将展示出疼痛可能的维度以及它们如何与"疼痛经历"联系在一起。注意备忘录和图表反映了对该题目的一种系统性思考,而且它们都来自真实的资料。分析者要用资料来激发思考。备忘录还有一个重要作用是,它们促使分析者对资料进行提问,而且如备忘录中所指出的,这些问题反过来又指导理论抽样。当分析者转向资料收集时,他或她会对分析中提出来的那些领域逐渐

敏感起来,仔细倾听人们如何描述他们的疼痛经历,包括疼痛的历史,疼痛缓解的体验以及治疗情况。这些思想都需要通过资料收集进一步探究。

这是另外一个备忘录和图表,是在同样的田野笔记中撰写和绘制的。这个备忘录和图表比先前来自于资料的备忘录更具有推测性,而且它们的目的是为理论抽样指出方向,以及帮助分析者打破阻碍思维的常规分析思路(analytic ruts)。分析者在头脑风暴备忘录或图表中提出的思想不会放到研究中。

备忘录3 一个对备忘录进行比较和提问的样例 1997.4.4

关于"疼痛经历"及其属性和维度的头脑风暴备忘录

从我的个人经验、专业训练和文献着手,我知道关节炎当然不是疼痛的唯一原因。你还可能会因为受伤而疼痛,例如肌肉拉伤或有点儿烧伤。那么疼痛在"类型"上会出现变化,从"灼痛(burning)"到"剧痛""缓痛(dull)",甚至"刺痛(throbbing)"。可以将其描述为"可怕的(horrible)""势不可挡的(overwhelming)""破坏性的(disruptive)"或只是一次"刺激(irritant)"。疼痛是"感知的"。这意味着,如果恰好有一种测量疼痛的客观方法,那么两个有同样客观疼痛的人,他们体验疼痛也会不一样,因为他们是不同的个体,正因如此才给了他们不同的疼痛体验。有些人在手术后需要大量的药物治疗,也有些人则只需要很少的药物。这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疼痛阈限(pain threshold)"和对疼痛的不同"反应(reactions)"。另外,"疼痛经历"有一个"轨迹"或过程。疼痛体验并不是从这次疼痛开始的,而是回到过去,有一个当下体验,然后进入下一个疼痛体验。而且这种特殊的疼痛体验会随着时间而变化,更加强烈或有所缓解。因此,我现在有了一些理论抽样的思想,例如将寻找时间情境与慢性疼痛进行比较,将强烈疼痛与更加温和的疼痛进行比较,以及将包括缓解的疼痛历史与历史上令人不满的疼痛处理方式进行比较。正如我所思考的,疼痛体验受到众多因素联合影响,例如强烈性、持续性以及它是否能够部分、完全、永远或暂时地缓解,包括历史。我记得有一位妇女,她患有永远也无法摆脱的孢疹后(post-herpetic)疼痛。她最终不是死于疼痛本身,很可能是被疾病折磨得筋疲力尽。她寻求缓解疼痛的历史是一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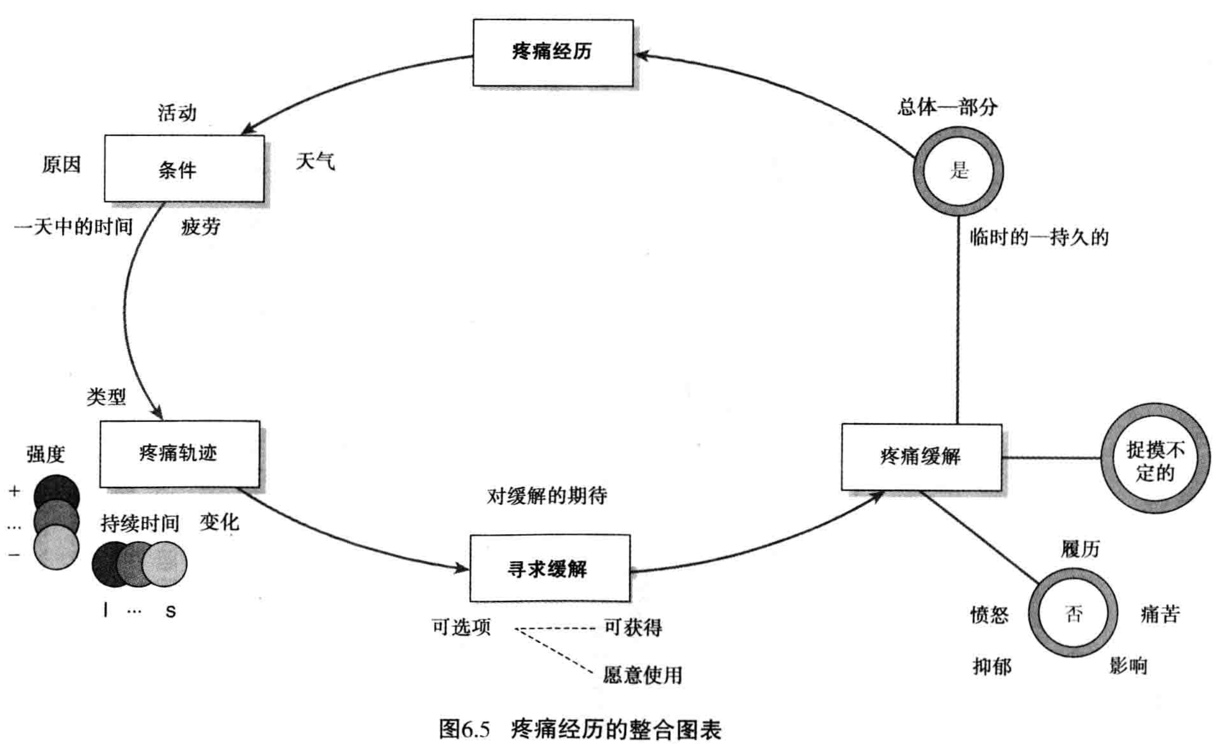


图6.5 疼痛经历的整合图表

很长的历史。最后，她只能学会与疼痛相处，并且觉得每天与其战斗已经行不通了，她知道了疼痛的意义和对日常生活或个人生命的启发。我知道，要发现疼痛与其属性、疼痛缓解及疼痛经历之间的关系，我有很多工作要做。当我将其作为样本时，我还有一些问题想要问。我应该研究患有“慢性疼痛”的人。正是慢性病的属性驱使我收集关于个人的资料，例如那些患有风湿性关节炎、孢疹疼痛、镰状细胞性贫血（sickle cell anemia）和癌症的人。我还应该研究那些“暂时”疼痛的人。这里，促使我收集的原因正是因为疼痛是“暂时的”这一属性。我应该去找那些经历过分娩、手术或受伤疼痛的人，去研究暂时性疼痛。灼伤和截肢都是很有意思的研究领域，因为这种疼痛可以是“暂时的”或“长期的”，这取决于其并发症。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疼痛经历的各种类型有哪些？有各种经历疼痛的类型，它们涵盖了所有这些属性吗？疼痛的意义是怎么来的？预期的疼痛与预期之外的疼痛有什么不同？得到缓解的能力或可能性会有什么不同？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期待着或相信治疗会带来缓解，或者相信虽然治疗但不会有任何缓解，这两种体验有什么不同？如果疼痛是意料之中的，有哪些措施用来防止或缓解疼痛？个人是如何控制它们的生活或活动来尽可能减少疼痛？像文化、年龄、性别如何影响疼痛？疼痛持续了多长时间？强度如何？努力缓解是如何影响疼痛体验的？

对备忘录和图表的评论

上面长长的备忘录和图表并不完整，但是它们确实展现了研究者是如何通过比较的方式对“慢性的”和“暂时的”疼痛进行思考，从而拓宽了自己思考的属性与维度，然后才回到田野。这里的想法是要收集关于这两种极端情况的资料，然后对这些资料进行比较，看看属性和维度是如何变化的。理解像“疼痛经历”这样的现象，它在本质上非常复杂而且是个人化的，需要大量的思考以及从各种领域来收集资料。在上面的备忘录和图表中，读者还能够看到，当他或她分析资料时，类属和次级类属是如何围绕一个现象，如“疼痛经历”而建立起联系的。但是要想将备忘录或图表中任何假设的东西放进研究发现中，研究者就需要收集资料并进行必要的比较。

备忘录4 一个深入说明范式的备忘录样例:条件、行动/互动和结果之间的关系 1998.6.18

一个更加深入的(Advanced)关于疼痛体验的备忘录

经过几个月资料收集和将自己沉浸在他人的疼痛故事中,最后要讲述的是怎样一个疼痛故事呢?我想,这个故事有点儿像下面这样。除非疼痛"非常温和"而且"持续时间很短",否则疼痛是一种很难熬的体验。每次我做访谈时,我都能够感受到那些正经历"剧烈疼痛"的人们"苦难"的"强烈性",就像他们谈论的体验一样。这些人被迫去寻求"缓解",但是缓解常常是"捉摸不定(elusive)"(能够缓解疼痛的维度会变化不定,从缓解"能够实现(obtainable)",一直到"捉摸不定")。寻求缓解常常让他们不惜一切代价,情绪会因为很多原因(对疼痛的情绪反应特征)而出现从"愤怒"到"沮丧"等不同的变化。甚至对他们的生活和他们"忍受"的"苦难""失去了控制"。虽然有很多"治疗方法可供选择",但是找到一种有效的方法并不容易。这里会牵涉很多"试错策略"。当疼痛"长时间持续(long duration)"而且人们"疲倦了(fatigued)"或者被它的"顽固性(constancy)"折磨得疲惫不堪时,"疼痛容忍(pain tolerance)"似乎变小了,这是一个有趣的概念。"寻求缓解"可以和夜晚在黑暗的森林中迷失作比较,就像一个人试图找到一条路,作为一种逃避,但是这条逃避的小路却被堵塞了,而且在黑暗中很难确定其位置。有时候人们变得"绝望",想知道是否苦难就要结束,有时候希望以死来"逃避"疼痛。疼痛能够"剥夺"生命。有时候生活是围绕着一段段的疼痛和缓解而"循环"的。"每天的生活"在这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因为疼痛对每天的生活都会产生潜在的影响。每天的生活有可能"很少地"或"极大地"被破坏。人们寻求缓解不仅是为了"摆脱"痛苦,而且还为了能够"继续"他们的生活。疼痛是一种个人体验,所以很难描述,急性暂时性疼痛与慢性剧烈疼痛差异很大。我确实看到了一些模式出现。有那么一些人他们体验过"急性暂时性疼痛"。他们的疼痛体验可能非常强烈,但是当情况过去后,这种强烈紧张时刻就被忘记了。对他们疼痛体验的界定是通过如何处理这些疼痛以及如何获得控制疼痛的处理方法来进行的。在这个小组中的有些个人将疼痛体验描述为可怕的,或者无法应对的。

还有一些人并没有将其描述为这么糟糕。无论疼痛经历是什么,它都成为个人"疼痛历史"的一部分,在未来疼痛的时段中,重新发挥作用,无论是急性疼痛还是慢性疼痛。有一些人,他们遭受的是"慢性疼痛。"他们已经形成了控制其强度和对日常生活影响的应对策略。他们通常称他们的疼痛是可以忍受的,虽然他们宁愿没有疼痛并继续寻找治疗方法。他们的疼痛体验受到别人支持和认可及自己的愿望影响,即他们所接收的来自他人的支持和认可以及对希望该情境是暂时的,这样的愿望形成了他们的疼痛体验。还有其他途径向他们敞开着。因此有这样的群体,对他们而言"每天"都是一种"疼痛体验",他们是"永远的疼痛患者。"受苦就是他们的生活。每天的活动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沮丧是适度的而不是严重的,正如你所期待的。这种情况几乎无法改善。他们的故事令人同情。

备忘录5 形成故事线索的备忘录样例 1998.6.20

探究故事线索的选项

我问我自己,将各种各样的材料整合起来的主要概念或故事线索是什么?我感到困惑不解。我知道有"寻求缓解",但是这似乎只是一个逻辑的或普通的解释。必须有一个更好的解释。我想集中于疼痛经历本身,疼痛是什么样子的,无论是遭受暂时性疼痛还是持久性疼痛。我不断回到夜晚森林和黑暗的想象,这能够让我想起疼痛体验,在黑暗中,既在身体上又常常在精神上遭受害怕、障碍、疲倦和沮丧。有"**在疼痛的黑暗中漫步**"或"**疼痛,一个受苦的故事**"的想法,但这两种思想似乎都无法很好地捕捉其特征。然而我还是无法将这种感觉写出来。我只能继续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希望有合适的概念出现。

对备忘录的评论

正如读者可以看到的,虽然分析者是想要把事情考虑清楚,但备忘录确实漫无主题(do wander)。有时候,分析者还没有准备好就对重要主题绘制整合性的图表,因为他或她还没有一个统整性的框架。备忘录表达了分析者自己的情感和挫折,他们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有一种内在感觉,但同时却无法将其表达出来。不能绘制完成图表说明了分析者仍然还有很多需要思考的。撰写备忘录和绘制图表促使分析者

一直努力寻找“合适的”概念化形式（conceptualization）。这就是为什么备忘录和图表是如此强有力的工具。注意与那些在研究早期形成的备忘录相比较，备忘录和图表以及本章后面的备忘录是如何展示对疼痛体验的进一步思考的。

备忘录整理

当我们考虑整理备忘录的时候，我们头脑中出现的形象是，一个没有经验的研究者站在那里，手里是大把大把的备忘录；然后，将它们一张一张地散落一地，落得地板上到处都是。结果是一堆堆的备忘录代表着一种对概念的随意整理。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这种感觉，尤其是当我们沉浸在概念当中，但却无法理解它们如何组合到一起的时候。

然而那些有经验的人都知道，研究最终却是有结果的。经过几个月的资料收集、分析资料、撰写备忘录以及绘制图表，对资料是什么就有了内在感觉或者“直觉（gut feeling）”。很难解释，为什么我们的研究参与者的故事成了我们的一部分。并不是因为我们有慢性病，或我们是瘾君子、赌徒或新妈妈。而是我们听了他们的故事，观察了他们的行动，感受了他们的情感，承受了他们的负担，所以我们理解这在他们那里是什么样子的。要将最终的故事综合为几句话也许并不容易，但故事却在我们的头脑中。通过我们对备忘录的整体阅读，我们可以写一个描述性的故事。然后使用到目前为止我们形成的类属/主题，我们可以将我们的描述性故事转变为分析性故事。是的，该故事或理论（如果理论是我们的目的）是一个建构物，但建构物却扎根于资料。

由于建构了一个故事线索，研究者就可以在研究课题、同事、委员会成员、朋友、配偶及同伴的帮助下尝试设计出框架。最后备忘录组合成为特定的话题以及一个整体使得研究者能够详细地写出每一个话题并呈现一个整体故事/理论。

要点总结

当分析者坐下来分析那些第一手田野笔记时，他们常常会被面前的任务压得喘不过气来。对于新手来说，他们很难知道从哪里开始，寻找什么东西，或即使看到了也不知道如何认出“它”。

纸上的文字看起来就像毫无区别的一团,很少有区别或有意义,除非特别明显。这对我们所有的人都一样,因此,你如果有这样的感觉也不要担心。我们的建议是,拿起第一份资料,坐下来,然后撰写备忘录。不要担心那些最初的备忘录或图表看起来是什么样子。这种早期的困惑和不确定反应在备忘录和图表中是很正常的。记住,研究者无论在备忘录中写什么或在早期的图表中放进哪些东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开始了分析。

早期分析是获得洞见以及提出最初的概念。为了理解资料的意义,你必须首先“咀嚼”它,“消化”它并“感受”它。研究者必须担当起他者的角色,试着从参与者的视角理解这个世界。这可以在备忘录中做。备忘录和图表是分析的基本方面,无论研究的目的是描述还是理论。正如前面解释过的,备忘录和图表不只是编码的储藏室。它们激发并记录分析思考的过程,并为理论抽样指出方向。

进一步说,没有备忘录和图表,我们就无法跟踪随着研究进展而逐渐形成的复杂思想和累积起来的观念。图表是概念之间关系的直观呈现。图表的目的是为了帮助而不是阻碍分析进程。它们也会随着分析的进展而发展并变得更加复杂。有些人比别人更善于绘制图表。如果你绘制图表有困难也无须担心。有些人只是不是视觉直观型的。

最后,我们想说的是,没有任何规则规定如何撰写备忘录或绘制图表。每一个分析者都是通过研究过程发展他或她自己的类型。无论备忘录还是图表后来都非常有用,在写作发表以及汇报研究的时候。

思考、写作及小组讨论活动

1. 翻到附录 A 中的田野笔记。现在开始分析资料,将你的思考写在备忘录中。试着写出各种不同的备忘录,使用本章提供的备忘录作为模板。自然,只有这么有限的资料,你无法写出一个整合性的备忘录,但是你应该能够写出一些你已经发现的概念

以及这些概念的一些维度和属性。

2. 绘制几张图表,提纲挈领地反映你的分析。
3. 然后带几份备忘录和图表到小组讨论会上,和小组其他成员对其进行讨论。
4. 每一个小组成员可以拿一个备忘录来讨论。
5. 在小组讨论的基础上,撰写一个小组备忘录,总结所有的思想。
6. 绘制一张小组讨论的图表,将所有的思想放在一起。

7

理论抽样

最高产的科学家并不满足于澄清当前的问题，虽然已经获得了某些新知识，但他们是利用这些知识揭示更深层的，通常也是更重要的东西。（Beveridge，1963，p. 144）

框 7.1　术语界定

饱和：饱和通常理解为“没有新的资料出现”。但是饱和不只是一个没有新资料的问题。它还指类属在其属性和维度上的形成发展，包括变化形式，而且如果建构理论，还包括概念之间关系的描述。

理论抽样：一种建立在概念/主题基础之上的资料收集方法，这些概念/主题也来自于资料。理论抽样的目的是从地点、人物和事件来收集资料，最大化地从属性和维度上形成概念、揭示变量以及寻找概念之间的关系。

导 论

有时候作者不知道将材料放在书的什么位置。本章也是如此。理论抽样的概念也许更容易理解,如果读者看到它如何在研究过程中发挥作用,不过这是一个程序上的技巧,在阐述有关分析的章节之前,了解它是非常有必要的。也许最好的方法是建议学生阅读本章两次——一次是在阅读第 8 章到第 12 章之前,再一次是在阅读那些章节之后。我们将什么时候以及如何阅读本章内容留给读者和教师自己决定。

转到本章,分析者面对的一个主要论题是知道要收集什么资料、什么时候收集、在哪里以及如何收集。本章探讨理论抽样的概念,一种建立在概念/主题基础之上的资料收集方法,这些概念/主题也来自于资料。使得理论抽样与传统抽样方法不同的是它是对资料的回应(responsive to the data),而不是在研究开始之前确定的。这种回应方法让抽样变得开放并富有弹性。概念是来自分析中的资料,围绕这些概念的问题推动了新一轮的资料收集。研究过程通过研究过程本身来充实。它只是不断地往前推进,通过它自身的力量驱动。而且,理论抽样不是用来对有关概念的假设进行验证或检测,理论抽样的目的是用来揭示相关概念和它们的属性和维度。在这种形式的研究中,研究者就像一个侦探。他或她循着概念的指引,从来不知道概念会将自己引向何处,但总是对可能的发现保持敞开。

本章要阐明的问题包括:什么是理论抽样?理论抽样比其他形式的抽样有什么样的优势?研究者如何进行理论抽样?如何保持抽样系统的一致而又不僵化?研究者什么时候进行理论抽样?研究者如何知道已经有了足够的抽样?

记住概念是分析的基础,无论研究的目的是描述还是理论。在资料中作为抽样的是概念。参与者提供的资料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些概念。因此,当研究者进行理论抽样时,他们要去那些提供他们想要知道的关于这些概念信息的地方、人物和情境。乍一

看,理论抽样似乎与研究者所学习的抽样方法相矛盾。传统的抽样方法让研究者思考抽样人群和控制变量。但是在理论抽样中,研究者考虑的不是抽样人群而是概念。研究者要有目的地去寻找这些概念的标志(indicators),从而让他或她可以检查这些资料,以便发现概念在不同条件下是如何变化的。因此,在第一次遇到理论抽样时新手感到困惑就毫不奇怪。

不像传统的抽样方法,研究者不是出去收集好所有的资料才开始分析。第一天收集了资料之后就可以开始分析。资料收集引导分析,分析引出概念,概念提出问题,而问题则需要进一步收集资料,从而让研究者能够对这些概念有更多的了解。这一循环过程一直延续到研究达到饱和为止,也就是说,直到所有的概念都被很好地界定和解释为止。

对于理论抽样,到什么地方去收集资料,具有很大的弹性,分析指出去什么地方收集资料最丰硕,就要去什么地方,这样就能够回答分析中产生的问题。当然,研究者可以从一般的目标群体开始研究,并继续从这个群体中抽样。在第 8 章之后以及在整个 12 章这些分析章节中,我们将带着读者阅读一个研究项目,用越战老兵作为目标群体。读者将会看到,在对第一次访谈的分析之后,源于访谈的概念和有关这些概念的问题就成了进一步收集资料的基础。

理论抽样是建立在资料收集和分析两者齐头并进的基础之上。换句话说,资料收集永远不要超过分析太多,因为后面资料收集的焦点,即在后面访谈或观察中要提的问题,都是建立在前面分析发现的基础之上。

现在,研究者必须要实际。很多时候,研究者必须利用先前收集的资料或必须在一个限定的时间内收集资料。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研究者必须要外出寻找参与者或者必须利用这样的机会。这种方法的问题是,当真正分析时,以及问题像它们通常那样出现时,研究者可能就没有机会去收集一个概念的其他资料,从而在研究中留下了缺口。在本章的后面,我们将会说明,如果研究者不能收集到其他资料,他或她可以怎么做。但首先让我

们还是来回答一些重要的问题。

关于理论抽样的问题和回答

(1)理论抽样与其他形式的抽样比较有什么优势?

理论抽样是概念驱动的。它能够让研究者发现与该问题和群体有关的概念,并且允许研究者深入地研究概念。当研究新的或空白领域时,理论抽样特别重要,因为它为探索发现提供了空间。最重要的是,它能够让研究者好好利用偶然事件。思考下面的例子,它来自我们的关于医院工作的研究。该研究的一个主要主题是"工作流程(workflow)"。在我们收集资料的时候,发生了一场里氏7.4级地震。该自然事件为我们提供了一次机会,让我们有机会回到我们的现场获取应对"偶然事件"的"工作流程"的例子,并检验我们关于偶然事件如何"打断"工作流程的假设。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工作流程被改变了吗?如何改变的?以及新的安排是如何提出来,从而让病人的护理工作得以继续?结果非常有趣,因为我们发现,工作流程并没有中断很长时间;实际上,它很快就恢复了,虽然有时候会有创新。假如我们使用了更加传统的抽样方法,我们可能无法利用这样的情景。

另外一点是,理论抽样是累积性的。抽取的每一个事件都是建立在前面资料收集和分析的基础之上,反过来又有助于后面的资料收集和分析。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抽样变得更加具体,因为随着研究者想要让类属更加饱满,他所提的问题就变得更加具体。在最初的资料收集中,研究者是在一个非常广泛的领域收集资料。这有点儿像钓鱼,因为研究者希冀着某些东西,但却并不知道海量的资料中会出现什么。一旦有了初始的分析,分析者对研究走向何处就有了更好的感觉,因为现在研究者有了一些概念,可以围绕这些概念进行抽样。并非每一个从研究中提取出来的概念都要用做抽样。研究者必须要实际,而且坚持发展那些最重要的类属或主题。

(2)研究者如何进行理论抽样?

在做理论抽样的时候,对于资料收集,研究者一次只收集一部分,紧跟着就分析,随后是进一步的资料收集,直到一种类属达到"饱和"点。在理论抽样过程中,研究者必须让分析引导研究。研究者必须提问,然后寻找最好的资料来回答这些问题。虽然人类研究对象和论文委员会成员(human subject and dissertation committees)想提前知道抽样要抽取哪些人或群体,以及研究将对这些参与者提出哪些问题,但理论抽样很难对这些进行准确预测。研究者使用理论抽样从来不知道研究将会遇到什么样的曲折。我(科宾)不知道什么时候第一次与越战老兵进行访谈(见第8章),我准备要开始的研究会走向何处。然而,我可以确定地说,虽然研究题目的方向很大程度上还是未知的,但是我的研究却聚焦在越战老兵身上。我们将在关于撰写研究计划书的章节里更加详细地阐述这个问题。

理论抽样的步骤很简单:研究者循着分析的轨迹就可以了。在第一次访谈期间,参与者(一名护士)将他在越南战争的体验描述为"不是太糟糕"。这使得研究者要询问"为什么?"以前,我听到的越战老兵和其他战争的老兵都是说战争是多么糟糕,那么是什么使得他的体验没有如此糟糕呢?可以将这样的差异归因于该参与者不是一名"战士"吗?鉴于这样的洞见,研究者开始去访谈"战士们",看看这在"战争体验"中是否确实不同。

第二次是访谈了一位战士。访谈表明在参与者如何谈论"战争体验"中有相当大的差异。

在这次访谈分析中,令研究者吃惊的是,战士的战争体验集中于"生存"的问题之多和程度之深,以至于在30年后退伍老兵所讲的故事中依然存在没有解决的问题(缺乏"治疗")。这使得研究者提出这样的疑问:长久以来为什么有如此多的"愤怒"?是什么样的"战争体验"产生了愤怒,为什么会有缺乏"治疗"(lack of "healing")和沉默之墙(wall of silence)的出现?没有回答这些问题意味着我必须要去了解更多有关战争本身的体验,这促使我

去阅读越南退伍军人的回忆录。我还阅读了老兵护士撰写的回忆录,以获得比较的基础。此外,我还研究了其他类型的战士,例如飞行员,询问他们经验的本质。

在大量的资料分析之后,越战“文化”似乎呈现出相当大的关联。因此我又回到资料,但这次不是找回忆录,我找的是历史资料,去寻找更多关于“战争文化”的资料。分析有关“战争文化”的资料发现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通过其带给战士们的“危险”对他们的“生存”构成了威胁。这一发现导致了要进一步的检查“生存危险”的概念以及战士们以前克服困难和降低危险的策略。基于这些发现,我想知道更多具体的“生存情景”以及人们对它们的反应方式。继而是最后一个问题,即我可以用什么概念把这些材料整合在一起。答案就在“整合多重实在(reconciling multiple realities)”这样的概念形式中。

注意,当我开始进行研究时,我总是遵循前面分析的引导。我不可能提前知道我将会采取的抽样路径(sampling path),但是我却始终保持在我的目标群体之内。正是这些资料分析和分析中产生的有关概念问题决定了我需要收集什么样的资料以及我要注意这些资料中的哪些方面。其他研究者可能选择了另外一个方向,但任何阅读过我的分析的人都能理解我的逻辑。本研究的方向取决于资料的性质和分析者对资料的解释,它将研究者和资料一起带到过程中。

(3)研究者如何保持抽样的系统性和过程的一致性而又不僵化?

在理论抽样中,由于循着重要的理论路径,研究者并不是十分关注一致性。由于在分析过程中会出现新的分析线索(概念),所以研究者希望随意跟踪一些问题而不用担心这些问题是否询问过前面的参与者。与此同时,一致性通常不是个难题,因为当人们讲述他们的故事时通常都有很大的一致性。我从阅读越南战争回忆录中得到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是,每个回忆录似乎都有一个相同的基本形式——对生存的渴望,尽管很多细节不同,这是必然的。记住:资料中来自一位参与者的相关概念几乎总是会在

其他参与者的资料中发现，虽然他们呈现的形式可能不同。如果在其他资料没有发现，研究者就要问“为什么没有发现？”如果在一个非结构化访谈或观察分析结束时，相关的话题没有覆盖到，研究者当然可以就此提出问题，特别是如果他或她觉得这些话题与研究相关。

(4)必须做多少抽样？

这个问题的答案既简单又复杂。简单的意思是，研究者不断地收集资料直到资料达到“饱和”的程度。复杂的意思是，资料达到饱和并不容易。饱和通常理解为“没有新的类属或相关主题出现时。”但是饱和不仅仅指没有新的类属或主题出现这样的问题。它还指类属在其属性和维度上的形成发展，包括变化形式，以及它们可能与其他概念的关系。换句话说，研究的目的不仅仅是提出一个类属清单。研究还要对这些类属说一些什么。研究者提供的理解必须要超越表面的解释。换句话说，仅仅告诉人们战士们在战争中的体验可以归结为生存，这是不够充分的。研究者必须解释生存如何及何时呈现其意义，在不同的条件下生存是什么样的，以及生存的某些后果是什么。

只有当研究者已经在一定深度上探究每个类属/主题，找出了不同条件下其各种属性和维度，研究者才能说该研究已经达到了饱和的水平。事实上，研究者可以继续不断地收集资料，为类属增加新的属性和维度。最终，研究者必须要说，就该研究的目的来说，这个概念已经发展得很充分，并且将没有涵盖的部分视为研究局限之一。每一个研究者必须要意识到不能过早地对研究下结论。有时候，当研究者说他们的类属已经饱和的时候，他们的真正意思是“他们”认为资料收集过程饱和了。他们要么时间、经费用完了，要么精力没有了，因此，提前结束了不该结束的研究问题，给整个故事留下了一个缺口。所以，五到六个小时的访谈就会饱和，这是令人怀疑的。

(5)研究者什么时候进行理论抽样?

理论抽样开始于第一次分析之后,并贯穿于整个研究过程。只有当研究过程结束的时候才终止。甚至在撰写研究报告的时候,研究者又有了新的洞见,发现一些类属比其他类属发展得更加充分,或者发现整体逻辑上的断裂,需要进一步收集资料,这些都是很常见的。

(6)研究者如何知道什么时候抽样已经足够充分?

当主要的类属显示出它们发展的深度和变化时,研究者就知道抽样已经足够充分了。尽管完全饱和(全面发展)可能永远也无法达到,但是如果研究者认为一种类属为理解一个现象提供了相当深度和宽度的信息,而且与其他的类属之间的关系已经被澄清,那么他或她就可以说抽样已经足够充分,研究已经饱和。

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应该好好利用发生的偶然事件。然而,研究者通过理论抽样收集的任何资料都必须与分析相关。换句话说,如果研究者正在一处设备里进行观察,这时一个重要的管理人员死了,那么,这里涉及的问题不是管理人员的死亡本身,而是死亡在研究者正在研究的"工作流程"上的意义或其他概念上的意义。

当新手研究者外出在田野中的时候,他们很容易被牵着走,因为有许多有趣的事情正在发生。如果研究者使用来自前面观察结果的概念为向导的话就会有所帮助。让在分析中形成的问题和概念来引导资料的收集。就因为某人说,"如此这般"难道不是很有趣吗,这种说法不应该成为"徒劳无益"地就派研究者去的理由。保持专注,寻找那些可以提供有关正在研究的概念的变化形式或不同的情景,然后从这里进行理论上抽样。各种条件中的变化形式会极大地增加发现概念新属性和维度的机会。

(7)如果在我坐下来做分析之前我已经收集了我的所有资料,我还能做理论抽样吗?

答案是肯定的,虽然这可能更为困难。现在我用回忆录作为研究越战中退伍军人的资料,我在后面会呈现,所以使用已收集到的资料是可以做到的。记住,理论抽样是以概念为导向的资料搜集和分析。有关概念的问题起着指南的作用,指导在后面的资料中寻找什么样的事件。因此,研究者可以对已收集的资料进行抽样或提供事件用于修饰一个概念。回到前面已经分析过的资料,并用一种崭新的视角看待它,这是很常见的事情。指向一个概念的事故或事件在早些时候可能已经被忽略了,因为这些事件的意义可能没有被当时的研究者很好的理解。研究者可以时常回到先前收集的资料去看看丢失了什么。当分析先前收集的资料时,一个警示的词语可能就是研究中的缺口,因为没有再进一步探究的机会了。如果研究者被某些资料困住而无法进行研究,那么他/她必须要想办法。这并不意味着研究就缺乏意义或者会肤浅。研究者可以作出一个高水平的分析,无论他/她所拥有的资料是什么。

(8)研究者从哪里获得样本?

在寻找抽样领域过程中,分析者选择确定哪些资料能够最好的回答问题以及帮助补充有关类属的知识。在继续这一思想之前,请让我们澄清一点。关于越战老兵的研究将在下一章进行介绍,很明显,为了发现每个战士战争体验之间的不同,我不得不出去寻找一群战士。我确实获得了几个访谈,但当时无法获得更多的访谈。所以,我去回忆录中找寻我的答案。可是,当时我感兴趣的是它的情境,我去了解历史文献,因为它们会为我正在寻找的美国怎样加入战争及其原因这个问题的答案提供一种类型的资料。然后,当我需要更多关于生存概念的信息时,我又回到回忆录。我回到这些资料,专门看我标记"生存"字样的事件,然后更加深入地进行分析。有时,为了理论抽样,研究者必须收集更

多的资料;有时,研究者也可以回到那些已经收集的资料。

(9)开始研究之前,研究者必须考虑的抽样事项有哪些?

在研究开始时,有些抽样事项研究者必须考虑。一个项目的最初决定给予研究者方向感和一个资料收集的地方。曾经有一次正在进行的资料收集碰巧就变成最初的决定,变成了一个非常适合揭示资料的事情。最初的考虑包括:

(a)**对要研究的场所或群体作出决定**。当然,这是以主要的研究问题为导向的。例如,如果研究者对主管们的决策感兴趣,他或她则必须去主管们正在做决策的地方去观察到底发生了什么。

(b)**对要使用的各种资料作出决定**。研究者想使用观察、访谈、文件、回忆录、传记、音频或录像带吗?或者使用它们的组合吗?这个选择的确定应该基于哪些资料,才能够有潜力最大限度地捕获那些渴望得到的信息?例如,要研究主管们制定决策的情况,除了访谈和观察以外,研究者可能还想使用回忆录和其他书面文件。如果正在研究团队之间的相互作用,除了访谈以外,观察是唯一合乎逻辑的,因为观察更有可能揭示这些微妙的互动。

(c)**对一个场所应该要研究多长时间作出决定**。只要一个场所可以提供研究者正在寻找的资料,就要研究它。记住:我们研究的不是场所或个人本身,而是概念。通常我们利用场所去收集我们正在跟踪的那些概念的资料。在研究场所,我们总是可以改变资料收集,以了解什么人、什么事、什么时候、怎么样以及在哪里发生,当然这些都是建立在源于资料的概念基础之上。着手抽样决定的一个因素就是研究者是否正在发展正式的或实质性的理论。澄清一点,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我们将我们对医院的工作表现方式的研究限定在一所医院,这只是因为我们正在发展实质性理论。为了形成一个更加正式的医院工作表现方式的理论,有必要对其他组织机构进行抽样,这些机构的工作也是这样完成的。关于各种场所的决定可能在调查研究的开始就作出了或作为在概念基础上的研究过程而被选择。最初,有关场所和观察或

访谈数量的决定取决于是否可以进入、可获得的资源、研究目的,加上研究者的时间安排和精力。后面,根据研究的进展,在分析期间出现的问题的基础上,可以对这些决定进行修改。

(10)可以利用访谈和观察指南来收集资料吗?

访谈和观察指南与理论抽样的关系,没有与结构化形式的研究关系那么密切,因为在研究过程中它们往往会演化和改变。不过,研究者不指名将要提问的问题和将要实施的观察,他们是无法通过人类研究对象或研究计划委员会这一关的,后者的目的是保护被研究的人。当面对调查表或观察指南时,学生或有经验的研究者通常都有一些基本知识可以借鉴,要么是来自经验,要么来自书本。对一系列问题或观察领域进行总结不应该那么难。研究者最好是总结一组综合的问题或观察领域。要想包含所有基本问题,研究者应该在建议中加一两句话,表明如果参与者带来了其他话题,而且该主题被证明对研究非常重要,那么研究者可以对该主题跟踪到底。

作为一个实践问题,一旦研究者确定了目标人群、地点、时间以及要收集的资料种类,他或她就准备提出一系列的访谈问题或观察领域。最初的访谈问题或观察领域可以建立在那些来自文献或经验的概念基础上,或者来自初期的田野工作更好。由于这些早期的概念不是从"真实的"资料演化而来,如果研究者将它们带到田野中,那么必须将它们看作是临时的,而且当资料来了的时候要将其抛弃。不过,早期的概念通常只是为资料收集提供一个起点,许多研究者(和他们的委员会成员)发现,对于他们正在研究的现象,没有一些宽泛的概念化东西,要进入田野是很难的。不过,这并不是我们的风格。

一旦资料收集开始,最初的访谈或观察指南(用来满足委员会的)就会让位给来自于分析的概念及与其相关的问题。如果整个研究过程中僵化地固着于最初的问题将会阻碍发现,因为这限制了可以收集的资料的数量和种类。我们的经验是,如果研究者带着一份结构化的调查表进入田野,人们将只会回答被问的问

题，通常不会有详细的阐述。受访者可能会有其他信息提供，但是如果研究者没有问，他们也不愿意主动去说，他们害怕可能会扰乱研究进程。非结构化访谈，使用像这样一般性的问题，“告诉我你怎么想的”或“那时发生了什么”或“你的体验是什么”，给回答者更大的空间去解释什么对他们来说是重要的（Corbin & Morse, 2003）。

(11)有理论抽样的变化形式吗?

对于所有研究来说，分析都有“理想的方式”和“实用的方式（practical way）”。有时，研究者必须选择后者。这里有一些变化形式。

（a）**研究者可以寻找人物、场所或事件，他或她可以有目的地收集与类属、属性和维度相关的资料**。例如，在做一项有关医疗技术在医院里应用情况的研究时，一名小组成员指出，医院的机械有很多属性（Strauss, Fagerhaugh, Suczek, & Wiener, 1985）。这些属性包括（包括其他的）成本、大小和地位。然后，研究小组继续在医院内对事件和场所进行抽样，在那里机械的这些属性中相似点和不同点被放到最大。他们去观察计算机轴向断层扫描仪（CAT），一台巨大而昂贵机器，被诊断医生给予相当高的地位。然而，计算机轴向断层扫描仪代表的只是医院机械的一个极端类型，在资料收集中是要记在心里的事实。同样重要的是要抽样调查那些可能会花费更少，声望较低，并且在比较基础上不太可靠的机器。在上面的例子中，研究者也被迫通过概念来抽样，即病人的护理工作可能受到医疗器械特定属性的影响，这些器械被用来作为他们护理的一部分，因此，需要整合“病人护理”和“医疗技术”这两个类属。

（b）**研究者可以很系统地收集资料，依据名单从一个人或地方到另外一个（或经过的任何人，或同意参加的人），在方便的基础上进行抽样**。这是一种更实用的收集资料的方式，可能也是研究新手最常使用的方法。换句话说，研究者获得的资料就是他或她能够进入的。这并不意味着分析中的比较不是建立在概念的

基础上，因为它们确实是。正因为如此，研究者必须接受他或她获得的资料，而不是选择下一步就谁和/或往什么地方去收集。

通常，由于情景的自然变化，资料差异会自然出现。例如，当我们开始医院的“工作流程”研究时，我们对特定的医院或病房或护士长了解很少；我们只是从一个部门到另一个部门，将时间花费在任何愿意参与研究的护士长身上。最终，我们发现每个部门在组织条件、病人数量、工作类型及怎样组织和保持工作流程方面都存在差异。由于这些差异，我们有足够的机会在概念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抽样。但是，理想的情况仍然要让有关概念的问题去引导后面的资料收集，但前提是这些概念都要来自于分析。

(c)**研究者可能会发现差异的出现常常很偶然**。在田野观察、访谈或阅读文献过程中，研究者常常会意外地遇到在理论上意义重大的事件。要认识到分析这样一种事件或事故的重要性并将其记录下来，这非常重要。这需要有一种开放、质疑的思想和警觉的意识。当分析者遇到新的或不同的东西时，他或她一定要停下来问“这是什么？”“它意味着什么？”

(d)**研究者可以回到资料本身，根据理论上相关的概念重新组织这些资料**。在对高危孕妇的研究期间出现的抽样形式就这样一个例子。当时很明显，研究者正在根据她自己对危险的认知对妇女进行分类，她的认知是医学上的，但那些妇女是在他们对危险的认知基础上行动的，这并不总是和学医的人对危险的认知一致。然后，研究者回到资料，重新整理那些事件，根据这些妇女对情景的界定将它们放到危险的类属中。于是，妇女们的行为在分析上开始显得合理了。

注意，在任何一次访谈或观察中，通常都有好几个事件与同一个概念有关，因此每一个都要分别进行编码。例如，在对高危孕妇的研究中，有时经过一周的时间，危险的感知就发生变化，这取决于慢性疾病、婴儿以及妊娠的状况。这就意味着要分别对每一个事件进行编码，因为危险的定义和处理往往会相应地变化。

在资料收集和分析时，研究者希望(要么从新收集的资料要么从以前收集的资料)对事件进行抽样，以使他或她能够发现重

要的变化形式。通过询问器械的类型对给予病人的护理类型有什么影响,研究者就能够将“器械类型”与“护理类型”联系起来。要询问的问题包括:病人如何准备? 如何应对危险? 工作如何分配? 谁来计划和协调? 等等。概念之间的关系,就像概念本身一样,通过场所和人物进行比较,目的是揭示和验证异同点,它们会表明一个概念的维度范围或变化形式以及概念之间的关系。

研究者不应该因为不能选择场所或接近理论上有关的场所或人物而烦恼。恰恰相反,他或她应该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可以获得的。当谈到事件时,研究者发现很少会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是相同的。相反,总是会有不同的东西,可能是条件、行动/互动,或结果,这将会为比较和揭示变化提供基础。如果分析者是在概念基础上比较事件,而不只是在描述意义上探究资料,那么,他或她就是在做理论抽样,而不管资料实际上是如何收集的。当研究者不能有目的地选择对象或场所来最大化地发现变化形式,那么要揭示过程和变化形式可能就要花费更多的时间,但通过持续不断的抽样,最终差异会出现的。

(e)**在研究要结束的时候,在研究者填补类属的时候,他或她可以回到旧的场所、文献和研究的人们,或者去寻找新的场所、文献和人们去收集必要的资料,以使类属饱和并完成研究**。分析者总是将他们的分析结果与实际资料比较,并在比较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修改或增补。正是这样,他们不断地验证或否定自己的解释。

(12)我能从图书馆对资料进行抽样吗? 如果可以,怎样做?

有些研究要求将文件、报纸、书本作为研究资料的来源。只是怎样着手去做呢? 答案是对它们的抽样就像你处理访谈或观察资料一样,就像你在编码和抽样中经常发生的互动一样。

如果你使用储备的档案材料,那么它就相当于访谈资料集或田野笔记(Glaser & Strauss, 1967, pp. 61-62,111-112)。不过,文献资料可能不只是在一个地方,而是散布在一个图书馆、多个图书馆、部门或组织机构中。那么你必须要说明理由,要到哪儿去

抽样或寻找那些相关的事件，就像其他类型的资料一样。它们会在有关特定组织、人群或地区的书籍中吗？你可以使用常用的书目检索技术查找这些材料来回答这样的问题，包括有目的地在图书馆书库中浏览。

一种特殊的文件包括其他研究者收集的访谈或田野笔记。人们习惯上将这种资料的分析称为“二次分析（secondary analysis）”。研究者也可以对这些材料进行编码，与通常的编码程序一样使用理论抽样。

(13) 当一个团队在收集资料时，研究者如何进行理论抽样并仍然保持一致性？

当与研究团队一起工作时，每一个成员都必须参加小组分析研讨。每一个人还必须有所有备忘录的复印件，这些备忘录既有资料收集者所写，又有小组研讨期间撰写的。资料必须带回小组并共享。重要的是每个人都知道要被研究的类属，这样每个研究者都知道在田野工作期间要提什么类型的问题。同样重要的是，团队要经常定期开会，对部分资料进行分析。作为一个分析整体进行研究使得团队能够在一起共同进行理论抽样。随着资料堆积起来，团队成员不太可能阅读每个人的访谈或田野笔记，所以，每个人当然都有责任对自己的材料进行编码，并把编码的结果带回小组中。每个人都必须阅读所有的备忘录，否则团队就不知道研究结果的演化发展性质。

(14) 理论抽样与更加传统的抽样形式有什么区别？

在定量形式的研究中，抽样涉及随机选取一部分人群代表研究者想要对其进行推广的整体人群。因此，最重要的考虑是，就某些属性来说，从更大群体中抽样的目标群体具有多大的代表性。事实上，研究者从来不能肯定样本完全具有代表性。在定量研究中，像随机抽样和统计测量这样的程序有助于减少或控制变化。在质性研究中，研究者对他们的参与者如何代表较大人群并不是很感兴趣。他们更多的是关心概念及寻找阐明概念的事件。

对于概念，研究者是要寻找变化，而不是相同。变化在理论构建中尤其重要，因为它增加了概念的宽度和理论的范围。

(15) **理论抽样难学吗？**

做理论抽样并不难。然而，它需要极大地自我信任和研究过程，从而让演化发展的分析来引导研究。这需要时间和经验。

(16) **如何做研究设计？它与理论抽样的关系是什么？**

与统计抽样不同，理论抽样在研究开始之前是不能计划的。具体的抽样决定是在研究过程中演化发展的。当然，在开始研究之前，研究者可以推断，事件可能会在某些场所和某些人群中出现。事实上，在撰写申请资助的研究计划书时，解释研究者怎样进行抽样以及这样做的依据非常重要。

要点总结

理论抽样是让研究指导资料收集的过程。抽样的基础是概念，而不是人。通过有目的地收集与这些概念有关的资料来阐明和提炼相关的概念。正是通过理论抽样，概念被阐明，因此，它构成了厚描和理论建构的基础。理论抽样一直持续到所有类属均达饱和，也就是说，没有新的或重要的资料出现，而且类属在属性和维度上都很好地发展了。

思考、写作及小组讨论活动

1. 思考理论抽样。理论抽样背后的逻辑是什么？理论抽样如何提高研究进程？你认为这种抽样有哪些缺点？
2. 用简短的几句话写出在你的研究中你可以如何进行理论抽样。
3. 小组讨论你可以如何在计划书中向人类研究对象委员会解释理论抽样。

8

形成概念

我最喜欢的形成概念的方式就是与经验资料进行持续不断的对话。既然概念是总结资料的途径,那么重要的是,它们应该和你打算概括总结的资料相适应。(Becker, 1998, p. 109)

框8.1 术语界定

类属(Categries):更高层次的概念,分析者将低层次的概念根据共同的属性组织在一起置于其下。类属有时候被称为是主题(themes)。它们代表相关的现象,让分析者能够归纳与合并资料。

编码:从原始资料中提取概念,并在属性和维度上发展这些概念。

概念:代表资料中所含的思想观念的词语。概念是阐释,是分析的产物。

维度:概念属性中的变化形式,它们赋予概念以特殊性及变化范围。

属性:界定和描述概念的特征。

导 论

前面几章为本书中的质性研究取向奠定了基础。下面我们将转向其他主题。我们将运用程序和策略来说明如何做分析。多年来我发现,谈论资料收集和分析是一回事,但真正做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当读者读到下面的五章时,他或她就会发现早在第4和第5章所讨论的分析策略不是故意要折磨人,它们是整合在一起的,是分析的自然组成部分。做分析是流动性的和生成性的。

我(I)*将以所谓的"开放编码"来开始项目研究的呈现,"开放编码"要求用头脑风暴的方法做分析,因为,在分析的开始,分析者想要打开资料中所有的潜在可能。只有在考虑了所有可能的意义,以及仔细审查其语境之后,研究者才能准备好将解释性的概念标签贴到这些资料上。概念化资料不仅减少了研究者需要处理的资料量,同时也提供了一种谈论该资料的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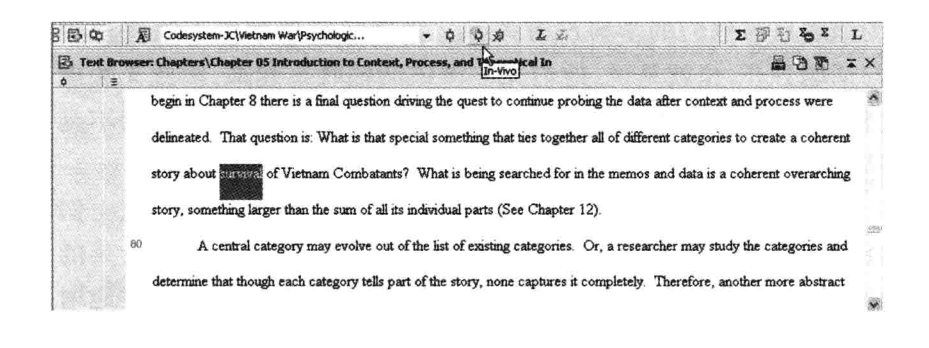
作为这个部分开始前的一点提醒,记住有很多层次的概念。概念范围可以包括从低层次的概念到高层次的概念。高层次的概念被称为类属或主题,类属告诉我们一组低层次的概念的所指向的或所代表的。所有的概念,无论哪个层次,都来自于资料。只不过有一些概念比另外一些更抽象。资料概念化的过程就像这样。研究者仔细阅读这些资料,目的是理解原始资料所表达的本质。然后,研究者用一个概念名称来描述这种理解——研究者所定义的概念。有时候,参与者也会提供概念。他们用来谈论某事物的术语非常鲜活且很有描述性,所以研究者便借用他们的术语——鲜活编码(an in-vivo code)。

在这一章里,分析的焦点是从资料中建构概念。首先,我将资料分成可操作的片段(manageable pieces)。其次,我会随身带

---

* 在下面的五章中,将使用代词I,而不是we,因为这些分析是由科宾做的,她将对此负全部责任。

着这些资料片段，探究其中所蕴涵的思想（解释这些资料）。第三，我将赋予这些思想以概念名称，代表蕴涵在资料中的思想。编码要求“在盒子外思考”（Wicker, 1985）。它的意思是要将研究者期待在研究中发现的预期看法放到一边，让资料以及对资料的解释来引导分析。编码也要求学会抽象地思考。观念不只是从“原始”资料中提取一个词语，然后将其用作标签。编码需要寻找合适的词语或者从概念上最能够描述资料所指的词语。实际用来分析资料的程序并没有寻找资料的本质或意义重要。前面几章所述的程序步骤只是工具。研究者所拥有的最伟大的工具是他们的思维和直觉。最好的编码方法就是放松，让你的思维和直觉为你工作。



屏幕截图 8 该截图显示的是 MAXQDA 上方的菜单栏，它位于文本浏览器窗口的上面，这个窗口显示的是当前打开的文本，并且可以对其进行操作。该例子显示给我们的是“生存”这个编码的鲜活编码过程：将你想要编码的词语（或术语）高亮出来，点击菜单栏上的 In-Vivo 按钮，该编码就就自动生成了，并且插入编码系统中，显示在它的顶端，这时编码将在文本边上的编码空白栏中显示出来（在这个例子中还没显示出来，因为还没点击 In-Vivo 按钮）。这张图片还显示了打开和关闭文本编辑功能的按钮，它位于菜单栏的左边，让你能对文本做改动的同时，又不失去对编码的定位。在它的右边，你能看到快速编码栏（Quick-Codebar），你可以在此对编码系统里的编码进行转换，从而将它们放在手边来对某些编码进行集中编码。在 In-Vivo 按钮的右边，你能找到撤销键，它让你能在同一工作会话（working session）中删除所有的编码。它旁边的“L”图标是一个链接选项，

你可以使用它把文本中的任意一个单词链接到你的资料库的其他位置或者你研究项目之外的其他位置。例如,你硬盘里的一张图片,或者一个网址等。

展示研究项目

作为本章的开始,我将带领读者进行一次分析之旅。我将从分析第一次访谈记录开始。接下来的每个章节都将建立在前一个章节分析的基础之上。我选择了一个我以前没有研究过的研究话题。因此,我将从最基础的地方开始。作为研究的一部分,我要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将展示在读者面前。

有些读者可能会受到选择用来展示研究的话题的影响。或者,有些读者可能会认为他们不能从展示的项目中学到什么,因为该题目与他们的学科没有关系。我理解有些学生无法将过程与话题分开,也就是说,他们无法将该话题联系起来,因此无法理解作者试图要展示的是什么。记住,这里重要的是过程,而不是话题。

我承认我将要处理的资料很集中。这些资料是关于战士们在越南战争时的经历。这个研究的目的是从参加战争的士兵的角度来解释越南战争。这项研究对社会的用途在于它潜在地增加了人们对战士所经历的和不得不在战区中生活的理解。此研究也包含着应该给那些从前线回来的男人和女人以医疗和护理的目的。在越南战争时,只有男人被指派为战士。没有女性地面战士或者战斗机飞行员,不过有不少女性在越战中承担着支持性的角色,如护士(Smith,1992;Van Devanter,1983)。因此,当我明确地谈到“战士”时,我指的是男性。

关于研究话题和研究问题,这里我想提个醒。注意,我并没有以一个特定的研究问题作为开始,而是从一个一般的话题领域开始。该问题是开放式的,因为当我开始做第一次访谈分析的时候,我不知道这项研究将把我引向何处,也不知道随着研究的进行,将会演化出什么问题。当我谈论一名士兵的经历时,我并不仅仅在谈论“内在的经历”,或者现象学意义上的体验,而是用一

种包含了能够描述越南战争中志愿参战、或被征兵或退役军人成为前线战士或飞行员的普遍经历的整个过程。使该研究项目成为一项扎根理论研究，而不是现象学研究的原因在于我作为一名扎根理论家的背景和训练。我分析和解释资料与现象学者不同。我的背景和训练使得我能关注情境（结构）和过程（行动/互动），并引导我超越描述而发展一种理论解释。然而，正如读者将会看到的，研究者并不需要竭力去形成理论。如果他或她有能力的情况下，可以在找到和形成概念后停下来，做一些漂亮的描述性研究，并添加一些情境和过程要素。

在分析的过程中，我要处理各种不同类型的资料，包括访谈、回忆录和历史材料。这一章主要是在访谈资料的基础上，聚焦于开放编码和寻找概念。读者可以在附录 B 中找到完整的访谈记录稿。该访谈大概是在 1994 年做的，是由安塞尔姆·施特劳斯实施的。它并不仅仅是为这个示范项目所做，它在我们的文件夹中放了好几年了。它描述了一个战士的越战体验。我最近在为本书寻找材料时才发现这个访谈资料，访谈的内容让我非常震撼，于是我请求访谈参与者同意我使用这份资料。他同意了。

分析

任何分析的第一步都是从头到尾通读材料。（如果研究者是分析田野笔记、录像或其他类型的文件，他或她可以用同样的程序浏览所有的录像或文件，以了解其内容。）在最初的阅读中，分析者应该尽量不要在材料旁边写东西、划线做标记或做笔记。初次阅读背后的理念是要感同深受地走进参与者的生活中，感受他们所经历的，倾听他们告诉了我们什么。（参阅附录 B 中的研究者#1的全部内容。）

开始编码

在完成第一次访谈、观察或录像后，分析者就应该开始编码了，因为这些初始资料是进一步收集和分析资料的基础。可以这么说，只要研究者已经阅读并消化了所有的文档，就是“开始分析

资料”的时候了。我将文稿中的自然停顿点作为剪切点，因为通常这些停顿点代表了话题的转换，但并不总是这样。然后我深入地检查每部分内容。使用这种详细的方法比仅仅大致地阅读文稿，然后归纳出一些主题更加乏味。然而，本书的作者认为在分析的开始阶段就与资料“密切接触”将使后面的分析更容易，因为有了坚实的基础，就不必再回去寻找漏掉的环节。在开始阶段做这些细致的工作将使你的描述更加丰富和深厚，理论更加完备。

可以使用计算机来编码，但分析者一定要注意不要落入陷阱，仅仅在某一资料上贴上标签，然后把大堆大堆的“原始”资料放在那个标签下。如果研究者这样做的话，他或她最终将只是得到一系列并不反映资料所指的概念。即使有了计算机的帮助，研究者也需要花时间对资料进行反思并撰写备忘录。思考是质性分析的核心和灵魂，它像发动机一样驱动分析过程并将研究者带到分析过程中。

我使用的过程如下：我首先取一份原始资料，这份资料将被用来作为分析的跳板。在分析资料的时候，我所思考的将作为备忘录呈现，每一个备忘录都将以一个概念作为标签。有时，编码的名称会随着我对每一个引用所包含的思想反复考虑而改变多次。每一个概念性的标签都反映了我对其内容的理解，虽然其他研究者可能有他们自己的思想，甚至不同意我的看法。这里的想法并不是要为我所说的每一件事争辩，而是指出我所经历的过程。

我将拿出访谈的第一部分，然后从那里开始我的分析。读者将会看到每个备忘录都被编了号，并且都用一个概念作为标题，这些概念反映了我对原始材料的思考。在标题下面是真实的资料及对其的分析。有些备忘录会比较长。记住这是最初的分析。随着分析的积累，在后面的研究中备忘录将会更准确、更复杂及更长。

备忘录1 自我定位：时间：参军 2006.6.10

总的来说，我来自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很爱国，敬畏上帝而且

虔诚。我们的家庭是个充满爱的家,将来也会是这样。我有三个哥哥和一个姐姐,我父亲已经过世了,我母亲在她八十多岁时也去世了。我们每年至少有一次家庭聚会。我十六岁离开家,我干了几年粗活,活儿不是特别重,但收入低。我在一家医院做护理人员,这就是我如何进入护理行业,并且决定将其作为我的职业的原因。我第一次作护理人员时是20岁,我现在50岁了,做护士工作已有很长的历史了。时间追溯到60年代,我在X城的一家退伍军人医院里工作了一年,在那里,我第一次与退伍军人接触,他们都曾参加过战争。

总体来说,他们之中有较年长的"一战"战士,一些中年的"二战"战士,还有一些朝鲜战争退伍的军人也在里面。我对他们谈论的战争经历特别感兴趣,正因为这些,所以在1966年当政府终于决定保护越南,遣送很多男人、女人和物资时,我志愿前往那里。

在访谈的开始阶段,这位受访者一直在回忆他刚参军时的"自我定位"。他一开始是解释当时他是谁、他那时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要参军。我不确定他为什么以这种方式开始,因为我不在访谈现场。也许是在访谈之前施特劳斯要求他提供这样的信息,也许是参与者觉得有必要进行"自我定位",或者解释当时他的身份,然后比照现在的身份。在"定位"的概念之下,紧跟着一些小的概念——有助于界定他的身份特征。首先是"家庭背景",包括"中产阶级""虔诚的""敬畏上帝""亲密"以及最重要的是"爱国的"。第二个概念是"爱国主义",它从其他概念中凸显出来。我不确定爱国意味着什么,因为他并没有为我们界定。第三个概念是"参加战争的途径(path to the war)",也就是,他如何参加战争以及他参加战争的精神状态和为参战所做的准备。"参加战争的途径"的下位概念(subconcepts)包括:听战争故事,成为一名护士,志愿参战(这是一个我想要回来阐明的概念),成为一个"六周的奇迹",成为一名官员,以及迅速被派遣到战区。我必须指出他的"途径"具有"直接"和"迅速"的维度。当时,对于是否去参战他没有任何内心冲突的表现,对战争本身也没有任何负面的感情。

方法论说明 我经常会在备忘录之间插入方法论说明,从而对所发生的事情进行分析说明。在上面的案例中,很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有几个次要的概念,如"家庭背景""参战的途径"以及"爱国主义",但是它们并没有被列为题目的标题。在分析的开始所犯的一个错误是未能将不同层次的概念区分开来。他们没有在分析早期开始就将较低层次的解释性概念从那些将其组织起来的更大的思想或更高层次的概念区别开来。注意这些低层次的概念是如何嵌入、解释并告诉我们这个人是谁,以及告诉我们"自我定位"的某些维度和属性。"自我定位"是一个高层次的概念,因为它也可以应用于其他的访谈。"自我定位"这个概念可以贯穿于访谈,但是像来自"中产阶级家庭"这样的具体属性很可能因人而异。

如果分析者在一开始分析的时候不去进行区分,那么他或她很可能最终累积了一大堆的概念,但却不知道如何将这些概念组合到一起。而且,如果分析者把低层次的概念与更宽泛的概念联系起来,如"自我定位",那么可以对"定位"的概念进行限定,赋予更加具体的属性,例如"在入伍时"。分析者然后就可以查阅资料,确定同样的和/或其他人在随后的战争经历或者甚至后来在他们的生活中如何对自己进行定位。读者读到这里就可以看出像"家庭背景"和"自我定位"这两个概念之间在抽象程度上的不同。家庭背景告诉分析者的是在参军时关于"自我"的东西。这部分地解释了他是谁以及他为什么参军。而自我定位则是分析者对于受访者在做什么的解释。

备忘录2 志愿参军者 vs. 征兵入伍者 vs. 逃兵役者 2006. 6. 10

嗯,我是志愿入伍的,我比征兵役提前一步,所以属志愿参军者。我在德克萨斯州的圣休斯顿接受了六个星期的基本训练。训练结束后,我被授予二等中尉,立刻派遣到越南。

这里有三个概念。一个是"志愿参军"。这个概念直接来自资料。根据我对那一历史时期的一般了解,我知道在越战时期征兵仍然在继

续着，许多年轻人参加战争并非是出于爱国，而是因为他们要服兵役，他们除了上前线，别无选择。

我也知道那时有一群“逃兵役者”。但我没有那个时期关于被征兵者和兵役逃避者的资料。我对“志愿者”这个概念很感兴趣，因为它代表着心甘情愿去参加战争，或者至少在他的例子中，他或多或少是愿意去越南的。我们的受访者很年轻，才 21 岁。他那时还没有上大学，但已经从卫校毕业了。他是爱国的，但并不是因为爱国才参军的，或者说是因为他认为他最终会被征入伍的。让我们来看一下他登记的信息情况，他来自一个“爱国”的家庭，当时对他来说，参加战争是一件“正确的事”。但他说他要比征兵提前一步，这里似乎有一点矛盾。作为一个分析者，我想知道，志愿入伍和征兵入伍在战争体验上是否有不同之处。如果年轻人是志愿入伍，那么，比起那些被征入伍或者不想参加战争的人来说，是不是对战争更可能“接受”，并“准备好”“为战胜而努力”？另外，还有一点，如果应征入伍，他将面临选择进入什么样的服务部门。正如我所做的分析，我想看看，总的来说，在整个战争体验中，志愿入伍和应征入伍有什么区别。同时，我觉得看看参军仅四年和职业军人有什么区别也是很重要的。还有，我很有兴趣看看是否能找出一些关于逃兵役者的资料，以及那些参战的人和在战争中受伤的人是如何看待那些设法逃避服兵役的人。

备忘录3 成为一名非战斗人员与成为一名战斗人员 2006.6.10

我……大部分时间是在一家转运医院做伤员运送工作，我们乘直升机出去，到救助站接伤员，这几乎……很难说，因为实际上是没有确切的航线。航线可能每天都会改变，一天两次或三次，救助站在战争冲突的地区。我们把受重伤的伤员送回西贡（Saigon），西贡离战地大概 75 英里。

成为一名“战斗人员”与成为一名“非战斗人员”似乎是相关的概念。受访者告诉我们他在一家转运医院从事伤员运送工作，这表明了他是一名“非战斗人员”。成为一名非战斗人员是令人感兴趣的，因为这使他与在前线打仗的年轻人不同。然而，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他没有

经历战争的恐惧。他确实飞进了战区，我称之为"冲突地区"，然后把伤员送回至"安全地区"，这个"安全地区"在75英里之外。

那么，作为一名"非战斗人员"意味着什么？为了理解在战争中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之间的区别，我需要更多的资料。然而，我可以在关于战争的一般资料的阅读基础上玩一种分析比较的游戏。作为一名战斗人员意味着一个人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危险中"。战斗人员看到他们的"同志们受伤"和"牺牲"。在"战争"中，战斗人员"必须要杀敌"或"被敌人杀"。同时，作为一名战斗人员意味着在与敌人的交锋中总是处于"恐惧和压力"中。在战争中，某种程度上有点儿像一个"猎人"，但与"猎人"不同的是，他自己也可能成为"猎物"。它就像那种疯狂的电子游戏，双方都冲出来要把对方逮住，但在战争中，"猎杀"是"真实的"。"敌人"就在那里，如果你不先杀他的话，他就会杀死你。除非亲身经历过战争，我不确定一个人是否能充分理解战争的意义，体会既是"猎人"又可能成为"猎物"的持续压力和恐惧。

作为一名非战斗人员会引发不同的恐惧和压力。如果他们进入错误的区域，虽然他们不是外出"寻猎"敌人，但他们可能会成为"猎物"。非战斗人员"不是杀手"，如果他们因某种原因遭到攻击，他们的武器，如果携带的话，是用来"自我防卫"的。这种特殊的非战斗人员的工作就是"照顾伤员的"。他暴露在"敌人火力"范围是"断断续续的"，主要是在执行飞到救助站接伤员任务的时候。我觉得"护理"对应"杀敌"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概念，这使得战争经验对研究参与者和战斗人员有很大的不同。作为一名非战斗人员并没有减少对战争所作的贡献，但它确实形成了一种不同的体验。

尽管医务人员有这样的经历，但他们却没有那种与敌人厮杀或在战斗中连续几个小时射击的亲身体验。然而，从我阅读的材料可以看出，因为压力、紧张、抑郁，以及目睹年轻人的受伤和死亡，很多去越南的医护人员也和战士一样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们有很多同样需要调整的问题（Moore，1992；Smith，1992；Van Devantar，1983）。

备忘录4 敌人　　2006.6.10

我是很反对越南人的，就像大多数战士通常对他们的敌人的

感觉一样。

这个备忘录与备忘录3联系在一起,继续讨论"敌人"这个概念。他告诉我们他是反对北越人的,把他们视为"敌人"。"总是"这个词非常有趣,我想知道,战士们是否总是把他们的对手视为"敌人"。在这里,"通常"这个词让我感到有点儿困惑。继续分析下去,敌人就是那些如果有机会就想伤害你的人,是想要带给你伤害的人,是与你的国家打仗的人。如果一个人根据这样的定义行动,那么将某人看作敌人是否合理都不重要。当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觉得有趣的是,战争双方都在与敌人作战。在战争中,双方彼此都是敌人。如果没有敌人,就不会有战争,就不会与他人打仗。但是,当两群人关系紧张时,你可能因为没有必要的战争而成为敌人。我从来没参加过战争,我对于抽象的"敌人"很难理解,但是我觉得,当一个人对着你开枪,目的就是要杀死你,"敌人"这个概念就变得很具体了。"敌人"就是对你开枪的人。我想知道在什么情况下,战士会不把对手看作敌人。

备忘录5 安全区域以及冲突区域或厮杀区域 2006.6.10

这个备忘录也是讨论从备忘录3中挑出来的一个观点,而不是对某个特定田野笔记的阐述,重要的是理解"战争体验"。当一个人处于战争中时,是没有真正的安全区域的,但却有前线,或者说"冲突区域""厮杀区域",或者说此时战斗正在进行的区域。也有"安全区域",远离战场的地方,像基地——尽管未必一定是安全的,而且在越南战争期间确实被袭击过。乘坐直升飞机飞入"冲突地区"是要冒很大危险的,因为直升飞机是攻击的目标,尤其是在它接近地面的时候。尽管我们的受访者实际上并未在战场上与敌人打仗,但他每次乘坐直升机去战场救人时,他就是潜在的被攻击目标。正如我们的受访者说的那样,冲突区域经常从这个地方换到那个地方,所以很难知道该降落在哪里接伤亡人员。伤员要运送到75公里之外的地方治疗。但是正如我们所知的,西贡最后也成了战场。所以,所谓的"安全区域"某天可能安全,但另一天却可能成为战场。不仅仅越南战争是这样,任何一场战争都是如此,因为你不知道你的敌人是"谁",他们会在"哪里"攻

击,这使得每个人都处于危险的边缘。

备忘录6 军队系统 2006.6.10

这仍然是来自备忘录3中的另外一个探究性备忘录,是在备忘录3基础上的扩展。当我阅读了伤员是如何根据受伤的程度被送往不同的地方时,我想起了军队是一个"安排"和"规定"的"庞大系统"。军队必须将士兵和供给从一个地方运送到另外一个地方,运送伤病员,给养部队,提供炮弹,制订攻击计划,等等。军队里做每件事都有制度和规定。同时,为了群体的整体利益,纪律必须严格,也是必要的。除此之外,怎么能让一群年轻人出去杀敌,同时,也可能被敌人杀害呢?战士必须服从命令,即便这个命令是错误的或者是不合理的。发动一场战争的逻辑是让人很难以想象的。最近当我从电视上看到在伊拉克的战争时,我注意到,整个军队系统都起来支持战争。如果没有士兵就不会有战争,如果没有整个军队系统的支持,士兵就无法打仗。我想关于士兵是如何看待战争这个问题,可以通过他们是否觉得受到制度的支持而得到部分解释,也可以通过他们对正在进行的战争的感觉来说明。在你需要的时候,是否有直升机和其他部队支持?在战斗之间你是否有时间休息?是否有补给?如果你受伤了,是否得到精心的护理?这就是受访者#1描述的情况;他是这个支持系统的一部分,为伤员提供护理。

方法论说明 我在这里想打断分析,从方法论上来对我正在做的分析进行说明。读者可以看到,我正在资料中寻找概念。同时,我在备忘录里记录下我和资料间的精神对话。在备忘录里,我不断地问问题,作比较,写出想法,并且做头脑风暴。尽管这种与资料的对话似乎比较乏味,有时很杂乱,但它对分析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激发了思维过程,并且为进一步收集资料指明了方向。最重要的是,它帮助分析者走进资料,从内心层面感受资料。

研究者常常对正在研究的话题很好奇,但常常缺乏对它们的体验。为了理解去参加战争或者说"战争体验"是怎样的,分析者只能通过参战者的视角来感受这种体验。要注意,分析并非是

“强迫的”。当我们在分析资料时,提问题和作比较是很自然的。尽管分析者不可能完全理解他人的体验,但他或她处理、思考、琢磨的资料越多,资料呈现的意义也将越来越丰富,这样,研究者就开始理解了。还有一点,如果我是研究团队的一员,那么团队成员之间将会进行类似的讨论。团队研究不仅有趣,而且研究者的思考会受到他人思想的启发。在团队中分析工作的速度通常较快,就是因为这些相互间思想的激发。但很重要的一点是,团队中要指派一个人做“记录员”,这样就可以对讨论进行跟踪、维持秩序,而且笔记可以在后来整理作为备忘录。

备忘录7 自我定位:努力寻找意义 2006.6.11

让我想想……我那时很年轻,才21岁,很爱国,充满热情,认为我们有权利参加战争,做我们要做的事情。我是非常反对越南人的,像多数战士通常对他们的敌人感觉一样。

他列举了那些个人特点:爱国,充满热情,而且他认为“我们有权利参加战争,做我们要做的事情”。他“反对越南人”,因为这是战士们对敌人“应有的感觉”。在做该陈述时,让人觉得他是在回忆,试图为他自己,同时也在为研究者解释他为什么参战。但这种定位对研究者来说很重要。要通过某种经历的体验者理解这种经历,研究者只能从他的视角回忆他是谁,并与现在的他区分开来而获得。如果被问及在去越南时对这场战争有什么看法,受访者会告诉我们,“去越南是正确的”。他在去越南参战时对战争的看法和在接受访谈时对战争的看法是不同的。在接下来的访谈中,他陈述了很重要的一点。当你“身处其中”时,对一种经历进行评价是很难的。一种是作为“身处其中”时的经历,一种是作为后来对它“反思”的回忆。只有当我们往回看时,我们才能够与我们的行为和经历拉开距离。往回看总是当前的一种建构。在这里,参与者有了另外一个假设——即战士们应该那样看待敌人。战士们应该如何看待敌人? 我也不知道。

备忘录8 战争中的矛盾(inconsistencies):阻挡或减少矛盾的心理策略

2006.6.11

我觉得,我在那儿的时候,我开始意识到,在良心上受到谴责,非常矛盾,但我想我没太注意这些情绪。太多的事情在持续不断地发生着,所以我真的没有太多的时间思考这些。

我不能确定,是否是某种无意识的机制阻碍了你,让你看不清你在做的事情而且无法对其进行评价。我不知道是否是因为你不想或者选择不去思考。我不知道,当你身处其中的时候,你要对它们进行评价是很难的。

正是在"越南战争体验"中,我们的受访者开始意识到"良心的吞噬(nips of conscience)",这也导致他对战争的态度发生改变。引起他"良心的吞噬"的是他认为矛盾的事件,但是,与什么相矛盾呢?我猜,他的意思是与他所来自的社会的道德准则相矛盾?"矛盾(inconsistent)"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他继续告诉我们说,那时他并没有思考这些"良心的吞噬",因为他太忙于照顾伤病员的"体验当中"了。自然地,我们都有处理不愉快情况的"心理策略","逃避"就是其中一种。我把他的"逃避"编码作为"心理生存策略",因为,正如我们的受访者后来在访谈中告诉我们的,如果一个人在战争中对他所见的和所做的进行过多的思考,那么他将很难在心理上和生理上存活下来。他说"不要多想"或者"进行评价"。在接下来的访谈中,他给我们谈论的是这种经历使他"变得冷漠了(hardened)"。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学会了对事情不做过深的考虑。过多地接触某些事情确实容易使得一个人变得麻木不仁,也许这就是他所说的"冷漠"。现在这里有两种不同的心理生存策略,"逃避"和"冷漠"。我相信,随着这项研究的深入,我将会发现更多的策略。

备忘录9 对战争体验的感知　　2006.6.11

实际上,我不能说我的体验都是那么糟糕。我那时很年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对那样的经历还有点儿喜欢。我想我人生中

所做的最成熟的一件事就是我去了那儿，然后知道了那些人想要杀我。目前为止，我从来没杀过任何人，尽管我时常携带武器。我从来没有向任何人开枪。无论如何都没有故意向谁开枪。在我的人生中，这是一段奇怪的时期。

在这里，我们的受访者给我们一个观点，“战争体验”的一个维度，即“并不是那么糟糕”。我怀疑他认为自己的体验“不是那么糟糕”是因为他是一名“非战斗人员”。他的工作是“护理伤员”，而不是“杀死或打败敌人”。他晚上是在称作“安全区域”里的床上睡觉的。而且他年轻，愿意冒险。但我从阅读中获悉，许多退伍军人并不这样描述他们的经历。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获得更多的有关“战斗人员”的资料，然后进行比较。在这部分的访谈中，他说的还有两点似乎很重要。一是他说他在战争中没有杀过任何人，所以他在“良心”上就不需要“承载负担”。另外，他在结束这部分的访谈时说，这在他人生中是一段“奇怪的时期”。他的“奇怪的时期”是什么意思？使用我们的分析工具之一，我就问，他的这个表述是什么意思？他把奇怪看作是未知的而且他那时候非常不理解什么会发生在他的身上？或者，意思是打仗是一种“超现实的体验”，一个人经历过这种体验，希望能够活着回家？我想知道，其他的士兵是如何描述这种体验的。

备忘录 10　一个更加宽泛的关于战争体验的备忘录　2006.6.11

我想走出该访谈，写一个更加宽泛的有关该“战争体验”的备忘录。我想把思想集中在思考战争体验的某些属性上。战争体验的变化似乎可以从“不是太糟糕”（他目前为止还没有称其为好）到“非常糟糕”。“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体验在继续，但是一个人的体验会随着时间而变化。但这种“进行中的”体验通常在年轻时发生，因此战争体验对个人当前和将来的传记也有潜在的影响。通过迫使一个人变得有责任、独立以及能干，可以加速其变得更加成熟。另一方面，这也有负面的影响，尤其是如果一个人因此而变得痛苦、愤怒和充满仇恨。大部分人去参加战争时还很年轻，他们最初对战争并不是很了解。“战争的印象”被浪漫化了，都是从一些口述的故事或文章中获得的。

然而,在战场上,"在战争的体验中",改变了一个人对战争的印象,朝向一种更加现实的观点。我仍然不明白为什么他把这段经历称为他人生中一个"奇怪的"时期。也许他的意思是不管一个人接受了多少的军事训练,他都不可能真正为战争做好准备。你只有"经受"这样的体验你才能够真正理解它。它就好像进入了即使在最恐怖的噩梦中也不能想象的世界。

备忘录11 战争文化及其矛盾性 2006.6.11

有许多东西我觉得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例如人的生命价值,我想我是在看着它逐渐消失。我参加了1966—1967年的新年攻势(Tet Offensive),当时北越人开展了反攻战,并取得了胜利。我记得在一个叫作"胡志明(Cu Chi)"的村庄,他们被击溃了。许多南越人被越共杀害,他们的尸体就像木柴似的堆在路边,我记得我对此竟没有任何的感情。好像"这就是战争"。这就是在战争中所要发生的。这种麻木不仁让我觉得很困惑,因为在此之前,当我看到一个人快死了,我就会觉得很紧张。在医院里工作,如果一个人快死了,你会非常担心,并对此感到不安。

当我读到这些话,"有许多东西我觉得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例如人的生命价值,我想我是在看着它逐渐消失",我被这可以称作是"战争文化"的东西触动了,当一个人被迫生活在这种文化中时,他会发生变化。因为杀戮是如此普遍,以致于他把它作为一种正常现象来看待。我把"战争文化"看作是贯穿这次访谈的一个重要主题。这就是构成战争体验的情境或背景。随着分析的进展,"战争文化"将可能成为一个类属,因为我越深入研究,我对"战争文化"这个概念就越感兴趣,它在概念上与"平民文化(civilian culture)"是完全不同的。那么,什么是战争文化?它与平民文化有什么不同?平民文化包括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价值观、信仰以及标准。这些东西规定了我们日常的态度和行为。什么是战争文化?战争文化是由军队体制规定。它也有自己的一套规范和准则。为了在战争文化中发挥作用,必须将平民态度和信念放置一边,采取新的态度和信念。在战争文化中,可以对被

认为是敌人的人开枪。战争的目的就是,在“约定的规则”内,你可以使用任何手段击败敌人。而在平民文化中,我们一般不会对他人开枪,而且如果看到他人受伤或生病,我们应尽可能地救助他。把社会“植入”到你身上的这些价值观丢置在一边,对一个人来说是多么不易。不管怎样,一个人为了能在战争中幸存下来,就不得不去“调解”平民生活和战争生活之间的“矛盾”。“嗨,这就是战争”这句话表达了这一切,因为战争意味着死亡和毁灭。这就是我们的受访者采用的“心理生存策略”之一,也许还有其他的调解平民文化和战争文化之间矛盾的策略。现在我们有了另一种“心理生存策略”,那就是“重新界定伦理价值以符合实际情况”。

备忘录 12 更多心理上的生存策略 2006.6.11

对此我没有任何的感觉。像这样是很好的,因为在战争中就应该抱着这样的态度,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身边的其他人对此也没有任何的感觉。事实上,还有很多滑稽的事情。“嗯,这是一个我们不再担心的‘亚洲佬(gook)’”,“亚洲佬”是当时对越南人的一种常用的称呼……所以让我看看……

毫无疑问,在“战争文化”中身体上和精神上的生存取决于一个人形成策略的能力,通过这些策略来缓解战争体验的恐惧感。我们的受访者告诉我们,他“没有任何的感觉”。如果去“感觉”,就会打破为了生存在你周围形成的“保护性盾牌”。当你看见尸体堆在路上时,你会告诉自己“这就是战争”,对“敌人”没有情感,没有同情,或是自责。其他心理上的策略,除了拿起“保护性盾牌”,包括“嘲弄(making jokes)”或者“举重若轻(making light of the situation)”以及“拉开自己与敌人(——亚洲佬)的距离(distancing oneself from the enemy)”。心理上的生存策略能够帮助你“阻挡”这些场景、声音,从而让你能够继续做事。我想抓住“阻挡”这个概念,因为我觉得它无论对于处理在战争期间还是在战后的体验都很重要。

备忘录13 另外一份关于敌人的备忘录和对待战争的心理策略

2006.6.11

当时,有一段时间,我在一所转运医院工作。他们让你不断轮换工作。令人觉得奇怪的是那里搭起了像医院病房一样的圆拱形活动房(Quonset huts),还有……很奇特的是,我们会一次接收到三类人,一类是受伤的美国士兵,一类是受伤的南越士兵,还有一类是受伤的越共或北越士兵。所以,我们对这些越南人并不带什么感情色彩。我记得当我们向来接班的工作人员交接工作时,我们会只谈论我们的战士,用他们的名字等类似的东西。我记得当我们报告北越伤员和南越伤员时,我们会说"12床"或在房间的"亚洲佬"等。这是一种对待你没有感觉的人的一种方法。你不会和他们交流,因为你不会说他们的语言。你身边很少会有翻译员或解说员。

在这场战争中,北越人和越共是"敌人"。这里又是一个战争的"矛盾"。战士的任务就是杀死敌人。但敌人一旦受伤,他或她却与你自己的战士在同一家医院病房里接受治疗而且还要照顾他们。为了协调这种不一致的情感,那些照顾受伤敌人的医护人员在"护理"敌人时形成了一种心理策略,就是要"照顾(taking care)"敌人但却不会"在意(care about)"敌人。敌人的名字或身份是被忽略的,只是"某床"或"亚洲佬"。你不会设法和他们说话。你不必这样,因为你不懂他们的语言,而且战时又没有翻译人员。我们的受访者继续说道:

对于这些人,我现在所记得的是那时他们是多么隐忍(stoic)。我不记得他们曾向我们提出什么来减轻他们的疼痛,现在回想起来,他们一定承受很大的痛苦。同时,非常不幸的是,我不记得我自己或其他任何一个医生或护士曾主动去看看他们是否有什么不舒服。战争带来的伤害是可怕的。我不知道。那时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事。我不记得我曾给过越南人任何东西来减轻他们的疼痛。

有趣的是,这么多年来,留在我们的受访者脑海里的是敌人的"斯

多葛主义(stoicism)”。在访谈中,我们的受访者进一步描述了越南人所受的待遇,实际上,即使是“友好的”南越人也是被“忽视”的。在医院里,他们并没有伤害敌人,或者让其他人去伤害,但他们并未给予“敌人”减轻痛苦或提供安慰。“给敌人安慰”,人们一般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这与战争文化是相矛盾的。但是,人们会感觉到,在回忆的过程中,我们的受访者对于自己的行为会有些懊悔。也就是,他希望他那时对敌人的痛苦和心理的伤痛更加敏感一些。

方法论说明 注意,在上面及之前的几个备忘录中,我把概念连接在一起,也就是说,将“心理策略”和“敌人”放在一起,来处理“在某些条件下”的敌人——这里指的是不得不照顾敌人这件事。由于分析仍然处于开始阶段,在这里我只能说,我认为这两个概念相互之间有某种关系,不过对它们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我可能还不确定。

备忘录 14 放下情感警惕 2006.6.12

他们非常隐忍。我记得有件事让我觉得对一个越南人很愧疚,我不记得他是敌对的越南人,还是友好的越南人。当他手术后醒来,朝被子下面看,他发现自己的一条腿没了,然后他哭了。很无助……我不记得有谁,包括我,能够以什么方式安慰他。

尽管努力“阻挡”对敌人的人道主义情感,但是这种情感常常还是会出来的。“打破”的时候在心理上肯定是很不舒服的,因为在战争中生存下来取决于我们“阻挡”对敌人的人道主义情感。我知道,现在战争结束了,有这种情感没有什么问题。当他回忆战争时,我觉得他在某种程度上感到负罪和懊悔。当然,这种情感是当下被体验的。

备忘录 15 战争中更多的道德矛盾和心理上的生存策略 2006.6.12

嗯……要是在战区之外,就医务人员来说,这是一种不正常的行为。我们不应该让人们在情感上和身体上遭受我们让他们受到的痛苦。

战争充满着“道德的矛盾”。我们从旁观者的立场很难判断战争中的行为，因为战争必须要求其行动方式不同于平民生活。我们的受访者不时地从回忆的视角进行比较，站在他现在的地方——更年长、更智慧而且是平民文化的一部分。他似乎对自己过去的行为感到懊悔。对自己的评价并不总是不变的，它随着人生的经历以及时间的推移不断地演变或者说是改变。我们的受访者继续说道：

我们的病房里时不时就会出现冲突，因为那里有三群人。一些美国士兵或者南越人认为他们的敌人在那里，而北越人或越共则会因为我们总是袒护美国士兵和南越人发生冲突。我们不曾允许我们的士兵对他们辱骂，尽管我记得还是有很多言语行为、威胁等，但我从来没见过他们使用暴力。对于谁将受到护理，或者需要时谁先得到供给，这从来都不是问题。因为美国人或澳大利亚人总是优先。在我们的士兵旁边有一群澳大利亚人，他们将在我们医院安顿下来。呃……他们总是受到优先护理和供给。一般来说，是有足够的医疗供应的，所以，啊……我记起一件事，我并没有作选择，但当我把一个北越人的氧气瓶拔掉给一个美国士兵用时，我实际上是作了选择，因为那时只有那一个氧气瓶能用。这是我记得的唯一的一次选择，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很自然地忽视他们的需要，我们并没看看他们是否是真的需要什么。我记得有时南越审问组来医院审问越共，有时他们将越共带出医院，我能想象接下来发生的事。他们把越共带出去。他们说他们要把这些越共转到另一家医院，但我相信他们是被带去审问或者被杀。但在那时，这并未让我为难。这就是战争，他们只是一些不知名的人。他们对我来说只不过是其他的北越人而已……就像我所说的那样，这些事偶尔会进入我的意识，我会对这样的矛盾进行思考。

以上这么长的内容重复了之前所述的，所以就没有必要把它一行一行地分开。很值得注意的是，我能把类似的备忘录放在一起。上面这么长引文中所陈述的指出了“战争中的道德矛盾”的核心。在战争中被认为是正常的行为并不是平民生活中的标准行为。一名护士可

以“稍微疏忽”地对待敌人,但他或她却不可以稍微疏忽地让病人回家照顾。如果你忽略了你的病人,你将丢了你的工作。而在战争中,作为一名护士,他或她不能让自己“感受”敌人的痛苦,换句话说,就是不能让自己同情敌人。如果护士同情敌人,那么他或她就不能让南越人把敌人带出医院审问,因为他们很可能被杀。所以,你要与敌人保持距离,漠视所发生的一切,把敌人当作匿名的人。这样,所发生的一切就不会让你烦恼。再一次,我们的受访者带来了一点良心的“突破”,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我想正是这些良心上的突破,一个人才能在战争中保持人性。当这种突破出现时,使良心平静下来的一个方法就是告诉自己:“这是战争,他们是不知名的人。对于我来说,他们仅仅是另一个北越人。”

备忘录16 军队系统内待遇的矛盾 2006.6.13

我会思考这种矛盾。困扰我的不仅仅是越南人的待遇,还有美国军队系统内的等级制度。我是一名军官,所以我比普通战士拥有更多的特权。他们要连续工作12~18小时才会有轮班,但军官却不是这样。他们是“喽啰(grunts,即普通士兵)”,但这就是军队。世界范围内的军队都是这样的。我在尽力考虑我的同伴,回想我是否与我的战友们讨论或商量过什么,但我没回想到什么。我真不知道,当他们在那儿的时候,其他人的感觉如何,他们对他们所看见的是否有任何疑问。

在军队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军队是建立在等级系统的基础上的。这是军队情况的组成部分,所有的军人都必须遵守。我们的受访者把这个情况描述为这样一个地方:这里军官有更多优先权和更好的工作条件,最重要的是,比更低层战士身体上的危险少得多。除了讲述了这对他的影响外,他几乎没有多说。他没有看到这对其他战士产生影响的证据。或者即使有影响,他们也从来没有说。情境对理解“战争体验”非常重要。但对于我来说,我对军队及其制度的感觉是逐渐“祛魅”。这是使他对军队的态度渐渐改变的事件和行为之一,从军队开始,他对战争和国家的态度也改变了。

备忘录17 使情况正常化:另一个心理生存策略 2006.6.13

令我惊讶的是,我可以很舒服地进入那样的情况。你起床,然后去工作,而这似乎对你并没有多大影响。我想,这是整个人类的适应力使然。你只是适应环境,但那时的生活却呈现出一种几乎正常的感受。你举行派对,常常最大的担心是"我们从哪里可以获得足够的啤酒?"或者"我们能用一些青霉素与另一群人换威士忌吗?"或者类似的事情。我们从未考虑也许还有另外一些人需要这种药品。

我想我们的受访者在这里想表达的,也是当我进入这个研究就开始感觉到的:在"战争的情况下",会发生"道德调整(moral adjustment)"。否则你就无法生存或活在道德冲突中。有时候,正如我们的受访者所指出的,也会有"良心的突破"。但它们很快就会"受阻",退回内心的深处,因为它们不符合战争情况的日常现实。同时,战士们尝试着使生活"正常化"或者通过开派对和关心是否有足够的啤酒"逃避"现实。"正常化"是一种释缓压力和暂时走出冲突的方法。交易和讨价还价也是"正常的行为",而且是自人类社会以来就在进行的事情。如果一个人有青霉素,另一个人有啤酒,为什么不能交易呢?然而,当我们的受访者追忆往事时,当时对他看起来正常的事情,现在却呈现为另外一种真实。在谈论这种体验时,他试图"协调这些不同的真实"。"协调这些不同的真实"是许多退伍老兵返回家园时要做的事情。"协调不同的真实"似乎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因此在研究进展中,我必须要记住它。

备忘录18 更多关于道德的冲突 2006.6.13

我:你曾经被袭击过吗?当你在那的时候,你是否感到任何危险?

参与者:你是指营地(compound),还是医院本身?医院经常着火,经常有人被杀死在营中。着火时,我们只好将病人搬离他们的床,把垫子放在地板上,把病人放在垫子上。那些建筑,即圆

拱活动房(Quonset huts),都是用铁皮做的,当炮弹袭击的时候,弹片会四处飞散。但我们从未去搬动北越人。他们就待在自己的床上。而美国人则搬到地板的垫子上远离火力攻击范围。

当我在处理该资料时,一些模糊的概念开始在我脑中出现。回顾我们的受访者所提到的所有的矛盾,我的脑海中开始勾画一个叫作“越南”的地方,至少是从一个参与者的角度勾画的。这是一个“矛盾”的地方,道德或不道德(moral and otherwise),一个超现实的环境,在那里错是对,对是错。尽管安全的地方不一定安全,因为敌人会向医院开火,而且虽然受伤的美国士兵被搬离了他们的床,但越南人被留在他们的床上,处在火力攻击的范围。

然后,我们的受访者继续说道:

……还有其他的一些矛盾,在白天,我们会让越南人到营中做些事,打扫卫生等等。你不知道他们晚上是否会出去,穿上他们黑色的宽松裤,变成越共。就好像,在白天你一切正常,我们能看见你。但在晚上,我不知道你是谁,以及其他类似的事情。

白天,越南人在基地干活。晚上,他们会偷偷地袭击同一个基地——另外一个“矛盾”。“表面的真实”不是“所知的真实”,而是一个没有什么东西像它所显现的样子的世界。你如何能赋予这样的世界以意义?以及当有这么多矛盾时如何维持目标和心理平衡?你所能做的就是专注于“生存”。我一直在想,是否有什么我可以用来将其与这种体验进行比较的,从而找到一个更好的方法处理它?我能想到的是《爱丽丝漫游仙境》,感觉很多人在超现实的仙境中四处奔跑。但这对比较起不到帮助作用。嗯,也许更好的比较就是爬上像珠穆朗玛峰这样的高山。在战争环境中需要生存下来。就像在高山环境,它碾碎你的思想,使你困惑,使你很难活着出来,因为大脑受到高原反应的影响,看起来是真实的东西,实际上是不“真实”的。在珠穆朗玛峰,你的生命取决于训练、体能、精神力量、适当的装备、大量的运气,以及在紧急情况下作出正确的决定。而在战争中幸存下来也取决于接受的训练、体能、精神力量和原则、大量的运气、适当的装备和支持,以及在紧急情况下作出正确的决定。但在越南,道德准备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颠覆,一个人与他原来的世界脱离开了,在家乡被认为是错的行为,在

这里似乎是对的。只有在精神上和身体上最适应的人才能够熬过这种体验而不受伤害，或者，更好的表达方式是，只有最适应的人才能够不需要太多帮助就能够重新适应平民生活。我想，重新适应平民生活的最佳策略应该就是我们的受访者在接下来的访谈中所提及的了。这些策略包括“隔绝这种体验”和“建立一道沉默之墙”。

备忘录 19 回家继续生活 2006.6.13

我在那里待了一年。回想起来，也不是那么可怕的一年，它很快就过去了。对我来说，它使我成熟了。嗯……我是在 1967 年回来的。那时正是和平运动开始高涨的时候，我记得在西贡之后的第一站是旧金山飞机场。他们叫我脱下制服，换上便服，因为机场的人们正向从越南回来的战士扔东西，喊他们杀人者等类似的口号，这让我真的要疯了。我想我们到越南，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他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们？

在上面的文字中，受访者从越南转向“回家”。这部分非常有趣，因为他描述了从战争到家的转变。对他来说，这种转变很顺利，他继续他的生活，做在越南时就计划好的事。他告诉我们做这些战后计划的原因是引人深思的，他说这些计划给了他一些可以依赖的东西，帮他生存下来。他告诉我们的另一个生存策略就是“计划未来”。

他还指出了他回到家后发现了另一个矛盾。国内人们对于战争以及参战的态度与他不同。这让他很生气，因为他觉得他和他的战友们响应国家的号召，冒着生命危险为国家服务。然而，回国后，却被人们认为这么做是有点儿“不干净(unclean)”。

备忘录 20 美国人的失败：反战环境 2006.6.13

那是 1967 年，和平运动闹得很大。我那时在上大学，我对学生的游行、结队和演讲很生气。那时，我们还有士兵在越南，我知道，当他们看到或听到这些国内的新闻，他们一定会感到受伤害。现在回想起来，正如我之前所说，我钦佩游行者，那时我是站在我

自己的角度，一个爱国者的角度去看待的他们的，而他们是站在他们的角度来看的，他们觉得“战争是错误的”，而且一切都是错误的。所以现在回头再去看过去，我钦佩那些比我对战争更有远见的人。战争是错误的。

我并不是把和平示威者他们自己称为“美国人的失败”，更为最重要的是，它不断提醒着人们，这个国家正在进行一场似乎要输掉的战争。另外，我们的受访者认为去越南是“正确的事情”，然而，当他从战场回来时，他发现人们告诉他这是一件“错误的事情”。更糟糕的是，对回家战士的态度表明了人们的责备。人们责备战士们参加了一场不受欢迎的战争，却没想到他们是被征兵役而且被迫去打仗的。富人子弟缓期应征(deferments)，而中产阶级和穷人子弟则要去打仗。他对和平示威者表达了心中的愤怒。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改变了对战争的看法，对他来说，时间赋予了战争新的意义。在这“反战的环境”里继续生活下去要求“让一切都过去”的策略，那就是，脱下你的军服，然后融入人群中。对于刚从前线回来的人以及那些仍然信任自己的国家及其使命的人来说，尽管爱国主义出现了一些瑕疵，但做到“让一切都过去”和“不理会大众”是很难的。另外，仍然有很多年轻人在越南为国家在牺牲他们的生命，而在国内，有一些“从未经历过战争的恐怖”的人们却坐在家里对他们进行评价。

备忘录21 逐渐醒悟:战争的新意义 2006.6.13

几年来，我对战争的看法发生了改变。对于我们来说，去越南是无意义的。但这很难动摇你的爱国主义思想，很难将其放弃。

这是一条很短的信息，但却很重要。它将他对战争看法的变化过程很好地展现出来。当他去参加战争时，他将其看作是“去做正确的事情”，然而，几年之后，他觉得去参战是徒劳无益的。但在这期间发生了很多事。不仅仅是战争，还有社会动荡不安，随之而来的战争，艾滋病的出现，等等。战争是改变他想法的催化剂，战争打开了他的眼界。战争中伤亡的现实为他的醒悟播下了种子，而战后所发生的事只

是帮助这些种子成长而已。当“道德矛盾”和“良心的吞噬”第一次出现时，变化就开始了，并持续到现在。“自我的变化”和“意义的变化”是贯穿访谈的重要主题。我想，他的一部分醒悟还与和平示威者有关，这些示威者让那些从前线回来的战士们非常气愤，而且我气愤的是社会对那些参加战争的战士缺乏承认。另外，还有对政府的愤怒，政府送这些年轻人上战场，却没有赋予他们一个完整的使命让他们为之战斗。我想知道，这种愤怒在那些曾在越南服务的战士们中有多么普遍？要唤醒对战争和政府醒悟，一个人并不需要到越南去。我们的受访者似乎是努力在一个承载着充满情绪和矛盾冲突的战争经历中寻找意义。

方法论说明 在上一个备忘录中，就像很多新手研究者经常做的那样，我把受访者的感受编码为“态度上的改变”或“动摇爱国主义”。但是，作为一名分析人员，他所要做的是努力理解受访者所谈论的本质，也就是，要努力理解资料的根本议题，而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每一个很小可能的概念。我还可以把“醒悟”和“战争的意义”联系起来，描述意义是如何随着时间、地点而演化，以及作为各种经历的结果，它们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同时也要注意，有些备忘录把两个概念，如“战争体验”和“心理生存策略”放在一起。这些备忘录可以说是轴向编码的一些例子，因为它们表明了两个或两个以上概念之间的关系。

备忘录 22 战争作为迈向成熟的垫脚石：变化的自我 2006.6.13

我觉得这场战争经历给了我积极地做一些事的动力，我那时可能才 22 或 23 岁，我在战争中形成了很多打算退役后要做的计划。后来，回家后，我申请去上大学，获得了护理方面的学士和硕士学位。我很忙，我业余时间工作并继续上学。

我们的受访者指出了战争带给他的意义是给了他去上学和做一些他生活中事情的动力。他在访谈的剩余部分里提到了战争使他成熟的一些原因，如一些必须要承担责任的事，要有好的角色模式，以及最终学会了接受自己是一名同性恋(gay)（见附录 A 中的完整访谈）。

这只是“他的生命中的一年”，他人生成长的“一个方面”。与其说战争经历是他人生的“转折点”，还不如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所以在这份资料中还描述了另一过程，“变化的自我”。在他的例子中，这是一个走向成熟的过程。战争是改变他自我的一个垫脚石（stepping-stone）。

备忘录23 沉默之墙 2006.6.13

我很忙。我业余时间工作而且还要上学。我真的太忙了，无暇思考整个战争经历。我把他尘封在过去里，继续过我的生活。在这一方面，可以说，战争对我的生活确实没有什么负面影响。这么多年，我确实不知道我对战争和杀戮的感情是如何变化的。很难说是什么导致这样的变化，无论是成熟的过程，还是意识到战争的矛盾和对战争无意义的感情。我一般都阻挡这样的情景，不想回忆这些内容。我从来没有去看过一场有关越战的电影，也不会去看。这些对我绝对不会有吸引力。我不知道为什么它们对我没有吸引力。我从来没有想去维持我们在越战中认识的那些人的友谊。我离开了军队。我知道，我绝不会再想要这些了。

对我来说，整个越南战争体验的一个有趣的方面是，似乎有一扇“沉默之墙”存在，一扇围绕着体验本身建立的内在之墙和一扇建立在自我和外部世界之间的外部之墙。离开了军队的人真的都不想谈论越战，尤其是不想和外面的人谈论。当我试着为该研究寻找受访者时，我就遭遇到了一扇“沉默之墙”。只有一个人回我的电话说愿意作为参与者。另外一个人回应说愿意作为参与者，但是不想接受访谈，他说，“我都不想和我的妻子谈论越战，为什么我要跟你说?”（意思是我这个研究者）我的结论是，对于很多越战老兵来说，这场战争是一个非常“令他们不安的经历”，无法轻松对待。当战士们回来的时候，他们所受到的接待更进一步将他们推向这扇墙的后面。他们甚至不想在他们之间谈论，这在访谈中非常明显。这位士兵从来没有在他的爱人或兄弟们面前讨论过这场战争。这位参与者通过“一直忙碌”“不与他人说话”“不看有关越南的书或电影”，从而维持自己的沉默之墙

不被触及，换句话说就是不做任何会带来“回忆”的事情。我从我的经历知道，当我在退伍军人管理局医院对护士长们进行研究的时候，有些老兵仍然还在做噩梦，因为“往事不断重现(flashbacks)”，有些人甚至求助于毒品(drugs)和酒精来摆脱。

备忘录24 关于战争作为成熟过程的补充：变化的自我 2006.6.13

当我思考战争对我的影响时，我觉得是积极的。说战争具有积极的影响似乎很奇怪。我在越南遇到过一些人，一些积极的人，这激发了我去继续上学的念头。(暂停)我想说，如果我必须重视这事，它就可能更加积极而不是消极。这是一个成熟的过程。我可能早就成熟了，但这次有点儿瞬间成熟的感觉。

无疑，上战场让你迅速成长。我发现，在阅读过程中我也有所成长。有一个谈话，说的是一个年轻人离家上战场，回家时像一个老人了，因为高度紧张的经历。当然，在战区的现实打消了你可能对上战场曾有的所有罗曼蒂克似的想象。知道别人有机会就会杀死你，如我们参与者在前面访谈中说的，而且看到有的受伤，有的牺牲，这会让你快速成长。我仍然感到好奇的是，该参与者说，战争对他具有积极的影响，更积极而不是消极的影响。我只能认为，他是从正面来看待战争，因为他从来都不需要到战斗中，而且他的时间都是用来照顾伤病员，换句话说是做一些正面的事情。

备忘录25 战争意义的演化 2006.6.13

当我离开了军队之后，我仍然很气愤。那是1967年，和平运动气势高涨。当时我在上大学，我对那些学生示威者、群体以及诸如此类的人非常恼火。战场上还有战士们在那儿，我知道，看到这些，看到这些新闻以及与此有关的消息，对他们是一种伤害。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像我之前说的，我敬佩这些示威者。那时，我是从我的观点，一个爱国者的视角来看待他们，他们则是从他们的观点来看待战争，“这完全是一个错误”。所以现在回过头来

看,我佩服那些当时比我在那时更能够洞见形势的那些人。战争是错误的。

我当然理解他对和平示威者的不满。他刚刚回到家,越战的经历以及战争的伤亡都历历在目。他可以联系到所有的仍然在越南的以及仍在前线的那些人,此时这些家伙却从他们自己国家的安全出发来抗议。而且,上面引用的话给我们展示了他有关战争的思想随着时间而发生的变化。这在他的思想中是一个转折。

方法论说明 在阅读访谈记录其余部分中,我发现很多材料都扩展了我们已经发现的概念。对于同一访谈记录,没有必要再继续这样的编码展示了。但只是为了让我们的读者知道,我将继续以同样的方式对剩下的访谈记录进行编码,就像这里所展示的一样。我将提出已经描述出来的概念,并进一步寻找其他概念。

在结束之前,还有两个其他领域是我想要去写关于它们的备忘录的。

备忘录26 突破沉默之墙 2006.6.13

我们的受访者没有和他们的配偶或兄弟们提起他们的战争经历,但他却检查所有的讣闻,去查看是否有他们认识的人在名单之列。因此,尽管他努力维持这道沉默之墙,让关于战争的思想留在记忆的深处,但它在某种程度上一定是偷偷地出现了,因为他会阅读这些讣闻。他仍然与越战有联系,通过那些与他一起服役的人。

备忘录27 对未来的定位:生存的策略 2006.6.13

我们的受访者在访谈中很少谈论生存,很可能是因为他不是一名战士。然而,他确实有一些策略,他在某种程度上利用它们来帮助自己逃避战争的恐惧和求得生存。对于这一点,他说,"我想,对未来的定位有点儿能够帮助你从当前所处的情景中抽身出来。我考虑更多的是未来,而不是当前。"

然后,他继续说:

我想,无论谁,如果不能超越当时来处理任何事情……我就想,他们处理起来会更加困难……我能够看出来……而且可能通过形成我对未来的计划来下意识地告诉我,我还有未来,我不会死,我会离开这里的。

备忘录 28 努力寻找意义和承认:去纪念馆(Memorial) 2006.6.13

我感觉到,通过去战争纪念馆以及做该访谈,即使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的受访者依然在努力寻找战争的某种意义以及他和其他人在那里的经历。他去战争纪念馆部分出于好奇,但更多的是他想要寻找战争的意义,战争导致了 58 000 名美国人的死亡以及更多越南人的死亡。当他到那儿的时候,他想得到某种承认,他想要发现一种人们一直都关心的联系纽带或某种启示。当他刚从战场回来的时候,他希望他没有去那儿。阅读该访谈记录,我并不确定他是否通过去纪念馆而找到了他想要寻找的东西。实际上,我怀疑他只是再次掩藏自己的情绪,这可能会留下更大的失落感。

方法论说明 到现在,我们的读者都知道了我们开始的分析是如何进行的。它是对资料进行头脑风暴,以便发现意义,然后用一些概念来代表想要表达的意义,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概念化。这时概念和最重要的类属/主题都是暂时性的。概念需要对照后面的资料进行详细的检查,而且随着分析结果积累,这些概念需要增加、修改,或者被丢弃。下面这些备忘录来自上面的备忘录,它们就我们思考的这些方面进行了总结和综合。

备忘录 29 访谈印象 2006.6.14

对该访谈分析和思考了好几天之后,我为主要矛盾所困惑,我觉得这个矛盾贯穿着整个访谈。我仍然感到对战争积郁的愤怒和潜藏的感情。这很难解释,但还是要尝试。我觉得很多东西被遮蔽了,可能并不是故意的,但却被掩盖了,裹上了糖衣。并不是说他没有说什么事情,他确实说了。但问题是他对事情作出回应的方式,如在胡志

明“尸体堆积的就像柴堆一样(like cords of wood)”。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得到解释,因为“这是战争”而且像这样的事情是在“意料之中的”。该访谈几乎就像最近在伊拉克的战争被电视台记者所报道的一样。它已经被筛选过。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血汗或恐惧。我们的受访者在野外医院工作,坐直升机执行任务去接送伤员。他肯定看到过可怕的事情,士兵肢体断离、内脏暴露以及一堆堆的运尸袋。他肯定遇到过这样的士兵,他们因恐惧和长期的压力而发疯。他没有谈论这些。这是正在消失的情绪、感情。他确实说,在越南改变了他对事情的情感,即由于这种体验他变得“冷漠(hardened)”了。但是被战争激发出来的原初情绪却被封闭在某种深暗的地方。通过他的故事,读者能够感受到这种愤怒和罪恶。他们对政府愤怒是因为政府将战士们送到越南,虽然称其为一场“战争”却未充分给予他们支持。还有的愤怒是因为这是一场“没有解决任何问题的战争”,一场无用的战争。他还对和平示威者愤怒,他们说战争是错误的,因为他必须要向这些人妥协,而很多人却为他们认为“错误的战争”丢掉了生命。他还对自己感到愤怒,因为他相信了自己的国家,使自己成为了“被欺骗者”。还有罪恶和愤怒是由于没有对“敌人”更富有同情心或照顾,“敌人”也是人而且也受伤了。他到越南战争纪念馆的旅行很有感触而且非常具有启发意义。他想承认那些付出了生命的人。他想要一帮人、一群人在那儿,说战争是有价值的。但是他只是一个人站在那儿。很有趣的是,他去纪念馆寻找他朋友的兄弟的名字,然后走开了,将所有的情绪都掩埋起来,不想再回到以前。当他后来在访谈中说,政府从来都没有对越南宣战。这是使得访谈在事实发生之后显得非常有趣的地方。我们有了“回顾的视角”。我们通过当时和现在的不同透镜看待战争。我们还看到,即使这么多年过去了,要想穿过沉默之墙依然非常困难。

备忘录30 主题/类属备忘录总结 2006.6.14

在该访谈中,我看有好几个主题/类属在发展演进。我的意思是它们是贯穿该访谈的线索或观念。他们已经将它们看作概念,但这时,我们将它们提升到主题/类属的地位,这不仅是因为它们似乎贯穿整个访谈记录,而且还因为它们似乎能够将一些更小的概念结合到

一起。

第一个主题/类属是“战争文化”。对于该主题/类属，我的意思是，战争都有其自己的文化，这里发生的事情常常与“平民的”准则和行为标准发生“冲突”。这些冲突被体验为“对良心的吞噬”或者更准确一点是“矛盾(inconsistencies)”。另外，战争文化是一种超现实文化，是一个国家的事情，对人自己很陌生。战争中有一个“敌人”，如果有机会，敌人会杀死你或抓住你。这是一种有很多规则的文化，这些规则由发起战争的军队机器建立并实施，这是一种每一个战士必须服从的机器——他们要你到哪儿你就要到哪儿，他们让你什么时候去你就什么时候去，他们让你做什么你就要做什么。如果他们要你到丛林中与敌人战斗，你就必须要去，即使你害怕。这是一种战斗的文化，死亡的文化及毁灭的文化，有时候巨大的恐惧唤起了心理和生理上的生存策略。这是一种文化，只有通过真正负责人的行为和求生存才能够加速成熟的过程。在这个标题下面，我会给它们贴上“敌人”“冲突地区”和“安全区域”“军队系统”“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以及“心理和生理生存策略”这样的概念。

还有一个主题/类属我在这里称其为“变化的自我”。这次，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些类属，但是似乎必须要研究经历战争体验在自我上的逐渐变化。开始是一个爱国主义的、充满热情的个人，很多人都是非常年轻，通过在越南期间发生的事情，个人变化了，有时候变得更好，就像该案例中我们的受访者，有时候会变得更加糟糕。对于我们的受访者，越南的经历是一个成熟的过程。它帮助他认识到他是谁，并为其建立了未来的计划。其他战士可能受到不同的影响，而这仍然有待于在后面的资料中去发现。我们的受访者成长非常快，知道“外面”有人想要杀死他。我想，在这个主题下面会出现像这样的概念：“通往战争的路”“自我定位”“战争作为一个垫脚石”“在战争期间的经历和战后的经历”，如“继续生活”。

第三个主题与“战争意义的发展演化”有关。很多年轻人，就像我们的受访者所做的，是满怀着激情和对战争的浪漫情怀进入战场的。最后，他们的幻想破灭了，战争是无意义的。“什么也没有改变，什么也没有实现。”在这个标题之下，我想提出的概念有：“自愿”“和平运动”和“沉默之墙”。我通过该访谈发现了沉默。退伍战士们不想谈

论这些体验。他们也不想去看有关这场战争的电影或阅读这方面的书籍。文献中为沉默之墙所提供的理由中，有经历本身的性质，即战争的某些邪恶和敌人的顽固，还有看到很多死伤尸体的沮丧，尤其是看到自己同志的尸体。除了这种体验，还有就是像艾萨克斯(Isaacs，1997)所指出的，当战士们返回家乡时，他们的牺牲和努力没有得到承认。不像其他战争那样，没有乐队，也没有游行的队伍欢迎他们。实际上，战士们常常因为战争和那里遭受的破坏而受到谴责。而且，有些战士，如我们的受访者，觉得政府从来没有真正为战争承担责任。他们将战士们送到战场，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目的，仅仅是一些模糊的反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理由，而当战士们到了那儿之后，政府并没有很好地给予支持。他们不理解，敌人为什么要打仗，而且也低估了他们的战斗力。

备忘录31 理论抽样的问题和说明 2006.6.14

对访谈记录进行编码留给我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将用来指导理论抽样或进一步的资料收集。该受访者曾在军队中而且是一名“非战斗人员”。在对与访谈有关的所有分析完成之后，我只剩下一个非常重要的，而且我认为是最相关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从参战人员的视角来看，处于战争中是什么样子？

方法论说明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上面提出的这个问题对这里的分析是最重要的事情。这个问题将指导后面的资料收集工作。分析从一个访谈开始，它提供了“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的概念。该访谈是对一名非战斗人员的访谈。这里分析的结果是，他对战争的体验在很多方面与我们所期待的当然有很大的不同，在某种意义上，他所说的战争体验“并不是一种糟糕的体验”。正是对“不是很糟糕”这一体验维度化的描述使得我进行提问，那么，这种体验对于战斗人员是什么样子的呢？他会以同样的方式或另外一种方式来描述这样的体验吗？理论抽样就是这样进行的。在该例子中，“体验”这个概念的一个维度是“不是很糟糕”。我的直觉告诉我，他认为这不是很糟糕的原因是，他不是处于真正打

仗的前线(一种有待于通过进一步资料收集来验证或证否的假设)。该假设指导我接下来从战斗人员的角度来收集资料(理论抽样),从而确定"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如何一样或不一样地来描述他们的体验。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不仅延伸了我对"战争体验"的理解,我还看到了"战斗人员""非战斗人员"和"战争体验"这三个概念彼此之间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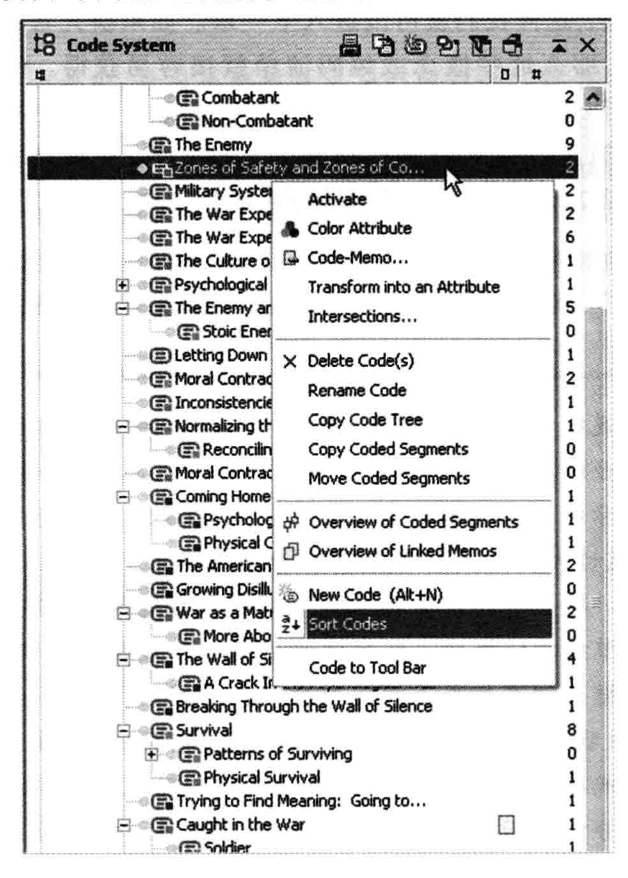
概念/编码清单

这里,我有一个概念/编码清单,也许可以对概念/编码提供某种启示。我现将它们列出来,以便我在继续后面访谈分析的时候能够将它们记在心里。

1. 定位自我:入伍的时候
2. 自愿参军 vs. 被征入伍 vs. 逃避应征
3. 作为一名非战斗人员 vs. 作为一名战斗人员
4. 敌人
5. 安全区域和冲突区域或杀戮区域
6. 军队制度
7. 战争体验和阻挡或减少矛盾的策略
8. 战争体验
9. 战争文化及其矛盾
10. 心理生存策略
11. 敌人和心理生存策略(一种轴向编码备忘录)
12. 放下情感警惕
13. 战争的道德矛盾和心理生存策略(一种轴向编码备忘录)
14. 军队制度内的矛盾
15. 使情况正常化:另外一种生存策略
16. 道德矛盾
17. 回家继续生活
18. 美国人的失败:战争敌对环境
19. 逐渐醒悟:战争的新意义
20. 战争作为成熟过程中的垫脚石:变化的自我(一种轴向编

码备忘录）

21. 沉默之墙
22. 打破沉默之墙
23. 生存
24. 努力寻找意义：去战争纪念馆



屏幕截图9　这里你可以看到在MAXQDA中如何处理编码。你可以按照等级顺序对它们进行排列。它们的组织形式类似于Windows浏览器——你可以看到，如果一个编码前面有一个小小的+号，则表示该编码有一个次级编码。编码中小小的矩形标记出你为编码所选择的颜色。所有的编码线条都是以颜色的形式展示，而且颜色还有直观作用，如TextPortrait、CodeStream等。颜色的选择完全取决

于研究者,有好几百种颜色可以选择。右边每一个编码的数量表明目前有多少文本片段与该编码建立起了联系。鼠标右键点击任何编码都将出现全部菜单。这样,你就可以很容易地看到你要处理的编码系统的那些选项。

方法论说明 这里列出这些概念的目的是为读者提供一份材料以便于记忆,这样我们就可以进入下一章。如果研究者在使用计算机程序,那么这些概念或编码清单就很容易获得。但是要记住,仅仅列出这些概念并不是我们的目的。重要的是这些概念所承载的思想,以及它们在属性和维度上的发展。这些属性和维度在我们的备忘录中并不总是阐述得很清楚,但它们却是我们自己的语言。

要点总结

本章说明了早期的编码。研究者将资料拆分为可操作的片段来开始分析,以备忘录的形式对资料进行反思,并对他/她认为资料所指示的意思用概念进行总结。为了理解资料所表达的意思,可以通过大量的头脑风暴不断地对资料进行提问、比较以及大量反思。有些备忘录是通过概念扩展丰富起来的,包括资料中的一些细节或次级概念。还有尝试去做一些最初的轴向编码,或者将次级概念和更加宽泛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例如在入伍的时候的“定位自我”和列出其下面的下位概念。而且,还要描述一些可能的主题或类属,虽然这里的类属仍然有待验证和发展。本章中的大多数分析为后面的资料收集提供了指导。指导后面资料收集就是这样的问题:作为一名“战斗人员”或作为一名“非战斗人员”如何影响“战争体验”?在下面一章中,我将从我暂停的地方继续我的分析,用后面的资料继续前面的分析。

思考、写作及小组讨论活动

1. 坐下来,思考本章中研究者做了什么分析。

2. 撰写一个有关分析过程的详细备忘录以及你从中学到了什么。如果你使用 MAXQDA 来撰写备忘录,那么要为你的备忘录考虑一个有意义的符号。利用一切可能将你的编码和备忘录连接起来,看你的备忘录是否可能和现有的编码建立联系。
3. 和小组讨论你的备忘录,指出你从上面的展示中学到了什么东西。
4. 在一个小组中,拿出小组成员或导师提供的一段资料、一篇访谈记录或一份观察记录,然后对其进行分析。提出一些概念,并撰写备忘录说明和拓展这些概念。如果你使用 MAXQDA,为小组的每个人选择一种“个人的”颜色,然后将所有其他编码的颜色放到一边。当完成了编码,打开所有的颜色,将你的小组不同成员所做的编码进行比较。讨论编码的差异。

9

阐明分析过程

就研究者来说，创造性的、坚实的资料分析需要机敏的提问，对答案孜孜不倦的寻求，积极主动的观察以及精确的回忆。这是一个整合资料的过程，一个使得不可见的东西变得可见的过程，一个连接和搭配前因后果的过程。这是一个推测和验证的过程，一个校正和修改的过程，一个提议和辩护的过程。(Morse & Field, 1995, pp. 125-126)

框 9.1 术语界定

轴向编码：将概念相互贯穿或联系起来。虽然本章不会专门阐述这个问题，但注意当在同一个备忘录中讨论两个概念时，我在运用的就是本书以前的版本中的轴向编码方法。

比较分析：将事件与事件进行比较，以寻找相似和差异之处。如果发现与前面编过码的事件在概念上相似的事件就赋予它们相同的概念标签，并放到同一个编码下面。每一个新的在某一编码下被编码的事件都通过阐述和引入变化形式增加了该编码的一般属性和维度。

概念的饱和：获得足够的资料以从属性和维度上充分发展每一个类属/主题并对变化形式进行说明的过程。

开放编码：将资料拆分开，勾画出概念来代表原始资料块。同时，研究者要从属性和维度上对这些概念进行描述。

理论抽样：在那些看上去和故事线发展相关的概念基础上搜集资料。

导 论

作为第9章的导论,我(科宾)想给读者讲述下面的故事。在完成了第8章的草稿之后,我来到厨房准备午餐。在准备主菜和沙拉之间的某个时刻,我突然有一个洞见(当你一整天沉浸在资料分析中时,这种情况常常发生)。我回到计算机前,写下了下面的备忘录。

备忘录1 关于战争体验的方法论说明 2005.6.1

在我认为是参与者#1 的访谈中所含有的主要思想中遗漏了一个重要的范畴/主题。它就是"战争体验"。是的,我把"战争体验"定义为一个概念,但是把它放在"演化中的战争意义"这一类属/主题的下面,而没有将其本身界定为一个类属/主题。离开资料之后,我越发清楚地发现,虽然这两个概念有联系,但是从分析的角度看却是不同的。而且,这两个概念也不同于第三个概念,它就是"战争文化"。"演化中的战争意义"这个类属属于一个人对战争的感情、情绪和态度,它们演化中的建立在个人的战场经历基础上的,这是非常主观的。"战争文化"属于战争发生的情境。因为它与战争的目的,在战区中以及回国后发生的与战争有关的真实事件有关,在这个意义上它不是那么的主观。它还包括战争中的规范以及战争的现实如何和平民世界的规范区别开。它还与建立起来用来战斗和维持战争的整个军队制度有关。另一方面,"战争体验"与那些真实事件的"感知"有关,例如人们是如何体验战斗、朋友的死亡以及看到路边的尸体。它还是情境的一部分,但却属于条件矩阵的更加个人层面的东西。甚至在坐下来考虑下一组资料之前,我对自己的思考进行一点儿修订和改善。

上面的这个小故事的寓意是,分析者对资料做越多的分析工作,就越可能有"啊哈"顿悟体验或突然洞见到资料的可能意义。洞见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可能会出现,因此研究者必须总要准备好在它们消失之前把它们写下来。修订和重新修订形成中的分析方案,尤其是在分析的早期阶段,不应该为此感到忧虑。

解释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资料的积累进行修改。事实上,新的洞见及随后对分析体系的修改常常直到研究结束仍在发生。在研究后期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资料并不表示早先的分析是错误的。这只是说明理解在发展变化,一些细节之前被忽视了,但是随着研究者阅读的资料越来越多,这些细节的意义开始显现。

在这一章中,我会继续自第 8 章开始的资料分析。在这一分析阶段,指导资料收集的问题建立在对先前访谈资料的分析基础之上,并由我,也就是分析者,来决定和演化中的故事线最为相关的问题。指导本阶段分析的问题是:对于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越战体验在什么方面不同?换句话说,是“战斗人员”这个概念指导着分析。研究者的兴趣在于: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的战争体验在什么方面相似或不同,以及为什么是这样。

资料收集和分析将像下面这样进行。我将从战士们那里获取资料,并将该资料与从先前的受访者#1,一名非战斗人员那里获取的资料进行比较。比较将在概念层面进行。更具体地说,再一次,资料被拆分为可处理的片段,然后对每一段资料进行仔细的审查。如果一段新资料在概念上与先前的访谈资料相同,那么将用相同的概念名称对其进行编码,但是这次我会问自己:我们对这个概念了解到了什么别的东西,这将进一步加深对参加战争是什么样的感觉的理解。例如,如果第二次访谈中的一件事情被编码为参战时期的“自我定位”,那么我就想要知道,该参与者把他自己定位在什么地方。也就是说,他告诉我的关于他自己的什么信息?与我们的第一个受访者相同或不同吗?他告诉我的任何新的东西都会加入到属性和维度清单上。而且,研究者还要寻找前面资料中可能没有的新的概念,并把它们添加到编码清单中。

除了在概念上作比较外,我会继续问些基于理论提出的问题,知道接下来如何进行资料收集(理论抽样)。研究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资料收集的过程,伴随着分析和撰写备忘录,引出问题,这些问题又引导进一步的资料收集,如此循环。在这一方法中,根据分析过程中的发现,最初的问题被一次次修改。整个的资料收

集和分析过程会继续,直到我满意于获得了充分的资料,能够对每一个类属/主题就其属性和维度进行充分的描述,直到我能够说明变化形式(概念饱和),而且最重要的是,直到我能够构建一个前后连贯的解释性故事。

这里我想强调一点。虽然这一阶段的分析集中于“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的比较,因为我认为这个概念很重要,但是另外一位研究者可能已经走在不同的方向上了。集中于这个概念并不意味着忽视其他的概念,比如自我和战争想象。它们仍然是重要的类属。这是因为我有这样的分析预感,即在自我、战争想象、战争文化、战争体验以及回家中的差异可能与一个人是否是一名以直接的方式与敌人接触的“前线战士”有关。在我开始分析第一次访谈记录之前,我只有一般的而且非常开放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对于在战争期间在越南服役的军人,越南战争的体验是什么样子的? 我不知道研究会走向哪里。我让我对第一次访谈资料的解释引导着我下一步该往哪儿走。

允许资料引导着你走是一种分析资料的方式,对于有些研究者来说这也许过于开放。有些研究者喜欢与原初的问题保持近得多的距离,但我敢说越是有经验的研究者越愿意“跟着资料的感觉走”,让资料引导他们。不过,越有经验的研究人员越不太可能必须要回答委员会成员的提问,对于什么是重要的,他们更愿意相信他们自己的直觉。然而,要注意,我一直围绕着我的目标群体,越战老兵,并且我仍想知道上战场对他们来说是什么样的感觉。

轴向编码

在本书以前的版本中曾经提到过轴向编码。在第 2 版中,轴向编码(将概念/类属彼此联系在一起的行为)作为单独一章介绍,仿佛它独立于开放编码进行一样(将资料拆分开,然后勾画概念来代表一块块的原始资料)。但是,正如你可能从第 8 章的备忘录中注意到的那样,开放编码和轴向编码是齐头并进的。在两

种类型的编码之间作出区分是“人为的”，而且只是为了解释的目的，为读者指出，虽然我们拆分了资料，并找到了代表那些资料的概念，但是我们必须还要通过将这些概念联系在一起的方式将这些资料重新组合到一起。当分析者分析资料的时候，他们的头脑会自动进行连接，毕竟，因为这些连接来自资料。例如，当我在一份备忘录中说，“阻挡(blocking)”是一种“心理生存策略”，我是在把这两个概念联系到一起，“阻挡”是一个较小的概念而“心理生存策略”则是一个更加宽泛、更具包容性的概念。虽然我提出了“阻挡”和“心理生存策略”的概念，但这些标签和它们之间的联系是建立在受访者提供的资料基础上的。这样，如果我说，使用“心理生存策略”对“战争体验”中“生存”是必需的，那么我就是提出了一个更抽象的假设，将两个类属联系起来，一种直觉，有待于通过资料进行检验，它要么被证实，要么宣布无效，或根据我在资料中的发现进行修改。

当我连接类属的时候，我也对它们进行说明。当我在我的分析中写下“阻挡”是一种“心理生存策略”时，它就成了一个心理策略下的解释性叙词，说明了人如何在战争体验中存活下来，由此来阐明这个概念。连接发生在各种层次，较低层次的概念，如阻挡，到一个较高层次的概念，如心理生存策略，以及心理策略到“战争体验。”这就像把一系列相互连接的积木放到一起建造一个金字塔。金字塔代表着整个结构，但是积木，以及这些积木如何排列才是使其成为其所是的构成要素。在本章中读者会注意到的是，很多时候，备忘录的标题(这基本上是编码)通常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概念，且备忘录要阐明这些概念之间的联系。

分析策略

我想要提醒读者的是，对分析过程的说明，提问题和作比较的分析策略依然是主要的分析策略。例如，如果我要更多地思考“心理生存策略”，在继续分析下一个访谈记录之前，我可以问“谁”使用了心理生存策略，他们“什么时候”使用的，“为什么”，且“如何”使用以及“带来的结果是什么”？第一位参与者告诉我

们,他用这些策略主要是为了帮助他在战争体验中存活下来并处理战争在他内心引起的道德冲突。然后,我就问,其他战士使用这些策略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还是另有原因?通过对比情况的思考,分析者变得更加敏感,这提醒他或她要在资料中寻找什么。

本章中关于使用访谈的情况

本章中使用的访谈与在第8章中使用的有点不同。在第8章中,我分析的访谈可以看作是一个“非结构化访谈”。参与者可以根据自己所看到的来讲述自己的故事,只是在他结束了自己的讲述之后,访谈者才进行提问,提问的问题是根据访谈中引发出来的要点而且是访谈者觉得有必要进一步说明的。随后两个访谈不同,我们可以称其为“结构化访谈”。因为参与者的回答是根据分析者从前面资料中提出来的一系列问题。以这种方式进行访谈是一个没有选择的事情。我更喜欢做非结构化访谈。但是在这个案例中做非结构化访谈被证明是不可能的。我如何获得另外的访谈材料是很有趣的事情。在分析了第一次访谈后,我意识到,作为理论抽样的一部分,我必须要访谈“战斗人员”。不幸的是,我不认识曾在越南战争中作过战斗且足以能够要求进行访谈的人。我决定到网上看看是否能够联系上越战老兵,或许会找到一些潜在的研究参与者。我发现了一个越南战争参与者的聊天室,并邀请研究参与者。但只有一个人作出了回应。

起初,我感到失望的是,人们没有利用这个机会参与到本书中来。事实上,我的邀请遭遇到很大的冷遇。一位越战老兵写道:“如果我不能和我的妻子谈论这段经历,我为什么还要和你谈?”说得好!一位网友,他同意接受该研究的访谈,即参与者#2,说他愿意回答有关他的经历问题,因为他的部分愿望是用他自己的越战经历教育其他人。其实,他经常在群体中谈论这场战争。参加者#2 回答问题非常简短,但是很诚实且很有力。

另外,我想向我的读者保证,在实施网上研究时,我确实采取了一些措施来维持道德标准。该网站是不公开的,参与者只能与

我联系。我可以在网站上留言,但我不能与任何人聊天。对于这两个回应者,我完全向他们公开访谈的原因以及收集资料的用处。我甚至将这一章复印给这两位参与者,让他们看看这些材料是如何使用的,以便他们能够作出回应并提出任何异议。我也获得了他们的签字同意,并采取措施以保证他们的隐私和姓名不被泄露(Flicker, Haans, & Skinner, 2004; Hamilton & Bowers, 2006)。对参与者#2 的访谈有两部分。这两部分访谈都能够在附录 C 中看到。

备忘录 1 自我定位:进入战场 2006.6.20

去越南那年我 21 岁。我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一位教师、教练和体育训练员,母亲是一个家庭主妇,还有一个妹妹,比我小 19 个月。我没有结婚或订婚。我父亲是一个二战老兵,当时在意大利托雷塔(Toretta)驾驶 B24 轰炸机,他有 50 次飞行作战任务经验。我的家庭支持我的选择,但不一定是越南战争。

"自我定位"的概念也适用于本次访谈。在这次访谈中,我们知道,提供个人信息是为了回应研究者直接提出的问题。这位回答者的"家庭背景"与参与者#1 非常相似。参与者#2 来自中产阶级的、亲密的且积极支持的家庭。他的父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在军队服役过。我们的两位参与者都来自完整的中产阶级家庭,这非常有趣,因为人们经常听到的是在越南服役的人主要来自少数民族或低收入家庭。虽然在越南战争中可能有一定比例的男女来自少数民族或低收入家庭,但很明显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的背景。这两人之间的不同点是,参与者#1 是作为一名护士来培养的,因此,不可能成为一名战斗人员。他没有志愿成为海军陆战队士兵。成为士兵就会将你放到前线作为一名"战斗人员"。回到这一概念,在我们的分析中"刚入伍时的自我"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发现了属于"年龄""教育"和"家庭背景"的属性。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推断"年轻"是年龄的一个维度(25 岁或更小)。家庭背景的维度包括"中产阶级""完整的""爱国的"或"有责任感"以及"积极支持的家庭"。教育的维度包括"上过某大学"。

方法论说明 在分析过程中，研究者头脑中带着很多不同的想法。可以用计算机来保留一个动态的概念清单和备忘录记录。它们有助于分析者转变观念、回顾备忘录，以及方便查阅已经完成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说，计算机是一个很好的分析工具，可以添加到我们已经发现的分析工具中。但是计算机不能代替思考，它不能推动研究，这只有人才能做到。这就是为什么人的因素在做质性研究中如此重要的原因。计算机程序是令人振奋的，它们增加了另一个维度，但分析者不应该误以为如果他们使用了计算机程序他们就可以不用思考和撰写备忘录。有了这些知识的支持，我想说明我将从哪儿进行分析。

记得最后一章分析的重点是“战争体验”的概念。我的假设是如果这个人是一名“战斗人员”而不是一名“非战斗人员”，那么“体验”可能很不一样，因此，我特意从一名战斗人员那里收集资料。当时的想法是要检验我的猜测，这样的经验描述应该很不一样。从比较的立场看，非常有趣的是，我们的两个参与者就关于他们在刚入伍的时候他们是谁以及家庭背景方面，他们有很多共同点。因此，任何不同都可能与“入伍时的自我”没有关系，虽然这需要进一步检验。当检查这些资料将决定什么在体验中造成了差异时，这个问题依然存在，而且这个问题与一个人是战斗人员而另一个人是非战斗人员会有关系吗？当我们继续撰写本章时，读者会注意到，在我做分析的时候，我经常使用术语“我们(we)”或“我们(us)”或“我们的(our)”。这些词指的是读者和我，因为我正在带领着读者踏上我的分析之旅。

备忘录2 作为一名志愿参军者 2006.6.20

当我在1964年进入军队的时候，和所有的士兵一样，我也是一名志愿参军者。我没有和那些征兵入伍的人一起在越南服役。

再说一次，我们的受访者是一名“志愿参军者”。他在一个全部是志愿参军者的海军部队中服役，在这里服役的人都将其看作是一支“精英”和“训练有素”的军队。这与参与者#1代表的群体形成了鲜明

的对比,后者将自己描述为"6周的奇迹"。这名参与者提供的他参加海军陆战队时间是1964年。从战争的角度来看,这非常重要,因为当他志愿入伍的时候,唯一被送往越南的美国军队在那儿只是起到宣传作用。他们的工作是训练和支持南部越南军队。这就告诉我们,这位参与者并没有为去越南而特意参加海军陆战队。他最终到越南是偶然的。他说,不是这个"原因"本身吸引他参加海军陆战队的,而是军队所代表的意义,宪法所赋予的保卫我们的国家和保护我们的权利。这里我们与第一位受访者进行了某种比较。参与者#1 志愿参加护理军团,先于征兵一步。美国提升了其在越南的参与程度,而且他知道他可能会被送到越南。他并不介意,因为"在那时"他认为国家决定"到那里是正确的"而且"这是正确的事情"。如果参与者#1 没想到他会被征兵入伍,他可能不会志愿参军了。另一方面,参与者#2 到越南是因为他已经是一名海军陆战队士兵,而且正好碰巧战争升级了。虽然"通往战争的路径"不同,但他们最终都到了同一个地方,越南。

备忘录3 作为一名战斗人员　　2006.6.20

我是一名海军陆战队步枪手,还获得了3.5英寸火箭筒发射的资格。

现在我们进入问题的核心。这位参与者是名"战斗人员",其实他也是这样给自己定义的。他是一位与"敌人"打仗的前线士兵,和我们的第一位参与者形成了对比,他只是当敌人碰巧受伤才和他们接触。这将是非常有趣的事情,循着资料,并注意他"作为一名战斗人员"是如何形成了我们对他经历的理解。

备忘录4 敌人、战争体验以及这场战争的文化　　2006.6.20

越共是一支训练非常有素和纪律严明的军队,他们通过恐怖、杀戮、酷刑等在当地村庄获得了落脚地道。

一个有趣的评论,"战争体验",部分是由你与之打仗的"敌人"界定的。这位参与者将"敌人"称作是"训练有素的""纪律严明的"(这些是"敌人"概念的属性,因为这位参与者是这样描述他们的)。他甚

至给予我们该纪律和训练的品质属性或维度，认为敌人是“训练有素的”。他告诉了我们更多有关“敌人”的情况。他说，敌人往往通过“恐怖活动”来“控制村庄和村民”。那么，“这场战争文化”的一部分就是，普通人“卷入了战争”，违背自己的意愿为“敌人”提供避难和支持。这使得战士们很难界定谁是“敌人”，因为每一个公民（男人、妇女或儿童）都是潜在的“敌人”。因此战士们不仅遭遇到“训练有素的”敌人，他们还必须应对村民，他们也给战士们的生存带来了危险。

方法论说明　通过对可能关系的阐述，注意上面概念/类属的交叉或关联。这些关系将与不断收集来的资料进行检验，并在进一步的分析中被接受、修改或抛弃。在下面的备忘录中，我们也要对概念进行交叉连接。同样重要的是，要注意我们仍然是在进行开放编码。也就是说，当我们谈论“敌人”的概念时，我们赋予它的属性是“训练有素的”和“纪律严明的”，而当我们问敌人是谁的时候，我们收到的答案是它可能是“任何人”。

备忘录5　战争体验、军队制度，以及战争文化　2006.6.20

像我这样的海军陆战队员普遍都是被训练要遵从命令的，不要问为什么或政治情况。我能够毫不犹豫地杀敌，因为那是我的职责，我被训练就是做这种事情的。很快你就会看到战友受伤和死亡。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你要生存下来，杀戮变成了一种习惯和自卫。海军陆战队战士们还要为其他海军陆战队员和军团打仗，未必只是这个原因。

这里我应该注意，他告诉我们，那些海军陆战队的“战斗人员”“普遍接受训练”要遵从命令，这告诉我们至少这一群战斗人员“是”谁以及他们的工作是“什么”。“战争文化”是一种“杀戮”文化，它是这个战士的“工作”。我想这确实定义了是什么构成了“战斗人员”，比如，与非战斗人员不同，他们不仅会遭遇“敌人”，他们还要训练去“杀死”这些“敌人”。杀或被杀这个概念占据着“战斗人员”日常“经历”的很大一部分。杀人成了想当然的事情，任何人对这样的事实都不应该惊讶。作为一名士兵，你可能不喜欢杀人，但是，正如这位参与

者所说的,为了"生存"你要做你必须做的事情。这正是这名参与者对他自己的死亡和受伤的同志所作出的反应,这对我来说非常有趣。一个人真的会看到死亡变得"司空见惯"吗？或者"变得司空见惯"是那些"防护措施(blockers)"之一,一种需要用来生存的"心理生存策略"？这位参与者提出的另一点是,他并没有为如此这样的"事业"而战斗。当你投入战斗的时候,这样的"事业"过于抽象,而且也很遥远。"在战斗中,战士们都在为他们的生命而战斗,也在为他们战友的生命而战斗。"这是最基本的。

备忘录6 战争的困惑 2006.6.20

当我在服役的时候总是得到支持。我们有一些人不愿意去那儿,但是如果人们有选择的话,没有人员愿意到一个生或死的战斗情景中。

正如他所说的,很少有人愿意去打仗,没有人愿意被射杀或枪杀别人。问题是,年轻男子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参军,有些人是为意识形态,有些人是为了冒险投机,有些则是为了获得技术或训练,或远离家乡。当他们出发的时候都不知道战场上需要什么。当战争的事实来临时,对于来自中产阶级的年轻人来说,肯定是真正的震撼,因为在他们的生活中,人们彼此之间基本上都是非常友好的。

备忘录7 美国的失败与对自我的影响 2006.6.20

至于反战运动,这只是美国大兵打仗的原因之一。还有言论自由的权利、抗议的权利和生活自由的权利。然而,当运动因为美国大兵选择服役而攻击他们,骂他们"婴儿杀手",只提到一个方面,而且从未以任何形式服务于这个国家,只是用嘴巴嚷嚷那些他们不知道的或永远也不会知道的事情,我讨厌这样的日子,直至永远。我们都知道,这些人会搞垮美国的。我认为,反战运动什么也没有做,除了获得一个不光彩的和平和对58 000名美国人的不尊重,这些美国人为了他们的公民权利付出了最高的代价。那时的学生和反战积极分子,将参加越战的美国士兵看作是

叛徒一样。这种事情永远不要再次发生在美国士兵身上。

作为一个集体的社会,在越战期间以及越战之后,我们也辜负了我们的战士。我可以把自己看作是侵入到研究的人,但对此却无能为力。这只是我对该资料的反应。示威者看到了一场战争,一场他们觉得在道德上是错误的战争。他们没有将战争和战士们区分开,战士们是被他们的政府和社会推上战场的,而社会又允许政府这么做。这两个概念,战争和战士们,虽然他们结合在一起,但却非常不同。我真的不相信示威者不喜欢的是"士兵个人",虽然他们朝他们"吐唾沫",而且骂他们为"婴儿杀手"。这是他们所回应的"战士"所呈现出来的象征意义。

我认为,这位参与者想要告诉我们的是下面的意思。我们拥有某些自由,因为有人愿意参军服役以保护和捍卫这些自由。但示威者利用的这种自由,战士们用生命为代价换来的这种自由,来攻击这些战士,他们出征来到战场上,保护示威者言论自由的权利。这一切都如此具有讽刺意义。当然,也有真正的和平主义者,他们认为所有的战争都是错误的,无论出于什么情况。但我怀疑这些人相对来说占少数,而如果他们的国家遭到袭击,他们甚至可能愿意尽力去服务。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拥有一定程度的军事力量对于防御侵略是非常重要的。但有一支军队和发动战争是两个不同的事情。不是军队发动了这场战争,而是被选举出来的官员发动了这场战争。我们社会失败的地方在于,国家把年轻人送上战场去打仗,然后当他们到了战场做他们必须要的事情之后,却又责怪他们。艾萨克斯(Isaacs,1997)说得很好。他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回国的士兵被视为英雄。人们庆祝并承认他们做出的牺牲。这种承认的效应成了一种对由于战争而可能导致的任何暴行所产生的罪恶感进行集体分担。在越南战争中服役的士兵在回家时没有因为他们的勇猛而得到认可,相反那些从来没有去过战场的人,他们对战争情况一无所知,却抓住他们,让他们为战争负责。58 000 人死了。很多年以后,才在越南战争纪念碑上承认他们的牺牲。还有一个要注意,对于这位参与者,"战争的意义"就是"不光彩的和平(dishonorable peace)"。对他来说,接受不光彩的和平对 58 000 名逝去的生命是不公平。

备忘录8 承载着负担 2006.6.20

每个退伍战士，以及一些不是退伍老兵的人，终生都受到杀戮、大屠杀以及失去朋友和家庭的影响。有些人更容易承载负担。无论如何表面上看是这样的。

这里我们的受访者为我们清楚地描述这一点。杀戮和屠杀给退伍战士终生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承载着负担”是一个鲜活编码（in-vivo code）。那些在越战中打过仗的人最终都“承载着战争的负担”。他们努力生存下来，而他们的很多伙伴们却没有，很多人至今还因为输了这场战争而背负着“负担”。有趣的是，有些退伍士兵能够忍受战争的经历，而且很多人忘记了战争的痛苦。也许正是因为他们有，而且仍然有一个更大的“心理生存策略”库。或许正是因为他们已经能够谈论它，在讨论中，放下了一些负担。我想标记下“承载着负担”这个概念，因为对我来说，它有助于解释一些越战老兵仍然承载着的一些剩余的愤怒和“沉默之墙”。

备忘录9 爱国主义是成为一名志愿参军者的动机：战后的经验和战争的意义 2006.6.20

总之，我从某州立大学毕业后选择加入了海军陆战队。当时，我们只有越南方面的顾问。我自己以及我们整个部队都不是专门为赴越南而参加海军陆战队的。我参加了，正如约翰·肯尼迪说的，“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问你能为国家做些什么。”我想报答我深爱着的国家和人民。当人民选出来的国家领导人将他们带到越南时，我自己，以及成千上万的人都是在同一条船上。我是一个真正爱国的美国人，而且相信那些选择来服役或被要求来服役的人都应该以体面的方式去做好本职工作。那些因为我们服役而来攻击我们的人，那些逃跑到其他国家的人，他们不是建立这个国家的基础。很多人至今仍然带着这样的态度，美国人民绝不应该容忍或原谅他们。将越南战争与二战或一战比较，区别在于我们没有受到外国的武力攻击。所有那些时代的美国士兵在他们为国家服务方面是没有区别的。就是这个原因。

这位参与者,以及很多和他一样的人,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参加到军队中来。他们接受了海军陆战队的口号"为国家服务"。这位战士服役有五年时间,并晋升到中士的位置。我不知道这五年有多少是在越南度过的。我相信,通常在越南的服役是十三个月。是的,战争中会犯错误,无辜的平民会被杀。但是大多数士兵是值得尊敬的人,正如他所说的,他们在履行他们的职责,很多人受伤或被杀害。当回顾战争时,不同的是个人和团体赋予战争的"意义"不同。社会将这场战争看作是一个"错误",但很多越战老兵将其看作是一场"不光彩的和平"。可悲的是,战士们因为社会的"错误"而遭受痛苦。有些老兵今天继续遭受回忆的痛苦,甚至更糟糕。对于参与者#2,那些离开这个国家而不去打仗是令人感到羞耻的,因为他们在战时离开了自己的国家。卡特总统后来赦免了他们,但赦免对越战老兵来说是另一种打击。他们做了他们认为是"正确的事"并用他们的生命为代价。我想,为什么越战老兵难以谈论战争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社会认为参与了越南战争具有一种集体罪恶感。

备忘录10 总结性备忘录 2006.6.20

我感到吃惊,这位战士至今一直将"战争的负担"背负在身上。和这种负担一起的是无法排解的愤怒。我将"背负着负担"放在我的演化发展的类属清单里。我还看到,我正在进一步发展一些概念,如"战争的意义"这样的概念。对于这位老兵,他开始将越战视为"不光彩的和平"。他的观点是,荣誉来自赢得战争,而不是撤离。对他来说,在接受谈判解决协议中,美国背叛了那58 000名失去生命的战士和约300 000名受伤的战士。

作为一个研究者,我发现分析这些材料非常困难。我能够体会这些人的痛苦。我知道,他们只能和这样的经历"达成妥协"。我觉得在传达上面这段话中的情感深度上非常不准确。我知道,作为一名研究者,对那些信任地将他们的故事告诉我的人负有非常沉重的责任,我有责任准确而公正地呈现这些故事。我在研究中努力要获得的正是站在他们立场上的故事。要想真正表达出他们经历的复杂性,就必须要将其放到当时发生的所有其他事情的情境中,包括和平游行。

方法论说明 在对参与者#2 叙述材料的分析基础上，我还有一些问题要问他。我将在后面呈现这些问题。

备忘录 11 访谈的第二部分 2006.6.10*

战争的心理后果

研究者：在对参与者#1 的第一次访谈中，顺便提一下，该访谈是和我的一位好朋友一起做的，出现了好几个主题，我想知道你是否可以对它们作一个回应。我想，在某种程度上你已经说了，但我想请你再多说一些。一个是关于“战争文化”，以及在战争中发生的与正常的标准相冲突的行为有哪些。由于这样的道德冲突，在越南有很多次我的朋友对他所看到的和所做的感到良心痛苦。但只要想存活，唯一的方法就是抛开这些想法，把敌人看作“敌人”——如果有机会他就会杀死你的人，叫他们“亚洲佬(gooks)”，将自己和他们分开，不要把他们当人看，而且不谈论这个问题。其实，在战争期间或战后，他从来没有和任何人谈论过战争，除了这次访谈。当他回家之后，他只是将自己埋在大学校园里，回避所有的反战活动和校园讨论。这样的话还有任何这方面的事情困扰你吗？你是如何处理的？

参与者：战争困扰着我生活的每一天。没有哪一天不记起那个时代的某些东西。我从来没有向任何人提起或讨论起关于越南的事情，包括我 37 岁的妻子，直到 90 年代末她才知道。

这些都是相当有力的话。这位参与者说得很清楚，你不杀人，看着自己的战友被杀，然后毫发无损地离开了。这样你的生活就会有痛苦、悔恨、遗憾以及可怕的记忆。在日常生活中，一个有用的方法是将这些记忆深深地埋藏在“自我”中，并避免任何会触发疼痛和痛苦的东西。但我还想知道，不愿谈论自己在越南的经历是否有可能是害怕其他人不理解，因此会对你的行为进行猜测。你如何解释你所经历的事情、那些困扰你的幻境、你不得不做的事情，以及夜晚回到你身上的恐

* 根据上下文的逻辑关系，以及作者呈现材料的顺序，译者推测此处应为 2006 年 6 月 20 日。——译者注

惧？这么多年都要带着这些经历，而且不能放下，这真的指向了经验的深处及其挥之不去的影响。这样的疼痛几乎令人瘫痪，无法用言语表达，即使对于最亲爱的人都无法谈论。

备忘录12 生存：一个机遇的问题 2006.6.20

研究者：我想我所理解的是，你说你将战争看作是一种生存经历，但让你能够存活的策略是什么？

参与者：在战争中存活纯粹是一种运气的问题。在某个时间你正好不在某个地方。这只是运气。你不能仅仅通过小心翼翼，做一个懦夫，或想着只拿着武器待在后方就能够存活下来。我知道有些家伙，他们整个战斗过程甚至没有一点荆棘划伤，但当时，我知道有些人，他们在那里还不到三十天，几乎有一半都被炸死了。

这里我们的参与者谈论的是“身体上的生存”，他将其描述为是一个“机遇的问题”。这场战争伤亡率很高，准确地说，是因为敌人“纪律严明”“训练有素”，而且有些人将其称为“狡猾”。事实上，穆尔和加洛韦（1992）认为，“从那次，我吸取了一个教训：死亡就是你低估顽固敌人所付出的代价”（More & Galloway，1992，p. 49）。根据我的阅读，敌人常常藏在村子里，沿着路埋置地雷和饵雷，他们知道海军陆战队员会经过这些道路。虽然村民们也经常经过这些道路，但他们没有受伤，这表明他们可能知道地雷埋在什么地方（Anderson，1981）。当士兵受伤的时候，敌人就会用他作为诱饵，因为他们知道，海军陆战队员从来不会丢下另外一名海军陆战队员不管，无论是死是伤（Waugh，2004）。敌人将狙击手藏在树上，由于都是树叶，很难发现他们，因此要用橙剂（Agent Orange）去掉树叶。如果你看不到敌人或陷阱，那么你的“生存就受到威胁”，而且你必须去掉那些树叶，要么是用汽油弹将其烧掉，要么是用橙剂将其脱落。从军事立场上看，这是有意义的。不幸的是，这些军事策略会对无辜的村民造成一些后果，他们会陷入战争中。

备忘录 13 心理生存策略　　2006.6.20

研究者：你是如何处理在你周围发生的人员死亡的？

参与者：战争中死亡和伤残在你周围到处都是，这成了一个接受和习惯的问题。你在精神上尽量将自己从所有这些大屠杀中摆脱开，将心放到另外一个地方和另一个时间。在家庭里，和家人及爱人一起在温暖、干爽、洁净、安全的床上，你要快速地想。在我看来，海军陆战队员在处理这样的大屠杀问题上比一些其他军队受到的训练更好。并不是士兵更好，只是接受更好的训练，且彼此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

死亡、破坏和伤残"构成了战争文化"。如果一个人要"在战争中生存"，那么他必须接受战争的"现实"，必须忍受杀戮和死亡。我觉得有趣的是，这位参与者告诉我们的一些事情与参与者#1 告诉我们的非常相似。我们的第一位参与者指出，"提前规划未来"和"从心理上让自己离开现场"能够帮助他生存。他白日梦般地想着，当他离开军队的时候，他会做什么。这位参与者还想着自己在家里，想着回到他自己安全温暖的床和家庭。我猜"思考未来"和家不仅可以帮助你从精神上逃离，而且这还给予你"精神武器"，让你继续前进，不管流血牺牲和艰难困苦，我将这个心理生存策略编码为"精神逃离"，但这个标签很难公正地表达出这个概念的复杂性和深刻性。这句话真正告诉我，无论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都必须运用心理生存策略来让自己继续走下去。

备忘录 14 更多的心理策略：从精神上让自我离开　　2006.6.20

研究者：你是如何摆脱自我的？

参与者：我能够从精神上把我自己从大屠杀上移开。我总觉得，如果我老是想着它，任由它吞噬我，我将是下一个被击中的人。

这一小段话说明了一切，验证了上述有关心理策略作用的假设。你必须从精神上将自己从正在发生的事情上转移开。过分关注当前

会严重地从生理上和心理上影响你在“战争体验”中存活的能力。

备忘录15 治愈:总结性备忘录 2006.6.20

有一件事情,在这两个访谈中我没有听说过,或从各种回忆录中都没有看到过,这就是“治愈”。我想这是因为,对于有些人是没有“治愈的”,而对于那些已经“治愈的”就没有必要谈论它。在遭遇如此深刻的经历之后,如何、何时以及能够治愈吗?它在什么程度上会发生?而且,如果没有治愈,那么会发生什么?痛苦、失落和回忆会变成气愤、愤怒和沮丧吗?这是一系列有趣的问题。我需要在下一轮的资料收集中跟踪这些问题。

备忘录16 后果:未解决的仇恨、愤怒和沮丧 2006.6.20

研究者:然后呢?

参与者:自从越战之后以及现在,和朋友、家人和爱人在一起时,我完全将它置于头脑之外。我绝不喝酒,因为酒会带来仇恨、愤怒和沮丧这些最鲜明的精神打击。今天我之所以谈论这事,是因为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通过新兵训练营和越战老兵找到我,四十年啦,所有的记忆都像潮水般涌现出来。和你一起服役的兄弟谈论很容易,但和一般的公众谈论却不容易。这家伙是我们武器排的一名机枪手,现在我们定期见面,这使得我们可以相互倾诉所有的记忆,这就像是服用毒品。我很幸运在我的生命中遇到一位女人,她从来不提这个话题,从来不问那些问题,当恶魔出现时默默地帮助我,并给予我坚定的支持。

对于越战,不仅在自我和他人之间有一道“沉默之墙”,而且在“自我之内也建起了一道墙”以防止有关越南的记忆和感情。酒精会让这些防御放下来,然后愤怒、气愤和沮丧就会洪水般地涌现。其他老兵都依靠酒精来阻挡这些记忆。这又回到了“治愈”的问题。参与者#2 给我们讲述了这种基本的仇恨和愤怒。虽然参与者#1 没有直接表达,但我还是禁不住觉得,他也有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虽然肯定不

到参与者#2 的程度。我猜,这种差异肯定与参加“战斗”有关。不过,在概念上,#1 和#2 之间有相似之处,都埋藏着越战的记忆而且吞噬着他们的良心,他们一直将其作为“负担”背负到今天。

参与者#1 有一些美好的记忆,掺杂着一些不好的记忆。参与者#2 似乎没有任何美好的记忆。我想知道,激发出如此强烈感情的战争体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在我阅读到的由越战老兵撰写的回忆录中,有很多由于战争的残酷和他们感觉到的邪恶而对敌人的仇恨。还有,看到自己同伴的死亡和伤残的仇恨和强烈的复仇愿望(Waugh, 2004)。实际上,伯德(1981)指出,“战斗中的伤亡确实对我们产生了影响并改变着我们。这又以某种方式激发了战争,因为当有人被击中或被杀死,就会让其他人更加生气,想要复仇” (Bird,1981,p.43)这里表达的仇恨似乎也针对和平示威者,很多越战老兵觉得是他们让美国政府接受了“不光彩的和平”(Sar Desai, 2005)。这似乎令人非常惊讶,毕竟这么多年来,他们仍然是记忆犹新、噩梦如实。一场战争过后,老百姓生活依旧,但对于这些老兵,他们的生活似乎永远受到了影响。通过和海军陆战队的“兄弟们”交谈,他个人获得了某些安慰,而且他还有一个爱他的、支持他的妻子,这两者都是他应对“回家”之后对战争记忆的条件。

备忘录 17 **保持接触:一种治愈策略** 2006.6.20

研究者:正是你网站的名字“n. g. a.” 激起了我的兴趣。

参与者:正如你已经猜到的,“n. g. a.”肯定与越南及战争的鬼魂有关。这个名字是我在 1996 年,越战后三十一年,突然想到的。有好几十个越战老兵常常在一个网站聚会,网站是一位女士——越战老兵的支持者所建立的,但她与老兵或越战老兵没有任何联系。这么多年,对她来说有太多的事情要做,因此,我建立了一个聊天室和网站,以纪念我的部队,并保持与多年来我认识的越战老兵的接触。大多数是海军陆战队老兵战士,但我们也有一些来自其他部队的战士,包括一周来加入我们的空军、陆军和海军战士。我们是一个联系非常密切的群体,我们大部分时间待

在一起。我们在网上聚会的时候，我们都尽量避免越战的“鬼魂”。因此，有了这个名称……

将这些家伙联系在一起的纽带肯定与他们在“战斗”中共同分享的经历有关。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和你有着同样的经历，而且他们理解你所经历的以及仍然在经历的东西，在他们的友情中有着某种令人安慰的东西。这样的群体肯定有助于心理健康，因为有一个知心的兄弟姐妹倾诉而不必说出所有的细节。你会明白他们为什么不想要让那些鬼魂出现。那些死去的人总是与他们在一起。

备忘录18 那些纠缠的鬼魂 2006.6.20

研究者：你与敌人有过接触吗？那是什么样的情景？

参与者：我曾接触过的是已死的或要死的敌人。我见到过好几个奄奄一息的敌人，至今还历历在目。我们与越南共和国军队（南方越南军队）有过密切的接触，有时候我认为他们就是越共，我们的敌人。就这些人来说，在越南朋友或敌人之间是没有什么区别的。除了都是人之外，他们有一个不同的文化和宗教。我从来没有将朋友或敌人看作是非人类或恶棍。

这些话非常有力。想一想，这么多年过去了，当时死了和要死的敌人仍然历历在目，还有那些死去的战友。这些就是一直缠着你的“鬼魂”。朋友，敌人，在受伤或死去的时候，他们是一样的。很多越南朋友和敌人都在这次战争中失去了生命，这是一个要记住的重要事实。

备忘录19 每个人都是敌人 2006.6.20

和你的军医朋友一样，我不相信任何越南人，无论朋友还是敌人。从第一天到第二天，你永远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在被杀或折磨的压力下，在周一是你的朋友，周二就变成你的敌人了。他们仍然是人，只是变成了敌人。你只能信赖与你一样来自同一片土地的美国大兵。

对于这位参与者，敌人就是你不能相信的人，以及你在战争中与之打仗的人。关于越南的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情是，南方越南老百姓由于担心折磨和家人被杀而被迫变成了“敌人”。我想，有些村民成了“敌人”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国家的统一或“事业”。既然你从来都不知道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所以为了“生存”，你必须把所有越南人都看作是敌人。你唯一可以信任的人就是你的战友。

备忘录20 战争的意义 2006.6.20

研究者：可以说战争使你更加冷酷，使你更加敏感和富有同情心，对战争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了吗？

参与者：不幸的是，战争已经成为这个世界不可避免的灾祸，因为有其他文化的人他们想要杀死我们，我们中的每一个人。在正义的情况下我不反对战争，越南当然也不会让我成为一个和平主义者。在去越南之前，我把自己视为硬汗，在我七岁的时候拥有我的第一支枪。九岁之前我就独自狩猎。这些事如果在今天，你的父母会进监狱的。那时候不会。越南让我看到多少美国人对上帝和国家的态度是真的。我知道，他们就是他们自己，他们要杀死美国人，走他们的道路，或者在社会中执行他们的意志。无论你想要称呼这些人什么，都需要给这样的老兵一个生活空间。如果你想称其为冷酷，是的，我就是冷酷。我的感觉是，我们选举出来的国家领导者不能以害人的方式安排士兵。二战是无可奈何的选择。我必须要说的是，对越南、朝鲜或伊拉克，我不是很确定。不像我们选出的领导人必须有足够的信息来作出战争的决定，普通的美国人手头上没有这样的信息。历史将证明这些战争在世界上是否很重要或对美国是否有好处。我希望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我能在场。现在以及在去越南之前，我讨厌看到人类被虐待、折磨和残杀。我想，除了我们的民族受到保佑，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也要受到保佑，她让我们要习惯于帮助别人。这是战争的理由吗？我不确定，而且不知道怎么回答。

在这一段长长的引言中有很多内容，它确实表达了这位参与者一

直到今天的挣扎。战争会是正义的吗？当然，这是一个自从人类出现就可能在争论的问题。他在二战和越南及伊拉克战争之间作出了一个区分，前者有一个侵略者威胁到整个大陆。就后者来说，他质疑这些战争的意义，并将其留给历史来告诉我们它们是否有区别。这位参与者并不像参与者#1 那样对自己的国家或战争不再抱有幻想了。他所感受到的背叛不是国家的背叛，而是对老百姓的失望，这些人对那些为了美国人坚持的神圣理念而愿意去打仗的男女军人进行批评指责。

备忘录21 心理之墙上的裂缝 2006.6.20

研究者：你曾经去过战争纪念馆么？它对你有何影响？

参与者：去过，我去过一次，而且只有那一次。我无法解释看到那58 000 个名字时的感受，他们很多是和我一起服役的战友，以及高中和大学的朋友，我不知道它们对我的影响。我只能说，我永远不想再有那样的感受了。

看到墙上的那些名字，有一种深深的悲哀，因为每一个名字都代表着一个真实的人。对于参与者#1 来说，到纪念馆也是很难受的。我想，不仅那些逝去的人对他们产生了影响，而且去参观纪念墙将整个的"战争体验"都带了回来。它打破了"沉默之墙"，并将"那些鬼魂"释放出来"纠缠"他们。

备忘录22 维持沉默之墙 2006.6.20

科宾女士，最后我只是想提醒你，也许你还不知道，向有些越战老兵提出这些问题会引起攻击性的回应，有时候会有言语上的攻击，包括那些光顾我网站的家伙们。事实上，我想说的是他们大多数会这样。我的做法是从来不修改留言板，而且这些人都知道。我们让自己生活在言论自由中，对于其他服役过的战士也这样。我会审查自由言论吗？和你一样，这些年我一直努力为教师和学生提供一些基本信息，让那些没被卷入战争的人看到很多其

他人的看法，尤其是退伍军人的看法，希望以微薄的力量努力让别人理解他们的意见。如果有人让你走开，只是不要介意就好了。

这位参与者正在告诉我的是，最好不要打扰“沉默之墙”。那些退伍老兵感觉到的这种伤害一定是非常深远的。讨论这种经历重新唤醒了那些记忆，并将那些无法解决的愤怒带出来。但我仍然不理解，为什么战后这么久了，还会有如此的愤怒？这似乎是一种非特定的、扩散的愤怒，而不是集中于一个特定的人或事。为什么是这些恐怖的记忆？为什么这些老兵不能放下这些记忆和愤怒？战争中发生了什么？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这是理论抽样开始的地方。我认为，越战老兵有权不谈论战争。毕竟，他们赢得了战争。

备忘录 23 总结性备忘录 2006.6.20

访谈记录的这一部分内容让我意识到，战争后果遗留的程度以及在一些老兵身上的治愈是多么的少。“战争的鬼魂”似乎纠缠着那些参战的退伍老兵，也许还有那些在战争中支持服务的人员。这些鬼魂一定不只是那些死去人的鬼魂。这些鬼魂一定还包括对战斗、嘈杂、恐惧和混乱的记忆。虽然很多退伍老兵过着普通的生活，但是在有些人的外表之下却是一座火山，如果被激发则会作为愤怒而爆发。奥谢（O’Shea，2003）称此为“体内的野兽”，一只掠走了他大部分生活的野兽。

方法论说明 注意，对于每一个访谈，关于战争体验的知识和理解，从那些经历过这些经历的人的视角来看，都在扩展。在对本次访谈记录进行编码的时候，我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和一个新的可能的类属，“承载着负担”。还要注意，分析引出了问题，问题引起进一步资料收集，而进一步的资料收集又引出了进一步的分析。这就是我为什么如此坚信资料收集和资料分析要交替进行的原因。我知道，这并不总是可行，但是当有可能时，这个过程能够极大地丰富研究发现。在开始一项研究的时候，研究者不可能知道要提问的所有问题。只有通过与资料互动，相关的问题才会

出现。在展开的概念基础上提出来的问题都是来自资料，如“愤怒”“战争”和“治愈”等概念。有时候回答这些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回到田野，去收集更多的资料。

需要提出来的其他的重要方法论问题是，虽然备忘录没有具体说明有些东西是概念的其他属性或维度，但备忘录中包含着这样的信息。例如，虽然没有具体说明，但是“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都是战士的“类型”维度。从参与者#1 那里我们还获悉另外一个维度是军衔地位，其维度包括从“军官”到“入伍的士兵”，后者通常被称作是“喽啰”。换句话说，研究者在备忘录中并不总是能够具体地讲清楚“这”或“那”是一个属性或维度，但这个信息却在备忘录中。

分析引导理论抽样，或者在来自资料的概念基础上的抽样。虽然理论抽样的观念听起来相当复杂，其实不然。抽样遵循着一种逻辑思维。例如，我对“遗留的愤怒”这个概念感到困惑。我想更多地了解它。幸运的是，我可以就这个问题询问后面的参与者，我将其称为参与者#3。

参与者#3

在我对参与者#3 进行访谈之后的几个月，我收到了在同一网站另外一位海军陆战队员的电子邮件，他说他愿意和我谈。他不是在越南服役，而是在波斯尼亚和格林纳达服役。我问他，为什么愤怒？

备忘录1 遗留的愤怒和回家 2006.6.21

这种愤怒来自几个方面。它从新兵训练营就开始了。他们训练你，要你学会保护、防卫以及杀敌，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

他们让你遭受挫折，恐吓你，刺激你，因为任何理智的人都不会让你做他们让你做的那些事情。这样，如果你真的要上战场并体验这些事情，我们的愤怒就会爆发，就像一颗原子分裂并产生的热量一样。愤怒是不稳定的。你被送到某个地方去保卫你的生活方式，去保护你的国家、她的妇女和儿童，以及她神圣的生存

权。你会变疯的,因为你不明白为什么其他人恨你[敌人],因为你是美国人。因为在你还是孩子的时候就有人不断地告诉你,你必须要去保护,这种观念就逐渐建立起来。这增加了这种愤怒。你完成你的工作。你赢了,并且回到了家乡,每个人都受到了保护。而我在保护你们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在睡觉。

你回家了,没有人在乎你曾经为他们而战斗。他们感受不到这种痛苦,周围到处都是子弹横飞,闻着尸体,嗅着汽柴油、燃烧弹、火药,还有烧到战士们头发的味道。因为他们既没有经历这些,也没有真正感到他们的自由处在危险之中,他们并没有觉得你为他们做了什么。因此,在他们的眼里,他们的自由从来没有真正受到过挑战,因此,没有必要过度反应。你没有为我做过任何事情。这种毫不领情的反应增加了他们的愤怒;而且不断地发酵。现在记住你仍然年轻,你没有应对的技巧,因为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很多很快,在这个过程中,应对技巧都失灵了。

现在,你开始觉得这是一种浪费,而你的战友们平白无故地死了,而你为什么挨了枪子呢? 这让你更加愤怒,你就像一个原子快要分裂的原子弹。这是一个持续的反应。为这已经爆炸的混合物添加酒精。你就在地狱中,你不理解。你做得对。你是海军陆战队员,保卫美国。为什么命运遭受如此伤害,为什么我不想再到这里来了? 你怎么也想不通;没有什么逻辑能够帮助你将这些放到一起。现在荷尔蒙、多巴胺、肾上腺素增加了,因为你总是处于一种兴奋和恐惧的状态,你大脑中流淌的维持情绪稳定的荷尔蒙都被激发起来,高高地悬在那儿。即使想处理现在你也不能处理它。

愤怒其实是一连串的事件,它在大脑中产生化学反应,然后再给它们添加一些威士忌,除非这些链条中的某个中断,否则愤怒不会走开。这就是为什么"回家"需要很多年。

我希望这能够回答你的问题。用这些信息去帮助更多人,让他们能够"回家"。将我们这些都带回家,这样你就帮助了我。

这是相当有力的材料。他给的这些理由对所有服役打仗的青年

人有多大的代表性——我不知道。我确定的是，这位参与者所描述的也适合于其他一些人，因为这些人彼此之间确实分享很多信息。对他的清单，我将增加"丧失的感觉(sense of loss)"，这种感觉来自于看到牺牲或受伤的战友。我想知道，有多少越战老兵被诊断有创伤后应激障碍？这是另外一个我必须要跟踪的线索。我从在这里的老兵医院的经验知道，这些越战老兵很多在医院治疗依赖于毒品和酒精。我喜欢描述这种气愤的方式，他将其描述为一个过程，是在海军训练营开始，并随着战争体验一起成长。很多年轻的战士们经历过海军训练营，但不是所有人出来都气愤。根据我的猜测，这种气愤的一个主要条件是战争体验的高度紧张和压力。除了这点，当战士回家时，社会对他或她的经历表现出明显的冷漠。我不是说一般的民众不在乎，而是他们沉浸在他们自己的生活中。我也很喜欢他的"回家"这个"鲜活编码"。有"身体上的回家"，而且非常重要的是，"身体上的回家"意思是"重新调整以适应平民生活"，这是一个需要时间的过程。我认为，这些退伍老兵寻找联系纽带不是为了玩，而只是对他们的战争体验的一些理解和尊重。

虽然，"回家"似乎只是一个时间，但这时问题出现了。在战斗中，这些人太忙了，因此他们没有时间思考在他们周围发生的事情。思想更多的是关于未来的梦想，以及当他们离开战争后他们要做什么。但当他们回家的时候，战争体验却以重现的形式和其他回忆的形式(鬼魂)纠缠着他们。

备忘录2 回家：一个新的类属 2006.6.20

我喜欢"回家"这个概念，而且认为它应该是一个类属。它标志着过渡回到平民生活。当回家时，很多退伍老兵都"背负着沉重的负担"，其表现形式为重现不好的记忆以及愤怒。有些老兵能够放下这样的"负担"，如果他们再一次过上满意的生活。还有些人似乎至今还背负着越战的负担。我将"回家"看作是一个过程，其发生的频次和程度都不同，取决于个体，也可能取决于年轻，无论他是在战斗中服务，还是经历战争。这都不仅仅是一个身体上的回归。这必须要从心理上"放下""战争的负担"，这需要将纠缠着他们的"鬼魂永远埋藏起

来”，如果可能的话。虽然这样的愤怒在新兵训练营就开始了，但仅仅新兵训练营还不足以产生这么大的愤怒。很多战士都经历过新兵训练营，但并非所有的军人都愤怒。新兵训练营必须要和他的“战争体验”混合到一起并结合起来。在其他事情当中，“治愈”的程度与“放下”不好的记忆和愤怒很可能与一个人在家庭的支持系统有关（一个从研究者的角度有待于和收集到的资料进行检验的假设）。

方法论说明 关于“回家和放下”这两个概念，这时候引出了更多的理论抽样。我接着问参与者#3，为什么对于有些老兵从心理上“放下”这种愤怒以及“回家”这么难？下面是他的回答。

备忘录3 遗留的愤怒 2006.6.20

我所发现的实际情况是，老兵经历了一个悲伤的过程——背弃的交易、愤怒和接受。在“恐怖的印象”之后，一个影像嵌入战士的记忆中。该影像经常连续不断地重放，直到有了应对技巧以及印象减少才可以。愤怒成了主要的情绪留在身上，因为这就是一切问题出现的地方——为生命的失去而愤怒，为失去清白而愤怒，为失去“快乐的时光”而愤怒，为失去能力而愤怒，为很多事情愤怒。服役的年龄平均为十八到二十五岁。你记得这些年的什么呢？为什么记住这些呢？大学、春假、朋友、通宵，等等。与战争之于老兵相比，这些都是美好的记忆。秘密在于让老兵学会运用他们不知道自己拥有的应对技巧，因为从来没有人教会他们使用你们在大学里面使用的“批判性思考”的这些技巧。从情感上来说，除非他们使用应对技巧，否则他们无法在情感年龄或认知年龄上进步。他们在思想上无法进展，荷尔蒙激素失去平衡，等等。有些人不仅需要咨询帮助，而且需要药物治疗以帮助维持精神平衡。我学会了如何使用药物治疗、咨询、其他老兵的支持网络以及我的妻子作为我的应对技巧。这就是我为什么最终回到了大学，超过正常年龄十五年之后去追求我想要做的事情。悔恨是另外一个挥之不去的东西。你是否曾经做过任何让你后悔的事情，因为你认为它不是你真正想做的事情？后悔转变成情感上

的困惑,它反过来又造成了愤怒。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循环,直到你打破它。

虽然参与者#3 代表的是一个样例,但他的话确实给了我很多洞见,让我们知道了为什么气愤持续这么长时间。不仅有战争的经历,还有这样的事实:虽然你在打仗,平民的生活依然在正常地进行。虽然年轻人在打仗,但是他们太忙了,没有时间思考这些。但是当他们回到家乡的时候,那些"失去的时间"和"失去的经历"是他们永远也无法弥补的。除了这些损失,还有可怕的记忆、夜晚出现的恐惧、荷尔蒙的失衡(大剂量的肾上腺素和其他应激激素)以及觉察到平民的冷漠。然后还有"青春"。年轻常常意味着身体上的强壮,但并不必然代表心理上也强壮。除非敢于打破"愤怒的循环",否则愤怒很可能依然存在。

备忘录4 总结性备忘录 2006.6.20

我从这两位受访者访谈记录的分析中获得的信息如下。首先,就理解"战斗人员"这个概念以及这个概念的一些属性和维度来说,有了更大的发展。这两位受访者告诉我很多他们作为"战斗人员"的体验是什么样子的(虽然我没有将与参与者#3 访谈记录的所有分析都放到这里,但是读者可以到附录 D 中阅读完整的访谈记录)战斗人员,尤其是海军陆战队员们,都是训练有素且纪律严明的战士。他们的工作就是打仗和杀敌。在战斗期间,他们打仗不是为了事业本身,而是要生存下来,他们自己生存和他们战友的生存——这些是他们唯一能够真正信任的人。可以这么说,战士们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生存上,他们形成了很多心理的和身体上的策略来帮助他们生存。其次,"打仗"的经历真正改变了战士们,并给他们增加了一种负担,这种负担在他们余下的岁月里一直背负着。

虽然战士被训练去杀戮,但是杀戮确实违背了伴随着他们成长的社会道德,这留给他们的不仅是感到内疚,而且还有大量的愤怒,因为他们被迫不得不做这些事情。第三,回家后必须作出重大调整,就像进入战区时必须作出重大调整一样。但是由于"鬼魂"一直纠缠着这些战士们的回家生活,这些调整就并非那么容易了。让越战老兵更加

艰难的是他们回家后所受到的接待。没有人理解战士们所经历过的。回家之后,那些从来没有上过战场的男男女女们强迫他们背上了“非正义战争”和“不光彩的和平”这样的负担。在新兵训练营就开始的愤怒在越南逐渐形成(我的意思是,对敌人的愤怒使得杀他们更加容易),在“回家”之后被加强了。

我的“战斗人员”概念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这样的分析形成的。我也知道不少有关回家的“愤怒”,完全缺乏承认、指责,等等。但我仍有个问题,在越南发生了什么?是的,有杀人,但那是在战斗中发生的吗?战士在战斗中的感觉如何?他是如何行动,如何思考的?战斗如何形成或为什么形成了愤怒?我现在有了进一步进行理论抽样的方向。我是在“战斗”这个概念,或者“换一种说法,在战斗中它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概念指引下寻找资料。

方法论说明 已经确定的是,战争体验对于那些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在很多方面都很不一样,我现在感到好奇的是“什么是战斗?”我想对这个概念有更多的了解,并揭示其属性和维度。我从我的阅读中发现,“战斗”可能是很多事情,从和敌人面对面,到作为飞行员出去执行轰炸任务,以及背后被人袭击。我想,对“战斗”的主要描述是与敌人周旋。要继续我的分析,我需要更多的资料。我可以试着通过网络找到更多的老兵,或者在朋友当中发出这样的请求,但是在此时,我没有这样的时间,因为将这本关于方法的书写出来更重要,即使寻找老兵他们可能接受或可能不想接受采访。因此,我到哪里去寻找我的问题的答案呢?

检查战斗(Battle)的概念

需要更多的资料,但又不确定到哪里去寻找,我就转向越战老兵撰写的回忆录。当我发现这些回忆录的时候,我发现这是一个信息宝库。我意识到,那些写了回忆录的老兵可能是一些表达能力较好的人,不是代表所有的老兵,但这些人往往是很深刻的,也许就我的目的来说,他们可能对我的帮助最大。我想,很多人写回忆录不仅是为了说明越战是什么样子的,而且也是为了帮助

他们自己将有些纠缠着他们的“鬼魂”埋葬起来。在阅读和分析这些回忆录中,我所进行的理论抽样都是循着来自前面分析的问题。我想知道:战斗是什么?战斗引起了什么样的情绪?战士们对其作出什么样的反应,以及如何描述它?

从方法论上,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对回忆录进行编码的时候,分析过程与对访谈记录的编码是相同的。从阅读者的角度看,重要的是要注意我是如何运用这些材料去进行理论抽样,以及跟踪前面分析中提出来的那些分析问题。我编码的第一个回忆录是由雷·希尔德雷思(Ray Hildreth),一名前海军陆战队员撰写的,我给它的标题是 Hill 488。该书的合作者是查尔斯·W.萨瑟(Charles W. Sasser),一名作家。这本书是 2003 年由 Pocket Books 出版,该书介绍了希尔德雷思对战斗的描述,书也因此而得名。在那些和希尔德雷思一起参加了这场战斗的战士们中,有一个人获得了荣誉奖章(the Medal of Honor)。四个人获得了海军勋章(Navy Crosses)。十三个人获得了银星奖(Silver Stars),十八个人被授予了紫星勋章(Purple Hearts)。有些荣誉是死后追认的。虽然我确信,书中介绍的有些事件是为了说明问题而被夸大了,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整个故事看起来是真实的。它在语气上与我所阅读的其他关于越战的回忆录相似。我没有直接引用希尔德雷思的描述,而是转述了他的描述。

描述一场战斗并不容易,即使对于经历过战斗的人来说。而研究者试图要捕捉这种二手经验,就更加困难。然而,要想理解战争体验为什么对年轻战士有如此深远而持续的影响,重要的是要知道战斗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将努力再现这种经历的各个方面。

备忘录1 侦察任务 2006.6.21

在外出侦察巡逻的时候,侦察队来到了一个村庄,这里有相当多的敌人活动。通常,村庄里有男人、妇女和孩子们。但是,这个村在居民构成上不同。它看起来像是一个敌人行动的基地。侦察队将该信息传回总部,很快美国就对该村庄进行了空袭。侦察巡逻队仍然留在那里,进一步收集有关敌人活动的信息,尽管在轰炸,但这些活动依然在继续。

评论。本节回忆录告诉我的是，敌人确实利用了村庄和村民来打仗。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村庄被轰炸，尽管在越共和美国人之间有那些“被夹在中间”的平民。有趣的是，当轰炸开始的时候，敌人并没有撤退或逃跑，而是继续他们的行动。还有关于这条消息的有趣方面是，有些战士担任侦察工作，或打探敌人为军事打击提供信息。然而，在外面，只有一小群人单独在丛林中，这让他们很容易成为攻击目标。他们装配很少的东西，因为他们必须保持轻装上阵，就像他们在日常行动中一样。

备忘录2 发现和等待 2006.6.21

如果不是他们中的一位中士军官偶然通过他自己的卫星接收器听到一些在巡逻的美国特种部队和一个南越军事小组之间的谈话，侦察队肯定会对敌人的突袭而惊讶不已，这群南越军事小组碰巧也在这个地区。警告说要警惕，因为有一群敌人在该地区，他们似乎正在寻找什么东西或什么人。听到这个消息后，希尔德雷思（Hildreth，2003）的侦察队意识到，越共已经发现了他们，他们可能成了这只先头部队的目标。不幸的是，对于这些战士来说，天渐渐变暗，太晚了，无法请求直升飞机将他们空运出该地区。侦察队必须守在他们的地方，等待第二天早晨营救。由于轻装上阵，他们没有带重型武器。作为防御，他们带的只有步枪、一点点额外的弹药，以及一些手榴弹。在准备一场可能的袭击中，这些战士们两两一组，分布在小山的周围。只有长长的野草作为掩护。

评论。这告诉我，战士们并不总为“战斗”作好准备。有时候是战斗遇到他们，他们无法逃避。幸运的是，侦察队通过他们偶然听到的无线谈话有了预警，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作好准备。缺少的是需要用来打一场艰难战役的重型武器设备。不过在这一点上，战士们不知道有多少“敌方战斗人员”或袭击将有多么猛烈。

备忘录3 袭击开始 2006.6.21

战士们等待着敌人的到来。终于，一个战士看到动静了，并朝那

个方向扣动了扳机。听到信号，战斗就开始了。Hildreth 说，“我愣在原地，感到非常意外，几乎被吓死了”（Hildreth, 2003, p. 197）。有一位美国士兵受伤了。他的惨叫声划破了夜空。希尔德雷思觉得这尖叫令人不安。最后，一名军医来到受伤的战士旁，给他注射了一针吗啡。尖叫声安静了下来。但战斗才刚刚开始，这是第一个受伤人员。这是侦察队第一次经历战斗。关于这次经历，希尔德雷思说，“当你第一次经历战斗的时候很难把握它”（Hildreth, 2003, p. 199）。侦察队使用卫星电话，请求空中支援。然而，因为天非常黑了，而且敌人又是那么近，美国人认为派飞机去轰炸太危险。但是飞机可以投一些照明弹，让美国士兵可以更容易地发现隐藏在长长草丛中的敌人。希尔德雷思看到他旁边的人被打死了。身边战友的死亡，他说，在精神上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这使他意识到，这也同样很容易发生在他身上。

评论。希尔德雷思给了我们一些洞见，让我们看到战斗中发生的事情。尽管受过作战训练，但是战士们从来都无法确定自己该如何应对。希尔德雷思对战斗的第一反应是恐惧并愣在原地。正如参与者#2 告诉我们的，如果战士们想要生存，什么也不做不是一个很好的策略。这只会让他受伤或死亡的危险更大。不过，我可以想象战斗一开始的几分钟所出现的恐惧和混乱。那里必然是混乱，在那一会儿，战士们不确定发生了什么或不知道怎么做上面的资料还告诉我们，在“战斗”期间死亡一直就在身边。生存就像是一种技巧，它也是一种机遇。

备忘录 4 第二次袭击 2006. 6. 22

虽然敌人数量上占优势，侦察队还是设法暂时击退了敌人。不过，美国士兵知道，敌人只是利用这个机会去重新组织和计划他们的下一次袭击。希尔德雷思说，“等待是最糟糕的事情了”（Hildreth, 2003, p. 213）。终于，小山上的战士们听到了竹子敲打的哒哒声（这是敌人相互沟通的方式），知道第二次袭击就要开始了。第二次袭击非常猛烈。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直升飞机试图抵达战斗区域接走牺牲和受伤的战士，但被击落了，飞行员牺牲了。其他在该区域救援的直升飞机放弃了救援任务。情况似乎无可奈何。敌人有一架 50

口径的机关枪。希尔德雷思说,当机关枪开火的时候,感觉整个小山就像被撕开一样。排长受伤了。然而,每个战士,无论受伤与否,只要还活着并能够继续打仗的都在继续打仗。此时,希尔德雷思说,对于他,战斗显示出超现实的特点。他确信,他们都会死。他说,那时候,"……我没有动,因为一个战士就在我身边倒下死了,头顶被炸开。我躺在死人当中,在一个仍然没有掩埋的墓地……"(Hildreth, 2003, p. 307)。再一次,尽管敌人占有优势,但还是再一次被击退了。

评论。注意作战训练如何在实际的战斗中发挥作用,这是非常有趣的。虽然害怕,而且一开始还有些混乱,但战士们会自动进入这样的模式,做他们受训要做的事情,即进行反击。驱使他们反击的是生存的本能。虽然如希尔德雷思告诉我们的,有这样的感觉,觉得自己也快要死了,就像你周围的人一样。最有趣的是战士们使用的策略,精神逃离——超现实主义的战斗所呈现出来的,也就是几乎袖手旁观,看着事情发展,但却始终参与其中。我想,这对在战斗的恐惧中生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策略。害怕、恐惧以及尸体的味道都是老兵们想要深深埋藏的东西,不仅是在战斗的时候,也包括后来。这段经历是一场"噩梦",但却是你永远都不可能完全逃离的一段经历,就像你无法逃离战斗一样。

备忘录5 战斗中的转折 2006.6.22

准备好了第三次袭击,敌人开始叫嚣,"海军陆战队员们,你们活不过今晚了……"(Hildreth,2003,p. 261)敌人的叫喊没有挫伤海军陆战队员的斗志,相反却激怒并激励了他们。海军陆战队员们开始叫喊着回击越共。这持续了几分钟,直到那些仍然活着而且能够打仗的海军陆战队员们意识到这种情形的荒谬为止。在此,他们是在战斗当中,和敌人在进行一场喊叫比赛。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喊叫的行为将他们从绝望的感觉中脱离出来,重新恢复了他们生存的意志。希尔德雷思指出,"这是战斗中的一个转折点"(Hildreth,2003,p. m263)。海军陆战队员的请求获得了援助支持,他们最终得到了战术空中支援。战斗非常激烈,虽然天仍然是黑的,美国轰炸机还是进入了该区域,开始对敌人投放炸弹。炸弹并没有震慑住敌人。他们继续前进。仍然

能够打仗的海军陆战队员们继续和敌人战斗着。大约天亮的时候战斗结束了。海军陆战队员们仍然坚守着小山。但是,侦察巡逻队付出的代价非常高。这个排的十八名战士有六名战士牺牲,十二人受伤。在受伤的人中,只有三个人在不需要帮助的情况下能走路。对于这次经历,希尔德雷思(2003)指出,“我们不会再一次是19岁……”(Hildreth,2003,p. 324)。等待着清理那些死亡和严重受伤的人,他说,“我发现自己在一群越共人员尸体中间行走,我一阵眩晕,然后开始疯狂地扫射……”(Hildreth,2003,p. 325)。他接着说,“我下去,看看被我射杀的亚洲佬。他们正是杀害亚当斯[Adams,他的战友]的人。我看着他们,没有任何感觉。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够再一次感受到……”(Hildreth,2003,p. 325)这时候,他说,“我是一个恶心的、令人困惑的海军陆战队员。震惊和恐惧把我搞乱了”(Hildreth,2003,p. 265)。

评论。“作为一名战斗人员”似乎是以一种非常明确的方式对战争经验进行界定。在几个小时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的一个晚上,一个年轻人从青年变成了年纪大的人。因此,什么是“战斗”?我只能说,战斗就是一种“为生存而猛烈的斗争”,虽然军方可能从不同的方面进行定义——如,看作是一种事业。但是“为生存而斗争”是该研究的参与者对它的界定。在战斗中似乎引起了一定的情绪波动,这些情绪在整个战斗过程中会变化:害怕、恐怖、悲伤、绝望、震惊、愤怒,以及活下去的决心。在战斗中可以把你“搞糊涂”。我猜,说“被搞糊涂了(fucked up)”,希尔德雷思的意思是精神上混乱、茫然,然后就是试图理解一个人杀人和被杀是多么容易,多数是被激怒的原因。也许,对一个不愿意杀人的人,愤怒是需要克服的一种内在道德约束。“杀人”需要愤怒。如前所述,一旦愤怒被激发,肾上腺素就会飙升,难以阻止。愤怒可能会导致战士们采取行动,而当战士们后来有时间冷静下来时,他们可能会为此而后悔。

方法论要点

我现在已经分析了好几个访谈记录和回忆录。随着我不断地阅读回忆录,我看到希尔德雷思(2003)说的话在其他陆军士

兵、海军陆战队和飞行员的回忆录中得到回应。那些在越南打仗或飞行的战士们似乎都在讲述相同且普遍的生存故事,尽管具体特征可能有一点儿不同。我分析的回忆录包括:Alvarez J. & Pitch, 1989; Bell, 1993; Caputo, 1977; Downs, 1993; Foster, 1992; Herr, 1991; Marrett, 2003; Moore & Galloway, 1992; Nhu Tang, 1986; Rasimus, 2003; Santoli, 1981 & 1985; Terry, 1984; Trotti, 1984; and Yarborough, 1990。

回忆录验证了我的访谈,也表明在越战中服役的男人(和女性)将战争的很多东西带回了家,因此他们觉得必须要在多年之后把它写下来。在分析的这一点上,我需要更进一步的分析,以回答分析中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敌人到底是谁,他们为什么会是如此顽固的对手?美国是如何卷入到越战中来的?政治的、社会的以及环境的背景——像希尔德雷思这样的人在这样的背景下必须要去打仗——是什么?我意识到,这些问题是与情景脉络相关的问题,这意味着,如果我想要从越战中参与打仗的战士们的视角来理解战争,那么我就要拓宽我的调查范围,研究一些更加广泛、更加宏观的议题。在我已有的类属中,我已经有了一些更加微观的情境要素,例如从"入伍的时候"到"回家"及"超越(beyond)""自我的变化"以及"心理生存策略"。在分析交接的地方,我所缺失的是更大的社会政治画面及其对战斗经历的影响。我在下面的资料收集和分析中将转向这些宏观议题。

要点总结

本章探究并发展了"战斗人员"的概念,并将其延伸使之包括"战斗"的概念。虽然战斗人员这个概念的探究和发展是分析的主要关注点,但是新的概念都来自于其他的资料,如"纠缠着的鬼魂""回家"和"承载着负担"。读者从这一章吸取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备忘录对分析的重要性。研究者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在这一章中,如果没有运用备忘录来记录本章中探究的所有这些思想,那是不可能记得住的——我们很少有那样好的记忆力——或很

少能够通过对回忆录进一步进行理论抽样,对重要分析问题进行跟踪。如果没有将这些思想记下来,分析将变得太复杂,而且满脑子都是需要记录下来的概念发展。我还想指出,虽然计算机对分析很有帮助,即使使用计算机,分析者一定不要以一种机械的方式去进行分析。真正让质性研究的研究发现如此迷人和如此相关,以及让获得研究发现的过程成为如此令人激动的发现之旅的,正是思想的自由、研究者改变自己的思维、审查观念以及追踪资料轨迹的能力,无论它将你引向何处。

思考、写作及小组讨论活动

1. 检查本章中的一些备忘录,从分析的角度,想想发生了什么,也就是说,概念是如何被延伸和发展的,以及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是如何演变的。如果你使用 MAXQDA 软件,学会利用 MAX Maps 的功能,以便将你的想法直观化表达出来。
2. 思考这里分析中研究者的角色,如果研究者换了,分析可能有什么不同。对于相同的资料,你会如何分析? 你从这些资料会得出什么?
3. 记下你的想法,并把它们带到课堂上讨论。
4. 正如读者可能会注意到的,在本章的最后,我没有安排一个概念清单。作为此练习的一部分,请通读本章,然后将这些新的编码(概念)列一个清单,并将它们添加到第 8 章的清单中。现在已经阅读了这两章的田野笔记和备忘录,想一想这些概念可以如何更好地匹配到一起以形成类属。有什么新的重大主题出现? 如果你用 MAXQDA 软件工作,在编码系统中对你(最终)定义的新概念进行界定。利用团队输出和团队输入功能,在团队中分享你们的变化。

10

分析情境

美国在越南的溃败主要原因在于对叛乱原因的错误判断。产生冲突与其说是因为亲共主义,还不如说是反对吴庭艳、阮高其、阮文绍,他们都未能发起和实施急需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化解这场冲突更多需要的是通过政治途径的解决而非通过军事手段,也许还要满足重新统一国家的普遍愿望。(Sar Desai,2005,p. 120)

框 10.1 术语界定义

条件/结果矩阵:一种用来激发思考的分析工具,从而对能够纳入情境的广泛的可能条件和后果进行思考。

情境:引发问题的一系列条件或个人通过行动/互动/情感对其作出反应的情况。情境从这些条件中产生,范围从最宏观到最微观。

范式:一种将结构和过程整合到一起的模型。

过程:对情境中出现的问题或情况不断作出的反应。反应可以采取行动、互动或情感的形式。反应可以随着情景的变化而变化。

导 论

在上一章中，我们确定了越战中战士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生存"。分析者可能会说，战争威胁着战士们的生存，同时也影响了战士的心理健康和道德节操。但生存的威胁来自于什么地方呢？为了更加充分深入地理解"生存"的概念，作为研究者，我们面临着两个分析任务。第一个任务是探究战争发生的情境，因为这将有助于揭示威胁生存的情况或问题。情境有两个组成部分，一个是更为微观的条件，这是战士日复一日所面对的一系列直接条件，第二个是宏观的或更大的社会、政治和历史条件，在它们更加"直接"的条件。第二个分析任务是探究过程，在这些过程中个体通过行动/互动/情感对威胁生命的条件作出反应。过程将在第 11 章中讨论。

方法论说明 在探究"生存的情境"之前，我想把读者的注意力先引向一段对方法论的说明。一般情况下，在研究的最后，分析的成果呈现为一系列的研究发现。对研究者得到这些发现的过程则很少提及或只是简短提及。写这本书时，我想呈现给读者的不只是一本关于研究流程的书，我想带领读者走进整个分析经验里面。下面是我在上一章和本章之间撰写的一份备忘录。我将其放在这里，让读者对我的分析之旅有所了解。

备忘录 1 理论敏感性 2006.6.21

有趣的是，自从本研究项目开始之后，我有了很大的变化。这并不是因为访谈和我正在阅读的回忆录与研究一开始时有什么区别，而是因为我对它们所说的更加敏感了。需要在资料中沉浸一段时间，然后资料的意义才能够被发现。敏感性随着与资料的接触而增加。我可以说，分析资料就像剥洋葱，每剥去一层以后你就更接近核心。这便是"理论敏感性"的意思，即更加接近埋在资料中的意义，与之更加协调一致。

除了增加对资料的敏感性之外,我发现有趣的还有自项目开始以来我自身的变化。我情不自禁为我所读的战争故事所感动。我看过有关战争的电影和书籍。但是分析过程中,在分析者与资料之间发生的互动的某些东西改变了我对战士的想法和感受。这和承担起他人的角色有关,体验一下暂时将自己看作是士兵的感受。我知道我再也不会以完全相同的方式看待一位从任何一场战争中退伍的老兵了。我发现随着资料的分析,我对将年轻人卷入越战的情况和让他们打得如此艰难的交战规则感到愤怒。我为战争当中和战后一些人遭受到的痛苦而感到悲哀,我也为"被拖入战争的敌军士兵和平民"而感到遗憾。这对所有的人都是一个艰难的时期。同时,我知道我不能让我的感情成为做研究的障碍。有感受没关系,但是同时我坚持对故事的参与者保持中立,不能因愤怒和其他情绪冲昏头脑,从而使自己的失效。

还有很多我不理解的事情是分析越战中战士们的情况。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问题,我必须更加深入地探究形成体验的情境因素,即战前、战时及战后的政治、社会和历史条件。这就是研究引导我的方向。在研究的这个阶段驱动分析的问题是:战士们在什么条件下必须要打仗?又是什么样的历史/政治/社会因素导致了这些条件的产生?除了为研究,我自己也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

将"战争文化"与"生存"联系起来

回到分析上来,来自早先分析的一个概念:"战争文化"。"战争文化"被描述为战士在其中行动的情境,或用另外一种说法,他们的战争体验发生于其中的情境。在为情境审阅资料时,我现在"拓宽"了"战争文化"的概念,探究情境包括哪些内容,同时我将通过展现情境与生存行动之间的关系,将"战争文化"与"生存"的概念联系起来(将在下一章呈现)。我回到有关越南的资料,以便揭示威胁战士们生存的条件。很明显他们正遭受枪炮的射击,但是除了遭到袭击,还有什么别的战斗条件使战士们处于危险中并使得他们的身体的、心理的和道德的存在受到威胁?在分析了参与者#3 的访谈记录之后,我转向那些回忆录来寻找线索,确切地说,寻找那些威胁到生存的问题,使得生存成为主要议题的问题。

我发现有一个回忆录特别具有洞察力，其标题为《战争的谣言》(*A Rumor of War*)，是菲利普·卡普托(Philip Caputo)于1977年撰写的，它非常清晰地阐述了这些问题。卡普托说，他的书是“关于战争的故事”“人们在战争中所做的”以及“战争带给人们的”(Caputo，1977，p. xiii)。换言之，对于我们将“战争文化”和“生存经验”两个概念联系在一起的目的而言，这本书给予了充分的揭示。

卡普托1963年参加了海军陆战队，1965年3月8日他以中尉的身份被派到越南，在那里他服役13年。十年后(即1975年)，他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返回越南，报道西贡的衰落。他从士兵和记者这两者的视角撰写该书，为我们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信息。在阅读这些资料时，我专门寻找威胁到生存和增加脆弱性的条件。这些条件作为一系列的问题被提出来，因为这就是战士们所经历的或他们所谈论的。

备忘录1 问题#1：理想主义和青春 2006.6.23

我们满怀着憧憬奔赴海外，那些年异域的空气竟然成了我们的青春。(Caputo，1977，pp. xiii & xiv)

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年轻人怀着保卫国家的信念参了军。有些人是自发参军的，有些是应征入伍的。因为年轻士兵对战争的理解主要来自于电影，当他们抵达越南时，大多数都没有作好流血、受苦和磨难的准备。战争的“现实”非常艰苦，生存需要他们在态度和行动上发生剧烈的转变，一个从现实情景抛开浪漫想法的转变，代替这种想法的是“战争就是厮杀或被杀”的观念，即使不是接受，至少是承认这样的观念，而且要认识到，战士对流血和死亡必须要无动于衷，而且要努力存活下去。

备忘录2 问题#2：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 2006.6.23

人有的死有的伤，而我们的巡逻兵在相同的地方继续打仗，上周在这里打仗，上上周也在这里打仗。情况依然相同。(Caputo，1977，p.182)

阅读了各种战争回忆录，尤其是卡普托的回忆录，我感到战士们普遍有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无力改变他们所处的环境。在越南战争期间，征兵依然在进行。虽然早先的战士，特别是海军陆战队成员，都是自愿来的，但是随着战争的发展，需要的士兵越来越多，而志愿去的人越来越少，所以越来越多的士兵被应征入伍。他们只进行最基本的军事训练就被派到前线。但正是那些看到了敌人行动的优势的"战士们"，遭受了最大数量的战争伤亡。有人给前线士兵起了一个名字叫"喽罗(grunts)"，一个含义丰富的词语。喽罗们做"杀人的脏活"，他们处于军队等级系统中的最底层，几乎没有权力控制他们生存环境下的军事形势。他们几乎没有权利决定去哪里，也没有权利决定做什么，而且也不知道任务是什么，因为他们似乎没有去过任何地方。

分析起来，"无能为力(powerlessness)"是一个有趣的概念。也许，它解释了战后退伍军人愤怒的部分原因。至少我可以假设并在后期进行检验。除了有人告诉他去哪里，否则几乎没有一个前线士兵能够自己决定所作所为，他会按要求去做事，即使是没有意义的，甚至危及生命的事。

备忘录3 问题#3：令人困惑的交战规则 2006.6.23

用来定义本次战争的"交战规则"可以说非常令人困惑。听听卡普托怎么说：

根据那些交战规则，"枪击一个手无寸铁正在逃跑的越南人在道德上是正确的，但射击一个在站着或正在行走的越南人则是错误的；近距离射击敌方的俘虏也是错误的……"(Caputo，1977，p.218)

一个年轻没有经验的战士是如何通过大量令人困惑的潜在和显

在的规则，即所谓的“交战规则”找到自己的行为方式？某些条件下杀人被允许而其他条件下却不许，这种情况下他如何保持他的“正确与错误”的认知？难怪年轻的战士们对他们所见所为感到困惑、幻灭感以及烦躁不安，这又导致了他们做了他们本来不应该做的事情。此外，如果一个人发现生命危在旦夕，他还能停下来思考“交战规则”或道德问题吗？或他只会采取行动？

备忘录4 问题#4：与其他人打仗 2006.6.24

当卡普托首次抵达越南时，他被告知，他将被送到那里保卫岘港的空军基地而非进攻北越军队。早在1965年战争依旧被定义为越南战争。当卡普托登陆后被告知：

……好的，听着。当你向人们介绍时，讲清楚我们的任务仅仅是防御性的。（Caputo，1977，p.35）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局势变得明朗，仅仅靠南越军队是抵制不住北越军队的军事渗透的，美国军队在越南的军事目标已然改变了。它在战争中从早期提供侦察、培训和支持的目标转变成为防止北越占领南越的主要作战力量。卡普托说，“战争将不再仅仅是‘他们的战争’，也是我们的；是一个合作拥有的事业”（Caputo，1977，p.68）。但这对于一个离开家数千里而来这里的年轻人来说，要理解他们为什么来这里打仗，还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为了别人国家的共产主义而打仗，这太模糊了。

备忘录5 问题#5：进入生与死前线 2006.6.24

当美国的军事力量成为越南的主要战斗力量时，他们进入了一个可以称作是“生死前线”的世界。在一个战争区域，死亡或受伤的危险总是存在。为了战斗而作的“训练”，无论多么好，都与“处在战斗”有很大的不同。可以说，有一定量的学习是伴随着“生活”经验而来的。如果一个战士想要生存的机会，他必须非常迅速地从“新手”转型到“老练的战士”。卡普托描述了“变得老练”的一些属性并描述了一些后果。

卡普托解释说：

我们开始改变，不再像我们刚到越南时那样孩子般的幼稚。我们变得更加专业、精炼和坚韧，而且我们的心中开始结茧，一种情感的防弹衣，它钝化了同情的刺激和打击。（Caputo，1977，p. 90）

备忘录 6 问题#6：同顽固且老练的敌人作战 2006. 6. 24

当美国军队接过了越南战争时，他们认为这可能只是一个很短的冲突，因为美国认为自己拥有"超级"军事力量。然而这被证明是错误的假想。北越军队训练有素、积极性高。他们知道如何利用地形，从而对他们有利。他们挖隧道，在地下存放必备的生活和医疗设施物资。在村庄和路上布置陷井和地雷。他们接受来自其他国家的武器和装备。他们的供给渠道是通过柬埔寨和老挝，而这却不在美国士兵的监管范围。美国人可能具备精湛的军事技术，但北越拥有作战技能和动力。

备忘录 7 问题#7：一个不适合人居住的区域 2006. 6. 25

越共不是这场战争唯一的敌人。尽管美国士兵们接受了一些丛林训练，但是未对越南的地形做好充分准备。军队不得不长途跋涉，经受烈日的炙烤和雨水的洗礼，露宿在浓密的丛林。他们不得不忍受蚊子、水蛭以及热带皮肤病的侵袭。这样的环境只能叫它是"不适合人居住的"地方。

备忘录 8 问题#8：没有明确目标的战争 2006. 6. 25

在华盛顿确立的"政策"和"交战规则"除了起到限制战士们击败敌人的作用之外并无他用。北越士兵可以袭击美国士兵，然后安全地撤退到柬埔寨、老挝、北越，他们知道美国军队不会追到那里。（虽然在作战上受到限制，但是飞机仍在这些地区上空秘密执行任务。）另一个明显的议题是，我们的兴趣不是在永久性的安全领域。美国士兵打一场战斗，当战斗结束，美国士兵也就撤退回到他们的基地，让刚刚拼

命作战的敌人又可以自由收回土地。有时候美国士兵不得不回去再次争取之前的同一领土。这个问题一直困扰了年轻的战士们,他们丝毫找不到作战的意义。甚至飞行员也纳闷为什么他们冒着对自己相当大的风险反复被要求轰炸相同的区域。第一次轰炸攻击之后,敌人做好准备等待飞机的到来。战士们觉得似乎没有战略计划。大量的死伤人数加上没有明显的军事收益导致了战士们战斗力降低。如卡普托所说,“死亡的人越来越多,但这并没有带来任何收获”(Caputo,1977,p. 213)。

备忘录9 问题#9:以尸体数目衡量战争的成败 2006.6.26

美国对越战采取的战争政策目的在于打击敌军的士气,将共产主义越共和北越正规军驱逐回到越南北部。军事努力旨在“搜索”和“消灭”。战争的胜利是通过“清点尸体”来衡量的。在每次战斗后士兵必须四处清点敌军及美国士兵的死伤人数。

备忘录10 问题#10:文化分歧 2006.6.26

在这场战争中打仗的年轻战士们对越南文化或历史所知很少。许多年轻的战士在他们去越南之前甚至都不知道越南在哪儿。战士们期望越南村民按照他们的希望对局面作出回应。当越南村民的行为未达到美国人的期望时,这些村民似乎显得不够人性。去人性化的越南人以及敌人让暴行更加容易找到借口。在一个巡逻队中,卡普托的小队成员来到一座被烧毁了的村庄。起初,卡普托说,他对其他一群美国士兵所做的感到羞耻。当卡普托经过这个村庄时,他预计村民会对路过的士兵表现某种情绪,如仇恨或愤怒。然而,村民们外表并没有展现什么情绪。卡普托指出,缺乏情绪致使他将怜悯转为蔑视。几年以后,他便能理解为什么当时村民对他们做出如此反应。卡普托说,“他们遭受如此之多——无止境的战争、糟糕的收成、痛苦的疾病,因此他们已经学会了接受和忍受”(Caputo,1977,pp. 124-125)。

备忘录11 问题#11:一个不断更替的军队 2006.6.26

战士们在越南战争期间服役期为一年左右,长短取决于其服务的部门。对于有些飞行员,他们在越南的服役期是一年。而有些飞行员则是执行100次任务,对于在越南执行任务的海军陆战队服役期是13个月,而陆军是12个月。无论服役期是一年还是一年以上,经常更换就意味着当一名士兵变得“老练”能够保护自己和他人后,他的服役期就到了。然后他就可能被“新手”取代,这些新手与其说是对部队起到帮助还不如说是碍事。除了正常的轮换安排,在越南,伤亡率很高,因此也需要“新手”和缺乏经验的士兵来顶替。是“新手”就有其缺陷。由于缺乏求生技能,新手无形中增加了死亡的危险。而且还增加了偶然事件或“友军开火误伤事件”的机会。

备忘录12 问题#12:复仇的欲望 2006.6.26

战争不仅带来恐惧和愤怒,也带来了复仇的欲望。作为排长在战场待了几个月后,卡普托被调出战地回到总部得到一份工作。他的新职位是每天记录美国和越南的伤亡率。执行几个月后,卡普托说他开始不断做噩梦。担心自己这样会发疯,所以要求重返战场,即使这样意味着增加了死亡或受伤的危险。因为他想要敌人也承担一些他曾经忍受过的那种痛苦。

备忘录13 问题#13:难以停息的战争 2006.6.26

随着时间推移,战斗越来越激烈。战斗较卡普托第一次抵达越南时更残酷,也更频繁。当他回到前线,他发现,战争的性质在他离开后发生了变化。北越正规军部队的规模在扩大,相反,越南南部的越共作战技能却在下降。北越士兵携带着手持AK47步枪、手榴弹及克莱莫地雷经由胡志明小道挺进越南南部。当卡普托回到战场时发现,“这不再是一场游击战争了”(Caputo,1977,p.207)。

备忘录14 问题#14:体能疲惫 2006.6.26

随着战争的加剧,美国士兵加大巡逻力度以"搜索"和"摧毁"敌军。在常遭敌军袭击的丛林里,士兵没法过多休息。长途行军中,由于遭受炎热的天气,缺乏充足的睡眠和必需的食物,加上压力、紧张和恐惧,战士所面临的危险加速了他们体能的消耗。卡普托说,"连队已经投入近200支巡逻队,甚至晚上也在进行夜巡。战士处于一种长期疲惫状态"(Caputo,1977,p.237)。

备忘录15 问题#15:心理和道德崩溃 2006.6.26

虽然精力已经耗尽,卡普托和战士们依然得花更多的时间搜寻敌人。一天,他和兵排来到一个村庄,据称是一个越共据点。当士兵前往那个村庄,越共士兵袭击了美国军队。随后他们撤离了村庄,留下村民们面对愤怒的美国士兵。卡普托说,当他和战士们来到村庄时,他们就"输了"。他们喧嚣地进入村庄,放火烧掉所到之处每个房屋,然而村民们只能惊恐地看着。他说他感到无力阻止士兵也无力阻止自己。点燃村庄"几乎是一种情绪需要",也是宣泄这几个月恐惧感、挫败感和紧张感的一种方式。"我们不得以惩罚别人的方式释放我们的痛苦"(Caputo,1977,p.288)。

备忘录16 在高风险的情境中求生存 2006.6.26

那么,上述所有这些对我们的分析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战争文化是由威胁个人和集体生存的多方面因素构成。威胁以一系列问题形式呈现出来,这些问题是战士们必须要克服的,如果想要在身体上活着、心理上无损以及保持道德完整的话。日复一日的战斗已经够困难了,但如果你看到在领土上没有任何收获、似乎也看不到战争的目的,也看不到战争的结束,只是看见敌方不断地补充兵力准备杀死你,对于士兵,剩下的唯一事情就是忍耐着和求生存,直到能够离开战场,希望还活着。

作为结构的情境

所以,现在出现的问题是,为什么是这些条件或问题,而不是别的?是什么导致了这场战争?是什么制造了这场战争以及战士们经历的特属于越南的条件情况?这并不是说战士们在其他战争中不会经历类似的条件情况,但越南不同,因为对国家完整的威胁相当模糊(共产主义),而且当然也不是直接的,但是战争对战士个人的威胁却非常高,因为那些交战规则以及战争持续的时间非常长。当我们谈论结构或情境时,我们的意思更多的是在撰写章节时引用历史事件作为背景材料。我们感兴趣的是,战士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历史、政治及社会条件上为他们奠定基础,它们为战争确定基调和政策。虽然常常是象征性地也确实只有数英里远,但在华盛顿和河内作出的决策都是基于个人和集体的抱负、对过去事件的理解以及国家利益,这些决策奠定了此次战争的文化并创造了两边战士都在其中行动的条件。换句话说,上述清晰罗列出来作为问题的条件都可以追溯到历史/社会/政治事件。这种追溯过程将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战士们感觉自己失去了方向,只感到无止境的战争。

我们对社会/政治/历史条件的分析将以备忘录的形式呈现。它们回答了为什么、什么人、什么事等问题以及围绕我们对"战争文化"的概念所进行的探索。

方法论要点

我必须承认,这一章的分析让我停滞不前。这么多越战时期的材料,让我整理得头昏脑胀。我觉得我似乎已达到了饱和点。在把这个项目放开一段时间后,我重新着手该研究,才意识到我已经使用了太多的描述方面的资料,而没有像我本来想的尽可能从概念上进行思考。通过重新聚焦于概念而非细节,我知道我可以重新继续。这一节关于情境的资料来自下面这些资源:Ellsberg, 2003; Isaacs, 1997; Langgreth, 2002; McMaster, 1997;

McNamara, Blight, &Brigham, 1999; Nhu Tang with Chanoff & Van Toai, 1986; Santoli, 1985; Sar Desai, 2005; Sheeham, 1988; Sollah, &Weis;2006;Summers Jr. ,1999;Tucker,1998。

备忘录1 战争文化 2006.6.27

"战争文化"是一种充满了生理、心理和道德危险的文化。这种危险来自于那些形成战争体验及威胁生存的问题。为了寻找问题的原因以及为什么有这些危险,我不得不回头去看看,是谁使美国卷入战争,为什么在此时此地,谁制定了战争政策,谁是敌人?交战规则制定的限制是什么,为什么战期如此之长?是什么使得战争结束?是应该要深入地研究那些历史书籍的时候了。

这是一个很冗长却很重要的故事。它解释了战斗的条件:为什么越南战争变成了美国的战争,为什么部队在越南作战(一个对于当时美国来说是文化异质的国家),为什么美国以尸体数而非领土获得量作为衡量成功的标准,而且为什么制定以及由谁制定交战规则,为什么敌人如此顽固。还有更多的素材可以呈现,但这不是我们的兴趣,我们在本章努力要做的就是将它们都放到这儿。

为什么美国战士在越南作战?多年来,越南一直是法国的殖民地。越南人对法国的反抗使得法国人在1954年失败,而且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法国的撤退并没有致使越南统一。作为日内瓦公约的一部分,以北纬17度为界越南被分成两部分:共产主义的北方和非共的南方。根据日内瓦公约,重新统一的议题将在两年内通过自由选举的方式解决。然而,由美国支持的南越政府,拒绝签署《日内瓦公约》。该拒绝背后是一种担忧:假如举行自由选举,国家控制权交到了共产党人之后会怎样。美国担心的是如果南越落入了共产党人手中,柬埔寨、老挝以及其他东南亚国家将会产生一种"多米诺效应"(Sar Desai, p.68)。正是由于对共产主义和"多米诺效应"的恐惧,使得美国卷入越南战争当中。

同时,南越也有自身的政治问题。在1954年,吴庭艳担任南越总统。他是个天主教徒,最初来自越南北部,然后来到以佛教信仰为传统的南越。即位后就开始从军事上反对宗教上的和政治上的反对派。不是将美国的捐助用于重建他的国家,吴庭艳将资金用于建造和装备

他的军队。他将亲戚朋友安插在西贡政府岗位和地方村庄的行政职位上,扰乱了佛教的传统,回到了几个世纪前。越共承诺要消除南越政府的腐败。正是因为这些原因,许多村民都支持越共与美军抗战,或者至少是不愿帮助美军,因为他们认为美军是支持腐败政府的。虽然在国家分裂的时候很多共产党人到了北方,但是有好几千名共产党(越共)仍留在南方为最终统一做准备。

当吴庭艳政权倒台时,政治动荡不稳局面随之而来。由于各路军事领导人都在争夺控制权,领导之间的裂缝为北越军的渗透打开了门户,他们是来援助这里的越共。北越军队和物资供给通过胡志明小道抵达南方。这个路径很大一部分穿过中立的柬埔寨和老挝,所以可能是在美国和南越军队视野之外。

肯尼迪总统为南越军派遣了军事顾问。该决策的基础是,如果美国为南越军队提供以培训、技术支持和情报形式的军事援助,他们就能够很容易打败越共。1963 年当肯尼迪遇刺后,约翰逊担任了美国总统,约翰逊对总统任期有着自己的安排,但他不知道如何处理越南问题。他指望肯尼迪政策制定者为他提供建议。

麦克纳马拉(McNamara),肯尼迪政府留下来的一位年轻顾问,成为了越南战争的首席"建筑师"。他没有军事背景。相反,在成为总统顾问之前,他在福特公司工作,而他将他的商业知识应用到战争上。旨在解决越南冲突的麦克纳马拉计划由一系列运用在越南北部的被他称为"渐进压力(graduated pressure)"的措施构成。根据这项计划,无需采取较大的突袭。相反,通过对北越实施一系列控制的和有限的军事行动(如轰炸任务),给对方施加缓慢的压力。轰炸的目的是削弱北越的基础设施,让他们愿意谈判,从而制定出一个更有利于南越的和平协议。麦克纳马拉计划从一开始就有缺陷。首先,它是一个"遏制计划(containment)",而不是一个赢得战争的计划。该计划是基于一个平民对战争的理解以及战争应该如何打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军事策略和实施行动的基础之上。每一次提出来的军事行动都必须转到华盛顿,经过同意之后才能够实施,这常常耽误了行动,将军事行动的策略优势让给了敌军。换句话说,参谋长联席会议,那些负责执行战争的人,却没有机会提供战争该如何打的建议,他们也没有实施战争的自由,即使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他们可以赢得战争,其结果是

产生了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第二,麦克纳马拉的遏制计划和轰炸战略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北越几乎没有基础设施可以轰炸。北越不是一个工业化的社会。他们大部分的武器和弹药要么来自俄罗斯等国,要么来自他们俘虏的南越军(即美国提供的)。第三,在拟定日内瓦公约时,该计划没有考虑到北越决心统一自己国家的意图。最后,该计划未能考虑到轰炸对越南人民造成的影响。轰炸不仅没有消除他们的意志,反而加强了他们的意志,产生了不惜一切代价战斗到底的决心,使他们成了意志异常坚定的敌人(McMaster, 1997, pp. 323-334)。

早些年,越南没有(如果有也是极少)实际作战部队。到1965年,越来越明显的是,尽管有美国的支持,南越的军队已经无法与越共相抗衡,因此这就变成了美国的战争,美国将部队投入生与死前线。为了不引起美国公众对被派往越南参军数量的惊恐,国家采取了逐渐派遣的方式,随着时间的发展,数量逐渐增加。第一批派遣的包括18 000名士兵送到南越保卫美国基地,他们遭到了越共的袭击。1968年,新年攻势爆发。尽管春节对越共来说是一个军事打击——他们几乎被完全摧毁——这对北越来说是一次政治胜利,因为残忍和冒失的攻击使得美国公众舆论反对战争。北越人利用美国士兵的死亡和尸体作为宣传工具,点燃了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并且以此挫伤在越美国士兵的斗志(Nhu Tang with Chanoff and Van Toai, 1985)。然而,美国继续派军队到这个不友好的地方,训练好军队让他们去打仗,而不是去理解其文化,同时为他们制定混乱的交战规则。

备忘录2 敌人　　2006.6.27

谁是敌人,为什么敌人表现出这样坚决的战斗意志?总之,一千多年来,越南就一直在奋力维护他们的主权和他们的独立。最后的占领军是法国政府。脱离法国获得独立的渴望使他们发起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运动。由于受到中国革命的激发,为了推翻法国政权统治,许多越南青年,无论是共产党和非共产党人,到国外接受革命训练,以推翻法国统治。革命热情鼓舞的与其说是共产主义,不如说是民族主义。越南人,包括胡志明都"首先是民族主义者,其次才是共产主义者"(Sar Desai,2005,p.53)。正是这种民族主义感使得他们成为如此

强大的敌人。

谁是战斗人员(combatants)?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被定义为肯尼迪时代,其标志是服务于国家和人类的理想主义感。与此同时,有古巴导弹危机和对共产主义侵略的相当畏惧,这些都影响了美国的生活方式。此外,自从二战以来,一代人已经过去了,人们对战争的印象不再基于现实,而主要来自电影,但是电影的焦点是在英雄,而不是死亡和破坏。因此,有许多年轻男人做好了为国家服务的准备,与共产主义者战斗。他们爱国,而对战争也不冷漠。后来随着战争的持续拖长加上缺乏进展,军队和整个民族的士气逐渐下降。

在哪里作战? 在越南,一个当时许多美国人都不知道的国家。这个国家的气候和地形与美国有很大的不同。战士们在丛林中作战,炎热和降雨使得作战环境非常艰难。周围的寄生虫、蚊子和各种其他携带疾病的生物,这些都威胁着战士们的健康。此外,他们发现与敌人搏斗的村庄到处都是村民,这些村民常常帮助敌军,有时更多是出于害怕,而不是同情。士兵们经常弄不清楚谁是敌人,谁不是敌人。

美国在越南的战争是如何结束的? 最终,美国民众已经受够了,他们通过和平游行和其他手段支持结束战争。1974 年在巴黎达成了和平协议,结果是美国军队撤出越南,战争无胜而终。撤军后,北越军队对南越军队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1975 年西贡沦陷,共产党完全接管了越南。有趣的是,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the South Vietnamese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的很多非共产党员在战后也是寿终正寝了,他们曾经是那么猛烈地反对美国人。成千上万的南越人遭受迫害或被捕入狱。那些能够逃离这个国家的人就逃离了,如今已远离当初热爱并且曾为之努力作战的国家,作为移民生活在法国及其他国家。似乎没有人真正赢了那场战争。下面这些话是《一名越共的回忆录》(*A Viet Cong Memoir*)(Nhu Tang with Chanoff & Van Toai,1986)一书献词里提出的要点:

献给我的母亲和父亲。

献给我的被出卖的同志们,

还献给那些相信他们是为了人类自由而牺牲自己的人。

上面的社会/政治/历史条件代表了条件/后果矩阵各个层

面,并回答了什么人、什么事、什么地点、什么时候和什么原因这些问题。这里并没有介绍所有的条件,但是为理解为什么战士在越南和为什么他们面临这些特定的条件或问题提供了足够的背景。这些问题包括:理想主义和青春、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对交战规则的困惑、与不相关的人打仗、进入生与死的前线、一支顽固且老练的敌人、不适合人居住的区域、没有明确目标的战争、以尸体数目衡量战争的成败、一个分裂的文化、军队总是更替、不断增长的复仇欲望、没有停息的战争、一种体能疲惫,还有对心理和道德崩溃的潜在影响。将所有这些问题放在一起就是"战争文化"的属性。如果华盛顿和河内作出了不同的角色决策,如果确立了不同的交战规则和政策,如果敌人不是如此卖命,如果人事安排没有种族偏见,那么战争可能不会发生,或者如果战争确实发生了,可能应该从战士们的视角看,就会看到很多不同的东西。从分析的角度以及从指导随后的理论抽样和分析的问题是:战士们如何克服这些障碍或设法处理这些问题来增加存活的机会?

方法论说明 在分析中我并不是很轻易就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必须要进行大量的阅读、思考、写作和修改备忘录。我想要传达的一个最突出要点是,留出一定的时间去思考,这非常重要。年轻的研究者往往受到时间和工作的限制。他们没有大量的研究资助来组建研究人员,从而允许他们放下常规教学或其他职责去进行研究。我不得不强调质性研究不可操之过急。一个质性研究者必须留有时间来培养敏感性,必须留出时间让思想的演化发展得以发生。当我听到学生们说他们不喜欢做在书中呈现的详细的类型分析时,我非常沮丧,他们认为这项工作太烦琐。他们想要走捷径或以简单的方法来做质性研究。最后,研究者注入质性研究的正是"质量(quality)","质量"使得质性研究不同于其他研究,并且赋予研究发现以意义和新鲜感。在做研究时,研究者绝不要轻易更改资料、参与者、专业或自我。

要点总结

本章的目的是要寻找战斗体验出现的情境,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揭示并扩展了“战争文化”的概念,同时,将“战争文化”的概念和“生存”的概念联系在一起。战争体验的特点是一系列可以追溯到更大的特属于越南战争的社会/政治/历史条件。战士面临的这些问题导致了他们出现众多生理、心理和道德危险。揭示并阐明“战争文化”概念将分析向前推进,引出了理论抽样的下一个逻辑步骤,战士们使用哪些策略来处理他们在战斗中面临的问题和情况。

思考、写作及小组讨论活动

1. 以本章为模式,解释如何了解情境,从而丰富对战争体验的理解。如果你正在使用 MAXQDA 软件,学会使用 MAXMaps,从而对“情境”和“体验”之间的关系进行反思。
2. 循着本章的分析,努力辨别作者如何扩展和阐明“战争文化”的概念。
3. 将你的思考写下来,并带到小组进行讨论。
4. 将本章这些新的概念添加到你的概念清单中。是否有新的类属/主题出现?如果你使用 MAXQDA 软件,将这些新的概念作为编码插入到编码系统中去。和你的小组成员讨论你的编码。

11

将过程纳入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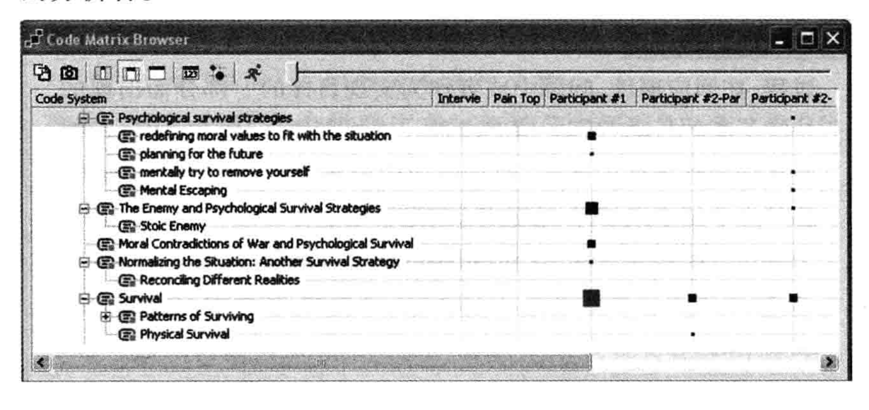
飞机缓缓起飞，越过中国海域，飞向冲绳岛，从死亡的怀抱中挣脱奔向自由。我们都不是英雄。我们不会回到欢呼的人群、游行的队伍和大教堂洪亮的钟声，我们只是忍耐着。我们还活着，而这是我们唯一的胜利。（Caputo，1977，p. 320）

框 11.1 术语界定

过程：在回应事件、问题中或者作为实现目标的一部分而出现的持续不断的行动/互动/情感流程。这些事件、问题和/或目标都是从结构性条件中产生，而在回应中出现的这些行动/互动/情感产生了结果或后果，在这里，就是希望生存。结构性条件的一个变化可能需要活动/互动/情感的调整，以利于生存。行动/互动/情感可能是策略性的、日常性的、随机的、新颖的、自动的和/或周全的。

导 论

我再一次拿起越南的案例,通过更加深入地探究和阐明“生存”的概念,将分析向前推进。这一次,我专门寻找由战士为生存而作出的行动/互动/情绪反应,即作为战士的生存体验。“生存”这个概念在每一次访谈和回忆录中都以某种形式出现。抛去爱国主义的言论、探险的欲望、成为飞行员或海军的愿望,最后都可归结于想在越南战争中“生存下来”。我读过的每一个回忆录实质上都是一个“生存故事”,因为个人活着就要讲述它们。飞行员谈论他们每一次出去执行任务中冒险求生。地面部队谈论在战争中幸存。当我坐下来思考我所了解的“生存”时,我发现我的脑海里漂浮着大量的资料,这样,我就准备考虑将过程引入分析中。但是将所有的资料都拿出来作为过程绝非易事,即使对于有经验的分析者。



屏幕截图 10 这幅屏幕截图展示的是 MAXQDA 的一个可视化的工具:编码矩阵浏览窗口,在这里可以清楚而详细地浏览“生存”的话题及其在不同访谈记录中的位置:相对于参与者#2,参与者#1 更多地讨论了这个主题。方块的颜色和大小表示被编码片段的数量,在方框中拖动鼠标就会显示所包含的编码片段的数字。这些符号从方块变成数字;这个表格可以很方便地输出到定量软件中,如 MS Excel 或其他软件。

生存作为一个过程

我寻找过程的第一步是重读前面分析中的备忘录。在处理资料时，我在重新阅读的基础上，撰写了一份总结性的备忘录，将主要的议题放在自己的面前。通常，研究者在分析中到达这一点时，他/她已经对什么是过程有所领悟了。但是的确有必要回过头来设想一幅更广阔的画面，以便假定如何让过程（行动/互动/情绪反应）与结构相匹配。因为本书不是一个研究报告，而是一本关于方法的书，所以我以一系列备忘录的形式呈现我的思想。

备忘录1　总结性备忘录　2006.7.8

战士们要生存，但是由于生理上、社会上、心理上和道德上的危险使生存成为一件复杂的事。这些危险表现为一系列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一系列要生存的障碍。这些问题/障碍包括年轻气盛和理想主义，这让战士们准备不足或作为战士“缺乏经验”；一种无力感，他们被迫在这些条件下要战胜这些条件，包括那些妨碍他们能够打败敌人的交战规则。当身处越南时，战士们发现他们是在一个不适宜人生活的领地上，与一支顽固的敌军，打着“别人的战争”，这将他们推上了生死边缘。一段时间之后，战士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在打一场没有方向感的战争，对于这场战争，衡量胜利的唯一标准似乎就是“尸体数量”。这是一场游击战，战斗不仅在乡村，而且还在村中进行，文化差异很大，这让战士们很难区分敌友，很难理解陷入战争的村民的举止和恐惧。不断增加的危险因素是部队总是被不断补充的“新手”士兵接替。那时，战争并没有停止，越来越多北越正规军通过胡志明通道进入南越，战斗变得越来越残酷和频繁，导致更多的伤亡。看到战友被炸死或受伤，战士们非常愤怒，从而激起了复仇的欲望。在这种情形下一连串的生存和战争压力最终导致体能疲惫、士气低落而且非常有可能导致心理和道德的崩溃。然而活着也留下了其后果。战士可能从身体斗争的危险中幸存下来，但是他通常遗留了战争的心理和道德伤疤。一些归来的战士们出现了“创伤后应激障碍”，还有一些老兵，虽

然没被诊断出来,但很难适应平民生活,或转向借用酒精或药物来驱逐噩梦以及阻止战争“鬼魂”的浮现。

资料中很明显的是,只有一个生存策略的资源库并不能自动地保证生存。与拥有策略同样重要的是运用策略和有效率地运用策略的能力。例如,一位战士可能受到很好的训练,有枪,准备好射击敌人,但是如果他在攻击前被震住了,那么他在战斗中存活的可能性就减少了。因此,有一系列我们可以称其为“介入条件(intervening conditions)”进入到生存的画面中,有些提高了生存的可能性,而另一些却减少了这样的机会。

一些提高战士们利用生存策略能力的介入条件包括:成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士兵、与战友关系密切、参与小组合作、有较强的领导力、聚精会神作战、有充足的且维护良好的资源和设备,以及在艰难时刻有后备支援。虽然这些“介入变量”每一个都很重要,但也许对生存最重要的两种战略是“成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士兵”与“有较强的领导力”。成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士兵让战士们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能够准确地识别形势并采取果断行动。具有较强的领导力很有必要,因为好的领导者能保持士气,提供指导和保持纪律(尤其是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非常重要),以及合作行动,因此增加了个人和部队存活的机会。

阻碍利用保护性策略的能力包括:在战斗中是一名“新手”、不能在激烈的战斗中控制恐惧和压力、不适当的领导、缺乏后备资源以及长时间的“疲惫”,特别是疲劳后的士气低落以及一时的心理和道德崩溃。最大的障碍也许是“不适当的领导”与“衰竭”。随着身体上的衰竭,对危险的警惕及迅速应对的能力就会下降,而不适当的领导真的会给一个战士带来更大的伤害。

一个人在攸关战争生存的时候必然会讨论生存的相互作用或共同作用方面。生存不仅需要个人行动起来,它也要求个人作为团队一起努力,或为了他人而行动,让他人能够生存。我们常常看到英雄、医疗兵、救援飞行员、后备力量和支持人员如医生、护士、工程师、技术员以及后勤人员。即使在战斗中,战士们必须共同合作与敌人战斗。一些士兵,不顾生命危险,置身于火力前线去营救受伤的同志。医疗兵、陆军和海军(海军医护人员被分配到没有自己军队的海洋区域成为海军陆战队)与战士们一起进入战斗区域,即使他们不是比那些和他们

一道进军的战士们冒着更大的危险,至少他们承担同样的危险。敌人经常利用士兵受伤的时机来射击其他试图来救人的人。有的飞行员在越南的主要工作就是飞行到敌人后方去营救被击落的飞行员或被困在敌方的军队,或为行动的地面部队提供协助支持,否则他们可能会遭到伏击。

方法论说明 由于"成为经验丰富的战士"与"好的领导"和生存的关系如此密切,而且"疲惫"又是一个主要的障碍,所以其他的备忘录都是围绕这些概念来写的。

备忘录2 成为经验丰富的战士 2006.7.9

我想更加仔细地看看"经验丰富的人"这个概念。成为经验丰富的战士不能保证生存,但它肯定有所帮助。"经验丰富"的意思是什么呢?经验丰富的人不一定是一位专家,它不是在专家擅长这个意义上说的。一个士兵可能在生存上经验丰富,但却不擅长发动战争。这里有我到目前为止所发现的成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战士"的一些属性。

这表明,一个战士已经获得了一套策略和技巧,他可以用它们来解决或处理威胁到生存的问题。这些策略和技巧在一些情况下出现,它们都来自成功地处理困难的情况。成为经验丰富的人需要战士抛开对战争的幻想并接受一个更加现实的观点,例如"那里有一个敌人想要杀我,如果有机会他会真的杀了我"。这表明,战士已经了解了他的敌人及其能力,知道如何采取必要的保护行动。这也表明,战士对他觉察到的形势更加敏锐,学会了识别环境中的暗示,还表明他已经形成了护卫自己的健康和保护他赖以生存的装备的习惯。这也意味着,战士已经在身心方面都变得坚强了,对死亡和破坏他能够忍受,而不是太过情绪化。此外,"经验丰富的"也意味着一个战士已经学会了利用恐惧,并在受到威胁时继续行动。最后,"经验丰富的"表明,士兵在战火中证明自己,并将自己看作是一个真正的男人。成为经验丰富的士兵是一种转变,可能很快就发生,例如,在第一次战斗中。或者说这种转变需要时间,这取决于个体和他所遇到的各种经历。

备忘录3 疲惫 2006.7.8

还有另外一个概念似乎与生存直接有关。就是“疲惫”这个概念，它会导致身体上和情绪上的枯竭和道德的崩溃。经过一段时间就会出现“疲惫”。它似乎是对总是处于像恐惧、压力、环境要素、敌人火力这些情况下以及持续处于战斗情况下的一种反应。它的特点是对敌人无法控制的愤怒、报复的欲望，以及被形势挫伤士气的感觉。它还包括过分疲劳，却无法通过休息来缓解；无法区分对错；恐惧，无法正常行动；不关心发生的任何事情；身体饱受不同的疾病如腹泻、疖子的折磨；以及表现出空洞的眼神或发呆。

备忘录4 领导力 2006.7.8

虽然在备忘录里没有提到多少领导力，但通过阅读回忆录，发现它似乎是生存中的一个很重要因素。好的领导者能增强纪律性和秩序性。他们保持军队的士气向上。他们培养团队精神。他们知道他们的人员在战争的压力下如何应对。他们知道可以信任谁并让他们去领导和支持他人，不能信任谁，以及如何在艰难的情况下以最小的代价解决问题。他们可以让事情发生、使他们的人能尊重和追随他们。无能的领导者会犯让他的人处于危险之中的错误。他们没有能力维持秩序或纪律或保持他们军队的士气。无能的领导者在有压力的情况下有可能出现混乱而不是团队合作，进而增加个人和集体的危险。

方法论说明 对于那些习惯于用发展的模式或“心理过程”模式思考过程(process)的人，下面的部分似乎显得很奇怪，因为如上所述，这里“生存”的过程并不循着发展的模式。我没有研究“成为一名幸存者”或甚至是“成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士兵”。资料中不断显示出来的主要议题或主题是“生存”，但生存并不总是一件日常事务。战士在越南战争中遇到的每一种问题或障碍都必须通过个人的或集体的行动去解决或克服，从而增加从越战中生还的机会。

备忘录5 生存模式 2006.7.8

在大量思考我如何对过程进行概念化之后，由于该过程属于生存，所以我决定使用“生存”的模式。关于这里的模式，指的是战士们对在越南遇到的以及威胁他们生存能力的各种问题作出回应的行动/互动/情感表达方式，是常规方式和新颖方式的一种结合。很明显，甚至在战争中，都要建立很多常规方式来处理已知的危险。

如施特劳斯所说：

> 反复指向目标的行动需要一种行动模式，这种行动模式不需要个人或集体在每次行动的现场被指出来。在遇到情况的过程中，除非行动者能够用一个标准的定义快速进行归类，否则他或她毫无疑问会变得筋疲力尽(Strauss，1993，p. 195)。

然而，由于突发情况(计划外的情况或条件的变化)会破坏预计的行动或由于行为的固定模式可能不能解决一个特殊问题，就需要新的行为方式。因此，施特劳斯继续说道：

> 当情况被认为是略有不同、新颖或不同寻常的时候，那么虽然需要合适的日常行为模式，但是这些将是对新的行为方式的补充或者对日常行为方式的细微调整。即使在最具革命性的行动中，日常行为的经验库也不是空的；至少它在和新的行为结合中变成有用的了。(Strauss，1993，p. 195)

在越南的战士们既利用常规策略又利用新的策略来增加生存的机会。下面所描述的两种模式表示行为的常规方式，而另外两种模式描述了更新的方式或调整了的对突发事件的应对形式。第一种模式是“常规性的和个性化的模式”。这种模式包括在应对“日常问题”中采取的策略，通过在越南和在战争区域提出来。这些策略由个人来执行，是日常行为的组成部分，战士们用这些策略来提高自身存活的机会，并帮助维持心理和道德平衡。

接下来的“生存策略”模式叫做“制度化模式(institutionalized pattern)”。很多战争的危险都是已知的，可以通过制度化程序和

安排提前计划和处理，这需要个人为了整体的利益在一起共同合作。

第三种生存策略是一种被称作“救援模式（rescue pattern）”的突发事件应对模式。救援行动是危险的行动，它们通常不是按计划去行动。将救援行动放到一起，将个人或群体从高度危险的情况下解救出来，因此救援行动需要许多人在一起合作，共同努力，以新的方式实施援救。

第四种模式叫作“逃跑和躲避”模式，适合于个人或小的群体有意识地潜伏在敌人后方或在伏击中不知不觉被困住或落在敌人后方。没有队伍可以拯救他们。为了活下来，战士们必须依靠他们机巧和全新的行动方式。不过，注意下面提供的例子，过去的经验和训练对于活着逃离出情景的能力有什么作用。

在各种模式下面，并不是每一种策略都会提到。重要的是要注意，有些问题与身处的战争区域有关，它对战士们克服这些问题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因此要通过使用各种不同的生理、心理及道德保护策略来帮助他们生存。

备忘录6 生存的个性化模式和常规模式　　2006.7.8

战争区域非常危险。战士们绝不会知道敌人下一次袭击会在何时何地发生，在下次战斗或任务中他能否活下来，或者什么样的事件可能引发导致他死亡的道德、心理或情感上的反应。在战争中，虽然一个士兵可以随着时间和经历的积累变得有经验，但是也有可能会随着时间而“疲惫”，因为危险总是存在，而又要求很高的情绪和士气。即使是在基地，一个相对安全的区域，战士们也从来不会真正“感到安全”。敌人会在夜晚发动袭击，尤其是针对小规模基地。基地周围有狙击手守候着。还有严酷的环境带来的危险，如霉菌、蚊子、被污染的水、炎热、雨水、潮湿等。巡逻队在夜晚出行，在矮树丛、埋有地雷的道路上，以及荆棘丛生的树林里度过。当同伴在你的面前牺牲或者执行任务没有回来，这样的失去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处理。

在与顽固的敌人打仗中，克服经验缺乏、不宜生活的环境、令人困惑的交战规则、无力感等问题（所有这些问题被称作“战争文化”）需

要"个性化的和常规的"策略性行动/互动/情绪反应模式,以处理这些并减少危险。这些策略的特点是它们被反复借用的性质,以及虽然它们经常被制度化,但是这些策略也会根据时间、地点及如何执行而被个性化的实施。这些策略的另一个特点是,他们旨在维护心理健康、道德上的诚实以及身体的健康。

在这些战略战术中,即旨在减少生活在炎热潮湿气候下身体上的威胁,有服食疟疾药片、用碘片来净化受污染的水、定期检查脚上的真菌、在丛林中加穿袜子、在感到身体虚弱之前向医护人员报告身体问题、水壶装满洁净的水、保持充足的水分、戴上头盔、穿衣防晒、保持军事设备顺序井然,以便你需要时它能发挥作用,以及始终保持警惕,迅速作出隐蔽反应等。在执行巡逻任务或飞行作战任务时,战士们必须特别警惕,看得懂表明危险的信号,不仅自己小心,还要为同行的士兵和其他飞行员(如果战士是飞行员的话)提醒。

要处理与战争有关的心理上的压力和紧张,还有其他策略。积极的策略包括以赢得一场战斗或完成一项任务以及与战友建立联系为骄傲。但并不是所有的策略都是建设性的。还有一些策略,虽然也许对心理有帮助,但却有害于身体健康。例如,一些战士过度使用毒品或酒精,麻木对战争现实的感觉。这些行为可以暂时遮蔽"现实",但它们往往是破坏性的,而且会让人产生依赖。尽管并不总是过度饮用,但是由于酒精的放松效果和社交联系作用,因此它常常位于交往的中心。回忆录提到,当他们在海滩上、在"酒吧(hooches)"里(军官生活区)和在派对上时会用酒来放松。被击落然后获救的飞行员们的一个传统是为那些营救他们的人买酒。完成飞行任务的飞行员们在派对上通常用酒来庆祝他们活下来了。要离开了,战士们经常到最近的城镇聚会和嫖娼。他们寻找各种可以使他们的生活有点儿"正常化"以及减轻压力的活动。

不是每个士兵或飞行员都喝酒、吸毒或嫖娼。许多人利用闲暇时间进行体育活动、给家人写信、参与社交活动如打扑克牌、读书或学习、在村庄做慈善工作,或者在下一次任务之前只是休息休息。其他心理策略包括通过白日梦想家乡的一位姑娘或者计划离开越南之后做什么来让自己远离越南。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战士能够对战争中的景象和声音变得冷淡或将战争最糟糕的方面隐藏起来,至少是"暂

时地”隐藏。一种常用的策略是贬低敌人,骂他们“亚洲佬(gooks)”以及用其他贬损的词语,这在某种程度上从心理上减少了敌人带来的威胁。

为了应对不断出现的道德困境、“良心上的吞噬”以及他们目睹的暴行,战士们经常重新解释那些发生的事情,将负面事件看作是“战争的本质”。战士们可以参加宗教活动来寻找新生和慰藉。为了维护他们的人性感,一些医疗人员和一些战士曾到孤儿院做事,将他们的战斗口粮与越南村民及南越士兵分享,以及走到村庄与村民发展友谊。

备忘录7 生存的制度化模式 2006.7.8

多年来,为了应对不断增加的与战斗有关的危险,军队建立了“制度化”策略。这些策略通常采用政策和程序的形式,并通过不同级别和类型的人员的劳动分工来安排实施。通过大量的训练让人准备好实施这些策略,而且它们有特定的时间和地点。

尽管有很多“制度化”策略模式在战争中被不断实施的例子,但是在进行的活动中所能够看到的这些策略的复杂性质就是每次只有一名飞行员被派出去执行任务。如果一项任务要被成功地完成,需注意工作的“团队性质”和“联合行动”的必要性。

为了准备进入一个不适宜生活的地区并与顽固的敌人作战,而且是由那些离越南很远的人来确立战规,飞行员必须在去越南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就要接受几年的高技能培训。飞行员还被要求参加丛林生存学校,以防他们被击落。然后,在他们执行任务时,每一项任务都要精心筹划,上到相关最高军事官员,下到飞机上的工作人员。对于飞行员,一天还没有开始,他们在黎明就要汇报这一天的详细安排,谁将驾驶哪架飞机、在什么地方、什么位置执行什么行动。早餐后,开始“层层着装”。层层着装是必需的,因为在高海拔高速度飞行会有各种危险(Trotti,1984,pp. 22-25)。飞行员第一件必须要穿的衣服是飞行服,这种衣服是用一种设计用来能够经受丛林生活的材料制造的,防止飞行员被击落。在飞行服的最外面,是重力防护服,一个充气腰带覆盖在脆弱的腹部、大腿、小腿部位以防止摔伤。在重力防护服里面,飞行员要穿上一个降落伞背带,这是设计用来防止行动时在驾驶舱里

摇晃和受到重击而被弹射出来。最后,飞行员要穿上救生背心。其目的是,如果被击落,它能为飞行员提供那些生存需要的装备。背心里的这些装备包含手枪、刀、密码册、地图、防鲨工具、防护绳索,无线电发射器,装有水的水壶、一磅大米、钓鱼线,甚至能够止痛的吗啡。

只有穿上所有衣物后飞行员才准备进入飞机。在飞机中,要继续使用制度化程序。首先,飞行员必须把他的腿固定在座位上来防止脱离座位而被弹射出去。其次飞行员戴上氧气面罩和头盔,之后,进入重力防护服中。当然,在执行任务期间,飞机必须经过一系列制度化检查。每次任务完毕后要对飞机进行彻底检查,看有没有被射击的洞和其他损坏。每架飞机有一队指定的组员,他们的工作就是维持飞机的飞行性能,并确保飞机燃料充足可以随时起飞。然后,还有一步步的程序,这些是每个飞行员在飞机起飞之前和起飞过程中都必须要执行的工作。程序的目的是确保飞行控制系统和通信系统运转正常。

在越南的飞行员们经常和一名导航飞行员和一名僚机驾驶员一起驾驶。当飞过敌人领地时,飞行员必须专注于目标,因此无法关注敌人的袭击。僚机驾驶员的角色是在扔炸弹时代替飞行员。然后在僚机驾驶员扔下炸弹时,导航驾驶员就代替掩护僚机驾驶员。在执行任务中,空中协作至关重要,还有一些步骤是将来自不同基地的飞机连接起来(每个基地在执行任务时都扮演不同的角色)以及为飞机加油。如果某一飞行员迟于计划的时间,可能就会耽搁所有的飞行员并置任务于危险中。战斗机需要耗费很多燃料。飞行员通常加油一两次也是任务的一部分,并且这也有一套安全程序。在达到目标区域时,飞行员会使用飞行技巧,如翻转、倾斜转弯,以及飞行员称之为"急转"或每隔几分钟改变高度和方向等,以避免被敌人的炮火击中。所有上述行动/互动都是执行一项任务时所必须做的。完成了去河内的一项任务后,在那里一架载着两个人的飞机被击中并坠毁(飞行员被救),特罗蒂说:

事实就是这样。为了进行十五秒的目标袭击要花费一百人次的时间。我们花费了30 000磅的燃料和250万美元的飞机,把六吨炸药投放到10英亩的土地上,这也许就是我们都知道的,获得的价值和付出的代价一样多。(Trotti,1984,pp. 96-97)

备忘录8 救援行动的模式 2006.7.9

救援行动的特点是紧张且需要行动的一致,救援行动的目的是为陷入埋伏的一组士兵提供空中掩护,或者是从战区撤出伤员,或者是将在敌人生活区后面被击落的飞行员营救回来。虽然为救援建立了制度化的程序,但是突发事件会使救援过程复杂化,如果想要生存的话,需要"现场解决问题"。也许在越南最具戏剧性的救援行动的模式之一就是那些涉及拯救美国飞行员的救援行动,他们的飞机落在敌军防线后面。在这种情况下,救援行动,虽然计划过,但通常不是按照计划进行。大多数情况下,救援会因突发情况而变得复杂。救援行动的特点是需要新行动的"协作"。救援行动需要训练有素的人一起解决问题。通常,所有相关人员都会有相当大的风险,包括救援人员和被救援者。下面的例子可以看到救援行动的顺序和救援行动的合作互动特征。注意救援者遇到的各种各样问题,以及他们如何利用"现场"解决问题和采取新的行动方法。

在越南战争期间,建立了一些特别小组来实施救援。有一个小组是专门用来救援在敌方被击落的飞行员——通常是在越南北部、柬埔寨或老挝。一种专门用来救援的飞机叫作天行者(Skyraider),是一个单引擎,螺旋桨驱动的二战老式飞机。通常的程序是两位天行者(Skyraiders)营救一个被击落的飞行员,资深天行者飞行员(指在越南服役的资深飞行员)和他的僚机驾驶员。天行者飞行员并不实施实际的"救援",救援任务是留给直升机的。天行者的作用是掩饰被击落的飞行员和救援直升机,使救援能够成功开展。驾驶天行者的空军飞行员的名字叫 Sandys,因为他们呼叫的信号是"Sandy"。另一架救援飞机是被称作 Jolly Greens 的直升机。它的工作人员被叫作"Jollys"。

马雷特(Marrett,2003,pp. 156-161)是一位天行者飞行员,他给我们讲述了下面的救援故事。在执行轰炸任务期间,一架隐形 F-4 喷气式飞机越过老挝的胡志明通道时被击落。飞机里有两名飞行员。一名飞行员能够跳出来,而另一位飞行员,资深飞行员,与飞机一同坠落。幸存的飞行员在弹跳出来的时候多处骨折,但还是充分地意识到激活了他的发射器,并通知基地他的位置。

F-4 喷气式飞机击落后不久,两名天行者飞行员和一对直升机机

组人员被派来救援。随着飞机接近目标区域，一架天行者被击落。飞行员设法从他的飞机上安全地弹跳出来。现在有两名活着的飞行员落入敌人的领地，原来的飞行员和救援的飞行员。因为天色暗下来了，救援行动被暂停，直到第二天早晨才开始。

拂晓，两架天行者和 Jollys 被派往该地区完成救援。那位严重受伤的飞行员第一个被解救。另外一个被击落的飞行员仍然在树上，被一群北越士兵包围着，但是他们没有发现。在确定了第二位被击落的飞行员的位置后，还没有完成救援工作，另一架天行者又被击落了。天行者飞行员在坠机后身亡。原先被击落的飞行员只能仍然躲在敌人的领地等待救援。第三个救援团队被派往该地区，确定飞行员的位置后，准备降到地面进行救助。当被救飞行员被拉起送进直升飞机时，枪声响了。一位直升机机组人员移到直升飞机敞开的背部，在那里他可以更好的向敌人射击。当直升机起飞时，直升机枪手被任命保护直升机免受来自火力袭击，他在直升机后部敞开的地方向敌人射击，他的腿严重受伤，直升飞机本身也被击中。现在注意力从被获救的飞行员，他已经在飞机上，转移到照顾受伤的枪手身上，他正在大量地出血。同时，直升机紧急降落。奇迹一般地，机上六个人包括受伤的枪手和被救的飞行员都幸免于难。（这是两天内为了援救飞行员的第二次坠机。）又一架直升飞机被派去拯救这六个落地的人，最终，他们都安全地返回了基地。

生存不仅需要很多资源，还需要对行动或应急处理方式进行大量的调整，直到最终成功实施。当一个计划失败了，另一个备用计划就必须立即启用。救援行动的特点是设备、人员和通信以及当问题出现的时候大部分用来处理问题的新的策略性行动/互动行为都协调一致。

备忘录9　逃跑和躲避模式　2006.7.9

在越南，战士有时会处于“极度危险”中，比如当他们被派到敌军后方执行任务，或被伏击，或发现自己在敌人后方而且没有人知道他在哪儿，即使他还活着。逃跑和躲避模式的特点是利用过去的经验和知识，提出新的策略来处理出现的情况或危险。不像救援行动是别人

在施救，在逃跑和躲避中，个人或小组必须自救。这里正好有一个例子，看看如何采取果断的、非凡的策略性行动来逃跑和躲避敌人。

这是一个由穆尔和加洛韦讲述的故事，是关于第五阵地、第一营阿尔法连队专家詹姆斯·扬(James Young)的故事(Moore & Galloway,1992)。在外出执行巡逻任务时，一群美国士兵被敌人伏击。紧接着是一场激烈的战斗。在战斗中，一架美国人的机关枪被敌人缴获，并被用来射击美国军队。扬自愿离开安全的小组，去确定枪的位置，这样可以请求空中打击。而在穿过高高的草丛时，扬头部中弹。他受了伤，并开始往他的小组返回，但发现在几分钟内他已经离小组很远了，敌人已经包围了美国军队。扬发现自己处在一种受伤并与部队失去联系的情形中。他身上带着几盘子弹、几颗手榴弹、一支步枪、两个水壶，以及一面小镜子。由于不知道自己在哪儿，该往何处去，扬努力回忆他的小组所在的地方并决定走回到那里。在跑的时候为了保护自己免遭敌人的炮火袭击，扬对着树林朝狙击手射击，并将他少有的几颗手榴弹扔向草丛里，跑着并走"之"字形路，以避开敌人的炮火。他能听到敌人在追他。为了哄骗追上来的敌人，扬利用了他年轻打猎时学过的技能。他来到溪流边，蜷曲在上游。他从河里把水壶加满以备后用，并喝了很多水。他在一块岩石区离开河流，其目的是不要留下线索，防止别人跟踪。他走进一个山谷，在那里他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身后的路径。天渐渐黑了。扬躲在一些石头的后面。在那里，他拿出他的日记本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家人，希望如果他不能回家的话他们能够看到这封信。到现在，他的头部伤得很严重，每次想喝水的时候都会呕吐。

整个晚上，扬睁着眼躺着，只是时不时睡一会儿。到了早上，他听到头顶上有直升机的声音，他知道那一定是美国人。他试着用手上的镜子给直升机发信号，但是没有成功。为了帮助自己逃跑，他循着他们的飞行路径跑，这是一个使其接近美方的策略。在那里，战争仍然很激烈。扬隐藏在大树后面，等待着战争的结束。美国飞机开始投炸弹到这一区域，以驱逐敌人。担心被友军打伤，扬在高高的草丛里寻找安全地带。此时天又黑了。扬知道，天黑了，如果他穿过草地与他的部队分开，他会被自己人或敌人射中。所以他又在草丛里度过了一晚。他盖上草来保持体温。战斗持续了一整夜。天亮的时候，扬小心

翼翼地靠近美军区域。他终于在最后一支美军从该地空运出去前安全地回到了美方。(Galloway & Moore,1992,pp. 318-321)

为了生存,扬利用了他孩童时学到的生存技能,并进行调整以适应在越南的地形和问题。他的技巧以及生存的强大动力使他得以逃脱,并躲开了敌人,直到成功地到达美方区域。

方法论说明 我的分析就此可以停止了。我已经把过程和情境放在一起,当然这对某些研究项目就足够了。但是我,自己作为分析者,还不满于此。还有一些类属如"自我的变化""战争印象"和"回家"没有说明。这意味着还需要更多的分析,从而将整个故事放在一起。我现在关心的问题是,我该如何把这些结合在一起? 第12章将重点讨论整合的问题。

要点总结

本章探究了生存的概念,在探究过程中,我将过程和结构放在一起分析。研究者寻找现有的策略性行动/互动/情感模式,以发现战士们如何设法战胜他们遇到和求生存中遇到的问题或对生存的威胁。模式是一种对过程概念化并将其与结构放到一起的方式。从资料中形成的模式必须得到研究者的认可。对过程进行概念化有不同的方式。研究者可以从时期、阶段、等级、程度、朝向目标的过程或行动的顺序来思考过程。在这种情况下,过程不仅仅是一个持续一天又一天的行动,事实上常常是一分钟又一分钟每分钟的行动,行动的目的是增加存活的机会。在资料中寻找过程没有捷径。研究者必须长时间研究备忘录和原始资料,研究如何处理和解决研究的主要问题或议题。一旦分析者在资料中发现了过程,他们就能绘制概念性图景,从而增加对经验的理解。

思考、写作及小组讨论活动

1. 根据上面的讨论,思考你对过程的理解。就这个话题,你还有

什么其他的想法吗?

2. 你知道过程是如何丰富分析和增强理解的吗? 如果你使用 **MAXQDA** 软件,请利用 **MAXMaps** 工具将过程的影响直观化。
3. 您能想到其他把过程和情境联系到一起的方式吗?
4. 从这一章节中选取一些新的概念添加到你不断更新的编码清单中。思考你会如何将这些概念组织到更高层次的类属中。也许你可以提出一个与我不同的方案。如果你使用 **MAXQDA** 软件,请使用复制和移动编码的功能,重新安排你的编码系统。将你的编码系统从等级形式转变为线性列单的形式。讨论选项的使用,将编码系统的等级结构形式留给小组讨论。
5. 通过阅读各个章节中呈现的资料,你有没有发现研究者可能错过的其他模式? 如果你使用 **MAXQDA** 软件,利用词汇搜索功能来帮助你检索模式。

12

整合类属

战后留下的是悲伤,巨大的悲伤,存活的悲伤。这是战争的悲伤。(Ninh, 1993, p. 192)

框 12.1 术语界定

整合:围绕一个核心类属将其他类属联系在一起并提炼和整理相应的理论构念的过程。

反面案例:虽然研究者可以持续搜集资料,以寻找反面案例,但是发现反面案例并不必然会否定分析者的概念化结果(conceptualization)。通常反面案例代表了有关资料概念化方面的一种维度上的极端情况或变量。

理论饱和:分析中的某个点,这时所有的类属在所属属性、维度和变化形式上都得到充分发展。虽然总是可以发现新的变量,但是进一步的资料收集和分析几乎对概念化没有新的贡献。

导 论

正如在本书中我们已经指明的那样,并非每一位研究者都对发展理论感兴趣。然而,对于有些研究者来说,包括我自己,理论的建构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目标。本章节是针对那些对理论建构方面感兴趣的人,不过有些读者可能会因为下面的原因而对其感兴趣。尽管对在越战中战斗人员的分析已经取得进展,并且一个带着情境和过程的有趣故事也快要完成了,但对于我来说,分析仍然还不完整,实际上是没有完成。这也许是因为我作为一个扎根理论研究者所受过的训练和偏见的原因。或许是我需要把各种分析线索聚集到一起,但我觉得有必要继续分析。我想实现最终的整合。前一章以这样的评论结束,即虽然生存似乎是从研究分析中得出来的重要主题或现象,但是它仍然存在以偏概全的感觉,因为它并没有讲述整个故事。该解释似乎丢失了一些东西。本章的目的就是寻找那些丢失的东西,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将所有的研究线索加以整合,构建一个关于越战中战士体验的合理的解释框架。另外,用来对研究进行逻辑总结的形式就是备忘录。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备忘录更像总结,而不是解释。它们将很多不同的思想聚集到一起。

整合备忘录1 描述性故事 2005.7.23*

最近,我对研究的核心概念做了大量的思考。资料中不断进入我的思考范围的主要主题是"生存"。我想,如果我问战士们越南的体验是什么样子这样的问题,我可以回答说,在越南一段时间后,尤其是与敌人进行战斗之后,那么出现的基本故事就是"生存的故事"。每一位从越南活着回来的人都是幸存者,战士们在那里的主要目标就是生存。但是生存,虽然是这个故事的核心,却不是故事的全部。有"自

* 虽然原英文版本中此处为"2005 年",但译者觉得这里应该是2007 年或2006 年,而不是2005 年。——译者注

我”方面的变化和“战争印象”和“回家”方面的变化，后者在某种程度上对生存有用或是生存的一种结果。我的意思是，战争的结果必然会改变人。当他们回到家乡，他们不再是以前的他们了。民众对于战争印象的理解经历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甚至会持续到很多年后。回去重读所有这些备忘录，我似乎觉得这里除了“生存”还有更深层的事情发生。说更深层，我的意思是，如果有人爬珠穆朗玛峰，那么该登山者是要生存下去，但伴随着生存下去的（即使不公开声明）是到达顶端以“实现梦想”或“证明某些东西”的理念。在有关越南战争的资料中，生存是至关重要的。它最终是最基本的东西。但生存似乎取决于更深层次的东西，而不仅仅取决于生存策略。年轻人必须能够在自我方面以及对战争印象作出必要的调整，从而使他们能够面对战争的危险——也就是，必要时要向敌人开枪，但与此同时提升内在的勇气和力量，这些对于维持心理平衡和道德完整是必要的。

年轻人从平民文化出发，带着一套标准、价值观和活动方式走进战场。这是构成他们生活的“现实（reality）”。一旦在越南，年轻的士兵就不得不进入战士的角色，在战争中他们面临着一个完全不同的“现实”。这种“现实”是由一系列充满了生理、心理和道德风险的问题或情况所构成；而且取决于他们是如何看待或界定这些情况，他们发现自己需要一整套全新的标准、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为了正确地界定他们遇到的问题，并采取适当的行动，他们必须协调好这两种不同的现实。如果战士们不能从平民生活调整到战争生活，那么他们的生存机会就会减少，因为他们无法运用生存所需的策略。然而，他们也可以更进一步在战争中创造他们自己的“现实”，如在《老虎的威力》（*Tiger Force*）一书中所描述的（Sallah & Weiss，2006）。一旦服役完成，战士们，现在是战争的退伍军人，就必须立即抛开在越南的经历，调整到平民生活中去。但是，已经遭受过越战的经历，他们就和他们第一次离开家乡时的人不一样了。

此外，越南退伍军人回到了一个不同于他们在一年或更久之前离开时的社会。虽然由于战争的原因他们发生了变化，社会也因为战争而发生了变化，对战争、国家和爱国主义形成了新的态度。我想，我的意思是，我的核心概念需要包括身体、心理和道德生存的观念，并能够从平民生活带到战士身上，通过在越战中的成长，然后再次带回来。

这还必须包括协调各种不同现实的能力，将各种现实整合到一起，造就任何退伍军人的全部经历。

我有好几个重大主题可以选择——“变化的自我”“战争印象的转变”“战争文化”“回家”——但没有一个符合。然而，在我早期的备忘录中，在对参与者#1 做分析中写的一份备忘录中有一个概念，我觉得它符合我想要说的。这个概念就是“协调不同的现实”。在我看来，这个概念确实强调了生存中的积极要素，以及战士为了生存必须经历的深刻变化。其他诸如“变化的自我”“战争印象的转变”和“战争经历”这些概念都可以整合到其下。让我感兴趣的的是，就其定义本身，“协调(reconciling)”必须要在自我上作出变化并改变战争印象。我甚至敢说“生存”必须与“如何协调不同的现实——战争之前、战争期间和之后”有关。“现实”不是战争事件本身，而是涉身其中的不同个体如何看待和界定这些事件。我所选择的作为我的核心类属的概念是“生存:协调多重现实”。我认为，该扩展的概念说明了所有的经历，集中于作为一名战士和去越南之前、期间及之后的所有经历。这个概念符合施特劳斯(Strauss,1987,p. 36)所提出的核心类属的所有标准，当然对其他人的研究也有启示作用，他们在生活中必须要适应困难的情况。我想，让战争变得如此独特不仅在于它有生命的危险，还在于它对心理以及道德的危险。

方法论说明 这里作一个评论非常重要。核心类属代表一种现象、研究的重要主题，虽然有些研究者只是从“基本的社会或心理过程”来思考。根据这些方面来思考，对于社会学家或心理学家来说是合适的，但对那些对教育、法律、企业管理或建筑问题感兴趣的人来说却不合适。所以，我不喜欢将核心类属作为主要的基本社会过程来强调。本书早先一位读者指出，核心类属代表着研究的重要主题或现象，但基本的社会过程或者无论什么过程都根植于重要主题之中。有像生存这样的现象，当然也有这样的过程（无论什么样的过程——法律的、教育的、心理的，等等——都适合于研究）。过程反过来可以解释现象，并且描述现象如何，所发生的事件、问题、情况以及人们对这些所作出的反应。研究者如何界定核心类属取决于他或她希望如何安排重点。

在从事该研究时,我是如何进行整合的呢?我必须要指出的是,我对研究进行了大量的思考,并关注我的直觉。我对仅仅用“生存”来解释我所读到的在越南的故事并不满意,因为这种取向太过倾向于身体上的存活。我一遍一遍地阅读这些备忘录。我坐下来,苦思冥想。我一边走路一边思考。我不断地回到了这一观点:身体上存活并不能够说明整个故事。无论如何我需要一种方式使战争固有的生理的、心理的、社会的、道德的问题以及人们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回到家乡的反应展现出来。一旦我想到早些时候提出的概念“生存:协调多重现实”,我就知道我已经找到了某种答案。核心概念及其他概念都源于资料,但是“理论”不能构建自身。归根到底,它是分析者通过参与者所提供的资料建构的一种构念(construction)。

从描述到概念化

既然我对我的核心类属感到满意,它为战士们在越南战争中的生存经历提供了一种可行的解释,那么我就打算去看看其他类属如何与它相关联。我将通过讲述越战故事的方式将它们联系在一起,这一次将使用主要的类属和次级类属作为基础来进行理论建构。

整合备忘录 2 分析故事 2005.7.24

可以把“战争经历”看作是在时间中延伸的“轨道”或历程。进入这样的轨道或历程,战争经历就是“战争印象”,在个人真正走进战场之前它们早就开始了。个人采取这些“态度”并形成“印象”都基于他们在家庭、社区,包括电影在内的媒体以及来自于他们可能与军队人员的任何接触中的所见和所闻。然后,(过渡性假设)当年轻人参军之后,根据在“新兵训练营”中的训练,他们开始形成新的但不十分“真实的”战争印象。尽管“新兵训练营”可能很艰难并且“类似于战争”,但它不是战争。直到战士们真正到达了越南,经历了真正的战斗,战争意义的“现实”才开始建立起来。进入军队的年轻人中也有“自

我”。他带着过去生活的所有经历来到军队,无论好的坏的。有一些来自于中产阶层爱国的和稳定的家庭。还有一些则来自于穷人家庭或有着悲惨的生活背景,有一些在去参战之前内心脆弱。他们中的大多数对于超出自身家庭的生活是缺乏经验的,对越南和越南人民一无所知。然而,如果男青年打算有一个生存的机会,能够到“战区”过渡,适应“不适宜生活的环境”是必要的。这并不是说他们必须把他们自己的一切都抛掉,而是说一旦他们到达越南就必须要提高生存所必需的技能、态度、健康心智及道德力量。在“战争经历”中的生存是关于在“平民文化”与“战争文化”中“协调多重现实”,然后“回到家乡”再重新适应平民文化。

协调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次又一次持续不断的事情,甚至持续到今天。“协调”包括:

(1)**改变自我**。这包括通过发展战胜“与战争有关的问题和危险”所必需的军事技能、情感的冷漠、道德力量和社会资源,以从“新手”变为“经验丰富的战士”。这就像为了在战争经历中生存,自身必须发生一些变化一样,也有作为生存下来的结果对自我的影响。遭受战争经历对自我的影响之一是比一个人的正常年岁“变得更老”。在了解自我、了解新技术和社会技能方面,在能够为自己和他人承担责任方面以及为自己的任何行动承担责任方面变得更加成熟。参加战争发生在“自我”身上的其他可能的变化是,回家的时候带着“无法消解的愤怒”和/或“被疏远的感觉”,因为社会对战士们所经历的一无所知。

(2)**改变战争印象**。一旦在越南,战士们不得不放弃源于电影的、对战争的“浪漫主义”印象,取代这些印象的是对战争的一种更加“现实主义的”观点。现实主义印象可以定义为这样的印象,它将“敌人”看作是仇敌,承认并尊重“领导”和“交战规则”,即使你不同意他们。必须要改变的其他战争印象包括“支持杀人”的观念,但必须保持足够的良知,从而使得战士们不至于过于鲁莽,随意杀人。战士们必须认识到在战争中有“道德矛盾”,在对与错之间只有一线之隔,他们还要认识到,人一定不要越过那条线,放弃了所有的伦理道德。强有力的领导是必须的,从而让年轻人在控制之下行动。每个人在越南的“现实”都是不同的,因为“现实”取决于这人是谁、过去的经历、在战争中

的角色以及在那儿对事件的认知。在战争经历中生存下来的一些影响包括将“遗留的愤怒”和“战争恐怖的印象”带回家，包括“战争的鬼魂”。当他们“返回家乡”后，在越南时似乎“正确的”东西在民众面前常常似乎是“错误的”，他们对那些落后的人和不能理解“战争本质”的人以及那些会出错的事情非常愤怒。从那些留在家乡的人的角度所看到的“战争的现实”与那些在越南打过仗的人所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很多退伍军人在“返回家乡”经历的视角冲突导致了他们对战争和政府以及对社会成员的“幻灭感”。对于战士们，只有那些去过越南和那些经历过他们所经历的人才有可能理解。

(3)**战争文化**。战争文化提供了情境，每一个士兵以及集体的战争经历都在其中发生。战争文化是一个政治、社会和历史条件的综合体，它们联合在一起创造了战士们在战场生存所面临的问题和/或障碍。除了在越南的战争文化，还有“在家乡的战争文化”，它从开始默默地支持战争发展到和平运动并形成了对战争道德产生分歧的民族。集体运动对于回国的士兵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战争文化介于其他两种文化之间，在前往战场之前的“平民文化”和从战场回到家乡之后的“平民文化”，后者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了变化。战争经历根植于两种文化，从到达越南的新兵之眼来看待和从离开越南后的老兵的视角来看待。

(4)**生存策略**。这些策略为那些阻碍生存方式的障碍提供了行为上的/互动的/情感上的回应。但是利用这些策略取决于战士们“将他们的自我与战争印象和战争现实相协调”的能力。战士们使用的生存策略要与他们身边的问题相匹配，这些策略可以分为“个人的”“制度的”“集体的”以及“营救、逃跑和躲避”的模式。虽然在谁确实回来了、谁没有回来中机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想要生存的行动因素和做必须要做的事情的意志对于获得生存机会和能够回来是至关重要的。有时候从身体上、心理上及伦理道德上“放松”自己和“更新”自我的策略并不起作用，而且战士们开始“疲劳了”，或因为无尽的战争压力和紧张，他们变得极其脆弱和士气低落。

在这里，研究者可以做一个假定：作为战争经历的一部分，那些设法存活下来、保持情绪不变，并保持道德完整的战士们，他们必须“协调他们自己以适应战争的现实”，也就是说，他们的自我在生理、心理、

道德上经历了深刻的变化，而战争的印象从新兵变成了经验丰富的老兵的印象，而且使用的策略不仅能够从身体上保护自己不受伤害，而且让他们能够从生理上、心理上、道德上更新自己。

(5)**返回家乡**。这意味着离开战争地区。另外，那些现在是退伍军人的战士们不得不对自我和战争印象作出巨大的调整，以适应平民生活的"现实"。对于很多老兵来说，为平民生活"进行协调"并不容易，因为他们"背负着战争的包袱回到家乡"，这表明他们自己处在"遗留的愤怒""些许的良心""鬼魂纠缠"，以及"与社会疏离感"的形式之中，并伴随着对政府、社会的"幻灭感"，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对自我也产生"幻灭感"，而且在许多情况下相当"愤怒"等。老兵背负的包袱需要"治愈"。"治愈"要求释放愤怒、内疚、后悔和恐惧以及要得到朋友、家庭和治疗机构的持续支持。越南战争后，由于社会不再关注并支持越南战争，这使得"治愈"变得更加困难。许多退伍军人回国后在自己的心中以及在他们自己和他人之间建立起一道"沉默之墙"，保护他们自己，避免自己从战争的现实经验转向平民的现实中经历的矛盾。他们将战争经历埋藏在记忆深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多方面的支持，有些退伍军人，虽然永远也不会忘记，但他们能够将他们当前的自己与过去的自己协调好，重新调整以适应平民生活。他们能够继续他们的生活并获得成功，通过克服战争经历的不利方面，他们变成熟了。有些人甚至今天还维持他们的"沉默之墙"。他们仍然愤怒、失望和疏远社会，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有些人已经发展为创伤后应激障碍，有的转向了一种依赖酒精和毒品的生活，以帮助他们抹去他们所经历过的恐惧。

总之，战争经历可以被描述为一种紧张的、有力的、改变生活的生存事件，它包括很多"不同的现实"，"如果战士想要生存，就必须要协调好这些现实"。当战士从越南回国，战争并不一定结束，对于一些退伍军人来说战争一直困扰着他们的余生。甚至很多老兵，他们本身不是战斗人员，只是提供支持服务工作，如护士、医生和工程师等，由于参与战争的结果，都类似地受到了深刻的影响。

虽然竖立了纪念墙以纪念那些牺牲的人，但它也承载了那些幸存者的痛苦。记得在早期的采访中，我为那些在自己周围搭建起"沉默之墙"的老兵感到惊讶。现在我明白了。它起到了一种非常重要的保

护作用，让他们能够带着“战争经历”的“现实”去生活。

方法论说明 上面的备忘录使用了来自分析的概念（用引号表示的部分），讲述了战士们生存和返回家乡的故事。虽然可能有更好地解释，但是将战争体验概念化为“生存：协调多重现实”似乎符合资料，并为研究是什么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从逻辑上说，在我们的大框架内主要的类属是合适的。虽然框架并没有说明为什么有人可能没有活下来（对于那些死去的人我们没有实际的资料），但它确实为我们理解“战争经历”对战士们是什么样子以及为什么有些人能够存活下来提供了某种洞见。

当我开始这项研究的时候，我不知道研究将会走向哪里。我让资料引着我往前走。然而，我并不是资料的被动接受者。在分析的过程中，我与资料进行互动，正是与资料互动中出现的问题引导着我前进。分析者和资料之间的互动始终不断。

提炼理论

如果这是一个“真正”的研究，现在就应该拿出我的总体框架，并（a）检查逻辑上的断裂，对似乎有断裂的地方要重新设计；（b）开始运用我已经撰写的和整理的所有备忘录来填充每个主要类属下面的信息。

检查逻辑方面的断裂

我不会在这里做这一项工作。这是一项很好的活动，读者可以自己在家和小组中将其作为小组讨论活动的一部分。

填充

核心类属是“生存：协调多重现实。”生存：协调多重现实呈现了战士们的“战争经历”。这是他们不得不去做的事情，从而能够生存——生理上、精神上、道德上的生存。在这一核心类属下面是好几个其他主要类属，包括“变化的自我”“改变战争印象”“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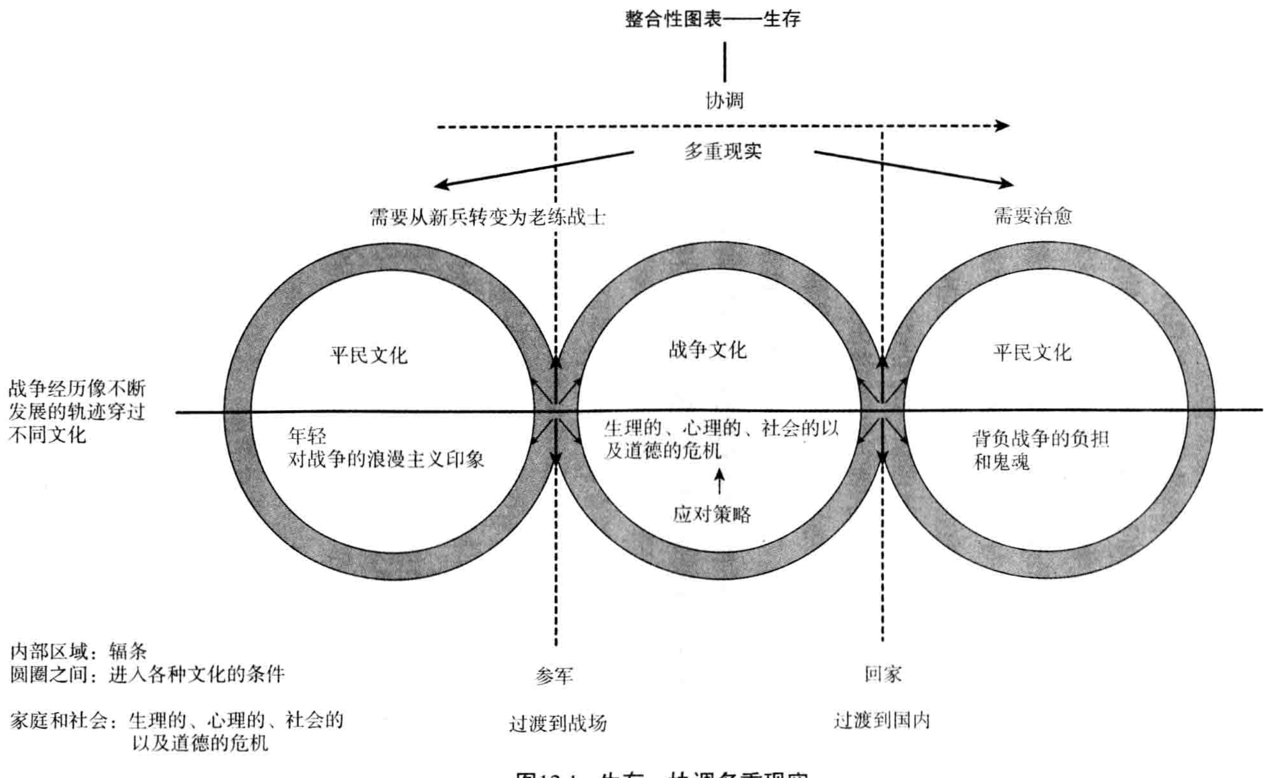


图12.1 生存：协调多重现实

争文化”“生存策略”和“返回家乡”。变化的自我和变化的战争印象表现了当战士们面临由战争文化和回到家乡所提出来的挑战时，他们为了协调这些而表现出的必要变化。战士们为了使用这些策略，“协调”是必须的，这让他们能够在战争中生存下来、保持心理的稳定及道德完整，以及回家之后能够进行治疗。

对于主要和次要概念，所有已经撰写的有关它们的各种备忘录都要整理，并用它们在表述这些概念之间联系的陈述下面进行细节填充。通过填充，我将说明如何通过改变自我和战争印象来进行协调。我首先要阐明在去战场之前，战士们是什么人、他们如何从新兵转变为老练的战士，以及老练如何让他们在战争中遇到各种问题时可以运用生存策略来解决这些问题，并在回到家乡后对这些问题进行治疗。我还将通过描述一些战士如何不能像其他人一样进行协调，所以他们会变得情绪低落、脆弱，以及在生理上、心理上和(或)道德上耗尽心力，从而引入一些变化形式。这些“耗尽心力”的战士，说明了为什么有些战士与其他人一样“回到家乡”却没有治愈，而且还有更大的适应困难，继而发展成创伤后应激障碍。

这里我必须要补充的是，该项研究还没有完成。为了更加充分地从战士的角度理解他们的越战经历，收集更多和更多类型的资料非常重要。关于这一点，超出了本书的范围，因为本书的重点在于方法论而不在这项研究本身。本研究是以服务教学为目的的。然而，如果我继续做这项研究，我希望能获得更多的与战士们的真实的非结构化访谈，而且与代表不同军种的军人进行访谈，例如海军快艇部队，这在当前资料中没有。从战争中的其他参与者——医生、工程师、军事领导人、政治家——那里获取资料也很重要，这些人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战斗，但他们肯定间接体验了战斗经历。

还有很多新闻记者，他们与军队一起前往越南，获得他们对战争的体验和看法，以及他们如何通过他们的体验和印象并把这些体验介绍给公众，塑造战争的结果，这将是非常有趣的。从“敌人”的视角来对“战争体验”获得更加深刻洞见也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还有国内的和平运动。作为这项研究的一部分,我希望能更多地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民众如何塑造并重塑他们的战争印象,被什么人或什么东西塑造和重塑,以及运动在结束战争当中所起的作用。还有在北越、南越和美国出现的一系列活动景象的整体政治方面的问题,以及影响结束战争谈判能力的一系列议题。为了获取与此相关的其他任何材料,必须追溯到战士们的战争体验,因为他们才是研究的焦点。所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多数研究几乎都不像对战争中战士们的研究这样复杂或涉及这么多。重要的是要记住,不论一个研究项目的范围如何,都应该尽可能将一个问题或主题的众多不同视角包括进来。多种角度增加了洞察力、丰富性、深度和变化形式。同样重要的是,要对情境进行讨论。要找出所有可能影响研究题目的情境因素是不可能的。但是知道情境是如何进入、帮助界定或创建情景并对这些情景作出回应,这就增加了解释的深度和效度。这里的要义是,研究要在自己的时间、精力和金钱限度之内,但不要过快地匆匆忙忙完成一个研究项目。一个人工作的质量和所作的贡献取决于其探究的深度和广度。

检验研究方案

检验研究方案在这里不是一个主要的议题,因为这不是一项"真正的"研究。不过,我确实做了一些事情来检验我的研究方案。我确实将我早期的分析送给了三名参与研究的受访者,以听取他们的意见。他们没有很多的评论,不过也没有批评,而且受访者认为我得出研究结果的过程很有意思。此外,在提出该研究方案后,我确实又回到一些更好的回忆录,重新阅读它们。我觉得这项研究方案经得住审查。我还与我偶然遇到的其他越战老兵交谈过,他们似乎也认为我的研究方案可行。我没有寻找反面案例,因为越南的研究不是我这本书的重点,而是一个范例练习。但是,我对该主题仍然很感兴趣,我想对其做更多的研究。

要点总结

对于那些研究目的就是理论建构的研究者来说,整合是分析的最后一步。整合有可能是分析最困难的部分,因为它需要筛选和整理所有的备忘录,寻找关于所有这些类属如何能够恰当地组合到一起的线索。重新阅读备忘录、讲述故事情节、绘制图表以及清楚地思考都是分析者可以用来帮助他们实现最终整合的技巧。只需要记住,做质性分析是一种艺术,也是一门科学,就像在最后的整合中一样,很明显质性分析无处不在。正如在本章中所介绍的,整合的线索要在资料中寻找。这种艺术就是能够在资料的基础上,让"研究方案发挥作用",并在备忘录的资料中获得洞察力。研究者必须认识到,当方案不能发挥作用(在逻辑上缺少联系)时,他们应该能够拆解该方案,然后一次又一次地对其进行重新设计,直到分析的故事都按部就班而且"感觉良好"为止。

思考、写作及小组讨论活动

1. 寻找逻辑上的缝隙或断裂,并说明如何修复这些断裂。
2. 考虑其他的核心类属,那些我可能没有想到的类属,并撰写总结性的备忘录,说明你将如何围绕它整合其他类属。如果你使用 MAXQDA 软件,利用 Add-on MAXDictio 功能,将其作为一个探索性的选项:让 MAXDictio 列出一个词频清单,看你是否从中获得其他的思想。与你的小组对结果进行讨论。
3. 把你的总结性备忘录带到小组进行讨论,呈现给小组以获取反馈意见。

13

论文、专著的写作及研究成果的报告

正是在阅读和写作中洞察力才显现出来。写作过程涉及具有解释学和解释意义的文本材料。正是在写作的过程中，研究资料不但得以解释而且呈现出来，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发现了研究问题的本质。(Van Manen, 2006, p. 715)

导　论

在完成分析之后，就可以在期刊文章、学位论文、专著以及报告中呈现研究发现了。写作或作报告的过程中有一个有趣的特征就是写作和报告有助于澄清思想和发现逻辑上的漏洞。正如我们以前的一个学生保罗·亚历山大(Paul Alexander)在1996年9月19日的备忘录中叙述的：

……写作迫使我去回顾整个理论并且突出了那些不怎么协调的部分……于是我又回到资料……这种对理论各个方面的建构和验证贯穿在整个写作过程中，尤其是在具体说明理论领域之间的关系时。

在我们开始讨论写作和作报告之前，应该作一些交代。为什么要出版(发表)或作报告？有很多种原因。抛开很多动机不谈(例如自尊、职业发展、渴望为改革做贡献，或阐明被研究的人们的生活)，最重要的责任乃是要借作品与同行沟通。没有写作和

报告，专业知识就无法增长，它们对实践与理论的意义也不会生效，除非通过出版（发表）或报告让人们知道。有经验的研究者一般都将出版（发表）的责任内化到他们的心灵中。倒是经验不足，尤其是生平第一次做研究的研究生，往往缺乏出版（发表）动机。他们经常低估自己的研究成果或者是害怕出版（发表）有可能带来的批评。

本章的目的是要阐明那些与写作和报告有关的不可避免地问题，它们与每个研究项目都密切相关。例如，这些问题：我应该何时开始写作？我如何知道研究准备好了，可以出版（发表）或可以汇报了？该写些什么或谈些什么？写作应该采取什么形式——论文、专著，或其他什么？写作论文与著述专著或作报告有哪些不同的因素？我是否该去出版（发表）？我该在什么地方出版（发表）？我为什么样的读者撰写或说给什么样的听众听（包括学位论文，如果我正在撰写学位论文）？我的写作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我如何在真正的写作提纲或报告提纲的基础上开始我的写作？我如何知道我的写作已经足够完善，可以出版（发表）了？*

本章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口头报告；第二部分是关于专著与学位论文写作；第三部分则是关于各种类型的论文。想要阅读其他有关写作方面的建议，可以参考贝克尔（Becker，1986b）和沃尔科特（Wolcott，2001）写作的专门关于撰写质性研究的文章。还可以阅读沃尔科特（Wolcott，2002）关于写作的文章。莫尔斯和菲尔德（Morse & Field，1995，pp. 171-194）以及西尔费曼（Silverman，2005，pp. 355-370）的文章也为那些希望自己的质性研究成果出版（发表）的准作者们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

口头报告

通常，研究者在准备出版（发表）之前先要作口头报告，看看

---

* 这一章是在本书第2版的基础上作了稍稍的改动后的版本，体现了本书两位作者施特劳斯和科宾在这一主题上的思想。然而，由于作者施特劳斯已经逝世多年，为了使那些了解他的读者少些困惑，文中将使用代词“我”。

听众的反应。事实上,有时候,被研究者也会直接或间接地给研究者压力,他们会询问,你有什么研究发现?你至少告诉我们初步的发现或解释?

很多研究者在出版(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之前都会作些口头报告,目的是为了满足参与者的好奇心或是为了从同行那里得到反馈。他们甚至在研究项目开始没多久就开始作口头报告。因为质性研究的分析在项目初期就开始了,所以相对来说,质性研究者较早就可以进行报告。用参与者讲述的一些有趣的故事就能够满足听众,根本不需要等到分析完成再报告。

同行听众能够理解抽象的报告,而且他们的谈话对研究策略和经验有贡献。其他听众则对故事或者是关于有趣的类属/主题讨论更感兴趣,它们辅以充分的描述性叙事或案例材料,会变得更加有趣。研究者也要为各种不同水平的听众仔细选择合适的词汇。如果语词选择不当,研究者用了过多的专业术语会吓跑听众。报告过于简单会使同行感到乏味。但是更重要的是研究者要对听众说些有价值的东西。这意味着要做质量上有深度的质性研究(参见第 14 章)。

这些建议虽然可能让人感觉到安慰,但可能听起来非常宽泛。对于如何选择演讲的题目这一实际问题又该怎么做呢?记住,演讲的内容应尽可能与听众的水平相符合,对此我有以下一些建议。首先,一般来说,最好不要在一个简短的报告中呈现所有的研究发现,特别是如果你已经形成了理论时。否则有让听众承受负担过重的危险。要想在二十分钟内把全部的理论框架表达清楚,以使听众能理解并在报告会结束后能记住,则需要很高的技巧。当然,研究者在阐述研究的一个更有趣的特征之前,可以对主要的描述性故事进行一个大概的描述。但是,如果报告集中于一个或两个引人注目的类属,并且包括很多描述性的事例,或者讲述一个或更多研究参与者的故事,我相信,口头报告会更加有效,而且当然更容易理解和记忆。

回到越战老兵的研究,我可能想作一个报告,重点是关于生存的两个重要次级概念(subconcepts):“变得老练”和“疲惫”,每

一个概念都有大量来自资料的例子。为了准备这个报告,我要回顾所有关于这些类属/主题的备忘录。用这些备忘录作为向导,我将先对我想在报告中要表达的主要观点写一个简短的总结陈述。这个总结陈述包括报告呈现的逻辑,可能看起来有点像这样:生存是战士们的主要关注点。这些离家奔赴战场的年轻人,如果他想要在身体上存活、心理上保持健康以及道德上保持完整,那么他就必须在身体上、心理上以及在道德上调整好自己,以适应战争的现实。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历的增加,战士变得"老练"了,表明他已经形成了一套解决遇到问题的策略。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没有形成足够的策略或者是压力变得太大,那么战士们往往会疲惫,他们的"现实变得模糊不清而且令人困惑",这将战士们的生存置于危险之中,并威胁到他们的心理健康和道德完整。

有了这个指导性的总结陈述在我手上,接着我将会形成一个清晰的提纲,包括用几句话来描述"生存:协调多重现实"这个主要故事,以便我能够将我选择讨论的概念放到情境中。我不会把它变得过于复杂或太花时间,但我会介绍某些多重现实是什么以及为什么协调能力对生存是如此重要。然后我将转到两个重要的次级概念上,"成为一名老练的士兵"和"疲惫"。首先,我会描述"老练"的意思是什么,然后,说明"成为一名老练的士兵"的一些条件,最后解释"变得老练"如何对生存发挥作用,在讲述过程中,会出现大量描述性的资料。接着,我将讨论"疲惫"是什么、它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它对生存的可能影响。在报告的最后,我将简单地谈谈如何促进"老练"的形成、如何识别"疲惫"以及如何处理这种情况。应该向听众澄清的是,研究者报告的只是整个故事的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

专著或论文写作

经过一个项目的研究过程,研究者对于该研究是什么有了很深刻的认识。他或她对研究问题也有了更多实质性的了解。这

两个方面在写作过程中都非常有用。当然,研究者还需要其他的技巧,例如把握好如何建构语言和如何清楚地表达思想。很不幸的是,作者自己可能会成为写作时的最大敌人。除了写作技巧欠佳以外,作者可能会有各种常见的障碍,正如那些设计用来帮助人们写作的书上所提到的(参考 Becker, 1986b; Lamott, 1994)。所幸的是,在研究项目中,到这个时候,研究者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备忘录和图表,它们为写作提供了基础。写作要求:

(1)讲述一个清晰的富有逻辑性的分析性故事;

(2)作者知道自己想要传达故事的哪些部分;

(3)一个详细的提纲;

(4)用大量相关的备忘录去填补提纲的细节。

程序

当开始考虑撰写研究项目的结果时,研究者应该回顾最近的整合性图表并整理备忘录,直到厘清主要的故事情节。对备忘录进一步整理之后是回顾,直到有足够的资料去撰写详细的提纲。整理过程可能会让我们对分析性故事产生怀疑或者能够指出逻辑上的一些漏洞。如果是这样的话,不必灰心。最坏的也就是分析性故事要有所保留,因此需要改进。无论如何,必须要将故事转化到总的提纲中去。有些人不能列出详细的提纲。但是,我从我自己和我教过的学生的经验发现,明智的做法是至少拟出一份总体性的逻辑提纲,否则,要呈现的故事整体可能会有断裂。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程序可以帮助我们弥合分析和提纲之间的断裂。首先要深入地思考构成故事的逻辑。任何的研究专著,真正的研究论文,都会有内在的逻辑。每篇文章都会有几个关键句子或是段落表明作者的主要逻辑(Glaser, 1978, pp. 129-130),虽然有时候作者自己似乎都不知道。一个出版(发表)作品(或论文之类)的中心内容常常是第一段或开始几页,然后还可以在最后一页或几页中再次看到。就手稿而言,即使是初稿,也应该把这个分析性故事交代清楚。当撰写学位论文或专著的时候,不像

是写报告或者期刊文章，应该对整个分析性故事的进行展开说明。

将分析转化为写作的第二个程序是列出一个可操作的提纲，然后写出将各个部分连接到一起的陈述说明，以便于作者对理论故事的进展保持清醒。各个章节提纲要详细而且有序，要通盘考虑每一节及每一节下面应该包括哪些内容，记住章节各个部分与整本书的关系。而且，这些策略中最基本的是对相关备忘录的整理。即使在写作过程中，研究者也要经常回到备忘录去寻找细节和灵感。作者应在前言或者开篇的一章中说明著书的目的，甚至可能要对分析性故事进行总结概述，例如，该学位论文或专著讲的是关于什么的。这些陈述以及提纲都是可以修改的，如果研究者后来认为有必要的话。

第三个程序是要将可能的书稿体系结构直观化，也就是将作者想要该书或论文呈现的概念化形式直观化。直观化结构可以比作是创造一种空间隐喻。例如，当科宾和施特劳斯写《无尽的工作和护理》(*Unending Work and Care*)这本书时，在作者脑子里的是下面的隐喻。想象走进了一所房子：首先参观者会走进去，穿过走廊，然后是前厅，然后走进一个被隔成两个卧室的大房间，最后从后门离开。然后这位参观者走到屋外，慢慢地绕屋一周，从不同的窗户观看主要卧室，但现在是仔细查看屋内各种摆放物品的关系。当他们的手稿完成时，与这个空间隐喻相对应的形式是：书里有一个导论、一个预备章节、由三章组成的大的理论部分，以及另外一个由好几章组成的很长的部分，它们阐述并从早先介绍的理论形式中总结出启发意义。

如果要撰写的是学位论文，研究者可能会发现上述第三种程序(直观法)并不好用。毕竟，大部分大学院系的学位论文都有相当固定的论文格式要求，即使是质性研究也不例外。学位论文通常一开始是导论章节，接着是文献综述、方法论章节，然后呈现研究发现(用二、三章的篇幅)，之后是总结/结论/启发意义部分。即便如此，学位论文的作者仍可以从架构上对中间几章(内容)进行思考。无论如何，当在质性研究发现基础上构建学位论文的时

候,研究者应该依靠上面提到的前两种程序:(1)通过整理图表和备忘录,形成一个清晰的分析性故事,然后(2)拟定好一份包括这个故事所有重要情节的主要提纲。

该写什么?

当质性研究者尝试着决定对于他们的研究发现该写些什么的时候,他们常常会遇到一个困难。困难源自从整个研究过程中产生的非常复杂的一大堆资料。大的问题包括:所有这些分析,你要写哪些?我如何能够将所有的研究发现压缩到几个章节中?毕竟,撰写学位论文的标准格式不允许你无限地写下去。换句话说,在报告研究的时候,该深入到什么程度?答案是,首先作者必须要确定主要的分析线索(analytic message)有哪些。然后,他或她必须提供足够的概念细节来将这样的线索传达给读者。核心章节的真正形式应该与分析的线索及其要素协调一致。

不过,上述的答案没有具体说明是否是用来撰写学位论文还是专著、需要包括多少及哪些概念细节、哪些可能排除不要。所有这些都要归于回答这样的问题:“该研究探究的是什么?”“这些提供信息的人想要抓住的主要议题和问题是什么?”然后,要有足够的概念细节和描述性引用,让读者充分理解它们。当故事被讲述清楚并被人理解时,熟悉该理论领域的研究参与者和专业研究者才会感到满意。

专著提纲举例

如果让我来写关于越战老兵的生存体验的专著的话,我的提纲可能看起来像下面这样。注意,在将该提纲组织到一起的时候,我对研究结果的理解是如何推进的,甚至已超越了在关于整合那一章中所呈现的。到研究者对分析进行总结并开始写作的时候,很正常,分析也变得更加精炼了。毕竟,研究者已经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去思考。这里只提供一个大概的提纲。要理解,研究者将会用备忘录去填充细节。

第1章:导论

战争体验犹如一条轨迹可以分解成几个时期。战前体验、战争期间或"战斗体验",以及战后体验或是"回家及之后"的体验。一旦个人进入战斗体验,战争就可以被视作一种"生存体验",因为"生存"的身体上、心理上和道德上的威胁成了战时以及后来返回家乡的主要议题或问题。贯穿战争轨迹的有两个相互交织的线索,自我和战争印象。如果个人要生存,那么这二者必须都要变化。这种变化贯穿在整个"协调"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个人逐步把握现状并通过一系列身体上、心理上和道德上的策略来处理各种各样的危险,从而帮助他们变成"老练的士兵"并防止"疲惫"。

第2章:战前时期

自我。在战前的岁月中,"自我"的属性可以在其他事物中表现,如年轻、理想主义以及缺乏战争经验。战前时期包括受家庭、文化价值观和信仰、教育以及其他方面经验影响的形成期。有些青年是理想主义的、爱国的、爱冒险的,而且/或者是信仰宗教的。有些则是问题青年。他们有些是来自虐待家庭,有些犯了法。有些青年人出于责任和荣誉感加入军队,另一些人是为了避免监狱服刑或是远离家庭而去当兵。还有些人是应征入伍,但是却不想在越南服役。这些背景,以及不同的文化信仰和道德感,都和战士们一起被带进了战场,并影响了他们作出必要调整的能力,也影响他们维持生存、心理健康,以及保持道德完整的能力。

战争印象。同样形成于战前时期的还有战争印象。这些印象主要来自于电影、电视和取材于二战的故事。在很多媒体当中,战争都是被描述为带有浪漫气息的。总会出现一位英雄(或一些英雄)无私地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国家和他的战友。美国被表述为不可战胜的。虽然遭受挫折,但它总会作为赢家而胜出(这是后来影响老兵们如何看待越战失败的重要一点)。这些印象决定了这些青年人带到越南战场的预期,他们坚信他们会取得战争

的胜利,战争会很快结束,而且战争将会充满刺激。一旦来到军队,青年人就被送入新兵训练营,在那里他们就要被变成士兵,他们就要花时间在丛林中学会生存。那些受过高等教育或有特殊才能的人通常会进入军官预备学校,这是一个像狙击手学校或飞行学校一样的专门学校。在新兵训练营期间,改变自我和战争印象的种子就开始种植了。虽然新兵训练营在青年人准备战争方面是有帮助,而且在发展生存所必需的人际联系方面也有帮助,但是仍然没有让士兵感受到面对敌人的恐惧感,没有让他们感受到敌人正在那里等着消灭他们,没有让他们知道血腥和死亡的味道。

第3章:战争时期或战斗体验

当士兵们到达越南并经历了第一次战争后,他们的自我和战争印象遭受了重创。恐惧、血腥和死亡变得"实在了"。

(1)充满理想主义和冒险精神的青年人走进战场后现在面临着的是一大堆真正威胁他们生存的问题。生存成了战争体验的主要焦点。

(2)这些问题是在不断变化的情境中出现的。情境是由很多方面构成的,包括民族的历史、政治、社会文化情况,以及从自己的民族确定战争政策和条件的个人意识形态和信念。

(3)从情景中出现的问题并作为一系列感知到的威胁到生存的危险而呈现出来。这些危险分别有身体上的、心理上的和道德上的。每个场景都是不同的,因为是个人对危险的感知决定了他们的行动/互动/情绪反应的形式。

(4)为了克服这些问题,降低危险,某些事情势必会发生。士兵们必须改变自我,变得"老练",而且要避免"疲惫"。变得"老练"和避免"疲惫"需要"协调过去的自我和战争印象"以及调整适应"当前情况的现实"。就危险而言,战士们必须能够现实地看待他们所处的情况,并采取保护性的行动。

(5)生存行动采取的是个人、制度和集体策略的形式,这些都是根据情况而定,目的在于防止死亡和受伤、保持健康、维持心理

健康和维护道德完整。

(6)但是为了提高生存,必须要运用或制定策略。让策略能够运用的就是生存的“协助者”,而阻碍它们应用的就是生存的“障碍”。

(7)那些协调成功的战士们就变成了“老练的士兵”。他们能利用策略来保护自我,并避免过于疲惫,而且最后很多能幸运地生存下来。那些不幸的人就是没有利用这些策略。

第4章:战后时期或回家

生存带着它自身的问题。

(1)首先,参加过战争而且幸存下来的士兵会有鬼魂纠缠、内疚、恶梦和恐惧的感觉。战后的经历通常的结果是创伤后应激障碍。有些退伍老兵遭受了严重的创伤,成了永久性的残疾。对他们进行治疗不仅仅是心理上就够了,因为这也是严重的身体上的问题。虽然有些退伍军人确实痊愈了,当回想起那段战争经历时认为“不是太糟糕”而且“让人成熟”,但是他们也带着战争的伤疤。

(2)这是一个变化着的社会。一个曾经支持这场战争(至少是默许的)的民族现在则公开反对它。出现了反战示威、逃避征兵以及焚烧国旗的举动。因为少数人的行动,老兵们受到嘲笑,使他们感到耻辱。老兵们不能理解这些态度是如何转变以及为什么会转变,也不能理解为什么在国内的那些青年人不能理解他们为这个国家所作出的牺牲,特别是那58 000名死去的生命和比这数字更大的受伤者以及那些永久性残疾者所作出的贡献。

(3)老兵们在返回家乡后发现的社会情境需要他们对自我和战争进行另外一种“协调”。为了“治愈”他们,这样的协调是必要的。

(4)有些老兵能够对自我和战争印象进行调整,而且即使不是全部,至少也是部分“治愈”。

(5)还有一些老兵不能进行协调或不能“治愈”。为了生存,他们建立了一道“沉默之墙”,以防鬼魂、恐惧、家庭和社会闯入并

打破他们脆弱的稳定性，这些一直让他们在生理上、心理上、道德上漂浮不定。老兵们通常借助毒品和酒精来消除他们对战争的回忆、恐惧、恶梦，以及摆脱那些鬼魂。这是有些老兵在社会中能够活下去的唯一方式。即使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有些老兵仍然气愤，将他们对战争的看法和他们的自我隐藏在沉默之墙的背后。有些老兵则迷失在痛苦、酒精和毒品的世界中。

第5章：结论和启发

今天，越战对年轻男女的影响已经有了相当多的研究，并且也建立了一些项目去帮助战士们从战争生活向回国生活过渡。甚至今天关于战争的电影更多的都是以现实主义的且很少浪漫主义的印象呈现。但无论是从军队还是从一般公众来看，仍然没有为回国的战士们提供足够的咨询或帮助。本研究的最重要一点是从战士们的角度去理解战争经历。这是一种每天为生存而斗争的经历，不仅是身体上的生存，而且也是心理上和道德上的生存。

（1）最有效的解决方式就是避免所有的战争。

（2）这是不可能的，亟待解决的是，军队和社会应给予年轻男女支持，和他们所需的能力，让他们能够“协调”自我和战争印象，并使得它们和各种现实或战争相一致。然后，在他们回到家乡之后必须为他们提供帮助和必要的咨询服务，从而让他们能够在协调中采取下一步，这对“治愈”是必须的。

自信的问题

觉得专业化的写作越来越容易，这实际上与研究者对自己的分析及写作能力是否自信有关。这一点非常重要而且有效，特别是随着理解不断增加和研究发现的逐步推进。对于这一方面，下面的引用简洁地表达出一位没有经验的研究者可能有的体验。这段引言更多的指向分析而不是写作，但是就写作本身来说，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这两者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 这样的焦虑和痛苦……可以通过写一两篇文章而进一步得到缓解,然后才认真地开始漫长的和重要的写作任务……有一两篇文章被接受发表则能够大大地促进对于自己研究能力上悬浮着的信心或挥之不去的怀疑。(Strauss, 1987, pp. 259-260)

当研究者开始写作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发现遇到障碍了,更不用说后来在写作过程中,如果他们对自己的分析能力缺乏信心的情况下。他们可能会问,"我真的是对的吗? 我有没有遗漏重要的东西?"对于那些写作理论,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我真的已经找到了核心类属了吗?"如果确实是,还有一个问题是"我将所有这些提升到充分的概念密度了吗?"

这些答案也许是:是、不是,或也许是! 但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研究者的分析是否足够充分,而是研究者是否确信自己的答案就是对上面问题的回答。即使是有经验的研究者也并不是总是能够确定逻辑上的漏洞就在什么地方,他们也需要思考一些时间。即使在回顾之后,他们也不能确定他们就知道他们的分析中没有重要的遗漏。无论是否有经验,一个常见的减少不确定性的策略就是试着对其他人讲述该故事,无论是对个人还是群体,正式还是非正式。

不论理论是初步的还是快最终形成了,课堂研讨都能够帮助汇报者建立分析的信心。在学术会议上作报告,如果受到欢迎,也会进一步确认分析的效度并且在可读性上增加它的有效反应。然而,当接近写作之际或甚至在写作过程中,难免都会担心自己能否有效的完成研究报告。毕竟,有些人是完美主义者,非要十全十美不可。当然,这可能意味着根本不会有什么成就或大大地拖延研究。另有一些人就是对他们自己缺乏一定的信心,而这将使得他们难以完成这项特殊的任务。

放下

虽然已经对可能是最终的草稿进行了编辑修改,研究者可能依然难以放下文稿。放下可能并不是由于缺乏自信,虽然可能会

是这个原因,但可能是由于暂时缺乏勇气。我真的已经将最近的细节都写进去了吗?写得合适吗?这些怀疑又被几乎必然的新发现的细节所刺激,既有概念上的又有编辑上的发现,而且在每次重写文稿的过程中都会出现这样的重新安排和重新措辞。作为一名研究者和作者,逐渐成熟的一部分就是要理解,任何文稿都是未完成的。假如作者够幸运,不受个人、院系或出版(发表)商的最后期限限制,那么他或她就可以将完稿搁置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这样就能够在编辑上和分析上与其拉开距离。此外,可能压着一位或两位同行阅读一部分文稿,甚至全部,并提供建设性的反馈意见。最终作者还是必须放下他或她的作品,相信文稿像它应该被完成的样子完成了。研究者可以确信,一旦文稿交给了出版商或学术委员会,总会有关于改进的反馈意见。放下的逻辑是,写作只是犹如源源不断的传达思想的溪流的一部分,作者后来可以回过头来对其或后来的作品进行批评。吸收自己的批评意见与回应别人的批评意见没有什么区别。

然而,放下的心理意义更加复杂。基本上,这就是要避免不要落入陷阱,臆想着有完美的作品,纵容自己,而不是向新的项目、新的思想和新的资料敞开。重要的是要在重新修改手稿的获益和放下这些手稿之间进行平衡取舍。至于该怎么做是很难用文字表达的。当然,有经验的研究者,他们对研究工作确实非常熟悉,他们对这样的问题会提供帮助,但是最终,每一位作者必须依靠他或她自己的内在感觉去把握放下的时机和程度。

如果研究者正在撰写学位论文,并且非常幸运,是在一个允许其在格式上有一定程度自由的院系做研究,那么他或她就可以针对读者来写作,而不是仅仅为论文委员会和其他的院系教师写作。此外,图书出版商通常不喜欢出版学位论文,所以,作为可能的出版物给他们,最好是另外一种形式。因此,如果能以类似专著的形式写你的学位论文,那么以后把论文转写为专著出版,就更加容易。

读者

作者会想象他或她论文的读者也是一个问题。或许这个问题,在论文写作上比其他形式的出版作品写作(以下会讨论)以及演讲要简单,但对很多学生而言,这仍是令他们头疼的一个的问题。毕竟,论文的直接读者是论文指导老师和论文委员会的其他老师。如果他们不赞同该论文,那么你就功亏一篑了。当论文委员会的委员们是由那些持强烈反对学生研究标准从组成时,学生可能会因为他们在方法论上的不一致而受到牵累。假如幸运或聪明的话,学生就选择那些他们了解的委员会成员,这些委员会成员彼此之间愿意同意这些标准和格式,接受这样的学位论文,不过可能还是需要一些修改。如何处理这样的变化情况,并没有尝试的以及真正的规则可以建议。我给学生们最好的建议就是,如果有可能,选择一位支持但却具有批判性的指导老师,并尽可能写出优秀的文稿。如果学生做了扎实的研究,那么学生就很可能获得学位,除非论文委员会的有些老师对于质性研究持怀疑态度。假如有这种可能出现,那么学生就要尽量让这些潜在的持反对意见的老师在你的论文委员会里只占最少数。

学位论文与专著之间有一些关键性的区别,尽管在前几页我们一直在模糊这种区别。二者之间的主要不同在于专著中的探讨在概念上应更丰富,也就是说,专著的讨论应该有更加深刻的内容和细节。既然专著的写作有更大的空间和更少的字数限制,作者分析起来就更加自由。而且,专著会更加复杂。除了更加广泛地展示类属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专著可以呈现更多实质性的材料。这些材料可以包括案例研究,甚至来自访谈记录、田野笔记和文献中的大段引用。作者偶尔可以偏离主题,讨论一些次要的和枝节性的议题,只要这些议题与专著的主干相一致。此外,专著可以包括一些在更严格的学位论文中被删除或学位论文中没有充分发挥的议题。在学位论文写作中,由于仓促而出现的一些破绽应该在专著中修改过来。学位论文委员会往往强调研究发现,然而专著的读者则更喜欢或至少愿意接受在分析基础上的

论证,以及对研究材料更为广泛的讨论。

专著的作者在选择表达的风格上有更多的自由。在某种意义上,风格应该反映作者要传达的信息,同时考虑这些信息要传达的读者对象。需要考虑的问题有:读者限于学科或专业同行吗?或者你希望你的读者来自多个领域吗,也许包括来自实践领域的那些人?专业外的读者呢?如果想要专著最大地发挥其效果,作者就应该问问自己,“我希望对每一类不同的读者说些什么?”或者如果针对好几类读者,那么“我该用什么样的风格让他们接受我所讲的呢?”通常,将理论和充分的描述性细节相融合,让自己的表达生动而且清晰,这是一种令人喜欢的结合。总之,专著的风格和呈现形式应该考虑读者并反映读者的需要。

假设专著的作者既想对学科同行又想对外行阐明自己。为了让这两类读者都理解需要花费相当的精力考虑词汇、专业术语、案例材料、整体语气以及写作风格的其他方面等。社会学家出版的很多专著的目标既有同行读者,也有非专业读者。(已经出版的这样的专著有:Biernacki, 1986; Broadhead, 1983; Charmaz, 1991a; Davis, 1963; Denzin, 1987; Fagerhaugh & Strauss, 1977; Rosenbaum, 1981; Shibutani, 1966; Star, 1989; Whyte, 1955)有时专著的目标读者是非专业人员,例如,施耐德和康拉德(Schneider & Conrad,1983)合编的一本关于癫痫症的书,面向的读者是病人和他们的亲属。有时专著的写作对象是一般民众、同行和专业人士。然后他们作为普通书籍出版,例如,考哈佩(Cauhape)在1983年写的一本关于离婚后再婚的书。

为各类读者写作一般比只为同行写作更加复杂。但很多研究者都渴望或在内心上觉得有责任为科学界或专业以外的读者写作。有时,他们也会用自己的研究为平台,来写一些专著以外的书籍。一种可能就是表达政策议题,呈现一种观点,不过都是以个人的研究,也许是个人专业知识来提供信息(Strauss & Corbin, 1988)。或者为实践者写书,书中满是建立在研究基础上的知识信息(Strauss, Schatzman, Bucher, Ehrlich & Sabshin, 1964)。

将学位论文转写为专著

如何将学位论文转写为专著？如何去转写，前面已经含蓄地提供了一些指导建议。不过，摆在学位论文作者面前的首要问题是该不该马上就把论文写成专著的形式？关于这个决定，有好几个问题需要作者深思，并且最好按以下顺序思考。

(1)学位论文中有没有足够有趣的实质材料、研究发现或理论构想，值得我花时间和精力为更广泛的读者去著书？有些学位论文很适合改写成专著。还有一些学位论文，尽管对某些同仁而言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作品，但是并不适合改写为专著，不过作品里面的某些部分可以作为文章发表，日后有可能被广泛引用。

(2)如果认为足够重要，那么该如何决定哪些是要放入专著中的最相关的话题和概念？

(3)我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把论文转写为专著吗？我对该主题真的还有兴趣吗？我对它已经了解够了、厌烦了吗？我已经有了这样的专著吗？这真是我的特长或者我是否应该转移到其他的、当前更加有趣的题目或领域上吗？当然，若兴致勃勃的把论文成功的改写为专著会让个人得到极大的满足。一部分奉献和相应的满足也可能来自对读者的责任感，他们应该知道你通过研究发现了什么。

(4)对很多未来的作者而言，还有另外一个问题需要考虑。如果有了一定程度的兴趣和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是否就值得为了职业的目的去撰写专著呢？在某些领域，撰写专著（或其他类型基于研究的书）并不是特别重要，在相关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往往会带来更大的声望。不过，在其他领域的同行，包括社会科学，尤其是当招聘新教职人员或他们考虑自己准备晋升的时候，都知道专著通常比写论文在评价方面更有分量。

在考虑了上面每一个问题，以及有时候由指导老师、朋友、论文赞助人或其他亲密人士提问所带来的疑虑或困惑之后，研究者仍然要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如何把学位论文变成专著。事实上，要回答这个问题很可能会影响到决定是否要撰写专著的问题，因

为这需要考虑要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实际上如何把论文转写成专著,前面提到的一些思考就能够提供详细的指导。作者必须要仔细考虑专著所要针对的读者。另外,同时还必须仔细考虑题目,或概念,或理论构想,这对每一位读者可能都会引起兴趣或具有价值。这些考虑引出了风格的问题。例如,专著该用什么样的格式?理论构想应该成为专著的主要焦点而描述性材料居次,或是二者应该保持平衡?研究者应该直接用既有的理论构想为主要论点做辩护,还是低调或甚至含蓄地保留该论点?风格上的考虑当然也需要考虑使用的语言种类和层次、呈现选取的资料的模式、专著的整体风格,等等都受到影响。

正如前面所述,在学术论文的最初报告中必须增加对概念的阐述。研究者可以将在备忘录中已经提出来的但在撰写学位论文时被删除的理论材料放入专著中,还可以对学位论文中那些不清楚、模棱两可、不完备,甚至不一致的理论构想的方方面面予以通盘考虑。此外,在专著中,作者可能希望更加充分地讨论有关理论文献的研究启示,以及对未来研究的意义,或对实践者或对政策决策者的启发意义。很多研究者发现为了专著而重新写作是非常有价值的工作。还有些人将学位论文变成专著主要是为了职业晋升和个人名望,(几乎就是)当作一种投资。

共同出版(发表)

当一个项目涉及两位或更多的研究者,就总会有如何写作出版(发表)研究成果的问题。可以理解的是,这些答案取决于团队成员之间的关系、他们各自的能力和兴趣、他们承担的任务以及各自可以用来写作的时间。有些出版(发表)作品是由最主要的研究者撰写,团队里的其他成员贡献程度不一。还有一些出版(发表)作品则更有可能是共同写作的结果,而不只是共同分担研究工作。大概各种可能性都有。这对论文也同样,它们都是在团队研究基础上的成果。

撰写期刊论文发表

在研究基础上的第四类出版（发表）物很少是同质性的。对于发表论文的类型，有各式各样的选择。在此我们的建议是可以灵活地采取一种三分法对这些可能性进行区分。

（1）对于同行，你的论文重点可以是：理论的、实质的、思辨的和/或方法论性质的。

（2）对于实践工作者，论文可以为他们理解客户以及更好地为客户工作提供理论框架；可以为了改进操作程序提供实质性的研究发现和实践建议；可以为改革现有的实践提供建议，以及/或者提供广泛的政策建议。

（3）对于一般大众读者，合适的论文应该包括描述那些实质性研究成果、为改革当前实践或政策的建议、从实践者或机构的角度为其提供获得更好服务的自助指南或策略，还有通过分享其他人的经历为读者提供判断（例如经历一次离婚或收养一个孩子）。

以上对不同类型论文的选择指出了它们在写作目标、重点和风格上的差异，当然投稿的期刊杂志也会不一样。无论如何，研究发现为所有类型论文的写作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质性研究提供了理论分析、实质的内容和自信心。当完成了一项研究，研究者应该对议题、读者以及行动者和组织机构的优势和缺点有了相当的敏感性。当质性研究者决定该写些什么、为谁而写以及如何写时，也会利用这些知识。关于这些问题的选择决定依靠的是理性和程序，这与贯穿于本章所讨论的那些问题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有几点重要的不同可以简单地讲一讲，而且也很容易理解。以下是可能会直接影响作者论文如何写、为谁写以及是否要写的一些条件。

（1）正如前面所指出的，研究者可能在研究过程早期就决定发表论文。他们这样做可能出于不同的理由，例如，介绍基本的研究发现，或是为了满足资助人或是为了给资助人深刻的印象，或是因为他们掌握了一些与研究主题不是很相关但有趣的材料，

现在可以很容易写出来,以免日后忙于主要论文部分而写不成。

(2)有时候,研究者撰写论文是因为他们觉得有义务就某个题目发表看法或是因为他们有不得不写的压力。当然,这种写作动机也会影响研究者写什么以及怎么写。

(3)研究者也可能受邀为某期杂志或编辑栏目投稿,因为他们知道这些研究者正在这些领域做研究。或者是因为听众反应甚佳,研究者受到鼓励或渴望把演讲改写为论文。

(4)另外一个影响论文写作的条件是将完成的论文交给编辑有一个最后期限。对于一些研究者,这可以作为一种激励,当然还有一些人则会因为任何一个截止日期而感到担心。

(5)编辑允许的论文篇幅也会影响是否要写一篇论文,至少是否为这次发布去写,以及要写些什么和怎么写。

(6)除非是受到杂志编辑的约稿,论文作者总归是要作出一个重要的决定,即选择哪家特定的杂志作为自己论文投稿的对象。论文和期刊必须要匹配,否则论文有可能会被拒绝,花费在论文写作上的时间就白费了。更糟的是,虽然论文被接受,但针对的读者却不合适或不能充分理解你的论文。如果研究者对某期刊特别了解,选择一家合适的期刊可能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否则就应该仔细审查期刊的议题。而且,咨询那些非常了解特定期刊的人会有好处。在向自己研究领域以外的读者阐述时就显得尤其如此。正如一位社会科学家为一份社会工作或医学杂志写作时就需这样做。

已经指出了这些条件,它们有时候限制了写作,但有时候又激发写作,现在我可以讨论期刊论文写作的其他方面了。最重要的考虑就是目的和读者的相互联系方面。有了上面所列出的各种各样的写作目的及读者对象,读者可以看出这是每个写论文的人都会面临的核心议题(这是事实,即使是约稿也是如此)。作者应该对读者说些什么呢?在研究过程中,有些论文的题目似乎很自然的就萌生出来了。例如在慢性病患者和他们的配偶的研究中(Corbin & Strauss, 1988),作者惊讶地发现夫妻间处理病情的做法竟然差别这么大。有的彼此高度合作,有的却矛盾重重。于是在研究相对较早

的时候,一篇与此题目有关的论文就写出来了(Corbin & Strauss, 1984)。有的论文可能在研究初期或中期就在孕育之中,但一直到研究末期才被写成,或者这些思想被吸纳到专著里。

有些论文中的思想比其他思想需要更多的时间才得以形成,也许是因为他们需要对现象有更为深入的理解或者具有更深厚的理论修养,这样研究者才能自然的写出来。改革建议的论文撰写有可能会被延迟,因为只有研究者被他们所看到的现象深深地困扰时,他们才能够投入改革的角色,或者也许是因为他们不明确改革的方向。当理论构想被清晰地制定出来之后,研究者会忍不住想把全部的理论框架在一篇长文里呈现。正如我讲过的,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因为理论框架将变得非常复杂,涉及的概念也非常稠密。我的建议是不要试图在论文里这样做。如果作者选择这样做的话,那么最好是给出一个精简式的版本,让读者参考即将出版的专著。例如,施特劳斯和他的同事们就曾写过一篇关于"医疗工作"以及它与"安全工作"和"舒适工作"之间关系的论文(Strauss et al., 1985)。在另一篇论文里,这个研究小组写的是关于"安全工作"方面的,尤其是涉及他们不断使用有潜在危险性的医疗设备有关的工作。

作者还可以围绕方法或政策的议题撰写其他论文。这样,理论内容置于次要地位,但对讨论部分仍然需要润色深化。聚焦于方法论的论文可能既需要实质材料又需要理论说明,以帮助读者理解。政策辩护不仅可以通过资料支持,还可以通过理论框架或明或暗地为其奠定基础。例如,施特劳斯和科宾论证美国健康医疗系统的改革并提出建议。这些建议是建立在对健康专业人员和机构主导急性护理取向的批评基础之上提出来的,虽然今天仍然是慢性病占主导,慢性病有很多阶段,每一个阶段都需要不同类型的护理。

让我们回到我们的建议,理论取向的论文应该限制讨论的类属数量或概念的数量,和通常一样,问题是应该如何展开讨论?当我们撰写专著的各个章节时可以提出同样的问题,但修改为期刊论文则不同。首先,研究者要确定一个重点。作者想要讲述的

理论性故事是什么？这样的决定可以在研究过程中作出，或者实际上可以通过思考最新的整合性图表或通过整理备忘录提出来。至于越战研究，我可能想要写一个关于战争中生存的故事，详细讲述生存面临的各种类型的威胁，用来转变这些威胁所使用的策略，以及促进或限制使用这些策略的条件。当要讲述的完整故事和论文的逻辑都在大脑中形成之后，就可以提出一个论文的写作提纲了。就像专著的提纲一样，当收集并阅读了备忘录之后，作者就开始组合成一个故事。为了使论文更加有趣，以及论文的理论观念更加具体和为更广泛的读者所理解，在叙事中应加入丰富的例证描述。虽然写一篇关于“生存:协调多重现实”作为一种普遍现象的文章可能非常有趣，然而在一个研究项目初期所写的论文通常很少是理论性的。作者之所以写出来是为了想让同行以及一般读者对一个题目的思想有所了解。提出更加正式的理论想法可以放到后面某个时候。

在写论文时一个危险是让过多枝节淹没了你的思考。如果作者试图把过多的研究发现挤在一篇篇幅不大的文章里，有可能会让作者受到挫折，或者至少妨碍了作者清楚地阐明研究发现。至于什么应该放入论文中、什么可以省略，无论是不情愿或是迫于压力，这里的操作指南都可以用一个双向的问题来表达:我需要这些细节资料以使论文的分析讨论更清楚吗？且/或者使读者达到更加真实地理解吗？第一个问题属于分析本身，第二个问题则主要涉及是否要从资料中引用材料和案例的问题。

对于专著与学位论文，可以将草稿拿给朋友和同行看，试着与他们分享，甚至也可以给那些感兴趣的实践者或外行人看，如果这些材料与他们有关的话。另外，如果作者有幸在一个写作小组或一个学生研究小组中，那么他或她可能希望小组成员能够仔细研读他的草稿。作者也必须把相关文献放到论文中。如果作者写的是篇理论性的文章，那么他可能会考虑文章的启发意义，以便能够为政策或实践变革提供建议。然后，当论文终于完成的时候，甚至最终刊载的时候，研究者应该已经开始在思考并为下一部作品拟定提纲，并开始动笔了。

要点总结

对研究发现作口头报告和出版(发表)书面报告给研究者带来了另外一个挑战。面对诸多复杂的材料,对于要呈现什么、呈现给什么样的读者以及如何呈现,研究者该如何决定?一般来说,在一个口头报告或一篇文章里,作者最好深入地探讨一两个概念(类属/主题),把它们与一两个其他有相关特征的概念(类属/主题)放在一起讨论。在写专著时,研究者有更大范围选择的可能性,但即使如此,作者也应在拟订详细的提纲之前,仔细思考呈现材料的逻辑和顺序。学位论文表现出来的问题就是需要遵守标准的格式。此外,作者要仔细考虑,文章中要有多少细节,以及如何把概念化方案最相关的方面呈现出来,同时文意还能保持流畅与连贯。有一点很重要需要记住的是,如果研究者完成了一项深度分析,那么这位研究者将会有很多有趣的材料,可供未来数月写作,并且将会赢得读者的赞赏。

思考、写作及小组讨论活动

1. 想想你目前的研究项目或你之前已经完成的项目。其中哪些概念你可以用其去写一篇论文或作一个报告?为论文或报告订订一个提纲。

2. 从越战老兵的研究中拿出一两个概念。拟订出一个论文提纲。考虑你想要写给的读者和你准备投稿的期刊。

3. 把你的提纲带到小组并且向大家作报告。让小组提供反馈。对于他们的评论,哪些地方你同意,或哪些地方你不同意?因此你会怎样去修改你的提纲?

4. 浏览一些刊载质性研究项目文章的期刊。选择两篇论文,一篇是你认为写得非常好的,另一篇是你认为写得过于表面、内容不够深入的。把这两篇论文带到小组,对那些你认为对写作有益的各个方面的特征分别进行比较。

14

评估的标准

质量是难以捉摸的，很难具体说明，但当我们看到它时，我们常常就感觉到我们知道它了。从这方面说，研究更像是艺术而不是科学。（Seale，2002，p. 102）

导　论

我不得不同意西尔的观点。质性研究的质量是某种当我们看到它时我们能够识别它的东西，然而，要说明它是什么或者如何识别却非常困难。虽然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关注质量（Corbin，2002，2003），但是我发现关于评估这一章非常难写。我觉得自己很无能，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也不知道如何去写。当我研究文献的时候，我发现每个人都同意，评估是必要的，但是对评估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却少有一致意见。当提到质性研究评估的时候，我们是通过“效度”来判断？或最好使用像“严谨（rigor）”（Maya & Pope，1995）、“真实性（truthfulness）”，或“适度（goodness）”（Emden & Sandelowski，1999），或者某种所谓“完整（integrity）”的东西（Watson & Girad，2004）？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你能够确定一个适用于所有形式的质性研究的标准吗？在后现代主义和建构主义思想指出我们思考方式的某些荒谬之前，判断研究质量的观念似乎很清晰。现在我感到困惑的是，如果研究发现是建构的，真理是一种“镜像”，那么评估标准难道不也是建构的因此也是有

待讨论的吗？正如弗利克所说，如何评估质性研究的问题还没有解决（Flick，2002，p. 218）。我喜欢斯帕克斯文章标题中的讽刺："神秘94：质性健康研究者会同意效度的（Myth 94：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ers Will Agree About Validity）"（Sparkes，2001，p. 538）。

尽管我遭遇了各种争论和困惑，其实，在我灵魂分析的深处，我仍然相信质性研究既是一种"科学的"探索（Morse，1999），又是一种"创造性的"和"艺术性的"努力，所以最终产品（研究发现）的"质量"将反映这两个方面，这是西尔（Seale，1999，2002）所提出来的观点。正如惠特莫尔等人所说，优秀的和变革的思想可以和理性陈述、证据的呈现以及方法的批判性应用相互补充（Whittemore，Chase & Mandle，2001，p. 527）。本章的目的是质性研究的"质量"议题，并在本书中呈现的方法论基础上为读者呈现一些评估研究的标准。

一些文献

我想，本章开始最好是对相关的文献做一个回顾。一个经常提到的议题是效度。也许在质性研究中最常引用"效度"这个主题的人是哈默斯利。他说，可以考虑研究的有效性，如果"它准确地表现了现象的特征，那么研究的目的就是对它们进行描述、解释或理论化"（Hammersley，1987，p. 67）。温特（Winter，2000）在福柯对真理的多重性定义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效度解释模式，并继续说到，"[效度]似乎属于这样的情况，将研究方法论当作了真理系统，它们的过程是最好的代表。"这似乎很清楚，这些"专家"将"效度"和一种"真理"联系在一起，但这里更多是在一种复数意义上而不是传统意义上使用"真理"。

实际上，西尔费曼认为，"效度"是"真理"的另外一种表述方法（Silverman，2005，p. 224）。他提出了提高研究发现效度的五个策略。这五个步骤包括：当研究者继续做研究时，对资料要运用"可批判性原则"或运用批判假设；运用"持继比较的方法"，或者

至少针对一个其他案例,做临时假设检验;进行“全面的资料处理(comprehensive data treatment)”,或者对所有的案例进行分析;“寻找偏常案例”,将不符合模式的案例找出来并进行讨论;“制作合适的表格”或者运用量化研究的数字,如果在混合方法设计中它们有用的话。根据西尔费曼,信度(Reliability)可以通过对类属进行表格化处理的方式来实现,如果研究者这样选择的话;或者在转录访谈时将资料的所有方面都转为文本,即使是最细微的内容(Silverman,2005,pp.209-226)。

莫尔斯等人指出,“是该考虑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使用的检验策略重要性的时候了,这样才能够积极地实现信度和效度,而不是由外面的评论者在完成项目后再来喧嚣”(Morse et al.,2002,p.9)。换句话说,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应该采取策略性行动,以保证研究的效度和信度。莫尔斯等人列出了好几条策略,从而将“严谨性”带入研究。这些策略包括,“研究者的反映、方法论的一致性、理论抽样和抽样的合适性、采取一种积极的分析立场和饱和度”(Morse et al.,2002,p.9)。运用这些策略是合理的,而且人们可以在很多类型的质性研究中使用它们。然而,虽然这些策略表明了做质性研究的“科学性”一面,但是它们并没有对质性研究的创造性方面进行评估。

克里斯威尔和米勒(Creswell,1998;Creswell & Miller,2000)提出了八个不同的步骤,以实现林肯和古贝(Lincoln & Guba,1985)所说的研究发现的“可靠性(credibility)”和“可信性(trustworthiness)”。这些步骤包括“在田野中延长参与并坚持观察”;“三角检验”;“运用同行评论和质询”;“反面案例分析”;“澄清研究者的偏见”;“成员检验”;“深描”;以及“外部审查”(Creswell, 1998, pp.201-203)。而且,这些标准更多的是指向做质性研究的效度方面而不是创造性方面。

基奥维蒂和皮伦特(Chiovitti & Piran,2003)在扎根理论研究中描绘了一系列达到严格性(rigor)的标准。这些标准包括:让参与者引导过程;对有违参与者现象意义而提出了的理论建构进行检验;在理论中使用参与者的真实语言,澄清研究者对所研究现

象的个人观点和洞见;阐明构成研究者思考的条件;以及说明研究中如何以及为什么选择这些参与者,介绍研究范围,描述这些文献是如何与研究中出现的每个类属联系起来的。毫无疑问,遵循这些程序其结果就是严格,但是这一系列程序中却没有情境(context)、过程(process)、密度(density)、变化形式(variation)或实效性(usefulness)。该程序中也没有惠特莫尔等人(Whittemore et al. ,2001, p. 531)所描述的作为效度标准的"生动(vividness)、创造性(creativity)、充分性(thoroughness)、一致性(congruence)或敏感性(sensitivity)"。

卡麦兹(Charmaz,2006, pp. 182-83)提出了一系列评价建构主义扎根理论的标准。在我所看到的所有这些标准中,我发现她提出的标准是最全面的,因为这些标准既阐述了做质性研究的科学性方面,又阐述了其创造性方面。卡麦兹将她的标准分为四个类别。它们分别是可靠性(credibility)、原创性(originality)、共鸣(resonance)和实效性(usefulness)。这一系列标准相当全面,在这里我不想重复对其全部进行介绍,我将给读者介绍研究者应该向自己提问的例子。

例如,在可靠性的下面,她说道,"这些类属覆盖了经验观察的广泛范围了吗? 在这些收集的资料和你的观点及分析之间有很强的逻辑联系吗?"在原创性下面,她说,"你的类属新鲜吗? 它们提供了新的洞见了吗?"在共鸣下面,她说,"这些类属充分地描绘了被研究的体验了吗?"在实效性下面,她说道,"你的分析是否提供了人们在日常世界中能够运用的解释?"对于卡麦兹提出的评估标准,我看到有一个问题(这并不是批评,只是评论)。它们要求在研究过程中和研究过程后进行自我评估,而自我评估是复杂的。它需要一定程度的理论修养和经验来准确地评估一个人自己的工作,即使这样也很难抛开偏见。

在继续介绍之前,我想对我认为对这里的讨论很重要的文献再多做一些回顾。在早年关于扎根理论的书中,格拉泽和施特劳斯作了这样的陈述,"到研究快结束的时候,研究者对他自己理论的信念很难动摇,正如大多数田野工作者能够证明的。这样的信

念并不意味着他的分析是能够建立在他资料基础上的唯一的合理的分析，而是意味着他对分析的可靠性有高度的自信……”（Glaser & Strauss，1967，p. 225）（注意格拉泽和施特劳斯用“可靠性”意指“可信的”，而不是围绕着整个“真理”议题的效度。）作者们这样自信的原因是，研究者一直沉浸在研究的社会世界中，因此他或她能够对它提供一个“可行的”解释。格拉泽和施特劳斯提供了下面的这些标准来判断一个研究的“可靠性”。虽然这些标准为理论建构研究而写，但这些标准对其他描述性研究都有意义。

首先，要有足够的细节和描述，让读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因此能够自己作出判断）。其次，对于资料是如何收集的以及如何进行分析的都应该有充足的证据（以便读者能够评估研究是如何得出研究发现或结论的）。格拉泽和施特劳斯指出，很多比较群体使得理论的可靠性更大（因为研究发现是以一个以上的群体为基础的）。最后，研究者应该具体说明他或她所依赖的资料种类（Glaser & Strauss，1967，pp. 223-235）。除了“可靠性”，格拉泽和施特劳斯提出了“可应用性（applicability）”，他们也为其提供了标准。从我的观点看，任何声称有质量的研究发现都应该是“可应用的”，因此我也想提一提格拉泽和施特劳斯的这些标准。可应用性的标准包括：一个理论应该“符合”它所来自的领域而且可以用在该领域；除了专业人员外，一个理论应该很容易被专业外人士“理解”；一个理论应该足够“普遍”，适用于各种情况和人群；最后，一个理论应该为使用者提供充分的控制，能够给环境带来变化（Glaser & Strauss，1967，pp. 237-250）。

当我回头看时，我意识到，即使格拉泽和施特劳斯主要是在谈论理论建构研究，但他们所说的却意义重大。而且，他们必须要说得既适用于理论建构研究也适用于描述性研究。如果研究发现是“可靠的”，也就是可信的或合理的和“可应用的”，意思是研究发现可以很容易应用，因为研究发现提供了洞察力、理解力，适合于各种人群和情况，引起希望的变化，那么对我来说，所有这些关于“真理”“效度”和“信度”的哲学争论都是多余的。换句话

说,“事实胜于雄辩(proof is in the pudding)”,可以这么说。如果它“合适”,而且“有用”,因为它解释了或描述了事情,那么还有什么对严格性和所有其他事情担心的呢?严格性必须体现在研究过程中,否则研究发现将经不住审查,不会适合相似的情况,而且在实践中也会无效。

一些关于质量的一般思考

我已经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我来说,质量和效度不是同义的。有质量的研究发现还有一种创新的、熟虑的和创造性的元素。这里我想援引阿加的一些观点。虽然在文章中他讨论了计算机程序的运用除了帮助分析之外是如何妨碍分析的,但这里援引告诉我们的是思考和创造性是如何构筑到分析过程中的,而且在很多方面,正是分析的这些方面赋予了质性研究的丰富性和真实性,这些是计算机无法做到的。他说:

> 问题是软件预先设定了一种看待问题和情况的方式,预先设定了一种自上而下的顶级框架,用它来指导研究者收集材料、形成研究类属以及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批判地看待问题的方式,至少在我看来,来自于对一点点资料进行大量的循环阅读,大量的思考并认真对待像直觉和运气这样的事件……(Agar, 1991, p. 193)

当讨论质性研究的时候,我(科宾)也不喜欢使用“效度”和“信度”这样的术语。这些术语带着太多量化研究的暗示(一种个人偏见)。“真理”这个词在某种程度上也让我烦恼,似乎你无论如何定义“真理”,这个术语都带有一定程度的独断性。当讨论质性研究时,我宁愿使用“可靠性(credibility)”这个术语(Glaser & Strauss 1967; Lincoln & Guba, 1985)。对我来说,“可靠性”这个术语表示的是,研究发现值得相信且能够相信,因为它们反映了参与者、研究者及读者对一个现象的经验,但同时这种解释只是对资料很多“可能的”解释之一。最后,我同意罗尔夫(Rolfe,

2006)的观点。我不相信同样的评价标准能够适用于所有的质性研究方法。每一种方法都有它自己的一套评价标准。

什么是"质量"或质量的特征是什么?

当我把"质量"用到质性研究中的时候我该如何描述它?有质量的质性研究是这样的研究,它让读者或者听者支持并说出这样的话,"哇喔""我很感动""现在我知道了""很有力度""我觉得像参与者一样""研究非常深入,它揭示了我从来不知道的细节""这就是我可以在我的实践中、生活中使用的东西"。换句话说,有质量的质性研究与读者和参与者的生活经验产生共鸣。有质量的质性研究是有趣的、清晰的、富有逻辑的,它启发读者思考并想进一步阅读。有质量的质性研究是有内容的研究,赋予洞察力,显示敏感性,它不只是"相同陈旧材料"的重复或某些可能在报纸上读到的东西。有质量的质性研究将概念和充分的描述性细节融合在一起,让读者自己从资料中得出结论,判断研究者的资料及分析的可靠性。有质量的质性研究能够激发讨论以及对一个话题的进一步研究。

形成建构研究"质量"的条件是什么?

质量并不必然出现。质量是必须要努力的方向,而有某些形成质量的研究条件或情境。第一个条件是,"方法论的一致"(Flick, 2002, p. 219;Morse et al., 2002)。如果研究者说他或她打算使用一种特定的方法,那么他或她就要始终使用所有的设计好了的相关程序。这并不是说研究者在他们的分析策略中不能有创造性,否则他们如何执行特定的程序。但是如果研究者在操作上表现出贝克等人(Bakeret et al., 1992)所说的"方法的模糊(method slurring)"或将哲学上不同的质性研究方法组合到一起,如果研究只使用一种方法的某些而不是所有的重要程序,那么他们很可能会失去与该方法联系在一起的某些可靠性。

方法论是设计用来做某些事情,而且通过长时间的使用,如果与已有的设计一致的话,它们就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的"可靠

性”。要将不同的方法论混合在一起,或者只使用某些程序而不适用另外一些程序,那么它在可靠性上就受到削弱。例如,虽然有很多版本的“扎根理论”,不同版本中那些一贯的程序是“持继比较”的分析方法、使用概念并发展概念、理论抽样以及饱和。另外,对于那些想建构理论的研究者,应该建构一个描述完整的理论。因此,如果研究者使用这些程序中的一两个,或者不建构理论,他或她就不能宣称是在做扎根理论研究。可能说得更准确一点的是,他或她是在使用与扎根理论有关的一些程序做一个“如此这般(Such and such)”的研究。

第二个条件是,研究者有着清楚的研究目的。研究者在研究的一开始就应该非常清楚研究的目的是描述还是理论建构。如果研究者对描述和理论之间的区别不清楚,那么做质性研究就很困难。研究发现很可能显得含糊不清,既没有达到好的描述也没有上升到理论。一份研究的质量和价值不在于它是理论还是描述。正如桑德罗斯基(Sandelowski,2000)所阐述的,“质性描述”在护理研究中有其位置,我还可以增加其他的学科。任何研究的价值都在于它所形成的产品的内容、深度和创造。

第三个条件是,有自我意识(Hall & Callery, 2001)。因为研究者(作为解释者)既是研究过程的也是研究发现的整体组成部分,所以研究者对自己的偏见和假设保持清醒的意识非常重要。在资料收集和分析期间,坚持写日记和/或经常写备忘录,将研究者的反应和感觉记录下来,这能够帮助认识到研究者对研究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同样重要的,研究对研究者所产生的影响。

第四个条件是,在做质性研究中,研究者应该经过训练。就研究资历、经验、视角以及根本的哲学取向来说,研究者在质性研究发现中带给研究的差异非常大。每个人都想参与到质性研究活动中,或者今天似乎是这样。因此,研究出来的产品的质量参差不齐,很多看起来更像是糟糕的新闻报道而不是研究。我怀疑的问题之一是,很多研究者认为做质性研究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认为任何人都可以做。事实并非如此。任何人都可以从资料中提取一些主题,但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如何构建充分发展的主

题、达到丰厚的描述，或知道如何建构一个深度的叙事。也并非每个人都知道如何建构理论。做出有质量的质性研究需要在研究方法、资料收集和分析上有良好的教育基础——这和量化研究的要求一样。

第五个条件是，研究者对这些研究话题、参与者以及研究有“感情”和敏感性。要作出好的分析，你必须能够“走进参与者的世界”，从“内心深处”感受，否则，你就会失去资料的某些丰富性和深度。一个陌生和遥远的研究者可能提高量化研究的“效度”，但也可能损害了研究发现的“可靠性”，因为这使得研究者无法形成需要用来准确把握参与者观点的敏感性、移情、细心、尊重和忠诚（Davies & Dodd，2002）。

第六个条件是，研究者必须愿意努力工作。做质性研究就像做任何值得投入的工作一样努力。它要花费时间，而且愿意一遍一遍地去做，直到你感到满意为止。做质性研究需要花时间去写备忘录，去做其他各种各样与质性研究有关的工作。作出“有质量”的质性研究，没有捷径可走，无论你是做描述研究还是建构理论。

第七个条件是，愿意放松并触及创造性的自我。走出你的概念惯例（Wicker，1985）意味着愿意做头脑风暴、换角度看事情、做理论比较以及用新的方式思考。质性研究者必须向新的思想敞开，灵活地并创造性地运用策略，以便理解参与者给我们讲述的事情的本质或意义。其实，亨特等人（Hunter et al.，2002）在他们的文章《赋予意义：质性研究中的创造性要素》中展示了创造性对质性研究是多么重要。

第八个条件是，借用西尔（Seale，2002，p. 108）的观点，一个他称其为“方法论意识”的术语，指研究者应该意识到他或她在研究过程中所作出的决策的影响。方法论意识要求有潜在的批判意识，收集资料和分析资料的方法要可靠，同时注意方法论问题，如果它们出现的话。

第九个条件是，渴望为研究而研究。我认为，我们之所以看到在质性研究质量上参差不齐是因为在硕士课程中和学术界做

研究中的有各种各样的动机。有这样一种说法,"做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刚刚结束又要开始"或者是受过教育的人的标志。但有些人是更好的教师或实践者。而有些人则是更好的研究者。作为专业人士,如果我们能够相信人们会尽力所为——实践、教学或研究,而不要让任何人觉得他们必须要去做研究,我相信,质性研究中的质量不会成为一个问题。

运用这种方法判断研究质量的标准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达到了上面这些条件就必然能够保证质量。最终,是研究发现的质量最重要,而且人们将要进行评判的也是这种质量。然而,在这里,我的倾向是"让研究发现为自己说话",或者最好请读者也看看 Charmaz(2005),或 Creswell(1998),Guba and Lincoln(1985),或 Hammersley(1987),或 Morse 等(et al. 2002),Silverman(2005),或 Wolcott(1994),或者任何其他研究者的著作,这取决于你所使用的方法。我还认识到,我不能逃避自己的责任,我应该提供一系列的标准,来评判在本书中所介绍的方法论基础上的研究发现的质量。我认为这些标准不应该适用于所有的质性研究方法,或者说甚至不适合其他扎根理论方法。对质性研究的质量进行评估非常困难,因为很多方面都取决于是谁在做这项研究、其目的是什么以及所使用的方法。下面是一系列可以用来评估研究发现"质量"的一般标准。这些标准来自很多渠道,包括本章前面提到的文献。很多标准与其他质性研究者提出来的都相似。

第一个标准是**合适**。研究发现与专业人士和参与者两者的经验都相符合/产生共鸣吗?前者是研究所指向的读者,后者参与了研究。即使并不是所有的细节都分参与者相符合,但他们能够在故事中看到他们自己吗?这会激起他们的"真实"感吗(Lomborg & Kirkevold, 2003)?他们除了从专业上对研究发现作出反应外还会从情感上作出反应吗?

第二个标准是研究发现的**可应用性或有用性**。研究是否提供了新的解释或洞见?可以用它们来发展政策、改变实践以及增

加专业的知识基础吗?

第三个标准是**概念**。概念对于形成共同理解以及专业人士在他们之间对话是必须的,因此人们会期待着研究发现要围绕着概念/主题来组织。如何呈现研究发现并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是,研究发现要有内容,或者说他们必须非常重要,而不仅仅是一堆没有解释的资料,让读者自己辨认出该赋予其什么意义。当然,应该从属性和维度上发展概念,让概念有密度和变化。

第四个标准是**概念的情境化**。没有情境的研究发现,用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就像没有果冻的果冻甜圈一样。我的意思是,没有情境的研究发现是不完整的。没有情境,读者不能充分理解事件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将某些意义而没有将其他意义赋予事件,或者为什么经验是这样一种方式而不是另外一种。设想一下,要想理解越战中战士们的经验,但却不了解导致战争或政治决策的历史因素会是什么样子,后者决定了战争该如何打。读者会觉得某些根本的东西从故事中丢失了。

第五个标准是**逻辑**。有一个逻辑顺畅的思想吗?研究发现"有意义"吗?或者在逻辑上有断裂或缺少连接的环节吗?这会让读者迷惑并觉得有些事情并不十分正确。是否澄清了为什么选择这样的方法论?这样读者在收集资料和做研究分析的时候就能够对它们的合适性进行判断。

第六个标准是**深度**。尽管概念为讨论提供了一种共同的语言,并赋予研究发现以组织结构,但正是描述性的细节增加了研究的丰富性和变化形式,并将研究发现从普通领域中提升出来。正是材料的深度使得研究发现不同,没有深度,研究发现则会浅薄、无趣,而有深度则研究发现在政策和实践中就大不一样,对其产生潜在的影响。

第七个标准是**变化形式**。研究发现中有变化形式吗?意思是,是否有不符合该模式的案例?或是否有显示出不同于某些属性或维度的案例?通过加入变化形式,研究者就会展示出人类生活的复杂性。安塞尔姆·施特劳斯坚信生活是很复杂的,任何研究都应该尽可能通过变化形式来扑捉生活的复杂性。

第八个标准是**创造性**。研究是以一种创造性和变革式的方式呈现的吗？研究者讲了什么新的东西了吗？或者以新的方式将就旧的思想组合到一起吗？没有人想听陈词滥调。并不是说题目必须是新的，而是要对题目提出新的理解。要做到这些，需要一贯地、创造性地及灵活性地而不是教条地运用操作程序。

第九个标准是**敏感性**。研究者表现出对参与者和对资料的敏感性了吗？推进资料收集的问题是通过分析提出来的吗？或概念和问题是在资料收集之前就提出来的吗？换句话说，是分析推进了研究还是说研究是由某些事先预想的思想或假设所推进？将这些思想或假设强加给资料？后者可能合适或不合适，这取决于研究者如何小心谨慎地将偏见放到一边，并诚实地在资料中努力寻找与他或她的假设相矛盾的材料。

第十个标准是**备忘录的证据**。最后，当然在最重要的标准中要往上排的，就是备忘录的证据。因为研究者不可能记得分析过程中出现的所有那些洞见、问题和深刻的思考，备忘录是所有这些程序中最需要的。随着研究的进展，备忘录在深度和抽象程度上应该发展。因此，在最后的报告中，应该有一些备忘录的证据或讨论。

评估研究质量的其他标准

要评估使用本书中介绍的研究方法构建的理论或描述性研究发现的“可靠性”，还需要其他一些标准。在评判研究的可靠性时，无论是研究的“实施者”还是“评论者”都应该能够对研究过程的某些构成要素作出评判。即使在专著中，它往往比文章要长，如果没有指明研究过程，读者就无法准确地判断资料是如何收集的或者如何进行分析的。为了弥补这一点，如果研究者提供下面给出的有关标准的各种信息将会非常有用。不需要太多的细节，即使在专著中，但是要充分提供某些合理的原因，让人们判断这一研究过程的合适性。下面将以问题的形式呈现这些标准。这些最初发表在科宾和施特劳斯（Corbin & Strauss，1990）的著

作中。

标准#1 最初的抽样是如何选出来的？后来的抽样又是如何进行的？

标准#2 哪些主要类属出现了？

标准#3 指向这些主要类属的一些事件、事情和/或行为（标识物）是什么？

标准#4 理论抽样是建立在什么类属的基础上？也就是说，理论原则如何指导资料收集？在进行理论抽样之后，这些类属如何证明就是资料的代表？

标准#5 在分析过程中对哪些关系进行了阐述？提出并检验这些关系的根据是什么？

标准#6 当关系的阐述不能解释资料中所发生的事情时有事例证明（反面案例）吗？这些不一致说明了什么？关系需要修改吗？

标准#7（如果可以）如何以及为什么选择该核心类属？作出最后的分析决策是基于什么样的理由？

标准#8 这些概念有系统的关系吗？要想有理论，必须要形成系统的概念并将这些概念联系起来，以形成对某种现象的理论解释。这里的关键词是理论解释。它不只是描述。你必须回答这样一些问题：它"为什么"或"如何"发生以及"什么时候"发生，然后是"它有可能"发生吗？联系可以作为一系列假设或命题来呈现。或者，通过文本以更加精细的形式将它们穿插交织在一起。如果研究者向读者澄清这些，那对读者可能很有帮助。

标准#9 是否将变化形式构筑到理论中？变化形式非常重要，因为它表明，一个概念已经在一些不同的条件下被检查过，并在一定范围中获得发展。有些质性研究只报告一个现象，且只将现象出现的一些条件确立起来；而且它们只具体说明表示其特征的一些行动/互动，以及一定量或范围的后果。通过比较，当使用该方法时，应该考虑将变化形式构筑到理论中。在发表的论文中，触及到的变化形式可能非常有限，但是作者至少应该指出，在其他形式的写作中有对它们的具体说明。

标准#10 将条件和后果都构筑到研究中并对其进行说明了吗？任何对变化形式的说明都应该包括它被发现的条件和一些行动/互动/情感反应的后果。条件不应该只是作为背景信息列在单独的一章中，而是和真正的分析交织在一起，说明它们是如何影响资料中的事件和行动。这些条件包括经济因素、组织政策、规章制度、社会运动、潮流、文化、社会价值、语言以及专业价值和标准，但却不限于这些。

标准#11 是否已经考虑了过程？找出研究过程非常重要，因为它让理论使用者能够解释变化条件下的行动。重要的不是用来解释过程的概念方案，而是要努力将它带到分析中。

标准#12 理论发现似乎显得很重要吗？重要到什么程度？完成一项理论研究，或任何研究，却仍然没有获得重要的发现，这完全有可能。如果研究者只是经历做研究的活动，而没有获得创造性或对资料形成洞察，那么该研究者就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危险：获得了一些无足轻重的研究发现。对于这一点，我的意思是，该研究没有提供新的知识，或没有提供新的洞见或解释。记住，研究者和资料之间有一个互动，但没有方法能够确保这种互动是创造性的。这取决于研究者的四个特征：分析的能力、理论敏感性、以不同方式思考资料的能力，以及充分的写作能力以传达研究发现。当然，创造性的互动还取决于收集资料和利用资料的质量。一个缺乏想象力的分析，在技术意义上，可能在扎根资料上能够说得过去，但是对理论研究的目的来说却不够。这是因为研究者既没有更加充分地利用资料来源，也没有能够进一步地收集资料。

标准#13 研究发现变成了相关的社会和专业群体之间讨论和交换思想的一部分了吗？研究发现具有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效应，但是，主要的概念通常会继续有用。例如污名、劳动分工、不确定性、压力和协商这样一些概念。这些概念通过时间证明它们的有用性，尽管与它们联系在一起的具体研究发现可能已经被修改并且随着时间而发生了变化。

最后的说明

读者应该记住关于评估标准的另外三个评论。第一,这些标准不应该被看作固定不变的评估规则,无论是对于研究者,还是对于那些打算评价别人的研究出版物的读者。标准是作为指导原则的。某些研究可能需要修改这些研究步骤和评估标准,以适合研究环境。富有创造力的研究者,如果他们正在全力以赴地应对一些非凡的或创造性的课题和分析性材料,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抛开标准的做研究和分析的方法。在这样不平常的案例中,研究者应该清楚地知道他或她为什么以及如何抛开传统做事情的方法,例如在写作中,然后让读者自己去判断研究发现的可靠性。

第二,研究者应该对他们的研究步骤提供一个简短的回顾,尤其是在较长的著述中。这将有助于读者判断分析的逻辑和研究过程的总体合适性或可靠性。这也会让读者更加了解,一种特定的研究与那些使用其他质性研究模式的研究有什么不同。在具体说明这些信息时,要让读者准确地知道用了哪些操作步骤,以及它们可能不合适的地方。换句话说,研究者应该发现并告诉读者该研究的优势和不可避免的局限。

第三,在某些出版的著述中,研究者对他或她自己的研究视角作一个简短的解释,并对研究过程作出回应,这可能非常有用。这让读者能够判断个人的反应可能如何影响研究以及施加于资料的解释。在研究过程中写反思备忘录是一种方式,它能够确保研究者在研究的最后能够做到这一点(Rodgers & Cowles, 1993)。

评估和计算机程序

我必须承认,当谈到使用计算机来分析,像阿加(Agar,1991)一样,我就成了一位计算机使用"忧虑的"支持者。之所以这样说,我的意思是使用计算机程序做分析会扼杀创造性,使得分析过程机械化,或者更糟糕的是像阿加(Agar,1991)以及菲尔丁和

李(Fielding & Lee,1998)所担心的那样,它将使用者引到这样一条路上:他们屈从于"技术决定论"或让计算机程序而不是分析者来建构研究分析。然而,当我环顾四周,看到计算机"大显身手(savvy)"十多年了,我知道这个时代已经开始承认计算机在未来质性研究中的位置了。计算机程序不仅对组织、存储及拖曳资料和备忘录有帮助,而且在评估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计算机当然增加了"方法论意识"(Seal, 2002, p. 108),因为研究者对自己的决策留有一个无可争议的记录。研究者面前的印象就像一面镜子,指示出逻辑上的瑕疵、未形成的类属以及不充分的概念。由于"资料"就是从那儿出来的,当还没有达到时研究者就不能假装已经达到了"饱和"或"概念密度"。计算机程序完美地留下了"审查轨迹(audit trail)"(借用 Guba & Lincoln, 1985 的术语),因为研究者的工作记录很容易获得,而且无须费多大努力就能够重构出来。

计算机程序不会思考,他们也不会撰写备忘录(只是存储备忘录),但尽管有这些局限,计算机程序能够提高分析的创造性,因为它们让研究可以先以一种方式尝试,然后再以另外一种方式尝试,这样来寻找其他的解释。戴伊说过,"计算机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有效地面对资料,更容易以不同的方式分析资料"(Dey, 1993, p. 227)。但我仍然担心注意力分散,得出乏味的研究发现以及使用计算机程序分析的各种可能的陷阱。然而,我发现我开始使用计算机程序的时间相当晚。那些很大年纪才开始使用计算机的研究者今天无疑可以很方便地创造性地使用计算机程序,以一种提高他们研究质量和可靠性的方式使用计算机程序。谁知道计算机程序未来会发生什么。要想了解更多关于在研究中使用计算机程序的讨论以及其他对此的观点,请参阅 Bong (2002), Bezeley and Richards (2000), Fielding and Lee (1991), Flick(2002, pp. 250-261), Kelle (1997), Roberts and Wilson (2002), 以及 Weitzman and Miles (1995)。

结束语

一位阅读本书稿的读者评论建议说,值得对越南战争继续进行研究,并将这些评估标准应用到这样的研究中。但这样说可能不公平,因为该研究的目的只是作为一个例子,而不是作为最终的产品。正如在第12章中提到的,在考虑结束研究之前,还有很多资料需要收集。还需要进行更为充分的类属,还有更多的变化形式可以构筑到文中,而且还有更多的其他概念探究。到目前,我并不满意于本研究的"质量"就是我作为研究者对自己的期待,尽管我认为我所得出的研究发现是"可靠的"。我想,如果本书的读者和学生对该研究进行评估并指出其不足将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因此,我建议将此作为学习活动之一。

要点总结

在质性研究中,质量常常是缺失的东西。当出现这样的情况时,通常是因为研究者没有受到很好的训练,过于匆忙,或者不知道如何判断他们自己和其他人研究的质量。本章探讨了"质量"这个概念,根据质量的特征以及达到的条件对其进行探讨。然后文章提出了一些标准,用来判断研究发现的"可靠性"或"可信性"。虽然我坚信,"质量"这个概念用到质性研究时应该认真对待,但这里呈现的这些标准仅仅是作为指南。我仍然认为,研究发现为它们自己"说话",而且当我们见到质量时我们自然会知道。我还发现,有些特殊的研究情况,它们要求用不同的方法做研究以及作为评判的标准。在这些情况下,重要的是,研究者要对这些特殊情况进行说明,为什么这么做以及做了什么,将对结果的判断留给读者。

思考、写作及小组讨论活动

1. 思考你阅读过的研究。选出一个你认为有“质量”的研究。该研究的什么特点让你这样想?
2. 你愿意将上面的研究描述为“可靠的”“有理的”或“可信的”吗? 为什么或为什么不?
3. 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小组,拿出一些本章列举出来的评估质量和可靠性的标准,然后将它们应用到本书中呈现的越战研究中。讨论该研究的优势和不足,为了更好地提高质量和可靠性,还需要做些什么。

15

学生的问题及回答

艺术家和作家可以呈现单个案例，忽视科学文献（甚至是通俗的文献），而且不必关心"真理"或"实在"，即使这些个案可能是构想出来的。研究者却没有这样的自由，他们不能逃避对参与者的责任，他们更期待着能被人们认真对待，能被认为他们是在"做"研究。再说一遍，研究没有捷径。（Morse，2004，p.888）

导　论

在撰写本书的修订版时，我提前跳到了这一章，想着也许这里的东西过时了。但我发现在这章中提出的问题仍然非常重要，这一章经受了时间的检验。本章最初的写作是用来回应学生在课堂上、在咨询过程中以及在听完报告后所提出来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关注点各有不同。学生感到困惑，因为某些程序或方法似乎不清楚，模棱两可，或者与那些更传统的研究方法相矛盾。还有学生想知道如何去应对导师、学位论文评议会成员以及朋友的批评。以下是一些经常被问到的问题及回答。将这一章被放在本书的最后，而不是开头，是因为本章对全书的很多主要观点进行了总结。

问题 1："我听说现在有一些非常好的计算机软件可以帮助分析。你知道关于这样的计算机软件吗？它们是如何使用的？"

回答：1962 年，一个名叫道格拉斯 · C. 恩格尔巴特（Douglas

C. Engelbart)的人被邀请为位于加利福尼亚州门罗公园斯坦福研究所的美国空军科学研究办公室写一份总结报告。最近,我在上网的时候,看到了该报告的副本。考虑到这篇报告完成的时间,我发现它十分吸引人,因为其中的内容很有前瞻性。仔细看看下面这段从这篇报告中摘取的文字:

> 如果你能够迅速而灵活地改变你的工作记录,你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整合你的新思想,从而可以更为持续地利用你的创造性。如果能够更容易的更新你的工作记录的任何部分,将思想或环境中的新发展吸纳进来,那么你会发现能更容易的在你做事的方式上整合更加复杂的程序。这可能会给你带来额外的负担,例如,保留并使用特殊的文件,这些文件的内容既有助于当前的工作又灵活地被当前的工作所利用——它们反过来让你能够设计并运用更加复杂的程序,从而在你的具体工作情境中更好地利用你的才能。(Engelbert, 1962, p.5)

恩格尔巴特(Engelbert,1962)在他的报告中所指出的是计算机增加人类心智的能力,其方法是在很多方面帮助人类处理大量琐碎和乏味的工作,从而让使用者空出时间进行创造和思考。而这就是目前计算机程序真正为质性分析所做的工作。它们让很多琐碎的事情——比如对资料的筛选和类属整理——变得更加容易,让研究者有了更多的时间去思考,这对做出“质性”分析是必需的。并不是说使用计算机程序对于作出“好的”质性分析是必不可少的。大多数在我们各自领域中耳熟能详的经典质性研究都不是使用计算机程序完成的。安塞尔姆·施特劳斯使用过各种各样的计算机程序,尤其是 ATLAS/ti 和 Nvivo (它那时候叫 Nudist),因为他发现它们很有意思。然而,当他开始真正做研究的时候,他用计算机去写东西,或是整理备忘录,但是从来不会真正作为分析的一部分。我相信,如果安塞尔姆生活在今天,情形可能会不一样。他会利用计算机程序分析资料,并会用它们来增强他那已经丰富的和创造性的思维。

注意,恩格尔巴特并不是说计算机为使用者思考。很不幸,计算机的能力还没有达到这一步。即使是最复杂精致的质性分析软件程序也只能执行使用者的命令。不过,它们所能做的工作有很多。但是在我讨论计算机软件能够为研究者做什么事情之前,让我先提出一个忠告。新手研究者在他们的分析过程中往往非常小心。他们不相信自己或者不相信研究过程,因此他们往往死死抓住方法步骤或者软件程序当作救生索。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有些质性研究者不情愿去使用,或不愿让他们的学生去使用计算机程序的原因。他们担心学生将会把注意力集中在软件程序上,以至于无法自主思考。

然而,我相信,计算机辅助质性资料分析在未来将会成为质性资料分析领域中的标准做法。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当今很多质性研究者,当然也有很多下一代质性研究者,将会或者已经在使用计算机程序去增强他们的心智上和身体上的能力。用作分析的软件程序将成为他们自我的另一个延伸。我只能想象一下未来计算机软件在资料分析上的能力。但就现在来说,让我为你们评述一下它们是如何使用的。

从我的视角看,计算机软件对质性资料分析(QDA)的一些最重要的贡献有下面这些。它们能够提高研究者的创造性,因为研究者能够尝试不同轴向地看待资料,首先"这样"然后再"那样"看待其中的关系,无须花很多时间检索和组织资料。研究者在进行思考的时候,计算机完成了检索和布局安排资料的工作。随着计算机软件的使用,研究者总是能够追溯他或她的分析步骤,从而使研究过程对自己和他人来说都是透明的,让审查跟踪(audit trail)变得了如指掌。同样,研究者也不必猜测他或她几个月前思考了或在备忘录中写下了什么。在需要的时候,就可以从资料库中将它们拿出来,让分析更加前后一致,让研究发现更加可靠。研究者不必再提问,我已经使用了这个编码了吗?如果用过了,是如何使用的?研究者所要做的就是查看一下编码清单,回到原始资料和任何为该主题而写作的备忘录。想要绘制一个图表?小菜一碟,只要打开程序的绘图部分就行了。从我的立场看,最

重要的是当开始着手研究写作的时候计算机程序所具有的价值。它让你很容易就找到编码，回到原始资料去使用例子或找到引用的材料，检索备忘录，绘制图表，纠正错误，发现逻辑上的缺陷，而且最重要的是方便改写。

有些程序更加复杂老练。有些使用起来更加困难。我的建议有以下这些。尝试不同的程序。很多程序都可以通过英特网下载获得有限使用权。找到最适合你操作的程序。但要记住，你不要过分关注学习和使用软件程序，以至于研究在这个过程中变成了次要的或迷失了方向。要挑战的应该是做研究，而不是学习软件程序你也不要让计算机程序来指导研究。我这么说的意思是，你会很容易落入由计算机程序界定的条条框框，从而让程序主导研究过程，而不能做到由研究者灵活地使用程序，将其看作是自我的延伸，来帮助存储、检索、组织和重新组织关于资料的思想。分析关乎思考，而思考恰恰是计算机做不到的事情。*

问题 2：斯蒂芬，一位和众多心理学家一起工作的人类学家说："他们不断地询问，'数据（numbers）在哪儿？'"这也是一个经常被论文委员会成员提问的问题，而且多为量化研究者所提问。

回答：虽然有一些质性研究者确实会量化他们的资料，一般来说，质性研究者并不是十分关注数据，他们更多的关心对过程和社会机制的发现。质性研究者努力寻找有重要意义的概念并探究它们的关系。和假设检验相比，他们对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更感兴趣。如果委员会成员坚持使用数据，学生可以通过放入一些相关的测量工具，为研究增加一个量化部分。这样做能够满足委员会成员的要求，而且常常会提供其他有趣的发现。

问题 3："分析的焦点如果不是数据，那是什么呢？"

回答：这个问题是"你的数据在哪里？"这一提问的一个变种。怀疑论者认为，除非你使用统计学式的抽样和分析，否则你无法

---

* 我要感谢来自 VERBI Software 的安妮·库尔茨（Anne Kuckartz），感谢她为对问题 1 的回答提供的帮助和支持，而且还要感谢她协助在本书中增加了计算机的部分。

得出结论。对我们而言,分析的单元就是概念。正如在第7章中说明的,我们设计的抽样程序是探究概念如何沿着一定维度范围而变化,而不是用来测量人们沿着概念的某个维度分布的。因此,研究者从各地方和/或人们及/或事情那里收集资料,他们希望那里有可能的变化形式,因为他们要最大化地理解概念。例如,在本书中呈现的越战研究中,在对参与者#1,一位将自己在越战中的体验描述为“不太糟糕”的“非战斗人员”的资料进行分析之后,我提出了对“体验”“不太糟糕”这个维度的描述。我又出去寻找“战斗人员”的抽样,甚至同一战争中其他护士“非战斗人员”,来看看他们如何描述他们的体验。我要寻找的正是该“体验”的变化形式,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都是资料的来源。在概念基础上进行抽样的能力非常重要,因为它为研究者提供了弹性,从而顺着分析的引导,而且与此同时,将变化形式和密度(density)构筑到他们的研究发现中。

随后,如果研究者想要通过群组分析、建立联系或某种其他类型的复杂统计分析,来检验他们研究发现的某些方面,他们可以这样做。记住,做质性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发现,而不是验证假设。在研究的开始,分析者不知道哪个变量重要或它们的属性是什么,或它们在维度上有什么变化。因此,是通过概念来指导抽样,是概念而不是数据告诉我们关于现象是什么,数据往往只是确定现象的数量。

问题4:“我们可以使用已经收集好的资料吗?我们必须对所有的资料进行编码吗?我们应该随机抽样吗?还有其他的抽样方法吗?”学生常常提出这些问题,因为他们(以及其他研究者)在来到研讨班之前或开始他们的分析之前已经收集了资料。有时候,他们担心的是,“我必须一直收集资料,从而避免违反了理论抽样的程序?因为理论抽样认为资料收集和分析的程序交织在一起。”还有的时候,他们的担心是,“我如何处理这么多材料,尤其是当我的时间非常有限时?”

回答: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如下。从本质上说,分析已有的

资料与做二次分析没有什么两样，都是依赖于自己或其他人的分析——也许收集资料时间长了。而且，与已有资料相关的问题，和那些发现大量储存的档案材料或回忆录的人所面对的那些问题非常相似，他们都想对它们进行分析。也许主要的差异在于，对于个人已有的材料，研究者对他们比较熟悉。

研究者应该走进已有的资料、二手或档案材料、回忆录，就像要走进他们自己的资料一样。要处理这样的资料，从本质上来说，研究者像往常一样开始，并检查最早的访谈记录、田野笔记或重要事件的档案。一开始，他们可以快速地浏览一下资料，找到让他们感兴趣的途径，然后开始小心地进行最初的编码。类似地，既然已经在概念的基础上进行了抽样，研究者可以从理论上对已有的资料进行抽样，整理访谈记录、观察或录像，来寻找相关概念的例子并对它们进行分析。有时候，一些分析上的问题会和已经收集的资料或二手资料一起出现，例如，当研究者想要类属饱和，或在属性和维度中发现变化形式，他们会发现，令他们沮丧的是，没有足够的资料或完整的资料。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分析者必须要么回到田野去收集其他的资料，要么在理论中留下缺口。

作为对第二个问题的回应，我们的回答是，“不，并不是所有的资料都必须要‘从微观上’进行分析。”然而，正如本书前面所讲的，在研究的早期阶段，仔细查阅资料是必要的，以建构深厚的描述和严谨的整合性理论。通常，微观分析是专门针对早期访谈资料或观察资料的，目的是描述类属，并通过进一步的资料收集和分析，对类属进行补充、关联、延伸和检验。在研究早期阶段，集中编码是必须要做的事情。一旦建立了分析性故事的基础，研究者在自己的研究方向上就会更加轻松。

根据本书第7章所列出的各种理由，随机抽样只能适合于量化研究，而不适合质性研究。正如前面所阐述的，质性研究者并没有要控制变量，其目的是要发现变量。他们想要寻找、界定并揭示概念如何在属性和维度上出现变化及其原因。因此，虽然随机抽样是可能的，但它可能不利于研究，因为它妨碍了分析者，从

而使他或她无法循着分析的引导去发现自己想要寻求的答案。

至于其他类型的抽样，在几乎所有的质性研究中，最初的资料都是通过各种各样的程序收集的——利用机会观察、使用“滚雪球抽样”、建立关系网络，等等。幸运的观察者是这样一些人，他们不断地接近现场，他们知道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可以找到相关的情景，让他们能够扩展并阐明他们的概念。有时候，在寻找概念如何变化的案例时，研究者并不知道去找什么人或去什么地方。相反，他们根据“直觉（sensible logic）”或“方便（convenience）”来进行抽样，希望有机会发现变化形式。变化形式几乎总是存在，因为没有哪两个部门、情景或时间是完全一样的。每个情景都有呈现现象不同特点的可能。研究者实施的访谈或观察越多，就越有可能在资料中发现概念的变化形式。

问题5：瓦莱丽（Valerie）和斯蒂芬（Stephen）（一位心理学家和一位人类学家）说：“心理学家们接受的训练是从脑海中提出‘小理论（mini theories）’，然后检验是否可行。”这与你做研究的方式正好相反。

回答：这些“小理论”本质上是理论假设，它们可能有点儿建立在心理学家的经历和阅读的基础上。然而，这些假设并非来自于对资料的系统分析，并在研究过程中得到确证。从实践的立场看，这些小理论有其优点，尤其是对于那些需要利用知识来处理困难情况的实践者。当然，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小理论是如何获得的。如果缺乏扎实的根据，它们可能会引向错误的方向。

问题6：“质性研究者做很多的描述或从访谈记录和田野笔记中大量援引描述性内容吗？有些研究报告的特点是更多的是引用而不是分析。”

回答：在有些研究者和有些学科当中，似乎有一种趋势，他们做得分析很少，而引用却很多，将解释留给了读者。这都取决于他们使用的方法和研究者的哲学取向。本书采取的立场是，虽然引用会使研究读起来非常吸引人，但它并没有为读者提供任何的理解那些文本的框架。它也没有说明为什么研究者选择了某些

材料而不是其他材料，也没有说明研究者在材料背后想要传达的观念上的启示或认识。有人说，引用确实增加了趣味并为读者的怀疑提供了证据，因此整个研究报告中有一点很好的引用材料非常重要。例如，施特劳斯等人在他们的《精神病学的意识形态与精神病院》(Strauss et al. ,1964, pp. 228-261)一书中，呈现了一些材料，瞄准了在精神病医院中工作的精神病学助手的信念。这些材料突出的一个重点是这些助手，他们虽然没有接受过精神病学原理的教育，但是他们认为自己对病人"做得正确"。这些助手承认护士和医生的工作是专业性的，但是有时候认为，对特定的病人，他们比那些有着完整精神病学意识形态的专业人士们要做得更好。为了说服可能存在怀疑的读者，作者从这些助手的访谈记录中引用了大量的内容。但是，这些作者通常的做法是在描述和引用与概念化解释之间做个平衡。不同的质性研究者会以不同的方式处理引用的问题，我们建议学生多阅读一些专著和论文，了解不同的变化形式。

问题 7：克里斯托弗(Krystof)问："我在日本一家工厂做了一项组织研究。一位同事问我，'你只研究了这一家工厂，你如何将其推广到所有其他的日本工厂呢？'"

回答：这个问题的回答十分复杂。确实，你不可能从一家工厂推广到所有的工厂。但一般化并不是质性研究的目的。质性研究背后的思想是获得有关某些现象的理解，研究者通过研究一家工厂或组织能够了解一个现象的很多东西。记住，作为研究者，我们分析资料是为了得到概念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在这一个案例中，概念的表现形式可能被发现上百次。例如，在对医院工作的研究中，科宾和施特劳斯发现了"工作流程"这个重要的概念。他们提出的问题是，"是什么使得工作'流动'起来，是什么使得工作在日常基础上继续运转，当工作被打断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为什么？"通过对一个组织的研究，关于工作流程有很多需要研究的东西。但是，不可能通过一个案例(个人、家庭、工厂、组织、社区、民族)了解关于流程的所有方面。建立在单个案例基础

上的解释是有局限性的,需要进一步研究其他组织,从而更为详细的阐明这个概念。通过具体说明情境(特定现象[概念]位于其中的一系列条件),我们所能说明的是,这就是为何该工作在这里持续进行。如果类似的条件在你们的组织中也存在,那么也许我们对工作流程帮助你理解你的组织中所发生的事情,或者至少能够激发你对工作流程这个概念的思考,只要它存在于你正在研究的组织。

因此,如果有人问研究者,"这一个案例能够代表所有的案例吗?"在"代表(representative)"这个词的传统意义上,回答可能是"不能"。但是,如果这个人要是问,"我们是否能够从这个案例中学到某些东西,让我们能够对工作流程如何运行以及为什么这样运行获得某些洞见和理解,或者让工作流程在其他组织中继续?"那么,回答可以是"是的",因为工作流程的概念应该适用于很多组织,尽管具体特征可能不一样。

问题 8:"如果我在外国收集资料,我是否应该将我的访谈记录转变为英语,从而对其进行编码,或者说我是否应该用原初语言(当然假如我就说这种语言)对其进行编码?"通常给出的理由是,翻译要花费"太多"的时间。这是国外来的博士生经常提出的问题,他们常常被他们的论文委员会成员逼着要将他们的访谈记录翻译为英语。

回答:有好几个理由,只要做最少的翻译。做一点儿翻译的主要原因是,让说英语的读者至少能够对受访者所说的和所想的有一定程度的感觉/洞察,以及了解编码是怎么回事。另一方面,在翻译中把握细微的意义还是相当困难的。我们很少有人受过专门的训练或天生就有这样的能力能够克服这些困难,尤其对于较长的段落。外国学生反映他们在用英语编码上还有其他困难。其中一个困难是,经常找不到一个相应的英语能够把握原来语言中词语的细微意义。援引伊娃·霍夫曼(Eva Hoffman,1989)的话,"意义在翻译中丢失"。要是在其他国家而不是在资料收集的国家(语言不同)作报告或出版,可以将关键段落和它们的编码翻

译过来,尽可能接近原初的意思。然而,一般来说,要想翻译所有的研究材料,太多宝贵的时间和有价值的意义就会丢失。而且,在翻译中,很多原初的细微意义可能会丢失。

当与国外学生一起做研究时,我会要求他们翻译一些段落,否则我就无法研究那些资料。然而,我们会对汇报的学生进行提问,他们提供的词语或短语是否真的接近受访者的意图。通常,经过一些讨论之后,对词语的意义就会达到一种理解。换句话说,在研讨班或研讨会上,还有其他机会去探究所翻译意义的参数(parameters),避免将局外人的解释强加给资料。自然,当开始撰写研究的时候,一些引用的内容必须要翻译为出版(发表)的语言。例如,这可以参考 Saiki-Craighill(2001a & 2001b)。

问题 9:"在非工业化社会或者在工业化的非欧洲文化中做质性研究有什么特殊的问题吗?毕竟,该方法很多重点都是放在细致的语言分析上。"

回答: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棘手的议题,而且当然值得认真思考。一般来说,当质性研究者想要理解行为、事件和事物的意义而这些在本质上又都有着深厚的"文化"特征时,他们确实面临着同样的困难。对于生活在西方国家的人,当他们将外国人的行为和语言与美国人的进行对比时,误解外国人或只是部分理解他们是很常见的事情。正如人类学家已经告诉我们的,为了避免这样的误解,研究者必须要在国外研究现场待上相当长的时间(有人说很长时间),并参与到大量的观察和对话(非正式的访谈)中。而且,研究者必须至少理解语言的一些内容,除此之外还要审查他们自己经常建立在文化基础上的假设。即使听了这些建议,人类学家也不能保证误解(有时候是严重的误解)就不会出现。

然而,如果外国学生在这里进行研究,却希望在他们自己的国家收集资料,那么当然最好是能够使用这样的或其他的质性研究方法。其他国家并没有"借用"来自其他文化的理论,但是形成了他们自己的理论,反映他们的社会文化和行为的理论,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而且,一个常犯的错误是,将在一个社会中形成

的理论过分地强加给另外一个社会。即使文化差异很小,但依然存在。强加的理论可能听起来很好,但是如果不能就其合适性进行评估,它们可能会产生误导。

至于研究程序的运用,没有理由说明本书中介绍的程序为什么不能用于分析在其他国家收集的资料。毕竟,当研究美国少数民族时这些程序起作用,那么其他的"亚文化(subcultural)"群体像"朋克(punks)"和"吸毒者(junkies)",他们的文化意义和行为通常和一般的文化都不一样。正如一个例子所说明的,一个美国学生研究了苏语印第安人(Sioux Indians)中的健康概念,他在其居住地与他们共同生活,并作为一名公共健康工作者预先在那儿工作了好几年。她最终得出的结论是,那些已经研究了这些人的人类学家并没有准确地抓住苏语人(Sioux)的世界观如何影响他们的健康和医疗概念——他们的观念与一般的西方人有很大差异。

问题 10:克里斯托弗(Krystof),一位来自波兰访学的社会学家,有一大堆已经收集好的资料。他问,"研究者如何处理如此之多的资料?"

回答:这个问题的回答类似于上面给出的关于收集资料的回应。设想一个学生正在研究一个商业组织,尽管严重的萧条,它依然繁荣,学生想要知道该组织如何实现这样的成绩,也就是说他们作出决策的基础、指导他们执行行动的愿景、他们的激励方法等分别是什么。资料可能只有组织文件,但是量却很大。首先,分析者应该选择一些文件,让自己熟悉这些文件的内容,就把它们看作是访谈记录一样。然后,当分析者对文件所包含的信息类型有了一定的理解,他或她就可以开始集中进行编码了。有了一开始的概念清单,分析者就可以再对后面的文件进行编码,并对每一个文件进行分析,就当它们是不断收集进来的资料。并不是每块资料都要分析。当类属达到饱和,研究者就可以快速浏览剩下的材料,看看他们对研究发现能够贡献什么新的观念。

问题 11:"可以加速或缩短分析过程吗? 而且,很多实践者和

专业人员都没有时间可以用来发展理论,但他们却想做出好的研究,他们该怎么办呢?"

回答:如前面所述,做质性研究分析没有任何捷径。研究者必须要经历这个过程(因为这关系到自己选择的方法),如果他或她想要做出深厚的描述或发展整合完备的理论。研究者可以选择不去提出充分的类属或寻找情境。研究者可以选择不写备忘录等。这都是一个时间、经费和训练的问题。然而,研究发现都会反映这些,研究者应该准备好接受这些局限。

虽然很多出版物声称使用了如扎根理论这样的方法,但事实上,有些研究者所做的就是在操作程序中挑选一些最符合他们研究目的的操作。他们可能利用持继比较但却不完全采用。有时候他们使用某种分析程序,但却把它们和其他一些质性研究方法嫁接在一起。我们在前面关于评价的章节中阐述过该问题,我们建议读者回到这一章,进一步看看到底是什么构成了质性研究的质量。如果研究者寻找类属(主题),但却不想详细地从它们的属性、维度、变化形式或关系上形成类属,那么研究发现就会"浅薄",也许不能提供多少信息,可能不会为专业领域增加多少新知识。如果研究者选择零星地只用一种方法,那么他或她就不可能声称在使用这种方法,他或她很可能会失去一致遵循一种方法所提供的某些可靠性。

问题 12:"你能谈谈质性研究中包含的相关工作问题吗? 比如工作量、工作类型等。"

回答:首先是收集资料的工作。资料可以由项目负责人或研究助手收集,或者通过付费的方式请专门的人来收集。然后是分析资料的工作,不过我们还是希望从正面意义上来看待分析工作。分析确实耗费精力,是一个费时间的事情,但它也非常有趣而且很有回报。使用本方法的研究者应该给自己留有相当多的时间,特别是如果研究者在访谈本身的工作以及分析资料之外还要做访谈的转录工作。如果转录工作由别人来做,那么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工作量。如果研究者在资料收集或分析中遇到

困难,可想而知会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毫无疑问,工作量和工作类型的背后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研究者的最终目的。如果研究者的目的是厚重的概念化理论,那么这要比描述性研究要做更多的分析工作。然而,做深厚的描述也可能是非常复杂而且耗费时间的。

另外一个问题是涉及什么类型的工作。如果已经仔细地阅读了本书,那么研究者就会知道,在资料收集和分析中涉及很多形式的工作。有资料收集的工作(有各种潜在的困难);还有访谈录音,也许还有转录工作(甚至翻译),然后还有编码工作。当所有这些都最终完成之后,还有撰写论文或著书以及作讲座报告的工作。在研究开始之前,有撰写项目申请书的工作、获得人类被试委员会的同意等工作。总之,做理论建构的研究和其他形式的质性研究之间,或者与其他任何形式的研究之间的唯一重大区别就是在编码过程中要投入大量的工作。计算机能够帮助编码,但仍然需要分析者投入大量的工作。

除了细致的技巧,还涉及这种类型的工作需要什么样的资源的问题。实际上,除了笔记本、电话、录音机和录音带、计算机或打字机,这些质性研究常用的设备之外,不需要其他的东西。有时候需要一些钱做路费以及偶尔给受访者报酬。有好的研究型图书馆也会很有帮助,甚至是必备条件之一,但有了计算机,这些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资源还包括要有一个或几位可以咨询的人或能够提供帮助的朋友。如果你幸运的话,在你的资源库中还要包括一个必不可少的支持你的配偶或重要的他人。

问题 13:“日常生活的解释与我们的理论解释有什么关系?”

回答:正如我们在其他地方说过的,你必须仔细倾听各种各样的行动者所说的。他们的词语和表达方式提供了鲜活的概念、赋予意义并提供解释。而且,日常生活的解释常常揭示了行动者的认知、意识形态和无意识的假设。因此记下这些,尊重他们的原意,将行动者的解释整合到你自己的诠释中去。

问题 14:“如果你已经接受了精神分析理论或其他一些学科

方法的训练,你该如何将其整合到质性分析中去?”

回答:目前的质性分析的方法和程序能够并且已经被很多在不同学科受过训练并带着各自理论取向的人所使用。这些学科理论所做的是倾向于将分析聚焦到某些问题,同时为资料的解释提供了一个视角。例如,一个接受过弗洛伊德学派训练的人可能更加关注隐藏的动机和深层心理意义,而一个组织社会学家对社会组织过程和结构更感兴趣。重要的是,要意识到视角影响了诠释。使用质性研究方法的研究者感兴趣的是新的发现和揭示新的理解。如果研究者不能“在盒子外”进行思考,要想达到新的理解可能就会遇到阻碍。本书中呈现的步骤是用来帮助研究者以不同的方式对资料进行思考,但这并不能保证一定能做到。这取决于研究者如何使用它们以及如何明智地运用它们。一旦分析完成,就可以回过头来将研究发现与文献联系起来,前提是研究者要说明研究发现在哪些地方与文献相同,哪些地方与文献不一样。

更具体地说,该方法论的一个基本原则是要与问题相关。已有理论的所有假设都要面对可能的怀疑,因此必须根据你的资料对它们进行审查。在审查过程中,你可以质疑和认可,以及印证你吸纳的被普通接受的理论。概念必须“依靠自己赢得机会”进入研究,而不是盲目地接受并强加给资料。(“被普通接受的”理论对某些资料可能特别合适,但不一定适用于你的资料)总之,精神分析理论或任何其他理论必须要通过“扎根(grounding)”检验。

问题 15:“需要多少访谈和观察就足够了? 什么时候我可以停止收集资料?”

回答:这些都是所有使用质性研究方法的研究者经常提出的问题。对于大多数建构理论的研究者和用收集的资料来进行丰富厚重的描述的人,安全的做法是交代清楚,研究者持续收集和分析资料,“直到出现理论饱和”。

然而,总会有时间、精力、参与者的可得性以及其他影响资料收集的条件等方面的限制。这些会给收集多少资料和什么类型

的资料带来局限。但是,研究者必须记住,如果在理论饱和之前停止资料收集,研究发现可能会显得浅薄,故事线索也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有时候研究者没选择,但必须要有准备接受一个没有达到理想的成熟状态的理论模型。

问题 16:“该方法与案例分析有什么异同之处?”

回答:这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对它的回答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你的“案例”及其分析是什么意思。《什么是案例》(Ragin & Becker, 1992)这本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反思。两位社会学作者对很多受人尊重的同行进行提问,讨论他们如何在自己的研究中使用案例。无论是这些案例的性质还是它们分析的方式都有很大的差异。通常,当一个人说到案例时,人们将其解释成是对单个人或群体进行的深入研究。它们常常以一个叙述的生活故事、职业生涯或个人危机处理的形式呈现。稍微思考一下我们就会知道,案例也可以是对商业组织、非洲村庄或公共庆典的研究。研究者无论是分析单个组织还是多个组织,如果使用该方法的话,分析过程是一样的。研究者希望从理论上进行抽样,并继续抽样,一直到类属饱和为止。

问题 17:“使用‘基本的社会/心理过程’是唯一的整合研究的方法吗? 我注意到有些研究者似乎就是这么认为的。”

回答:通常,当人们这么说的时候,他们的意思是研究发现是围绕着某个概念进行整合,并根据这一概念的发展步骤或阶段进行解释说明。不,使用基本的社会/心理过程并不是唯一整合资料以建构理论的途径。该假设[当然不是在巴尼·格拉泽(Glaser,1978)的基本社会过程的讨论中提出来的]代表了一种对现象复杂性的严重低估,这些现象很可能在任何研究中都会遇到。该假设还妨碍了本方法论潜在的灵活性,限制了整合分析的策略。在每一个研究中,研究者都会发现过程,但是过程不应该局限于步骤和阶段。而且它也不应该限制在基本的社会/心理过程,除非“社会过程”这个术语也包括家庭的、组织的、竞争的、政治的、教育的、合法的、社区的过程,以及/或者与研究有关的任何

过程。总之,研究者可以对基本的社会/心理过程使用编码,但要围绕步骤或阶段或者社会/心理过程的观念来组织每一项研究就限制了该方法的应用。

问题 18:“你强调说你的方法既是归纳的又是演绎的,然而我经常在文献中看到人们总体上或基本上将其看作是归纳的。有时候人们的看法是赞赏的,有时候则是批评的。你如何看待?”

回答:再说一次,这是一种误解。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由于对《发现扎根理论》(Glaser & Strauss, 1967)一书的误读。格拉泽和施特劳斯强调归纳方法是因为他们攻击“未扎根的”或推测性的理论。目的是将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到将理论的获得根植于系统的资料分析中的不可值量的价值。然而,该书也强调了资料与研究者的互动。由于没有哪个研究者带着完全空白的脑袋进入分析过程,所以解释是演绎的结果或者是研究者对资料之意涵的抽象。就研究发现来自资料这个意义来说,这种方法是归纳的。但由于概念对概念之间的关系的表述都是解释性的,也就是说是分析者从资料中建构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它又是演绎的。

问题 19:“我完全淹没在访谈中。非常不幸的是,我阻挡不住这样的洪水。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过会陷入这样的情况,无法阻挡访谈的洪流。我对访谈和信息感到如此厌烦,以至于我甚至想不出新的访谈问题。更为糟糕的是,在访谈的时候,我都不能按照步骤进行分析。我该怎么办呢?”

回答:你的困境和大多数采访者的处境完全一样,他们推迟资料分析,直到大多数资料被收集上来。这种情况正说明了为什么资料收集应该由分析来指导。因此,这时候最好的办法是停止访谈,开始分析,拿起电话和受访者约好将访谈时间往后推。你后面还需要这些人来填满类属并检验发展中的理论。

问题 20:你能告诉我这本书里介绍的研究方法与其他方法,如与自传民族志之间的区别吗?

回答:我说不出有多少区别,因为我必须承认在其他方法上我并不是一个专家。我认为对于新手质性研究者最重要的是要

知道，每一种方法都有其自身的理论基础、研究目的，以及收集和分析资料的程序。用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都可以做出有质量的质性研究，只要研究者忠实地对待所使用的方法。对于想要做质性研究的新手研究者，我的建议是，在开始一项研究之前，应该研究一下各种不同的方法。不同的研究者会喜欢不同的研究方法。我可能不会喜欢做自传民族志研究，因为两个理由。我怀疑我是否能够无偏见地分析有关我自己的资料。第二，我对大量地揭示我自己感到不舒服。我能够在匿名的访谈中谈论我自己，但是却不会在一本专著中揭示我自己。我有着太强烈的自我意识。这正是我的个人偏见，每一个研究者必须要明确他或她喜欢什么。

要点总结

就此结束我们的问题与回答这一章。但是毫无疑问，还有更多问题可以提出来的。本章也对这本书进行总结，因此，还有几句忠告我想在结束之前传达给我们的读者。我们给读者的建议是，担心分析的每一个细微方面是不必要的。有时候，研究者必须运用常识，而不要陷入哪种方法是对是错的担忧当中。重要的是要相信自己和研究过程。保持和本书中指出的一般性原则相一致，并根据自己的能力和研究的实际灵活地使用这些步骤和方法。

思考、写作及小组讨论活动

1. 阅读本书之后，想想你有哪些问题要问。
2. 将它们写下来，然后把它们带到小组中。
3. 通过小组讨论，对这些问题进行回答。毫无疑问，对于答案是否合适，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这很好，因为可能会有不止一种答案的可能。要富有创造性、灵活性，最重要的是，要愿意将你的想法表达出来，这样其他人就可以对它们作出回应。

附录A

第4章和第6章的练习

田野笔记

传记研究

这些访谈笔记代表的只是长长访谈记录的其中几页，目的是补充在第4章和第6章结尾呈现的活动。研究的题目是："一个威胁生命的心脏病事件的传记性影响（the biographical impact of a life-threatening cardiac event）"。

这个人因为胸痛进了急症室，胸痛扩散到她的手臂。

"事件"发生的时候，她在外面修剪她的玫瑰花。

R = 研究者

P = 参与者

研究人员：J. C.

R：现在回忆一下，任何时候，当你经历这个过程[放置一个支架到两个阻塞的血管中]的时候，你会担心死去或者会出什么错吗？或者你只是相信医护人员能够完全处理好这事？

P：在经历这些程序的时候，我担心我会死在手术台上。我记得是这么想的。我最好别死在这里。但因为某种原因，我即将要死的想法从来没有真正进入意识。我只能在心里想着这事。我一直在做着噩梦以及类似的事情。但这却非常有趣，无法拒绝。我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这像我的妹妹，她并没有真正想过她的心脏病会发作。她想她确实患有——她仍然将其看作是她的事情。她并不说她患有心脏病。这就像我看待发生在我身上这件事情一样，它并非真正的心脏病发作，它只是有点儿紧缩，而且还没有等它们[紧缩血管]做任何事之前，它们将其打开了。

现在,事实是所有人都死了。我[首先]住进医院的唯一理由是,因为我知道我的妈妈有3次心肌梗死(MIs),我的妹妹只有肘部痛苦,我的婶婶——家里的所有人都有这些疾病,但是他们甚至都不知道他们有这些疾病。所以我想,嗯,我不想成为连自己的疾病都不知情的人。如果有一些变化出现,至少我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我知道,威胁在那儿,但是它并没有让我感觉我就要死了。我一直将其放在心里,放在心里并努力让它为我服务。因为如果我不能使它为我服务,我就会死,情况就是这样。

就像X医生所说的,她说,嗯,如果你不作任何改变,那么同样地事情将再次发生。就这么简单。她是对的。事情会发生的。我有很多其他血管将要闭塞,有一个可能血小板都没有了。但[如果]我早死的话,我将成为家族里早死的成员之一。我正在努力阻止它,即使它还没有内化,似乎不是这样的方式。我知道我必须要采取措施改变我的生活,否则我就会死掉。

R:关于心脏病的一个有趣的事情是,你看不到任何东西。所以,你很难将其纳入到你的存在。外表看不出任何东西。

P:外表看没有什么不同。你知道,这很有意思。但是现在却是个噩梦。我在想——而且我知道它是什么。我知道那里有一个这样的小支架,这样一个小的钢丝支架。但我不知道我是否只是一知半解或胡思乱想,我觉得它变松了。他们没有做什么,但是它变松了,或者它跑到边上去了,挡住了动脉,因此我醒来吓坏了,想着它可能会阻塞动脉。你说得对,这是你看不到东西,这是历史。甚至我对在医院经历的抱怨也并没那么糟。当我回到家的时候,我要让你知道,你一直在想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有什么事情出现吗?我想,也许是疼痛,或许就是疼痛。当我找到我的硝化甘油时,疼痛就消失了。我明白了,当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就有类似哮喘的毛病。现在,当我再回过头来看,我不知道那是否是哮喘,还是某种焦虑。因为我从来没有患过哮喘。他们给了我沙丁胺醇。当我到家的时候正咳嗽,所以我就吃了些沙丁胺醇,于是,出现了过早的心肌收缩。当时我还是很害怕。所以我打电话给医生,他们告诉我要停止服用沙丁胺醇,并让我服用了地尔硫卓(cardizam),降低我的心跳和消除过敏,我照着他说的做了,这样症状消失了,然后我接着服用氟替卡

松:这是一个可的松类型的药物。他们不希望我再服用沙丁胺醇了。最后这个滑稽的心脏支架不动了。我服用了一周左右的氟替卡松,然后我不想服用它了。我知道,这是他们让我服用的最少剂量。我的意思是它只是在局部,它根本不会进入你的所有器官。但在我看来,当你依赖可的松制剂时,我想你是治不好的,我希望这些支架能够起到治疗作用,因为我将只依赖血液稀释剂维持一个月,我想确保在这段时间进行治疗。

所以无论如何我尽量避免服用氟替卡松,但我不得不服用,我无法呼吸。我咳嗽,咳嗽,再咳嗽。我服用了大概一个星期,一天两板(puffs),然后咳嗽停止了。我把药物减少到一天一板,然后我完全停止服用。自那之后我就没有出过症状。但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哮喘或焦虑发作,因为当我回家的时候,咳嗽非常严重。我坐在那里,不停地咳嗽,我几乎不能呼吸,而且咳嗽得认不出人了。我注意到,我在这里坐了整整一个星期,你会想我可能在花园里度过我的大部分时间。通常情况下,我在我的空闲时间就出去到花园里随便做点儿事情。但我没有做。我还没有修剪完在围栏上的玫瑰,因为我一个人在家,我很害怕。我打算告诉你,我打电话给医生,让他改变处方用氟替卡松代替其他药物,他问我是不是一直有胸口痛。我说,这里有点小刺痛,但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当我发现硝化甘油的时候……他说,等一下。我不介意你吃什么药。他是这样一种人,我想,哦,可以。他是够严肃的,他说,不管这是什么,服用一份硝化甘油,然后到急诊室。于是我想,已经这样决定了,你已经将支架放进去了,事情就是这样。

所以那周我没有做太多的事情。确实,这就像在静修一样。我在院子里看着书,向窗外望去,我感到有点儿烦。我只是想一个人在那儿。我可以是一个很优雅的隐士。但我没有做什么。通常,当我的爱人和儿子走了的时候,我会做一些大的项目,画画这画画那,但是这次我没有。不久,他们回来了,我们去了X,当然我没有打算去。而我发现,我把我自己看得很脆弱。当我在那里的时候,我得了流感,而且变得更糟糕。每个人都在为我服务,帮我铺好床,然后给我姜汁汽水。你知道,我不想成为病人。我在想我为什么要这样做?通常我很痛恨这样。但我没去那些地方。我们通常去同样的

地方，但这一次我没有走。这次我没有下山，也没有沿着海边走。我待在山顶，看着他们做。所以我自言自语道，我已经不再废话，因为某个地方将我变得很脆弱。我不知道我是否害怕，因为我在倾听它们，或者是否是其他什么东西。

我猜这是因为大家都在看着。你知道，就是这样。我不想下山，又不能回去。我签了心脏修复手术协议，来治疗我的病。我要确保我的保险涵盖了这一项。医生想要我去做修复手术。她说，有些人幸运修复就好了。我想，这是好事，因为我还没有坐上我的轮车呢。我害怕的是没有人和我在一起去那儿，虽然我有小小的话筒。我甚至不知道我能走多远。这非常有趣……我想，我的一部分反应是无意识的。

附录B

参与者#1:越战老兵的研究

面对面的访谈

R = 研究者

P = 参与者

R:A. S.

P:基本上来说,我来自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非常爱国,敬畏上帝且非常虔诚。我们家是一个非常友爱的家庭而且会一如既往。我有三个兄弟和一个妹妹。父亲去世了。我的母亲在80多岁时去世的。我们家庭至少一年在一起聚会一次。

我16岁时离开家。我干了几年粗活,并不是很卑贱但工资很低。我在一个医院做护理员,这就是我为什么接触到护理专业并决定将其作为我的职业。我最初获得护士执业许可的时候我21岁。现在我都50岁了,我在那里有一段很长的护理历史。这要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我在X城市退伍军人医院工作了一年,我在那里首次接触到退伍军人,他们曾经参加过战争。

一开始,那里有一战老兵,一些中年的二战老兵,以及几个从朝鲜退伍的军人被放在那儿。我对听他们谈论他们的经历及一切相关的东西都非常感兴趣,所以,在1966年,当政府最后作出承诺去越南,派送了很多男人和女人及物资的时候,我志愿前往。嗯,有点儿自愿。我是先于征兵役一步的。所以说我是自愿去。我在德克萨斯州的休斯敦山姆堡接受了基本的训练,为期6周。我出来就成为一名少尉,并立即被送往越南。我……我在那里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转运医院工作。我们乘坐直升机出去,然后从救助站接送伤病员,这是相当……这很难说,因为确实没有确定的航线。航线可能

每一天都会改变，一天三次，但救助站在冲突地区。我们要将特别严重的伤员运回到胡志明市，这大约有 75 英里远，不是特别严重的伤员就运回到转运医院，通常约 25 到 30 英里远。让我们看看……我当时很年轻，21 岁，非常爱国而且充满激情，而且我们有权来到这里，做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我是非常反感越南人的，像多数战士通常对他们的敌人感觉一样。我觉得，我在那儿的时候，我开始意识到，在良心上受到谴责，非常矛盾，但我想我没太注意过这些情绪。太多的事情在继续不断地发生着，所以我真的没有太多的时间思考这些。我不能确定，是否是某种无意识的机制阻碍了你，让你看不清你在做的事情而且无法对其进行评价。我不知道是否是因为你不想或者选择不去思考。我不知道。当你身处其中的时候，你要对它们进行评价是很难的。实际上，我不能说我的体验都是那么糟糕。我那时很年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对那样的经历还有点儿喜欢。我想我人生中所做的最成熟的一件事就是我去了那儿，然后知道了那些人想要杀我。目前为止，我从来没杀过任何人，尽管我时常携带武器。我从来没有向任何人开枪。无论如何都没有故意向谁开枪。在我的人生中，这是一段奇怪的时期。

有许多东西我觉得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例如，人的生命价值，我想我是在看着它逐渐消失。我参加了 1966—1967 年的新年攻势(Tet Offensive)，当时北越人开展了反攻战，并取得了胜利。我记得在一个叫作“胡志明(Cu Chi)”的村庄，他们被击溃了。许多南越人被越共杀害，他们的尸体就像木柴似的堆在路边，我记得我对此竟没有任何的感情。好像“这就是战争”。这就是在战争中所要发生的。这种麻木不仁让我觉得很困惑，因为在此之前，当我看到一个人快死了，我就会觉得很紧张。在医院里工作，如果一个人快死了，你会非常担心，并对此感到不安。我对上述那些没有任何的感觉。像这样是很好的，因为在战争中就应该抱着这样的态度，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身边的其他人对此也没有任何的感觉。事实上，还有很多滑稽的事情。“嗯，这是一个我们不再担心的‘亚洲佬(gook)’”，“亚洲佬”是当时对越南人的一种常用的称呼……所以让我看看……

当时，有一段时间，我在一所转运医院工作。他们让你不断轮换工作。令人觉得奇怪的是那里搭起了像医院病房一样的圆拱形活动房（Quonset huts），还有……很奇特的是，我们会一次接收到三类人，一类是受伤的美国士兵，一类是受伤的南越士兵，还有一类是受伤的越共或北越士兵。所以，我们对这些越南人并不带什么感情色彩。我记得当我们向来接班的工作人员交接工作时，我们会只谈论我们的战士，用他们的名字等类似的东西。我记得当我们报告北越伤员和南越伤员时，我们会说"12 床"或在房间的"亚洲佬"等。这是一种对待你没有感觉的人的一种方法。你不会和他们交流，因为你不会说他们的语言。你身边很少会有翻译员或解说员。对于这些人，我现在所记得的是那时他们是多么隐忍（stoic）。我不记得他们曾向我们提出什么来减轻他们的疼痛，现在回想起来，他们一定承受了很大的痛苦。同时，非常不幸的是，我不记得我自己或其他任何一个医生或护士曾主动去看看他们是否有什么不舒服。

战争带来的伤害是可怕的。我不知道，那时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事。我不记得我曾给过越南人任何东西来减轻他们的疼痛。他们非常隐忍。我记得有件事让我觉得对一个越南人很愧疚，我不记得他是敌对的越南人，还是友好的越南人。当他手术后醒来，朝被子下面看，他发现自己的一条腿没了，然后他哭了。很无助……我不记得有谁，包括我，能够以什么方式安慰他。嗯……要是在战区之外，就医务人员来说，这是一种不正常的行为。我们不应该让人们在情感上和身体上遭受我们让他们受到的痛苦。我们的病房里时不时就会出现冲突，因为那里有三群人。一些美国士兵或者南越人认为他们的敌人在那里，而北越人或越共则会因为我们总是袒护美国士兵和南越人发生冲突。我们不曾允许我们的士兵对他们辱骂，尽管我记得还是有很多言语行为、威胁等，但我从来没见过他们使用暴力。

对于谁将受到护理，或者需要时谁先得到供给，这从来都不是问题。因为美国人或澳大利亚人总是优先。在我们的士兵旁边有一群澳大利亚人，他们将在我们医院安顿下来。呃……他们总是受到优先护理和供给。一般来说，是有足够的医疗供应的，所以，啊……我记起一件事，我并没有做选择，但当我把一个北越人的氧气

瓶拔掉给一个美国士兵用时,我实际上是做了选择,因为那时只有那一个氧气瓶能用。这是我记得的唯一的一次选择,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很自然地忽视他们的需要,我们并没看看他们是否是真的需要什么。我记得有时南越审问组来医院审问越共,有时他们将越共带出医院,我能想象接下来发生的事。他们把越共带出去。他们说他们要把这些越共转到另一家医院,但我相信他们是被带去审问或者被杀。但在那时,这并未让我为难。这就是战争,他们只是一些不知名的人。他们对我来说只不过是其他的北越人而已……[停顿]

就像我所说的那样,这些事偶尔会进入我的意识,我会对这样的矛盾进行思考。我会思考这种矛盾。困扰我的不仅仅是越南人的待遇,还有美国军队系统内的等级制度。我是一名军官,所以我比普通战士拥有更多的特权。他们要连续工作12~18小时才会有轮班,但军官却不是这样。他们是“喽啰(grunts)”,但这就是军队。世界范围内的军队都是这样的。我在尽力考虑我的同伴,回想我是否与我的战友们讨论或商量过什么,但我没回想到什么。我真不知道,当他们在那儿的时候,其他人的感觉如何,他们对他们所看见的是否有任何疑问。令我惊讶的是,我可以很舒服地进入那样的情况。你起床,然后去工作,而这似乎对你并没有多大影响。我想,这是整个人类的适应力使然。你只是适应环境,但那时的生活却呈现出一种几乎正常的感受。你举行派对。最大的担心常常是“我们从哪里可以获得足够的啤酒?”或者“我们能用一些青霉素与另一群人换威士忌吗?”或者类似的事情。我们从未考虑也许还有另外一些人需要这种药品。

R:你曾经被袭击过吗?当你在那的时候,你是否感到任何危险?

P:你是指营地(compound),还是医院本身?医院经常着火,经常有人被杀死在营中。着火时,我们只好将病人搬离他们的床,把垫子放在地板上,把病人放在垫子上。那些建筑,即圆拱活动房(Quonset huts),都是用铁皮做的,当炮弹袭击的时候,弹片会四处飞散。但我们从未去搬动北越人。他们就待在自己的床上。而美国人则搬到地板的垫子上离开火力攻击范围。[暂停]还有其他的一些矛盾,在白天,我们会让越南人到营中做些事,打扫卫生等。你不知道

他们晚上是否会出去，穿上他们的黑色宽松裤，变成越共。就好像，在白天你一切正常，我们能看见你。但在晚上，我不知道你是谁，以及其他类似的事情。

我在那里待了一年。回想起来，也不是那么可怕的一年，它很快就过去了。对我来说，它使我成熟了。嗯……我是在 1967 年回来的。那时正是和平运动开始高涨的时候，我记得在西贡之后的第一站是旧金山飞机场。他们叫我脱下制服，换上便服，因为机场的人们正向从越南回来的战士扔东西，喊他们杀人者等类似的口号，这让我真的要疯了。我想我们到越南，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他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们？几年来，我对战争的看法发生了改变。对于我们来说，去越南是无意义的。但这很难动摇你的爱国主义思想，很难将其放弃。我觉得这场战争经历给了我积极地做一些事的动力，我那时可能才 22 岁或 23 岁，我在战争中形成了很多打算退役后要做的计划。后来，回家后，我申请去上大学，获得了护理方面的学士和硕士学位。我很忙，我业余时间工作并继续上学。我真的太忙了，无暇思考整个战争经历。我把它尘封在过去里，继续过我的生活。在这一方面，可以说，战争对我的生活确实没有什么负面影响。这么多年，我确实不知道我对战争和杀戮的感情是如何变化的。很难说是什么导致这样的变化，无论是成熟的过程，还是意识到战争的矛盾和对战争无意义的感情。我一般都回避这样的情景，不想回忆这些内容。我从来没有去看过一场有关越战的电影，也不会去看。这些对我绝对不会有吸引力。我不知道为什么它们对我没有吸引力。我从来没有想去维持我们在越战中认识的那些人的友谊。我离开了军队。我知道，我绝不会再想要这些了。当我离开军队之后，我就完全与其脱离了关系。这就很像它属于我的一部分，但我发现几乎难以回想。这就像是，经验是我的一部分，但是它却随着时间结束了，而且已经离开了我。我很少考虑，也很少谈论这些经历。

当我思考战争对我的影响时，我觉得是积极的。说战争具有积极的影响似乎很奇怪。我在越南遇到过一些人，一些积极的人，这激发了我去继续上学的念头。[暂停]我想说，如果我必须重视这事，它就可能更加积极而不是消极。这是一个成熟的过程。我可能

早就成熟了，但这次有点儿瞬间成熟的感觉。当我离开了军队之后，我仍然很气愤。那是1967年，和平运动气势高涨。当时我在上大学，我对那些学生示威者、群体以及诸如此类的人非常恼火。战场上还有战士们在那儿，我知道，看到这些，看到这些新闻以及与此有关的消息，对他们是一种伤害。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像我之前说的，我敬佩这些示威者。那时，我是从我的观点，一个爱国者的视角来看待他们，他们则是从他们的观点来看待战争，“这完全是一个错误”。所以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佩服那些当时比我在那时更能够洞见形势的那些人。战争是错误的。

R：让我们就此稍微多谈一点吧。有两件事情我很感兴趣。一个是战争是一种使人成熟的经历，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你能够就此多谈谈吗？我想更多地了解，随着时间的迁移而出现的，你回过头来看战争以及在角度上的变化。

P：我想，成熟源于学会如何确定事情的优先顺序。嗯，能够很好地独立，学会替自己辩护。[暂停]与成熟经历一起的，还有冷漠的经历。我想，在那样的情景中，我学会对一些事情、人们的苦难、人类的状况的漠视，因为如果你让自己那样的话，当你处在那样的情况时，我想你就不能很好地执行任务。也许这确实让我对人们的苦难、对人们的疼痛、死亡这样的事情的敏感性变得麻木了。嗯……

R：你前往战场，像我的其他朋友一样，带着先前的军队背景，而且完全接受美国政府的立场。好的，这一点你怎么想的？

P：如果我循着你的思路，我就能够将自己作为一个美国人与政府强加给人民的战争区分开。战争改变了我作为一个美国人。它现在是一个开始过程……回来后，我感觉，政府会作出正确的决策，我们的领导人总做最适合我们国家的事情，经常，对我们国家最好的，也应该是对世界最好的。我们那时境界很高。我想，我失去了那样的天真了……嗯，你应该把所有的个人权力给政府，那些在华盛顿的高高在上的人永远会做正确的事情。所以说，这是成熟过程的一部分。我的两个哥哥也在越南。我在那儿同时成了他们的一员。有趣的是，多年来，越南从来没有成为我们讨论的话题。嗯……他们都过得很好，而且非常成功。这根本不是我们追忆的事情。而且，我不知道它的意义是什么。我不知道这是否意味着，这是我们不为

之而感到骄傲的东西,或它只是历史,根本不值得提起?

R:你的生活还好吗?

P:这是我喜欢用的词语,“只是还过得去(just get on with life)。”这是你前进路上的垫脚石,而你还要继续前进。我很难说出它如何影响了我的生活。已有近30年了。生活河流中发生的事情使得我成为现在的我,所以很难让我直接说出现在的我与战争经历之间的关系,我真的说不出来。

R:请就此多说一些吧。我并没有想将战争影响强加给你。正如你说的,它只是一系列事件中的一个。但当你现在回头看的时候,你认为它在什么地方进入了你所走过的其他阶段。

P:我认为这是一个踏脚石,一种动力,让我努力以及尽我所能地去实现我的人生。也许我看不到任何可以借鉴的意义。我不知道,但我将这段经历看作是一个起点(springboard)。

R:否则的话你已经上了大学了吧?

P:你知道的,我不相信。

R:为什么?

P:我不知道。我对我的教育水平很满意。我不知道我是否会走那条路。我本来是要继续的。我想是因为我在军队里遇到的一些人。

R:护士吗?

P:是的,我钦佩他们。我觉得他们很能干,那些级别更高的军官,在军队护理兵团时间比我更长的人。同时,我又不想仿效他们。一些关于作为一名职业军官的东西对我并没有吸引力。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上的某些东西对我没有吸引力。

R:那是什么东西呢?

P:我想,他们将生活的决定权交给了其他人。我经常听见他们说,“我不知道军队下一步会把我送到哪里。”我认为我知道军队下一步不会将我送到什么地方,因为我决定好了要到哪里去以及到哪里生活。这有一定的难度。但不是绝对的。确实有一些很好的人,但是一般来说,职业人员对越南的经历更感兴趣,因为这对他们的职业比其他事情更有用。这是非常好的晋升机会。我在两年之内从二等中尉升为上尉,这在和平时期需要10年。现在这可能需要15年才行。自从朝鲜战争以来,对于很多已经是少校或上校的职业军

官，这是一次机会，得到他们期待已久的晋升。他们做了各种各样的事情。我记得几个人，他们是内科医生，这些人都是在他们睡觉的帐篷里，我们讨论了一个晚上。一个人因为某种原因砍了他的脚，他想知道他是否可以因此获得紫心勋章，因为每一个人出来都想获得许多奖牌和待遇。我想，我记得想过，有些人，他们的腿被炸飞了，他们的眼睛瞎了，他们将会获得紫心勋章，而你想因为断脚而获得一枚紫心勋章却可能是由于你的粗心。但是他们还是在看战争如何帮助他们的事业。

R：这样的事情动摇了你继续在军队的想法？

P：绝对是，绝对是。嗯……大量不择手段的事情发生，包括很多黑市交易，特别是在药品供应上。过去这常常困扰着我。就像我说的，他们过去常常用抗生素换取别的东西，一箱啤酒之类的。

R：所以说，尽管他们给予了很好的护理，但是他们也做其他方面的事情。

P：嗯，你说很好的护理，那也是相对的。我能记得很多次，医生和护士喝酒喝多了，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不过，这是例外而不是常规。

R：那么，为什么你离开军队后仍然留下来做护理工作？

P：我已经是一名护士了。

R：但你回到学校后你可以转做其他事情。

P：我是可以。从这一方面来说我没有任何问题。我想，在护理工作上有你想要做事情的空间。那样的经历并没有动摇这样的想法。而且因为这只是一种经历。越南是一种经历，我一年的生活。它确实没有改变我的专业兴趣。

R：J. 刚才谈到的她的一个学生，她在研究越南的护士，我们谈到的一件事情是，在他们的专业内心中，他们是非常烦躁的，因为他们正在挽救人们，目的是让他们回到战场。那些受伤非常严重的，非常痛苦的，是允许他们死的，这扭转了以往传统的处理病情严重人员常用的医疗方法。

P：而且，这是军队的方法。军队医疗的目标是使人回到他们的战场，无论是一名步兵、飞行员，还是其他什么兵。因此，在一处恶战或袭击之后，我们的医院的伤病员就会泛滥成灾，就会 150，250，300 地

增加，然后就要对他们进行分类，因为这些人要被分流到不同的治疗区域。为了让这些伤病员舒服些，就要给他们麻醉以减轻他们的痛苦。我想，应该是有六个手术室，所以可能有100个人积压在那儿。那些受伤特别严重的人是不送到手术室的。让他们去死。我没有做分检的工作。我在想，如果是我，我会有什么反应。我想，我可能对这些情况已经适应了。因为这就是"军队的方法。"

R：我们继续吧，你离开军队后，你说你的下一步是上大学，回去拿护理学位。你能记起那些大约在1967—1969年你在大学时发生的事情吗？

P：我大部分时间都很忙。我是全职上学，兼职工作。我从来不参加任何这样的示威活动，我不知道你是否就是这个意思。同时，我不记得当时的感觉……一段时间后，我开始觉得他们确实是正确的。我从来没有支持过这些示威。同时我也从来没有说过它们的不是。

R：你为什么认为他们是对的？

P：嗯……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期，很明显，不只是我而且是全国，我们都被卷入某些事情中，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就是和平。我们要停止所有这些错误，然后再开始签订条约，停止战争，重新开始谈判。这就是华盛顿的政治情况，我们投入数十亿美元，然而，美国的社会体系问题就是出现在这里。我想，因为就那些死去的人们来说，我更多地觉得这是错误的。我认为战争引起了社会动荡和骚乱，对我们国家造成了影响。我想，那时对我来说，与我们对那些越南人所犯的错误比较起来，战争的错误更加严重，因为我仍然有点儿没有把他们，越南人当人看。

R：你看到了什么具体细节让你产生这种感觉？

P：我不记得具体的细节。我试图从经济方面考虑这里发生了什么，但我觉得需要更多地思考这里没有发生但却需要的社会改革。我记得学生年龄在下降，通货膨胀在上升；我记得我渐渐地很难依靠我的工资生活。我没有思考任何具体的事情。大部分时间我过着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我只是生活在我自己的小生活里，确实不知道整个大局。

R：为什么你说社会秩序被打乱了？

P：那是骚乱。记得那是20世纪70年代在肯特州，因为那时我还在上

大学,记得我们的校园里有很多示威游行,想着用那种方式对待我们自己的人并向他们开枪。我对在那时被捕的人表示同情。这可能是我转变对政府态度的一个转折点,但我不确定。我对政府越来越丧失了信心。

R:你与其他退伍军人有联系吗?

P:不,我和其他人没有联系。我记得学校有一个退伍军人组织,但我没有想过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那时候成为一个退伍军人不是件很光彩的事情。我记得在一些课上,如社会学课,关于越南的话题会被提出来,我从来都不主动参与而且也不发言。绝对的,我从来不会,也绝对不想被发现是一个越南退伍军人。我的年龄比大多数人都大,我和十八岁的孩子一起选修了社会学 101(Soc. 101),他们都担心服役以及它的不公平。我从未向任何部门敞开过自己。

R:然而你对政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P:这是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我开始对政府失去信任。[暂停]而且我看不到政府政策在什么地方对我的生活有任何大的影响,因为我真的只专注于我正在做的事情,并且做得很好。但记得那时学前启智计划(head start program)被取消了,因为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每个人都在谈论所有要花费在战争上的钱,但国内的事情却没有好好地考虑。我记得在一次课上,大家在课堂上似乎普遍反对政府。人们对政府持消极的态度。这使我渐渐明白了。我还没有完全失去信心。你可能会说是在慢慢地侵蚀。这很难说,因为我住的地方是我们一位伟大的总统的家乡,因此,当你尊重这些人的时候,很难否定那些你尊重的人。这是难以割舍的尊重。

R:战争在继续,而你也得继续生活。

P:是的,战争持续到 1975 年,但你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我没有花时间对其进行思考。我还记得,很多次,当他们说他们已经达成停火协议,战斗很快会停止,新的一天即将来临,我是多么兴奋。我不记得对越南人本身有任何消极情绪,因为那时我已经对政府失去了信心。我认为我们也同样受到责备。而且我开始思考也许我们应该退出来了。

R:这是早还是晚了?

P:晚了。我记得做了一件事情,他们将公布被杀士兵的名单。我总是

看这些名字,看看是否有我认识的人在名单上。[停顿]但就我来说,我是尽力跟上每天发生的我还不知道的事情。至于在巴黎的和平会谈,我记得他们在会谈,但是我们对此并不感兴趣。和大多数的美国人一样,我觉得,我们是夹着尾巴出来的,而且我觉得,这时我真正给自己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战争是无用的,没人会赢。我觉得,有人将愤怒指向政府,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对战争承担责任,而且政府也从不会把它叫作战争,而是越南冲突。他们绝不会得出什么结论并将其称作战争,因为国会从没有宣战。这是一种关于战争与冲突的文字游戏。

R:柬埔寨呢?

P:那是一个必经之路,当时我驻扎的地方胡志明,离柬埔寨边境只有75 英里。进入柬埔寨是很平常的,因为在那些乡村,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边界。就像这棵树的后面就是柬埔寨,那棵后面就是……对我们来说,进入柬埔寨不是什么新闻。

R:多告诉我一点关于你离开军队后的事情。

P:我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获得硕士学位,然后在一所护理学校获得一个教职。之后我教了 20 年。当时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因为我的职业生涯一直没有中断。我待在大学,并尽快地获得了博士学位,因为这对教学和终生教职是必需的。获得博士学位后,我准备跳槽,离开了我教学的地方,来到了这里。

R:你去过越南墙吗? 它对你有什么影响吗?

P:墙本身确实有过影响。我去华盛顿仅仅是为了看看它,记得当时这堵墙从情感上战胜了我。我特别想找到一个人的名字,我知道他牺牲了,当发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的情绪真的有股冲动。同时,我想这对我可能是一种洗涤。我到过那里之后,看到它,表达自己的感情,这样也就结束了。我没有对它有任何沉溺的问题。

R:这么说,整堵墙的体验都是围绕你要找的人吗?

P:似乎是这样的。如果我要对其进行概括,用一件事情来表达整个情况,应该就是他的名字。就是发现了墙上的名字。

R:为我描述一下那天的情况吧。

P:我记得在华盛顿那是一个寒冷的早晨,一直下着雨,我在阿灵顿晃荡,找不到那堵墙,所以我不得不问人。记得我询问的那个人对那

堵墙在哪儿一无所知，当时我感到很奇怪。后来我终于找到了那堵墙，墙周围已经完全荒芜。我原以为周围会有成群的人，但事实上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那。我看着墙，试图找到那种感觉，我坐在那里从不同的角度观察，我读了上面的字，其中大部分我已经忘了。那儿有一张桌子和一些长椅，桌子上面的东西看起来像是一本历史书，它能帮助你寻找到那个你想找的人的名字在墙的哪部分。我翻阅了它。那一刻我没有任何特别的情绪。后来我找到了那个人的名字，我走到墙边，靠得更近一些，那儿有证据表明人们去过那儿。那有纪念品和花。这有点儿令人鼓舞，因为我很失望，纪念碑周围人不多，没有更多表达悲伤的形式，因为在墓地应该有各种纪念碑和其他碑位。对我来说，我想这应该就是"纪念碑"！回想起来，没有什么比纪念碑更能体现对世界大战中亡者的重要性。我觉得，应该将其突出出来，应该有乐队演奏，在那里的人都应该有碑。但那里却不是这样。它确实显得很孤独，它是孤独的。我不记得我离开后有什么特别的感想。这就是我当时想做的事情，事情就是这样。

R：你关注过越南现在的发展吗？

P：越南开辟了旅游业，这很有意思。他们希望我们的人到那里去。很多人打算回到他们曾经所在的地方去看看。这有点像你不会和他们打仗，而是参与他们的某些事情一样。说实话，我想回去看看。我想很大一部分是出于好奇，不是寻找什么具体事情或想要解决什么遗留问题，是好奇心驱使着我要回去看看。我想那里呈现给我的只是一幅琐碎的景象，因为什么也没有改变。他们仍然在那里，而我们都还在这里。呃……无论如何，我对越南没有任何敌意。我想战争是我们强加给他们的，他们打仗是无可奈何的选择。当然，他们曾经长期被人占领。因此无论谁当权，他们都会臣服于权力。这是他们如何适应和生存的方式。这一点我没有异议。

R：你对越南人在那儿的生活有什么感受？

P：没有太大的感觉。我教过许多越南学生。有一年我在他们那过的春节，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关于越南儿童的，移民的儿童的身高约 6 英尺高，他们的父母大概这么高。我们总是认为越南人长得非常矮小。他们矮小的一个原因是饮食问题。但我发现很有意思的是看到那些高大的越南孩子在周围。我很钦佩那些来到这里

的越南人,而且他们很成功。他们继续过他们的生活。

R:你是否有亲密的朋友在战争中牺牲?你是否阅读过关于这场战争或其他战争的书籍或小说?

P:没有。在那里死去的一个人是在我回来之后死的,他是我弟弟的一个朋友。所以,他算是我最亲近的真正死去的一个人。至于书,我读过一些有趣的、轻松的书籍。有两本书,一本叫《胡志明隧道》(*The Tunnels of Cu Chi*),讲述越南人如何挖隧道的故事,他们住在那些隧道里面,这就是为什么当初我们不能找到他们。由于我在胡志明待过,所以读起来非常有趣。我还看过一本关于越南的书,它几乎就是一个闹剧。这本书叫作《拿起子弹的书》(*The Book that Pick Up Bullets*)。它基本上是传记,非常有趣,反映战争的荒谬。我知道有很多战争题材的书,但我不想读。这场战争没有英雄。

R:当你前往战场的时候有没有带着一些想象?

P:我不知道我是否有过什么想象。我的家庭没有军人背景。对,爱国,但不是参军。在我之后,我的兄弟们也参军了,所以我对军队生活没有什么先入为主的想法。

R:那么,概括来说,你所说的是,一个男孩子二十几岁的时候遇到了战争,这是一种让人成熟的经历。它在某些方面让你迅速长大。战争似乎并没有使你荒废(crippled),因为从此你有了一个很好的职业。从另一方面看,你也失去了某些东西(sealed off certain things)。

P:是的,可以说我是失去了某些东西。就我个人而言,我不认为战争对我人生有什么负面的影响。

R:我想回到你在转运医院的生活。在你的心里面,或者从构成上说,你们在对待北越人和南越人之间是否有什么区别?

P:他们的待遇是不同的。我记得有一支南越军队总来医院,和他们的士兵谈话,给他们带一些小礼物等。当然,没有人去看望越共,除非从南越来的审讯员。但是,我们确实给南越人更多的关注,我们称之为友好的越南人。另外,因为语言不通,我们很难和他们任何一方进行沟通。所以,有时他们似乎是被忽视的……我想,在我的心里面,只是我们无法做到我们想做的那样。但这是医院,所以我们尽我们所能地照顾他们。医院里面没有太多打仗的感觉,因为那里没有枪炮。

R:当你走到那堵墙前,你为什么要找那个人?

P:他是我最亲近的一个人的兄弟。我在墙上画了一条线(draw a corollary)。之前告诉过你的,十月份我要去华盛顿,因为那里将举行艾滋病纪念拼布展览,我看到在拼布和纪念碑之间有很多线。我要去的原因是同样的。我的爱人去年死于艾滋病,而且他也有一个拼布板,我们做的。当我去了纪念墙的时候,我一直想,这也许是我一直在寻找的同样类型的清除经历的方式。

R:战争期间以及你在医院的时候,你是否开始有了一种和军队拉开距离的感觉?而且和正在发生的事情有了距离感?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有了某种怀疑?在21岁或22岁时就能够将自己区别开,你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P:我想,我的大多数业余时间,自由时间,我就开始考虑一些我离开越南后自己想做的事、想参观的地方,我想住在哪儿,我要到哪里去上学,诸如这样的事情。我想,这种对未来的思考有助于你和当下的现实拉开距离。我更多的是思考未来而不是当前。

R:这是不是也是一种成熟的表现,即使有点儿保守?

P:我想是这样的。任何人都不应该超越现实……我只是认为他们在处理那些事情……会有更多的困难……我看得到……而且可能通过对未来进行计划在潜意识里告诉我,我拥有一个未来,我不会死,我会出去的。

R:有没有一些你愿意提及的人,这些人改变了你的生活或是让你渐渐成熟?

P:嗯,有,在私下里和工作中都有这样的人。在大学,我当然遇到了一些很有激情的人,教我那样的事情。有一件事我忘记提到,遗漏了……我不知道这是否重要……当我在越南的时候,我开始转变我的同性恋倾向。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个人,所以这非常有趣。这对于我来说是一段幸福的时光。我开始面对我是谁的问题。还是这个人,在越南时和我在一起,我们最后一起搬到了X,并在一起生活了六年。所以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工作中,这都对塑造现在的我发挥了作用。我常常想,这件事情为什么在那儿发生。也许是因为那里自由,也许是因为那里没有明天。所以你最好是生活在当下。我的爱人应征入伍,而我是自愿参军的。他待在外面,直到他们征选他参

军。他不是自己选择去那儿的。他更多是从专业上选择。我记得他比我更在乎医院的条件。他遇到的事情，他都能够做得比其他人更好。我想，他在某些方面是我的模范。

R：他会和你分享悄悄话吗？

P：你想，两个人都有过那样的经历，而且在一起生活了六年，他们会说什么。但我不记得我们曾经讨论过[关于]我们生活这部分内容。我们只是继续在生活，事情就是这样。

R：我还有一个问题。关于艾滋病以及相关的事情，你觉得这与战争之间有任何关系吗，或者这些只是独立的事件？

P：不，我想……我认为要与艾滋病作战。最受影响的主要是年轻人。所以你可以在战争地区和世界各地死于这种疾病的人之间画上这样一条线（draw that kind of corollary）。而且，我想，我们已经看到，我们的二分法非常严重非常明显，到目前那些想赢得反对疾病战争胜利的人，他们是赞成的。而有的人是真的不在乎。对于战争是同样的。有些人想去那儿，做一切正确的事，而有些人却不在乎。从社会交往来说，我认为，这两者之间有很多关系和相似性。我不再相信政府在这方面的努力，他们只会努力赢得越南战争。我与艾滋病有很深的接触，所以我无法离开它了。我想我更加反政府正是因为艾滋病，而不是因为曾经去过越南。

R：许多从越南退伍回来的军人最终都被示威游行转变过来，而且至今仍然很气愤和烦躁，因为他们的付出被大打折扣。

P：你知道，我想每个士兵都可以对任何战争这么说，因为这没有太大的差别。无数的战争、所有死去的人们都是这样的。因为他们的死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了吗？没有。看看现在所发生的事情。我想，那些死去的人付出的努力，他们放弃了某些东西，他们做出了贡献。我不能说这样一些事情是值得的，也不认为他们对社会有持久性的价值。显然，我们不能学习他们。

附录C

参与者#2

第一部分：电子邮件/调查

亲爱的参与者#2，

很高兴收到你的回信，从写信的日期中我可以看出你是在百忙之中给我们答复的。

如果我们能够面对面访谈的话，我想请你给我讲述你在越南的故事，我会坐下来仔细倾听。但由于我们不是面对面，我将给你一些主题领域，你可以从其中选出一个，你可以增加或删除，只要你认为合适。你回复后，我将根据你所说的继续问你一些问题以作澄清（如果你愿意的话）。

1. 首先，非常希望获得一些有关你的背景信息——你去越南的时间，如你的年龄、家庭关系，是否有兄弟姐妹，他们是否服役，他们是否爱国并支持你。

去越南那年我21岁。我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一位教师、教练和体育训练员，母亲是一个家庭主妇，还有一个妹妹，比我小19个月。我没有结婚或订婚。我父亲是一个二战老兵，在意大利（Toretta）驾驶B24轰炸机，他有50次飞行作战任务经验。我的家庭支持我的选择，但不一定是越南战争。

2. 你自愿参军还是应征入伍？

我自愿加入队伍的，像所有的海军陆战队员一样，我是1964年入伍的。我在越南没有见到应征入伍的。

3. 你的角色是什么，战斗人员，还是非战斗人员？

我是一个海军陆战队步枪兵，还具有3.5英寸火箭发射器的资格。

4. 描述一下你在那里的生活，投身于战斗中（如果你打算去打

仗),以及敌人怎么样(这是问题的真正核心)。

越共是一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军队,他们通过恐怖、屠杀和酷刑在当地村庄获得了藏身的地洞(foot holes)。像我这样的海军陆战队员普遍都是被训练要遵从命令的,不要问为什么或政治情况。我能够毫不犹豫地杀敌,因为那是我的职责,我被训练就是做这种事情的。很快你就会看到战友受伤和死亡。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你要生存下来,杀戮变成了一种习惯和自卫。海军陆战队战士们还要为其他海军陆战队员和军团打仗,未必只是这个原因。

5. 当你在那儿的时候你觉得受到支持了吗? 回到家乡后看到都是反战运动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在服役时我总是受到支持的。我们有一些人不想去那儿,但是如果能选择的话,我想没有一个人愿意在战场上生活或死亡。

至于反战运动,这只是美国大兵打仗的原因之一。还有言论自由的权利、抗议的权利和生活自由的权利。然而,当运动因为美国大兵选择服役而攻击他们,骂他们"婴儿杀手",只提到一个方面,而且从未以任何形式服务于这个国家,只是用嘴巴嚷嚷那些他们不知道的或永远也不会知道的事情,我讨厌这样的日子,直至永远。我们都知道,这些人会搞垮美国的。我认为,反战运动什么也没有做,除了获得一个不光彩的和平和对58 000 名美国人的不尊重,这些美国人为了他们的公民权利付出了最高的代价。那时的学生和反战积极分子,将参加越战的美国士兵看作是叛徒一样。这种事情永远不要再发生在美国士兵身上。

6. 你愿意将该经历描述为一种令你成熟的经历、一种糟糕的经历吗?

令人成熟的经历? 我认为这是一种求生存的经历。

7. 参加战争影响你以后的生活了吗?

每个退伍战士,以及一些不是退伍老兵的人,终身都受到杀戮、大屠杀以及失去朋友和家庭的影响。有些人更容易承载负担。无论如何表面上看是这样的。

就像我所说的,基本上,我希望你的故事就像你今天回过头去看它一样。

总之,我从某州立大学毕业后选择加入了海军陆战队。当时,我

们只有越南方面的顾问。我自己以及我们整个部队都不是专门为赴越南而参加海军陆战队的。我参加了,正如约翰·肯尼迪说的,"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问你能为国家做些什么。"我想报答我深爱着的国家和人民。当人民选出来的国家领导人将他们带到越南时,我自己,以及成千上万的人都是在同一条船上。我是一个真正爱国的美国人,而且相信那些选择来服役或被要求来服役的人都应该以体面的方式去做好本职工作。那些因为我们服役而来攻击我们的人,那些逃跑到其他国家的人,他们不是建立这个国家的基础。很多人至今仍然带着这样的态度,美国人民绝不应该容忍或原谅他们。将越南战争与二战或一战比较,区别在于我们没有受到外国的武力攻击。所有那些时代的美国士兵在他们为国家服务方面是没有区别的。就是这个原因。

我非常感谢你抽出时间做这个研究。如果你希望的话,我可以让你知道我如何处理这些材料。而且当这本书最终完成的时候,我可以送你一本。正如我所说的那样,这是一本关于方法论的书,我需要这些材料,以便向学生展示我是如何处理质性资料的。

第二部分:电子邮件/后续调查

亲爱的参与者#2,

在第一次访谈中,我用这种方式对一个很好的朋友做了访谈,出现了好几个主题,我想知道你是否可以对它们作出回应。我想,在某种程度上你已经回答了一些,但是我想知道你是否可以再多说一些。一个主题是关于"战争文化"以及它与常规行为的冲突。由于这个冲突,我的朋友常常在良心上感到痛苦,无论他看什么或者做什么,但要想生存,唯一方法就是将所有那些想法放到一边,将敌人看作是"敌人",一个有机会就会杀死你的人,骂他们是"亚洲佬"从而将自己和他们拉开距离,不把他们当人看,并对此事避而不谈。事实上,在战争期间或战后,他从来没有和其他人谈到过这场战争,除了这次访谈。当他出来后,他只是投身于大学校园生活,回避校园的所有反战活动和各种讨论。

1. 上面这种情况当时或后来有没有困扰你?你又是如何处理的?

战争困扰着我生活的每一天。没有哪一天不记起那个时代的某

些东西。我从来没有向任何人提起或讨论起关于越南的事情，包括我37岁的妻子，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她才知道。

我想我要表达的是，你说你把它看作是一种生存经历，但能够让你生存下来的策略是什么呢？

在战争中存活纯粹是一种运气的问题。在某个时间你正好不在某个地方。这只是运气。你不能仅仅通过小心翼翼，做一个懦夫，或想着只拿着武器待在后方就能够存活下来。我知道有些家伙，他们在整个战斗过程甚至没有一点荆棘划伤的，但当时，我知道有些人，他们在那里还不到30天，几乎有一半都被炸死了。

2. 你是如何处理在你周围发生的人员死亡的？

战争中死亡和伤残在你周围到处都是，这成了一个接受和习惯的问题。你在精神上尽量将自己从所有这些大屠杀中摆脱开，将心放到另外一个地方和另一个时间。在家庭里，和家人及爱人一起在温暖、干爽、洁净、安全的床上，你要快速地想。在我看来，海军陆战队员在处理这样的大屠杀问题上比一些其他军队受到的训练更好。并不是士兵更好，只是接受更好的训练，且彼此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

3. 你是怎么从中解脱的？

我能够从精神上把我自己从大屠杀上移开。我总觉得，如果我老是想着它，任由它吞噬我，我将是下一个被击中的人。

当时和现在？

自从越战之后以及现在。和朋友、家人和爱人在一起时，我完全将它置于头脑之外。我绝不喝酒，因为酒会带来仇恨、愤怒和沮丧这些最鲜明的精神打击。今天我之所以谈论这事，是因为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通过新兵训练营和越战老兵找到我，四十年啦，所有的记忆都像潮水般涌现出来。和你一起服役的兄弟谈论很容易，但和一般的公众谈论却不容易。这家伙是我们武器排的一名机枪手，现在我们定期见面，这使得我们可以相互倾诉所有的记忆，这就像是服用毒品。我很幸运在我的生命中遇到一位女人，她从来不提这个话题，从来不问那些问题，当恶魔出现时默默地帮助我，并给予我坚定的支持。

4. 正是你网站的名字“n. g. a.”激起了我的兴趣。

正如你已经猜到的，“n. g. a.”肯定与越南及战争的“鬼魂”有关。

这个名字是我在1996年,越战后三十一年,突然想到的。有好几十个越战老兵常常在一个网站聚会,网站是一位女士——越战老兵的支持者所建立的,但她与老兵或越战老兵没有任何联系。这么多年,对她来说有太多的事情要做,因此,我建立了一个聊天室和网站,以纪念我的部队,并保持与多年来我认识的越战老兵的接触。大多数是海军陆战队老兵战士,但我们也有一些来自其他部队的战士,包括一周来加入我们的空军、陆军和海军战士。我们是一个联系非常密切的群体,我们大部分时间待在一起。我们在网上聚会的时候,我们都尽量避免越战的"鬼魂"。因此,有了这个名字。

5. 另一个主题与"敌人"有关,谁是敌人,人们怎么想他们。你与敌人有过接触吗?那是什么样的情景?

我曾接触过的是已死的或要死的敌人。我见到过好几个奄奄一息的敌人,至今还历历在目。我们与越南共和国军队(南方越南军队)有过密切的接触,有时候我认为他们就是越共,我们的敌人。就这些人来说,在越南朋友或敌人之间是没有什么区别的。除了都是人之外,他们有一个不同的文化和宗教。我从来没有将朋友或敌人看作是非人类或恶棍。

6. 我的朋友是个医生,所以有时不得不"医治"敌人。这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应该是"敌人"。而且还有这样的事实,在白天,越南人被允许进入基地做工,而在这期间,你知道,同样这些人很可能在夜晚穿着睡衣就向你开枪。所以在处理越南人时,即使那些来自南部的越南人,总有这样的内部冲突和不信任感。

和你的军医朋友一样,我不相信任何越南人,无论朋友还是敌人。从第一天到第二天,你永远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在被杀或折磨的压力下,在周一是你的朋友,周二就变成你的敌人了。他们仍然是人,只是变成了敌人。你只能信赖与你一样来自同一片土地的美国大兵。

7. 可以说战争使你更加冷酷,使你更加敏感和富有同情心,对战争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了吗?

不幸的是,战争已经成为这个世界不可避免的灾祸,因为有其他文化的人他们想要杀死我们,我们中的每一个人。在正义的情况下我

不反对战争，越南当然也不会让我成为一个和平主义者。在去越南之前，我把自己视为硬汉，在我 7 岁的时候拥有我的第一支枪。9 岁之前我就独自狩猎。这些事如果在今天，你的父母会进监狱的。那时候不会。越南让我看到多少美国人对上帝和国家的态度是真的。我知道，他们就是他们自己，他们要杀死美国人，走他们的道路，或者在社会中执行他们的意志。无论你想要称呼这些人什么，都需要给这样的老兵一个生活空间。如果你想称其为冷酷，是的，我就是冷酷。我的感觉是，我们选举出来的国家领导者不能以害人的方式安排士兵。二战是无可奈何的选择。我必须要说的是，对越南、朝鲜或伊拉克，我不是很确定。不像我们选出的领导人必须有足够的信息来作出战争的决定，普通的美国人手头上没有这样的信息。历史将证明这些战争在世界上是否很重要或对美国是否有好处。我希望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我能在场。现在以及在去越南之前，我讨厌看到人类被虐待、折磨和残杀。我想，除了我们的民族受到保佑，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也要受到保佑，她让我们要习惯于帮助别人。这是战争的理由吗？我不确定，而且不知道怎么回答。

8. 你曾经去过战争纪念馆吗？它对你有何影响？

去过，我去过一次，而且只有那一次。我无法解释看到那58 000个名字时的感受，他们很多是和我一起服役的战友，以及高中和大学的朋友，我不知道它们对我的影响。我只能说，我永远不想再有那样的感受了。

再次感谢你。我很感激你愿意与我分享一些经历。

科宾女士，最后我只是想提醒你，也许你还不知道，向有些越战老兵提出这些问题会引起攻击性的回应，有时候会有言语上的攻击，包括那些光顾我网站的家伙们。事实上，我想说的是他们大多数会这样。我的做法是从来不修改留言板，而且这些人都知道。我们让自己生活在言论自由中，对于其他服役过的战士也这样。我会审查自由言论吗？和你一样，这些年我一直努力为教师和学生提供一些基本信息，让那些没被卷入战争的人看到很多其他人的看法，尤其是退伍军人的看法，希望以微薄的力量努力让别人理解他们的意见。如果有人让你走开，只是不要介意就好了。

附录D

参与者#3

第一部分:电子信件

你好,朱丽叶

我在 N. G 看了你的帖子,我是巴拿马、沙特阿拉伯、波斯尼亚的老兵,我曾服役于美国海军陆战队。有什么可以帮你?

亲爱的参与者#3,

感谢你的回信。我对你们的战争经历很感兴趣,我对这个话题的兴趣始于我在家中阅读的一些材料,我当时是要给学生展示一个质性研究的文本,这是我正在写的一本书(第 3 版,Sage 出版社),然后我发现了一个越战老兵的访谈记录。我有这篇访谈记录,但是从来没有真正去读它。你知道的,你阅读某些东西,但是又没有真正去读它。看完后,我对战争经历变得很感兴趣,从那些服役与越战前线士兵的角度来看这些经历。现在这个研究课题已经超出了本书,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讲不完的故事。我读了一些来自越南老兵的回忆录,坦白说,我对战士们面对的情境非常震惊,那些士兵面对这么多事情,而我们却知之甚少,或者根本不了解他们做过什么。因此从根本上来说,我想问些海军陆战队员的问题是:请告诉我你的战争故事,比如你的背景,你为什么入伍,你在军队里主要做什么,你见证打仗了吗,是什么样子的,你如何度过那些日子,以及你是如何带着这些记忆生活的,任何你想告诉我或希望别人知道的事情。我将从我的资料库里删除任何识别身份的信息。如果你仍然对此感情兴趣,请告诉我。

谢谢。

J. C.

第二部分：电子邮件/日志

你好，朱丽叶

开始这里是从我个人写作中摘录的一段内容。本质上是一种治疗，并没有预先设计。这是一种方法，开始治疗的过程。我仍然在那方面工作。这更像一个发展过程。我会尽力多写并尽可能发给你。你有最后期限吗？你可以问我任何你想知道的问题，我会尽我所能诚实地回答这些问题。

有一个能够帮助我的观点是：如果你认为自由是理所当然的，那么你就会拥有并要求更多的自由，这就是我们很好地捍卫了自由，让你们不必为此而睡不着觉，或不需要总是像其他国家人们所做的那样，总是想着它。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回报。问我任何你想要的问题，治疗的一部分是记住这些事情，并进行处理，因为当我们在那里的时候，我们没有时间去思考。不要试图保护我，不要把我当孩子对待。如果我能拿着一把 M-16 步枪上岗，我就能回答你想知道的一切。我结了三次婚，我现在是一名消防队员/护理人员（Paramedic），我开始很喜欢生活了。即使有各种借口，甚至邻居认为我失去了这些，因为我挖去前面的草坪，修建一系列的池塘和瀑布。我希望你说，因为从来没有人要听我的故事。谢谢你对这些事感兴趣。请把我的名字和其他的东西删去，我不想有任何的关注。我只是做这些事的百万人中的一个。我们是作为一个团队来做这事的，我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处理它。

我并没有真正被射中，而是被手榴弹弹片通过右边腋窝区插入肺。是的，这次确实受伤了，它令我惊讶的一个方面是感觉到非常烫。伤好后，我回家看望我怀孕的妻子，并开始喝酒。1990 年 3 月，我妻子出了一次摩托车机动车事故，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儿子。1990 年 8 月，我去了沙特阿拉伯。我升职了，这一次我是以爸爸的身份参加了我的部队。可以用经验丰富这一恰当的词语表达。我并不害怕，知道这是一个工作。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发现那些坏家伙。保持高昂的士气，将我的士兵团结在一起。你会不习惯的，你做过之后，一切又恢复原状了，你就奇怪为什么还有人想要这样做。你理解这个宏大的计划，但这是一个与你没有区别的家伙。养家、支付账单。和你一样，他

们的钱包里有他们家庭的照片。你会惊奇,有那么多子弹在空气中飞过,很多人却没有被击中。受伤让我变得更坚强,因为你经历了生活中的事情对你来说似乎不再稀奇或可怕。我希望做些有意义的事情。这让我意识到,生命比我原先想象的过得还要快,当时我相信我会活到 80 岁。这激励我多活几岁。然而,由于喝酒太多,我真的要丧失 10 年寿命。这确实让我非常羞愧,因为在内心深处我觉得那不是我。我是很有进取心而且好战的。这样说并不真正是我的本性。我仍然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去波斯尼亚。没有真正指定的任务。我想念那些回不了家的朋友,以及那些回来的朋友。这就是 NG 所代表的。老兵和老兵之间的对话。我对他们的思念就如瀑布一般,对我那些没有回家的朋友也一样,还有"9·11"没有回家的 343 个消防战士。我的灵魂费了很长时间才回家,身体上,我 24 小时都在家,但情感上和精神上的我大部分在这里。这是我欠我妻子的。极好的女孩,教会我如何重新生活,这比我做过的任何事情都艰难,死都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第三部分:电子邮件——后续

亲爱的参与者#3,

为什么喝酒?它对你起什么作用?回来时是什么让你如此的痛苦?如果你没有参加海军陆战队去打仗,你会用酒精麻痹自己吗?

J. C.

为什么喝酒,这是一种社交[接纳]。我们排部队会聚在一起喝一些"啤酒",让我们忘记不愉快和放松自己,那时你想更快地忘记,于是你就开始喝威士忌。这很简单,只是事后,它对我并没有起到作用,反而变得更糟。行为失态、做恶梦,而且尽管你尝试了,但永远都无法忘记,即使你喝足够多。一切都是痛苦的,做过的事、见到的人,一切都印刻在你的大脑中。你想念没有回来的朋友,你总是感到伤心和[愤怒]。[极端]愤怒,你讨厌这个世界,想要毁灭它。然而你做不到,它像蒸汽锅炉一样制造内部压力,快要炸毁了。如果我没有看到我所做的,我也不会喝了;如果喝酒不是唯一一种理论上减轻痛苦的"社交[接纳]"形式,我也不会喝酒。我高中的时候并不喝酒,对此也从来没有兴趣。21 岁时,我已经参加了两次战争、离了婚、儿子死了,而且

生活在离家数百英里之外的地方。当时因为太年轻了,没有一个支持我的朋友圈,家人和我都不知道如何从情感上处理好这些。尽管我身在美国的土地上,但是精神上和情感上却永远不能回家。尽管我的身体是21岁,而心智上有50到60岁的生活经历了。我周围的每个人都只看到一个生活在社会中21岁的人,即使你只是一个孩子,没有人会信任你。我直到2002年才回家。

第四部分:电子邮件——后续

多告诉我一些。

我所发现的真实是一位老兵经历了一个悲伤的过程:背弃、挣扎、愤怒和认命。在"惊恐的印象"之后,一段画面就被植入到战士的记忆中。那些画面通常不断地重放,除非提高应对技巧,印象消除。愤怒是主要的情绪,因为它是一切问题的根源:对丧失生命的愤怒、对失去纯真的愤怒、对失去"欢乐时光"的愤怒、对失去力量的愤怒、还有很多失去的东西。服役者平均年龄在18岁到25岁。你还记得那些岁月吗?为什么你还记得?大学、寒假、朋友、通宵达旦等,与战争不同,这些对老兵都是美好的回忆。这里的秘诀是让这些老兵学习他们不知道的应对技巧,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像你一样在大学学习"批判性思维"。除非老兵从情感上使用应对技巧,否则他们就不能在情感年龄或认知年龄上取得进步。他们被思维、荷尔蒙、失衡等困扰。一些人不仅需要心理辅导,而且需要药物帮助维持心理平衡。我通过吃药、心理辅导、其他退伍军人以及我妻子的支持来学习这些应对技能。这就是为什么15年后在正常年龄之外我最终还是要回到大学去。后悔则是另外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你是否后悔自己做过的事,因为你真的不想这么做?后悔转而又成为情感上的困惑,这反过来又变成了愤怒。这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直到你打破这个循环。

第五部分:电子邮件——后续

为什么如此愤怒?

这种愤怒来自几个方面。它从新兵训练营就开始了。他们训练你,要你学会保护、防卫以及杀敌,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

他们让你遭受挫折,恐吓你、刺激你,因为任何理智的人都不会让

你做他们让你做的那些事情。这样,如果你真的要上战场并体验这些事情,我们的愤怒就会爆发,就像一颗原子分裂并产生的热量一样。愤怒是不稳定的。你被送到某个地方去保卫你的生活方式,去保护你的国家、她的妇女和儿童,以及她神圣的生存权。你会变疯的,因为你不明白为什么其他人恨你[敌人],因为你是美国人。因为在你还是孩子的时候就有人不断地告诉你,你必须要去保护,这种观念就逐渐建立起来。这增加了这种愤怒。你完成你的工作。你赢了,并且回到了家乡,每个人都受到了保护。而我在保护你们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在睡觉。

你回家了,没有人在乎你曾经为他们而战斗。他们感受不到这种痛苦,周围到处都是子弹横飞,闻着尸体,嗅着汽柴油、燃烧弹、火药,还有烧到战士们头发的味道。因为他们既没有经历这些,也没有真正感到他们的自由处在危险之中,他们并没有觉得你为他们做了什么。因此,在他们的眼里,他们的自由从来没有真正受到过挑战,因此,没有必要过度反应。你没有为我做过任何事情。这种毫不领情的反应增加了他们的愤怒;而且不断地发酵。现在记住你仍然年轻,你没有应对的技巧,因为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很多很快,在这个过程中,应对技巧都失灵了。

现在,你开始觉得这是一种浪费,而你的战友们平白无故地死了,而你为什么挨了枪子呢?这让你更加愤怒,你就像一个原子快要分裂的原子弹。这是一个持续的反应。为这已经爆炸的混合物添加酒精。你就在地狱中,你不理解。你做得对。你是海军陆战队员,保卫美国。为什么命运遭受如此伤害,为什么我不想再到这里来了?你怎么也想不通;没有什么逻辑能够帮助你将这些放到一起。现在荷尔蒙、多巴胺、肾上腺素增加了,因为你总是处于一种兴奋和恐惧的状态,你大脑中流淌的维持情绪稳定的荷尔蒙都被激发起来,高高地悬在那儿。即使想处理现在你也不能处理它。

愤怒其实是一连串的事件,它在大脑中产生化学反应,然后再给它们添加一些威士忌,除非这些链条中的某个中断,否则愤怒不会走开。这就是为什么"回家"需要很多年。

我希望这能够回答你的问题。用这些信息去帮助更多人,让他们能够"回家"。将我们这些都带回家,这样你就帮助了我。

参考文献

Agar, M. (1991). The right brain strikes back. In N. G. Fielding & R. M. Lee (Eds.), *Using computer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181-194). London: Sage.

Alvarez, E., Jr., & Pitch, A. S. (1989). *Chained eagle.* New York: Donald I. Fine.

Anderson, D. (1981). Doc. In A. Santoli (Ed.), *Everything we had* (pp. 66-75).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Baker, C., Wuest, J., & Stern, P. N. (1992). Method slurring: The grounded theory/phenomenology example. *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 17 (11), 1355-1360.

Baszanger, I. (1998). *Inventing pain medicine: From the laboratory to the clinic.*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Bazeley, P., & Richards, L. (2000). *The NVivo qualitative project book.* Thousand Oaks, CA: Sage.

Becker, H. S. (1982). *Art world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cker, H. S. (1986a). *Doing things together.*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Becker, H. S. (1986b). *Writing for social scientist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ecker, H. S. (1998). *Tricks of the trade: How to think about your research while doing i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ell, K. (1993). 100 *missions north: A fighter pilot's story of the Vietnam War.* Washington, DC: Brassey.

Berg, B. C. (2006).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6th ed.). Boston: Allyn & Bacon.

Beveridge, W. I. (1963). Chance. In S. Rapport & H. Wright (Eds.), *Science: Method and meaning* (pp. 131-147). New York: Washington Square Press.

Biernacki, P. (1986). *Pathways from heroin addiction.*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Bird, T. (1981). Ia Drang. In A. Santoli (Ed.), *Everything we had* (pp. 34-43).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Blumer, H. (1969).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Bong, S. A. (2002, May). Debunking myths in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Qualitative Social Research*, 3 (2). Retrieved December 6, 2005 from http://www.qualitativeresearch.net/fqs-eng.htm.

Broadhead, R. (1983). *Private lives and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medical students.*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Cannaerts, N., Dierckx de Casterlé, B., & Grypdonck, M. (2004). Palliative care, care for life: A study of the specificity of residential palliative care.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4(6), 816-835.

Caputo, P. (1977). *A rumor of war.*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Cauhape, E. (1983). *Fresh starts: Men and women after divorce.* New York: Basic Books.

Charmaz, K. (1983). Loss of self: A fundamental form of suffering in the chronically ill. *Sociology of Health and Illness*, 5, 168-195.

Charmaz, K. (1991a). *Good days, bad days: The self in chronic illness and time.*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Charmaz, K. (1991b). Struggling for a self: Identity levels of the chronically ill. In J. Roth & P. Conrad (Eds.), *Research in the sociology of health care. Vol. 6. The experience and management of chronic illness* (pp. 203-321). Greenwich, CT.: JAI Press.

Charmaz, K. (2006). *Constructing grounded theory.* Thousand Oaks, CA: Sage.

Chesney, M. (2001). Dilemmas of self in the method.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1(1), 127-135.

Chiovitti, R. F., & Piran, N. (2003). Rigour and grounded theory research. *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 44(4), 427-435.

Clarke, A. E. (1991). Social worlds/arena theory as organizational theory. In D. R. Maines (Ed.),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social process* (pp. 119-158).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Clarke, A. E. (2005). *Situational analysis.* Thousand Oaks, CA: Sage.

Corbin, J. (1993). Controlling the risks of a medically complicated pregnancy. *Journal of Perinatal Nursing*, 7(3), 1-6.

Corbin, J. (2002, August). *Taking the work seriously: Putting the qualit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Keynote address presented at the 2nd Thinking Qualitative Workshop series,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Qualitative Methodology, University of Alberta, Alberta, Canada.

Corbin, J. (2003, November 28). *Taking the work of qualitative analysis seriously.* Paper presented at a meeting of qualitative researchers sponsored by the Japanese Red Cross, Tokyo, Japan.

Corbin, J., & Cherry, J. (1997). Caring for the aged in the community. In E. A. Swanson & T. Tripp-Reimer (Eds.), *Chronic illness and the older adult* (pp. 62-81). New York: Springer.

Corbin, J., & Morse, J. (2003). The unstructured interview: Issues of reciprocity and risks when dealing with sensitive topics. *Qualitative Inquiry*, 9(3), 335-354.

Corbin, J., & Strauss, A. (1984). Collaboration: Couples working together to manage chronic illness. *Image*, 16(4), 109-115.

Corbin, J., & Strauss, A. (1988). *Unending work and care.*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Corbin, J. , & Strauss, A. (1990). Grounded theory method: Procedures, canons, and evaluative procedures. *Qualitative Sociology*, 13(1), 3-21.

Corbin, J. , & Strauss A. (1991a). Comeback: The process of overcoming disability. In G. L. Albrecht & J. A. Levy (Eds.), *Advances in medical sociology* (Vol. 2, pp. 137-159). Greenwich, CT: JAI Press.

Corbin, J. , & Strauss, A. (1991b). A nursing model for chronic illness management based upon the trajectory framework. *Scholarly Inquiry for Nursing Practice*, 5(3), 155-174.

Creswell, J. W. (1998). *Qualitative inquiry and research design: Choosing among five traditions.* Thousand Oaks, CA: Sage.

Creswell, J. W. (2003). *Research design: Qualitative, quantitative, and mixed methods approaches*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Creswell, J. W. , & Miller, D. L. (2000). Determining validit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Theory Into Practice*, 39(3), 124-130.

Cutcliffe, J. R. (2003). Reconsidering reflexivity: Introducing the case for intellectual entrepreneurship.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3(1), 136-148.

Davies, D. , & Dodd, J. (2002).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the question of rigor.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2(2), 279-289.

Davis, F. (1963). *Passage through crisis.* Indianapolis, IN: Bobbs-Merrill.

Davis, F. (1991). Identity ambivalence in clothing: The dialectic of the erotic and the chaste. In D. R. Maines (Ed.),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social process* (pp. 105-116).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Denzin, N. K. (1987). *The alcoholic self.* Newbury Park, CA: Sage.

Denzin, N. K. (1989). *Interpretive biography*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Vol. 17). Newbury Park, CA: Sage.

Denzin, N. K. (1994). The art and politics of interpretation. In N. K. Denzin & Y.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500-515). Thousand Oaks, CA: Sage.

Denzin, N. K. (1998). The art and politics of interpretation. In N. K. Denzin & Y.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313-371). Thousand Oaks, CA: Sage.

Denzin, N. K. , & Lincoln, Y. S. (1998). The art of interpretation, evaluation, and presentation.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Collecting and interpreting qualitative materials* (pp. 275-281). Thousand Oaks, CA: Sage.

Denzin, N. K. , & Lincoln, Y. S. (2005). *The Sage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Dewey, J. (1917). *Creative intelligence: Essays on the pragmatic attitude.* New York: Henry Holt.

Dewey, J. (1922). *Human nature in conduct.* New York: Henry Holt.

Dewey, J. (1929). *The quest for certainty.* New York: G. P. Putnam.

Dewey, J. (1934). *Art as experience.* New York: Minton Blach.

Dewey, J. (1938). *Logic: The theory of inquiry.* New York: Henry Holt.

Dey, I. (1993).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Dey, I. (1999). *Grounding grounded theory*.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Downs, F. (1993). *The killing zone: My life in the Vietnam War*. New York: W. W. Norton.

Ellsberg, D. (2003). *Secrets: A memoir of Vietnam and the Pentagon Papers*. New York: Penguin.

Emden, C., & Sandelowski, M. (1999).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relative. Part Two: Goodness and the criterion problem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ursing Practice*, 5(1), 2-7.

Engelbart, D. C. (1962, October). *Augmenting human intellect: A conceptual framework* (Summary Report AFOSR-3223 under Contract AF 49(638)-1024, SRI Project 3578). Menlo Park, CA: Air Force 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 Retrieved March 1, 2007, from http://www. boot strap. org/augdocs/friedewald030402/augmentinghumanintellect/ahi62index. html.

Fagerhaugh, S., & Strauss, A. (1977). *The politics of pain management*. Menlo Park, CA: Addison-Wesley.

Fielding, N. G., & Lee, R. M. (Eds.). (1991). *Using computers in qualitative analysis*. London: Sage.

Fielding, N. G., & Lee, R. M (Eds.). (1998). *Computer analysi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London: Sage.

Finlay, L. (2002). "Outing" the researcher: The provenance, process, and practice of reflexivity.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2(4), 531-545.

Fisher, B. (1991). Affirming social value: Women without children. In D. R. Maines (Ed.),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social process* (pp. 87-104).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Fisher, B., & Strauss, A. (1978). The Chicago tradition: Thomas, Park, and their successors. *Symbolic Interaction*, 1(2), 5-23.

Fisher, B., & Strauss, A. (1979a). George Herbert Mead and the Chicago tradition of sociology. *Symbolic Interaction (Part* 1), 2(1), 9-26.

Fisher, B., & Strauss, A. (1979b). George Herbert Mead and the Chicago tradition of sociology. *Symbolic Interaction (Part* 2), 2(2), 9-20.

Flick, U. (2002). *An Introduction to qualitative research*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Flicker, S., Haans, D., & Skinner, H. (2004). Ethical dilemmas in research on Internet communities.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4(1), 124-134.

Foster, W. F. (1992). *Captain Hook: A pilot's tragedy and triumph in the Vietnam War*.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Foucault, M. (1972).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 M. Sheridan Smith, Trans.). New York: Harper & Row.

Foucault, M. (1974).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Fujimora, J. (1987). Constructing doable problems in cancer research: Articulating

alignment.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17, 257-293.

Fujimora, J. (1991). On methods, ontologies, and representation in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where do we stand? In D. R. Maines (Ed.),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social process* (pp. 207-248).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Gerson, E. M. (1991). Supplementing grounded theory. In D. R. Maines (Ed.),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social process* (pp. 285-301).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Geertz, C.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Basic Books. 362——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REF-Corbin (Basics)-45428. qxd 10/24/2007 12:17 PM Page 362.

Gilgun, J. F., Daly, K., & Handel, G. (1992). *Qualitative methods in family research.* Newbury Park, CA: Sage.

Glaser, B. (1978). *Theoretical sensitivity.* Mill Valley, CA: Sociology Press.

Glaser, B. (1992). *Basics of grounded theory analysis*. Mill Valley, CA: Sociology Press.

Glaser, B., & Strauss, A. (1965). *Awareness of dying*. Chicago: Aldine.

Glaser, B., & Strauss, A. (1967).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Chicago: Aldine.

Goulding, C. (2002). *Grounded theory: A practical guide for management, business, and marketing.* Thousand Oaks, CA: Sage.

Green, D., Creswell, J. W., Shope, R. J., & Plano Clark, V. L. (2007). Grounded theory and racial/ethnic diversity. In A. Bryant & K. Charmaz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grounded theory*. London: Sage.

Greene, J. C., Kreider, H., & Mayer, F. (2005). Combin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in social inquiry. In B. Somekh & C. Lewin (Eds.), *Research method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pp. 274-281). London: Sage.

Guba, E. G., & Lincoln Y. S. (1998). Competing paradigm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The landscape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195-220). Thousand Oaks, CA: Sage.

Gubrium, J., & Holstein, J. A. (2001). *Handbook of interview research: Context and method.* Thousand Oaks, CA: Sage.

Guessing, J. C. (1995). *Negotiating global teaming in a turbulent environment* (Microform 9613463).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Hage, J. (1972). *Techniques and problems of theory construction in sociology.* New York: John Wiley.

Hall, W. A., & Callery, P. (2001). Enhancing the rigor of grounded theory: Incorporating reflexivity and relationality.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1(2), 257-272.

Hamberg, K., & Johansson, E. (1999). Practitioner, researcher, and gender conflict in a qualitative study.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9(4), 455-467.

Hamilton, R. J., & Bowers, B. J. (2006). Internet recruitment and e-mail interviews in qualitative studies.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6(6), 821-835.

Hammersley, M. (1987). Some notes on the terms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British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13(1), 73-81.

Hammersley, M., & Atkinson, P. (1983). *Ethnography: Principles in practice.* New York: Tavistock.

Herr, M. (1991). *Dispatches.* New York: Vintage International.

Hildebrand, B. (2007). Mediating structure and interaction in grounded theory. In T. Bryant & K. Charmaz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grounded theory.* London: Sage.

Hildreth, R., & Sasser, C. W. (2003). *Hill* 488.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Hoffman, E. (1989). *Lost in translation: Life in a new language.* New York: Penguin.

Holroyd, E. E. (2003). Chinese family obligations toward chronically ill elderly members: Comparing caregivers in Beijing and Hong Kong.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3(3), 302-318.

Hughes, E. C. (1971). *The sociological eye: Selected papers.* Chicago: Aldine-Atherton.

Hunter, A., Lusardi, P., Zucker, D., Jacelon, C., & Chandler, G. (2002). Making meaning: The creative component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2(3), 388-398.

Isaacs, A. (1997). *Vietnam shadows: The war, its ghosts, and its legacy.*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Kelle, U. (Ed.). (1995). *Computer-aided qualitative analysis: Theory, methods and practice.* London: Sage.

Kelle, U. (1997). Theory building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computer programs for the management of textual data. *Sociological Research Online*, 2(2). Retrieved December 9, 2005, from http://www.socresonline.org.uk/socresonline/2/2/1.html.

Kuckartz, U. (1988/2007 [latest version]). MAXQDA—Professional Software for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Computer software]. Berlin, Germany: Verbi Software.

Lakoff, G., & Johnson, M. (1981).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amott, A. (1994). *Bird by bird: Some instructions on writing and life.* New York: Doubleday Anchor.

Langguth, A. J. (2002). *Our Vietnam: The war* 1954-1975.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Lincoln, Y. S., & Guba, E. G. (1985). *Naturalistic inquiry.* Beverly Hills, CA: Sage.

Lofland, L. H. (1991). The urban milieu: Locales, public sociability, and moral concerns. In D. R. Maines (Ed.),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social process* (pp. 189-205).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Lofland, J., Snow, D., Anderson, L., & Lofland, L. (2006). *Analyzing social setting: A guide to qualitative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Belmont, CA: Wadsworth

Thomson.

Lomberg, K., & Kirkevold, M. (2003). Truth and validity in grounded theory—A reconsidered realist interpretation of the criteria: Fit, work, relevance and modifiability. *Nursing Philosophy*, 4(3), 189-200.

Lonkila, M. (1995). Grounded theory as an emerging paradigm for computerassisted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In U. Kelle (Ed.), *Computer-aided qualitative analysis: Theory, methods and practice* (pp. 41-51). London: Sage.

Long, T., & Johnson, M. (Eds.). (2007). *Research ethics in the real world: Issues and solutions for health and social care*. Edinburg, UK: Churchill Livingstone, Elsevier Health Sciences.

Márquez, G. G. (1993). *Strange pilgrims* (E. Grossman, Trans.). New York: Knopf.

Marrett, J. G. (2003). *Cheating death: Combat air rescues in Vietnam and Laos*.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Books.

Marshall, C., & Rossman, B. (2006). *Design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Mays, N., & Pope, C. (1995). Qualitative research: Rigour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Electronic version]. *BMJ*, 311, 109-112. Retrieved on December 6, 2005, from http://bmj.bmjjournals.com/cgi/content/full/311/6997/109.

McMaster, H. R. (1997). *Dereliction of duty*. New York: HarperCollins.

McNamara, R. S., Blight, J. G., Brigham, R. K., Bierstaker, T. J., & Schandler, H. Y. (1999). *Agreement without end*. New York: Perseus.

Mead, G. H. (1917). Scientific method and the individual thinker. In J. Dewey (Ed.), *Creative intelligence: Essays in the pragmatic* (pp. 176-227). New York: Henry Holt.

Mead, G. H. (1956). *On social psychology: Selected papers* (A. Strauss,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ead, G. H. (1959). *Philosophy of the present* (Arthur E. Murphy, Ed.). Chicago: Open Court.

Mead, G. H. (1967). *Mind, self, and society* (Works of George Herbert Mead, Vol. 1, C. W. Morris,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4)

Mead, G. H. (1972). *Movements of though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Works of George Herbert Mead, Vol. 2, M. E. Moore,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6)

Mead, G. H. (1972). *The philosophy of the act* (Works of George Herbert Mead, Vol. 3, C. W. Morris,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8)

Miles, M. B., & Huberman, A. M. (1994).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Mishler, E. G. (1986). *Research interviewi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oore, C. J. (1992). *Oral history reflections of army nurse Vietnam veterans: Managing the demanding experience of war.*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Department of Nursing, 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 San Jose, CA.

Moore, H. G., & Galloway, J. L. (1992). *We were soldiers once and young.* New York: HarperPerennial.

Morgan, D. L. (1996). *Focus groups as qualitative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Morse, J. M. (1994). *Critical issue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Morse, J. M. (1999). Editorial myth #93: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re not relevant to qualitative inquiry.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9(6), 717-718.

Morse, J. M. (2001). Toward a praxis theory of suffering. *Advances in Nursing Science*, 24(1), 47-59.

Morse, J. M. (2004). Alternative methods of representation: There are no shortcuts.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4(7), 887-888.

Morse, J. M. (2005). Creating a qualitatively derived theory of suffering. In U. Zutler (Ed.), *Clinical practice and development in nursing* (pp. 83-91).

Aarhus, Denmark: Center for Innovation in Nurse Training.

Morse, J. M., Barret, M., Mayan, M., Olson, K., & Spiers, J. (2002, Spring). Verification strategies for establishing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Electronic vers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Methodology* 1(2). Retrieved July 22, 2006, from http://www.ualberta.ca/~ijqm.

Morse, J. M., & Field, P. A. (1995).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for health professionals*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Nhu Tang, T. (with Chanoff, D., & Van Toai Doan). (1986). *A Viet Cong memoir: An inside account of the Vietnam War and its aftermath.* New York: Vintage.

Ninh, B. (1993). *The sorrow of war: A novel of North Vietnam* (Phan Thanh Hao, Trans.). New York: Berkeley Publishers.

Oleson, V. (1998). Feminism and model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The landscape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heories and issues* (pp. 300-332). Thousand Oaks, CA: Sage.

O'Shea, J. (with Ling, R. D.). (2003). *The beast within: Vietnam, the cause and effect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New York: Vintage.

Park, R. E. (1967). *On social control and collective behavior* (R. H. Turner,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atton, M. Q. (1990).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methods.* Newbury Park, CA: Sage.

Patton, M. Q. (2002).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methods*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Pfaffenberger, B. (1988). *Microcomputer application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Newbury Park, CA: Sage.

Pierce, B. N. (1995). The theory of methodolog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TESOL*

Quarterly, 29, 569-576.

Piper, H., & Simons, H. (2005). Ethical responsibility in social research. In B. Somekh & C. Lewin (Eds.), *Research method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pp. 56-63). London: Sage.

Ragin, C., & Becker, H. (Eds.). (1992). *What is a case? Exploring the foundations of social inquir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asimus, E. (2003). *When thunder rolled: An F-105 pilot over North Vietnam.*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Reid, C. (2004). *The wounds of exclusion: Poverty, women's health and social justice.* Edmonton, AB: Qualitative Institute Press.

Riemann, G. (2003, September). A joint proje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 research tradition: An introduction to "doing biographical research" [Electronic version]. *Forum: Qualitative Social Research*, 4(3). Retrieved September 10, 2006, from http://www.qualitative—research.net/fqs-texte/3-03/3-03hrsg-e.htm.

Riemann, G., & Schütze, F. (1991). "Trajectory" as a basic theoretical concept for analyzing suffering disorderly social process. In D. R. Maines (Ed.),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social process* (pp. 333-357).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Roberts, K. A., & Wilson, R. W. (2002, May). ICT and the research process: Issues around compatibility of technology with qualitative analysis [Electronic version]. *Forum Qualitative Sozialforschung/Forum: Qualitative Social Research*, 3(2). Retrieved December 6, 2005, from http://www.qualitative-research.net/fqs-texte/2-02/2-02robertswilson-e.htm.

Rodgers, B. L., & Cowles, K. V. (1993).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audit trail: A complex collection of documentation. *Research in Nursing and Health*, 16(3), 219-226.

Rolfe, G. (2006). Validity, trustworthiness and rigour: Quality and the idea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 53(3), 304-310.

Rosenbaum, M. (1981). *Women on heroin.*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Rosenthal, G. (1993). Reconstruction of life stories: Principles of selection in generating stories for narrative biographical interviews. *Narrative Study of Lives*, 1(1), 59-91.

Rosenthal, G., & Völter, B. (1998). Three generations within Jewish and non-Jewish German families after the unification of Germany. In Y. Danieli (Ed.),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multigenerational legacies of trauma* (pp. 297-313). New York: Plenum.

Saiki-Craighill, S. (2001a). The grieving process of Japanese mothers who have lost a child to cancer: Part I. Adjusting to life after losing a child. *Journal of Pediatric Oncology Nursing*, 18(6), 260-267.

Saiki-Craighill, S. (2001b). The grieving process of Japanese mothers who have lost a child to cancer: Part II. Establishing a new relationship from the memories. *Journal of Pediatric Oncology Nursing*, 18(6), 268-275.

Sallah, M., & Weiss, M. (2006). *Tiger force A true story of men and war.* New York: Little, Brown.

Sandelowski, M. (1993). Theory unmasked: The uses and guises of theor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Research in Nursing and Health*, 16, 213-218.

Sandelowski, M. (1994). The proof is in the pottery. In J. M. Morse (Ed.), *Critical issue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pp. 46-63). Thousand Oaks, CA: Sage.

Sandelowski, M. (2000). Whatever happened to qualitative description. *Research in Nursing and Health*, 23, 334-340.

Santoli, A. (Ed.). (1981). *Everything we had: An oral history of the Vietnam War by thirty-three American soldiers who fought it.*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Santoli, A. (1985). *To bear any burden.* New York: E. P. Dutton.

Sar Desai, D. R. (2005). *Vietnam past and present.* Cambridge, MA: Westview Press.

Schatzman, L. (1986). *The structure of qualitative analysis.* Paper presented (in absentia) at the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 Session on Issues in Qualitative Interpretation, New Delhi, India.

Schatzman, L. (1991). Dimensional analysis: Notes on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to the grounding of theory. In D. R. Maines (Ed.),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social process* (pp. 303-314).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Schatzman, L., & Strauss, A. (1973). *Field research.*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Schawndt, T. A. (1998). Constructivist, interpretivist approaches to human inquiry.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The landscape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heories and issues* (pp. 221-259). Thousand Oaks, CA: Sage.

Schneider J., & Conrad, P. (1983). *Having epilepsy: The experience and control of illnes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Schütze, F. (1992a). Pressure and guilt: War experiences of a young German soldier and their biographical implications, Part 1.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7 (2), 187-208.

Schütze, F. (1992b). Pressure and guilt: War experiences of a young German soldier and their biographical implications, Part 2.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7(3), 347-367.

Seale, C. (1999). *The quality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London: Sage.

Seale, C. (2002). Qualitative issues in qualitative inquiry. *Qualitative Social Work*, 1 (1), 97-110.

Selye, H. (1956). *The stress of life.* New York: McGraw-Hill.

Sheeham, N. (1998). *A bright shining lie: John Paul Vann & America in Vietnam.* New York: Random House.

Shibutani, T. (1966). *Improvised news: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rumor.* Indianapolis, IN: Bobbs Merrill.

Shibutani, T. (1991). On the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self-concept. In D. R. Maines (Ed.),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social process* (pp. 59-69).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Shuval, J. T., & Mizrahi, N. (2004). Changing boundaries: Modes of coexistence of alternative and biomedicine.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4(5), 675-690.

Silverman, D. (2004). *Do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Smith, W. (1992). *American daughters gone to war.*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Somekh, B., & Lewin, C. (2005). *Research method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London: Sage.

Sparkes, A. C. (2001). Myth 94: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ers will agree about validity. *Qualitative Health Journal*, 11(4), 538-552.

Star, S. L. (1989). *Regions of the mind: Brain research and the quest for scientific certain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rauss, A. (1978). *Negotiations: Varieties, contexts, processes, and social order.*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Strauss, A. (1987). *Qualitative analysis for social scientist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trauss, A. (1991). The Chicago tradition's ongoing theory of action/interaction. In A. Strauss (Ed.), *Creating sociological awareness* (pp. 3-32).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Strauss, A. (1993). *Continual permutations of action.* Hawthorne, NY: Aldine de Gruyter.

Strauss, A. (1995). Notes on the nature and development of general theories. *Qualitative Inquiry*, 1(1), 7-18.

Strauss, A., & Corbin, J. (1988). *Shaping a new health care system.*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Strauss, A., Fagerhaugh, S., Suczek, B., & Wiener, C. (1985). *Social organization of medical wor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trauss, A., Schatzman, L., Bucher, R., Ehrlich, D., & Sabshin, M. (1964). *Psychiatric ideologies and institu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Suczek, B., & Fagerhaugh, S. (1991). AIDS and outreach work. In D. R. Maines (Ed.),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social process* (pp. 159-193).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Summers, H. G., Jr. (1999). *The Vietnam War almanac.* Novato, CA: Presidio Press. Terry, W. (1984). *Bloods: An oral history of the Vietnam War by black veterans.*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Thomas W. I. (1966). *On social control and collective behavior* (M. Januwitz,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rotti, J. (1984). *Phantom over Vietnam.* Novato, CA: Presidio Press.

Tucker, S. C. (1998).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Vietnam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Van Devanter, L. (1983). *Home before morning.* New York: Warner Books.

Van Manen, M. (2006). Writing qualitatively, or the demands of writing.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6(5), 713-722.

Vanhook, P. M. (2007). *Comeback of the Appalachian female stroke survivor: The interrelationships of cognition, function, self-concept, interpersonal, and social relationship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East Tennessee State University.

Watson, L. A., & Girad, F. M. (2004). Establishing integrity and avoiding methodological misunderstanding.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4(6), 875-881.

Waugh, B. (with Keown, T.). (2004). *Hunting the Jackal.* New York: HarperCollins.

Weiss, R. S. (1994). *Learning from strangers: The art and method of qualitative interview studies.* New York: Free Press.

Weitzman, E. A., & Miles, M. B. (1995). *Computer programs for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Thousand Oaks, CA: Sage.

Wiener, C. L. (1991). Arenas and careers: The complex interweaving of personal and organizational destiny. In D. R. Maines (Ed.),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social process* (pp. 175-188).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Wiener, C. L., Fagerhaugh, S., Strauss, A., & Suczek, B. (1979). Trajectories, biographies, and the evolving medical sense: Labor and delivery and the intensive care nursery. *Sociology of Health and Illness*, 1(3), 261-283.

Whittemore, R., Chase, S., & Mandle, C. L. (2001). Validit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1(4), 522-537.

Whyte, W. (1955). *Street corner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Wicker, A. (1985). Getting out of our conceptual ruts: Strategies for expanding conceptual frameworks. *American Psychologist*, 40(10), 1094-1103.

Winter, G. (March 2000). A comparative discussion of the notion of "validity" in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Electronic version]. *Qualitative Report*, 4(3 & 4). Retrieved December 6, 2005, from http://www.nova.edu/ssss/QR/ Qr4-3/winter.html.

Wolcott, H. (1994). *Transform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Wolcott, H. (2001). *Writing up qualitative research*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Wolcott, H. (2002). Writing up qualitative research... better.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2(1), 91-103.

Yamamoto, N., & Wallhagen, M. I. (1997). The continuation of family caregiving in Japan.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38(June), 164-176.

Yarborough, T. (2002). *Da Nang diary: A forward air controller's gunsight view of combat in Vietnam.* New York: St. Martin's.

译后记

本书的翻译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接受这项任务大概是四年前的事情了，当时策划人雷少波先生问我是否愿意翻译这本书，并表明出版社对本书翻译出版的重视，也说明了翻译可能存在的难度。也许正是因为他说有难度我才愿意接受这个挑战。通过前几次的翻译，我已经体会到翻译的痛苦。就像我的博士沈文钦所说，"翻译是一个体力活"，不仅在学术上被认可的程度低，而且还可能面临被批评、被嘲讽的风险。这么长篇幅的学术著作，汉语近40万字，认真读完就要不少时间，更不要说一字一句地翻译出来，而且还要推敲、斟酌及校订等。这让我想起了文中那些越战老兵在越南战场上的痛苦：无法摆脱，只能面对。和他们一样，我也只能"采取多种心理策略"：想着自己在学英语，想着先睹为快，想着这也算作是工作量，也算是为学术界做贡献，想象着书出版后的样子……有时候就用Word软件的"数字统计"功能统计翻译出来的数字，看着越积越多的文字，也是一种很好的心理安慰。翻译的最大快乐可能来自于翻译中不断扫除文字上和理解上的障碍。有时候，我会被作者深刻的洞见所折服，或者为自己能够理解作者写出来的话而感到欣慰。

记得读博士时，在陈向明老师的质性研究课上，感受最深的是"质性研究能够改变人"。这也是我现在经常向我们的研究生灌输的观念。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需要我们去改变我们的社会。"人们选择做研究，因为他们都有梦想，即在某种程度上，通过他们的洞见和理解而对这个世界产生影响。"而作为研究者，首先需要改变的是我们自己，要学会倾听，走进他人的世界，要设法去理解他人。翻译的过程也是一个理解的过程。施特劳斯和科宾带着我走进了一场理解特定历史阶段特定群体的历程。他

们让我对越战老兵有了更深的理解，尽管作者的目的是在研究方法及研究程序上。我们一方面跟着作者学习质性研究方法，另一方面，也可通过作者的研究来理解越战老兵的生活经历。这正是本书的特色之一。翻译不仅让我们对质性研究方法——确切地说施特劳斯和科宾的扎根理论——有了更多的了解，让我们体验了一场做扎根研究之旅，而且让我们学会了理解人——理解那些可能被我们忽视的人。我们可以从作者的感受中体验这一情景：

> 除了增加对资料的敏感性之外，自从开始该研究项目之后，我发现很有趣的是我自身的变化。我情不自禁为我所读的战争故事所感动。我看过有关战争的电影和书籍。但是在分析过程中，在分析与资料之间发生的互动改变了我对战士的想法和感受。这和承担起他人的角色有关，体验一下暂时将自己看作是士兵的感受。我知道我再也不会以同样方式看待任何一场战争的退伍老兵了。我注意到，当我分析资料时，我对将年轻人卷入越战的情境和制定致使越战难以胜利的交战规则感到愤怒。我对战中和战后造成的创伤和无辜"陷战"的敌军和民众感到哀痛。这是一个艰难的时期。同时，我知道我不能带着感情做这个研究。但是没关系，我坚持对故事的参与者保持中立，不能因愤怒和其他情绪冲昏头脑，从而使自己的研究失效。

质性研究者应具有好奇心、创造性，要敢于相信自己的直觉。但作为研究者，还要有一颗清醒的头脑。因为研究最重要的是"也许渴望超越已知和进入参与者的世界，从参与者的视角看这个世界，以及通过做质性研究的发现，继续发展经验知识"。这是我们作为研究者的责任。做质性研究有很多种不同的类型和研究取向。本书作者将芝加哥的互动主义和实用主义结合起来，为我们呈现了一种非常有用的方法论取向以及研究程序，对我们做质性研究，尤其是学习分析质性资料一定会非常有用。因为它是一位"不在场的教师/导师"。我相信，耐心的读者一定会从阅读

本书中获益。

我在研究生课上使用了该书的英文稿，我要感谢安徽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2011级研究生：夏晓丽、刘玲、刘爽、董波波、黄慧子、王莹、杨婷、史洋玲、张小兰、王立军，他们参与了该书部分章节初稿的翻译工作。我还要感谢北京大学陈向明老师对本书修订提出的指导建议，感谢安徽大学虞宝桃老师对该书部分内容的修改建议。最后还要感谢雷少波和邹荣，他们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很多的辛苦！由于本书由我最后统稿，所有问题都应该由我负责承担。请热心的读者发现问题后能够及时反馈给我，以便再版时修订。我的联系方式：zhgm2000@126.com。

朱光明

2014年12月12日

于安徽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for Developing Grounded Theory 3e, by Juliet Corbin and Anselm Strauss.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SAGE Publications of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and Singapore, © 2008 by SAGE Publications, Inc.

版贸核渝字(2009)第 013 号